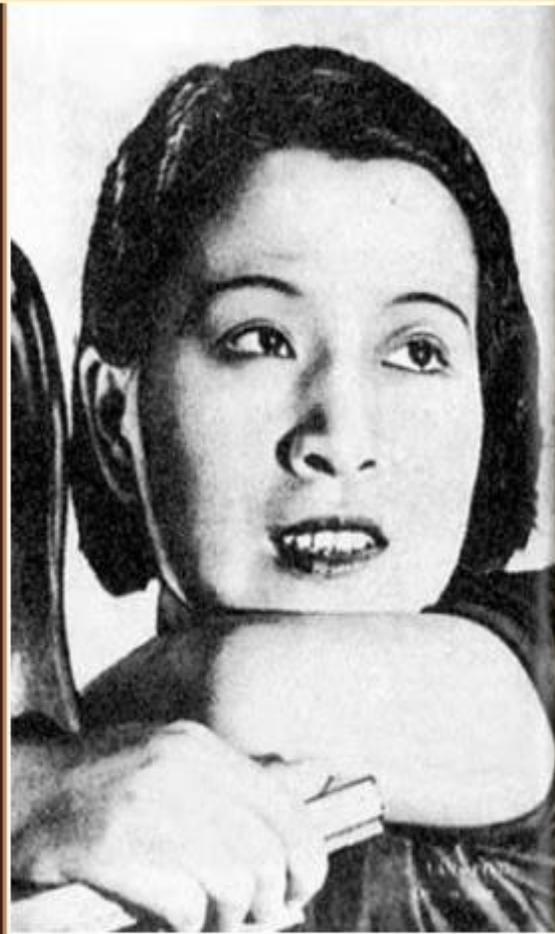




无畏的战士 伟大的旗手

江青在她的时代（上）



中流社编写组

江青在她的时代

（根据《江青同志》《红都女皇》改写）

中流社编写组

“哪怕是在睡梦中，我都常常梦见中国大地插满了我们自己的红旗。并且坚信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遍地都会插上共产主义的红旗！”

——江青

我从未跟外国人谈及过我的过去。你是第一个。

——江青

上 部

目 录

第一章 时不我待.....	3
第二章 童年旧事.....	44
第三章 入党前后.....	78
第四章 左翼联盟.....	153
第五章 新秀残影.....	216
第六章 延安之路.....	327
第七章 大众文化.....	440
第八章 进城赶考.....	515

第一章 时不我待

没想到我的中国之行竟然始于中美关系戏剧性逆转的 1971 年夏天，两个国家已经相互漠视了二十多年。

独具匠心的冷战思维一直惧怕共产主义，独具一格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也一直在躲避着我们。

长期以来我们愚昧无知的政策根本无法理解中国人的“自力更生”的原则，更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怎么就可以打败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就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随着极具魔法的“现实主义”的诞生，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转向，并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先是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的秘密谈判，紧随其后的是著名的尼克松总统北京之行。

当我们从电视里看到这历史性的一幕时，不得不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估这个对我们既充满热情但同时又充满敌意的有着超过八亿人口的大国——中国。

逆转的速度是惊人的。当年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被迎进了联合国。中国的极具文化外交技巧的手臂一下子就延伸到了美国。

美国人民渴望了解“真正的”中国的愿望，迅速地高涨了起来。

我便是其中最幸运的一员。

不像许多我的同事那样，首先得赶往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申请签证，我被免了这道手续。

一直生长在冷战时期的我，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史，可到了六十年代仍被这个国家拒之于国门之外，找不到亲临其境参与“学术”研究的机会。

机会，转眼即逝。

1971年晚秋，我有了一次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现代中国研讨会的常规讲学的机会。

当晚，我住在了一家并不显眼的酒店——罗斯福酒店。

翌日，用过早餐，我在酒店大厅刚打开手中的《纽约时报》，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人影，一晃而过。

我用眼角扫描了一下，但见此人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国字脸，身材魁梧，目光如炬，刚修剪过的短发，身着高衣领的海军蓝上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个官方访美代表团被临时性地安排在了这家酒店的十四楼。而我恰巧与他们住在了同一家酒店。

为了赶下一个约会，几分钟后我起身往电梯走去。刚上十四楼，便闻到走廊里飘散着一股淡淡的传统的中华料理的清香。

五年前在台湾时，我早就熟悉了这种味道。

是中国北方早餐最常食用的煎饼的味道。或许他们的茶壶此刻正舒舒服服地“躺”在酒店早已过时的散热器上吧？

电梯门开了。

门口出现了两名牛高马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酒店服务生。

“身份证，你的。”

我向警官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目的？”

当我笨嘴笨舌地向他解释我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中国人和中国政策一样感兴趣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中国人在门后正好奇地盯着我。

他示意叫我过去：

“Ni Chi Le Ma？”（你吃了吗？）

然后又问了我一些关于他的同胞（中国人）在美国这个城市里如何与美国人相处的问题。

谈话中，他对我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他消失了。

一会儿，从门后走出一位身材消瘦身着短袖衬衫和宽松长裤的年轻人：

“我姓刘。”

他很有礼貌地将我让进了一间小小的房间。

我们坐了下来。

他给我端了杯茶，又给我上了支烟。都是中国产品。

双方说话的语调都很快，连珠炮似地夹杂着中文、法语和英语，我们彬彬有礼地交谈起来。我们谈了中国外交政策转向的问题，也谈了两国交换留学生的的问题。也许这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

尽管这些问题两国政府之间的态度目前依然都很不明朗，但我俩谈得仍然十分投机。

双方谁都没有提及“毛主席”这个名字。

起身离开时，刘先生友善地邀请我过些时间再来。穿制服的服务生一直将送进电梯里。

电梯下降时，他突然开口道：

“你一定以为我是这家酒店的侍应生吧？不仅如此，我还是一名保卫人员。我是约翰·杰伊大学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如果真如你说的你是一名教授的话，那么你能帮我修改一下我的社会生态学毕业论文吗？”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加快步伐离开了酒店。

路上行人稀少。

过了好几条街之后，才将他那略带稚嫩的声音甩在脑后。

那次奇异的谈话，让我想起了长期以来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我们总是用被扭曲了的视角去看待共产主义。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差点迫使我忘记：共产党人的说话和行为方式也总是受偏激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几个星期后，因另一个学术研讨会我又回到了纽约。

中国人已经换到了西六十六大街另一家酒店。他们可以更自由地与持不同政见的美国人接触。

我决定利用会议后剩下的几个小时去回访他们。在当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很容易作出的决定。

我打了差不多有二十多个电话。

其中美国移民局的一位官员甚至将我的电话接到了联合国（中华民国“台湾”）办公室。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一个愤怒的男人在咆哮：

“共产主义强盗不住在这里！”

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刘先生的助手何利良先生。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驻海外首席谈判代表。他帮我联系上了黄华大使的夫人。

回访定在了当天下午。

谈话中，她不时变换着中文或法语（她学的专业是法语）。更多的是用法语。

会谈中，大使馆二秘高亮先生加入了进来。

高先生个头高大，性格豪爽，十分健谈。他只会说中文。他的博学更让我吃惊。他甚至知道我正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现代女权运动的新书。并十分认同我对青春期反叛心理的论述。有一些老革命家在与人合著的《回忆录》中也常常提到我的名字。

《红旗飘飘》第十六卷收集了一些持不同意见者发表的评论。警告读者不要被我的错误思想所迷惑。

他们对我早期发表的一些文章也很有研究。尤其是其中的一篇《毛泽东、妇女及其五四运动》。关于妇女参加社会革命的问题，我们争论的很厉害。何利良明确表示妇女应该和男人一样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我参加了一个考察队在亚洲和欧洲实地考察了两年。1967年秋天，回到伯克利。考察期间听到了许多关于江青的传说。更让我着迷的是，毛泽东的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妻子怎么一夜之间就登上了国家权力的顶峰？！我有了一种冲动，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很想走近她，了解她。将她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她，认识她。

我知道我的想法有多么的荒唐，而且根本不可能实现。

1966年，中国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令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大跌眼镜的是，一向沉默寡言几乎被所有人忽视的江青同志却冲在了这场大革命的最前沿。用她的女性的魅力征服了所有人，包括被她打倒的“敌人”。

在旧社会，作为一名演员，她既不是一个大美人也没有什么引起轰动效应的作品。除了气质(与众不同桀骜不驯的高雅气质)之外，大多数时间陪伴她的是孤独。她只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中最普通的一名孤独矜寡之人。

可是，随着她一夜之间飙升到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有关她的各种传闻也同样与之俱增起来。尤其是有关她的电影明星时期的恋情，更是被各种别有用心的人炒作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

六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浸泡在这样的令人恶心的黏液之中，满眼都是脏污的文字。

各种内容不实的报告，为江青树立起了卑劣的不公正的国际形象。外国图书馆里，除了漏洞百出的错误文件之外，就只剩下几篇对江青同志褒贬不一的《回忆录》了。

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有幸亲自接触到这位颇具争议的女士。

何利良先生来电话咨询我的意见：

“介不介意高亮以你的名义写信给北京代表处？联系去中国实地考察当代中国女性？”

我有些喜出望外，未加思考便脱口而出：

“当然，我一点儿也不介意！”

我刚回到纽约宾厄姆顿国立大学讲授二十年代中国的女权运动和思想文化史。有的是时间。

几个星期过后，高给我打来了电话。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按捺不住的兴奋：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已正式发出邀请，邀请你去中国参观访问。”

对外友协是中国政府处理与中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的一个非官方机构。

我是以个名义受到邀请的，在华期间的一切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

高告诉我，用不着再去渥太华大使馆办理申请。相关单位已经为我办好了一切手续。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一个褐色的牛皮信封。里面装着我的新护照。当然，已经办好了签证。

1

七月八日，我飞到了香港。

前来开泰机场接机的是对外友协的几位朋友，态度和蔼可亲。他们笑容可掬地将我安排进了当地一家极不起眼的旅店。

翌日清晨，带队的赖先生和另外两位同事陪同我坐火车过九龙半岛到达深圳镇——连接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一个边境小站。

这儿，一边是所谓的西方文明社会，另一边是众所周知的“红色中国”。不是亲临其境根本无法想像人类历史文明发展到今天竟然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回头眺望了一眼香港的小山顶。那里的人民长期以来受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他们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标准同样是生活在桥的另一头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和接受的。至少目前是这样。

刚过罗湖桥头，映入眼帘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田野里战天斗地的是农民兄弟。人人都怀着远大的革命理想。

或许，这就是马克思先生倡导的理想社会吧。

离开深圳，继续乘火车。

在广州火车站迎接我的是当地友协的另外两位女同志。一位年轻姑娘和一位中年妇女。两人对我都热情似火。

午休后，（这里的人，都有睡午觉的习惯。）等待我的是一餐丰盛可口的南方佳肴。

饭后，安排我乘机飞往北京。

飞行员不停地报道天气预报。途中，因天气原因我们被迫在郑州停留了一个晚上。

这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日程。

天气闷热难受，小旅馆里叽叽吱吱直摇晃的木板床更让人难受。总之，弄得我彻夜未眠。

在首都机场，我见到了北京市对外友协前来接机的朋友。于淑莲，翻译。年龄在三十开外；陈文超，实习翻译。年龄不到三十；陈明新，年龄最大，应该有四十多了。她是头儿。在接下来的六个半星期里，她们负责全程陪伴。三人虽说年龄有所差异，前后也就相差那么十来岁。但她们全都接受的是正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全都是原则性极强的人。老陈不会讲英语。但她学富五车，知识渊博，思想敏捷，十分健谈。

有她们三人相伴，此次北京之行一定不会无功而返。

我们驱车前往下榻的宾馆，沿途道路宽广，柳树成荫。

刚在北京饭店放下行李，就有人催促我提交此行的行程表和打算访问的人员名单。行程自然包括我想要去的几个主要城市。我的采访对象自然也都不是普通的人。至少也应该是学术界最杰出的妇女代表。说真的，当时我脑子里并没有具体的人员清单。当然，更不敢想像我能奢望有机会采访到她。

开始的三个星期，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北京。期间去了一趟古都西安（中国唐朝的首都，假戏公元618至960年），和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就是在这个地方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

每到一个地方，都是由翻译安排采访对象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人都是被精挑细选出来的各阶层的革命代表。政治意识形态完全相同。

千篇一律的谈话，让人感到沉闷乏味。

他（她）们总想说服我，向我证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是的，坦诚相待的回忆加上她们现有的资历和地位，老一代女革命家用她们的亲身经历，向我证明了正是依靠革命的理想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才有可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赢得这场革命的胜利。

她们语言质朴却不乏幽默感。

年轻人，用她们的话说：“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人，比她们的长辈更有自信心。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仿佛只长着一个脑子。不论年轻的，或是年长的，也不论男的或女的，他（她）们对捍卫党的路线以及对领袖的忠诚，绝对都是坚贞不二的。

私底下我也曾悄然问过一些很敏感的问题。比如说刘少奇（毛第一个打倒的人）。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 - 1969年11月12日），本名（谱名）绍选，字渭璜，湖南省宁乡县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者人之一。中共政治家和理论家。

关于毛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批判“刘邓”路线？国外有许多这方面的报道。当然是鱼目混杂，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令人真假难辨。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人都钳口无语。不是摇头，就是回避。

也许时间会向我说明这个问题。

可是多年以后（毛的政权倒了），政坛上升起的却只有邓小平，依然没有刘少奇。当年他俩不是一起被打倒？一起挨批判的吗？为什么中国人只为邓小平翻案？不为刘少奇平反呢？

这是后话，这个问题我只能问我自己。

可是我的读者不会自己问自己。他们在等待着我的答案，或者说是我给他们寻找到的答案。

从第三周开始，我的采访日程被排得越来越满了。可说是到了挑战我体力极限的程度。我被安排整天与历史学家、医学界人士和文艺界的演员们座谈。大多数人是女性。有时候，我们也会产生争论。结果每每是弄得我又累又渴，而且又无法战胜她们的传统思想。

偶尔，我发现自己是在扮演魔鬼（刘少奇修正主义卫道士）的角色，唯一可供我选择的结果是，被她们批驳的哑口无言。

2

八月十一日晚，我的陪同人员通知我说：

“明天上午，邓颖超同志和康克清同志要来看你。与你讨论妇女运动的起源。”

邓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

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康是朱德总司令的夫人：

康克清，朱德夫人，1911年9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的一个贫苦渔家。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江西万安人。她1928年上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与朱德结婚，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康克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始终保持着质朴大方、和蔼和亲的形象，人们崇敬而亲昵地称她“康大姐”。她为祖国的教育和妇幼保健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所著《家庭教育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强调了家庭教育对少儿成长的重要性；撰写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妇女的解放》，以亲身体会阐明了自己的一贯主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妇女走上解放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妇女，妇女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邓颖超和康克清二人都是中国妇女运动最早和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她俩同时来看我，不仅使我感到意外、惊喜，甚至可说是受宠若惊。但更多的却是感到不安，而且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

回到酒店，我没有坐电梯，而是沿着长长的楼梯一路攀爬上去。

进了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拧开热水笼头，将自己疲乏的身体浸泡在热水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走出浴室时，天安门广场依旧是灯火通明。

那儿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接见成千上万革命群众的地方。

想到明天的会见，我得抓紧点儿时间先睡一觉。

早上九点，会见准时在外交部举行。

邓颖超、康克清和其他几位女性领导出席了此次会见。邓大姐六十开外的年纪，身材纤细。可谁也想不到的是如此柔弱的躯体里却蕴藏着无限的能量。她性格开朗大度却不失幽默。

所有与会者都向我讲述了革命五十余年以来她们的亲身经历。

回到北京饭店时，我头脑里已经装满了她们的传奇故事。

生平第一次睡了一个午觉。足足睡了有两个小时。要不是于淑莲叫醒我，我恐怕还会继续睡下去。打搅别人午睡，在中国这可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

于在我耳边悄声细语道：

“下午，有人要来看你。”

“谁？”

“不知道。”

她有些暧昧地搪塞道。

过了一会儿，她再次出现在我的房门口，正式向我下达通知：

“请作好准备，领导要来看你。”

接着补充道：

“我会叫服务员准备好上好的茶叶和干净的杯子。”

一会儿功夫，桌子上就摆放好了纸和笔记本、茶叶、矿泉水还有新鲜的水果。

于又回来了。眼睛里放着光，显得非常激动：

“来了。她们来了。好像江青同志也来了！”

不一会儿，有三个人走到了我门口停了下来。她们的衣着十分简朴。苏珥薇和孙炅芸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作着自我介绍。态度和蔼可亲，一句话就能听出来，她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党务人员。

我用蹩脚的中文向她们问好，没想到她俩却能说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而且带着明显的英国上流社会的口音。

孙先开口：

“听说您对江青同志的事迹很感兴趣。”

停了停：

“江青同志特别指示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提纲。一共四个部分。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

“为什么这么急？”

“我们也不知道。”

她俩微笑着答道。

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她俩轮流地为我翻译江青同志的讲话。主要内容是1966年2月下旬部队开展文艺工作。即文学艺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

我的任务不光是听听而已，而且很认真地作笔记。每当我有疑虑或者是什么地方听不懂的时候，她们非常耐心地向我解释，直到我重新提起笔来。

“不好意思，耽误你们这么多时间。其实只要将江青同志讲话的原稿交给我自己看就可以的了。”

“不用客气，这是江青同志亲自交待的任务。”

直到我回来美国之后，重新整理笔记时，才真正明白江青同志的良苦用心。当时正值文革期间，所有文字都要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批才能对外公布。这场革命甚至让像林彪和陈伯达这样的高级别的军事家和老资格的革命家都落了马，被“清理”出了革命队伍。

她们一直坚持口头宣讲文件和江青同志写的未经审查的报告，直到五点半钟于过来敲门才停止工作，开始收拾手中的黑色塑料袋（公文包）。然后，很有礼貌地向我道别。

她们刚走一会儿，我还没有从兴奋和疲惫状态中恢复过来，于过来吩咐：

“赶紧收拾一下个人卫生！”

今天实在是太累了。从早晨到现在一刻也没有休息。上午是与几位妇女代表座谈，下午听报告。而且我还得赶紧将笔记整理出来。

“我想先吃点儿东西，再将今天的学习内容总结和消化一下。”

“不行！”

于立刻否定了我的请求。态度十分坚决。

“为什么？”

“因为今晚江青同志有可能要来看看你。快点儿吧！”

于没有再多说什么。

具体会见的时间、地点和内容，我一概不知。

第一次见到江青同志是八月一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五周年庆典。我与江青同志中间隔着四张桌子。

江青同志坐在几位显赫的老革命家中间。其中有朱德和董必武，都是年过八旬的老革命。

江青同志身着灰色制服，正与柬埔寨西哈努克夫人谈得十分起劲。我远远地望着她，心中充满了敬意。

江青同志留给我早期的印象是一张1960年发表的照片。摄于1950年。江青同志落落大方地面对镜头，开怀大笑的照片。

“二十分钟后出发！”

于明确下达了指令。

我赶紧“冲”进浴室，洗了一个冷水澡。为防止感冒，我吞下了双倍的头痛药。不过，更让我头痛的事是我带来了两条连衣裙却不知道该穿哪条？

“我说，黑的比红的好。”

于帮我作出了选择。

殷勤好客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当我们乘座的小车在警车的护卫下在长安街上呼啸而过的时候，我真真的被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感动了。

不仅如此，在吃住方面也是极尽地方之谊的。美中不足的是，客人被“看管”的太严，没有行动“自由”。

小车沿着宽广的长安大道一直将我送到了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领导人开会和办公的地方。

江青同志特意将会见的地点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由此可见她对我的重视和尊敬。

官方的媒体也全都被调动起来了。

新华社的摄影师和各大报社的记者蜂拥而至，镁光灯不停地闪烁，让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成了电视明星一样，竟有了几分飘然然晕乎乎的感觉。

前厅里云集着许多在江青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员，其中包括有毛泽东主席的亲侄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同志。（王海容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同时也是一位较有名望的无党派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后来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对王海容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海容”这个名字，有说是她祖父给她起的，也有说

是毛泽东为她改的，乃是取自古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希望她要胸怀四海，博学广闻。)

我们穿过内庭，被带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

一位男高音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江青同志就在隔壁的房间，请大家做好准备。”

3

门开了。

江青同志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脸上挂满了微笑。

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目不转睛地紧盯着我的眼睛。仿佛一眼就能看穿我的内心世界似地。

江青同志松开了紧握住我的手，只是我们俩人的眼睛并没有分开，足足对视了有两分多钟的时间：

“你很年轻，比我想中的要年轻多了。”

她笑了。说自己老了，都快六十了。

在革命者的队伍里，有时候年龄也能成为骄傲的资本。

接下来，她仔细地端详着我的脸、头发、衣服以及我穿的高跟凉鞋。弄得我心里砰砰直跳，还以为自己什么地方出洋相了呢。

江青同志身着棕色的制服，戴着宽边眼镜。依然是我在六十年代早期从照片上见到她时的模样。

她很健康，橄榄肤色中散发着闪光的热量。她的鼻子和脸颊线条分明，像是被雕塑出来的一样与毛泽东的高大形象极为般配。她鼻尖上有一颗肉色的小痣，即便是近距离不经意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她身高足有五英尺五寸，像大多数山东人一样。我俩面对面地站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似乎我比她更高。江青同志皱了皱眉，用嘲笑的目光盯着我的高跟鞋，耸了耸肩摆出一付不公平的姿势。

江青同志身材苗条、斜肩、细腰，集东方人的柔韧性和优雅于一身。举手投足之间透着一股古典贵妇的高雅简朴的气质。

江青同志身着灰色的裤子，丝绸衬衫配束腰外衣。像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脚上穿着塑料凉鞋。不同的是她穿的是白色塑料凉鞋，这种颜色的塑料鞋极为少见。再配上白色的塑料手提包仍不失为无产阶级审美观的最佳搭配。其穿着打扮与邓颖超极为相似，只是衣服的质地要破旧一些，骨子里透着一股无产阶级的本色。

我站在江青同志的左手边，我的左手边是姚文元，姚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政治人物。

姚文元中等身材，秃头。身着灰色中山装，头上戴了一顶鸭舌帽。脚上同样穿的是塑料鞋。他比江青同志整整年轻了十多岁。从他的举止言行中，明显可以看出他对江青同志的敬重和屈从。

江青同志领着我们进了会客室。谈话的内容是历史和文化。谈话中双方都极力去评论（抨击）对方的文化。

偶尔我俩会使用普通话，谈论一些轻话题。在谈论有关她过去的的生活、现在的工作等问题时，都是通过英语翻译来完成的。江青同志带来的翻译是孙灵芸和苏珥薇，英语水平极高。

我俩谈得十分投机，完全被她的鲜明的人格和革命的人生经历所折服，有时甚至忘了做笔记。江青同志笑着对我说：

“别在意，所有的东西都录在了磁带上，整理好交有关领导审阅后，会给你一份的。中、英文的都有。”

会客室的室内布置也完全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革命的精神。沙发、茶几都是木（红木）家具。

助理和翻译坐的是折叠椅。

服务员送上来的茶带着浓郁的香味，使用的茶杯说是宋代的古董。据说已有成百上千年的历史。

不同的是，江青同志使用的茶杯上系了一根红线，将杯盖和杯子连在了一起。手旁的电动呼叫按钮上盖了一块小毛巾，可随时呼叫服务员或身边的工作人员。

晚宴十点钟开始的，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放了一张很大的圆桌和十张椅子。我坐在江青同志的左手边，我的左手边是姚文元。

菜单看来好象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其中就有我最喜欢的北京烤鸭。

每上一道新菜，江青同志总要笑着向我介绍菜名、所用材料及有关这道菜的历史典故。

当烤鸭被切成薄片放在精巧的盘子里端上桌时，姚文元同志亲手教我怎样用地道的方法食用这道地道的中国名菜。

我点头向他表示感谢。

这是我一生中尝试过的最美的菜肴。北京烤鸭鲜美的味道连同复杂的食用方法，令我终身难忘。

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次见到姚文元同志，也是最后一次。实话实说他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倒是后来打倒《四人帮》，带“被告人”的时候，他与江青同志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给我留下的印象要深刻的多。

晚宴的主人是江青，姚极少说话。但我觉得他是在我整个访问中国期间，政府官员中唯一能完全理解我的人。至少在语言方面。

每当他有疑问，便举起双手召唤翻译：

“她说什么？”

虽然他说的是“普通话”，却带着浓浓的上海方言。

第一道菜“打扫”干净之后，一个新面孔的年轻漂亮的女孩托着一个巨大的盘子来到客人面前。盘子里盛着已烤成焦糖色的烤鸭。给客人看过之后退到屏风后面。

他们在那儿“肢解”鸭子。

先是切下皮肤，然后剔除骨头。

骨头架子用来煲汤，是下一道菜的主要原料。

我对姚说：

“最近，我参观了中古（古巴）友谊人民公社。在那儿，我看到了鸭子的整个喂养过程。”

姚补充道：

“准确地说，是北京填鸭。”

“是的。我将整个喂养过程都拍了下来。他们用一根很长的软管给鸭子灌食。”

“你喜欢摄影吗？”

江青插话道：

“我也喜欢拍照。我照过许多相片。”

接下来我们的话题从烤鸭转到了摄影上面。

我在北京拍的照片中许多是中国人清晨在公园里晨练的情景。男男女女的，有人在打太极拳；有人穿着古老的戏装在唱京剧。

“你有拍过《北海日落》吗？”

江青问道。

“没有。”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去过北海公园。

“不要紧。我拍过一张。照得不太好，但可以送给你。”

江青还告诉我说，她曾拍摄过大量的照片。大约有一万张左右。最近几年，她销毁了三到四千。还有更多的将被淘汰。尤其是那些缺乏艺术和历史价值的照片。

“你怎么就照了这么多的照片？”

“仅仅是我的个人爱好和兴趣而已。”

江青不仅照片拍的好，而且还有极好的自我修养。她的速记做得更好。

周总理接见外国客人，许多场合都是由她担任现场记录员。

1970年9月当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洛伊斯·蕙勒·斯诺来到北京时，江青正在家里午睡。在没有事先联络的情况下临时通知她出面接待这位最尊贵的客人。匆忙中来不及准备任何像样的礼物。

斯诺夫人通过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特意带了件礼物给江青同志。

“你有见过斯诺夫人吗？”

我没有见过斯诺夫人，却读过许多斯诺先生写的东西。并与斯诺先生的前妻尼姆·威尔士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她1930年来到中国，曾是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斯诺先生现在的爱人对中国同样非常友好。如果你有机会见到她，请代为转达我对她及她的家人的问候和祝福。希望他们都能再来中国。

等你什么时候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同样欢迎你经常来中国。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会出来见你的。”

江青同志用眼角巡视了一下餐桌上的所有人，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我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懂得生、老、病、死这一人类的自然法则。我也曾经年轻过，只不过是现在老啰。真的老了。”

为缓和一下桌面上的气氛，姚文元站起来吟诗一首：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最早见于曹操《步出厦门行·龟虽寿》中的诗句，后人用以比喻有志向的人虽然年老，仍有雄心壮志。

姚是中国文坛的大秀才，这首诗用在这里，真是恰到好处。

江青同志这时也来了兴致：

盈缩之期
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
可得永年

随口将整首诗背诵了出来。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

江青同志对待生死历来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她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好，一直在与病魔做斗争：

“最近，我一直在休息。主要是睡眠不好。我给自己开的药方是：‘医疗、休息加锻炼。’这不，今天你来了，我的病也好了一大半了。”

“在做什么样的锻炼？”

我开口问道。

“游泳、骑马、散步和园艺。”

她边说边将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了一些茉莉花。通过江青同志的解说，我第一次知道了花也可以治病，是中国草药中的一部分。

她接着补充道：

“我喜欢茉莉，有时觉得它就像自己一样。除了种花，我还种了各种蔬菜。今年，我们还打算种点儿棉花。”

她边说边用手比划着各种蔬菜的大小和形状。

主席住宅旁边有一块菜地。是毛主席的“私人劳动基地”。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主席家里的“自留地”。

主席休闲时间不多，种菜是他最喜爱的一种放松精神压力和身体锻炼的一种方式。

“我们的茉莉花还可以出口呢。”

江青接着说道。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民族自豪感：

“在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都有我们的茉莉花茶生产基地。”

“和许多的外国人一样，我也很喜欢茉莉花茶。”

我回应她的话道。其实，我更中意的是中国的菊花茶。

“菊花茶对保护视力很有好处。中国人也很喜欢菊花，在我国许多地区都有种植。你见过中国的盆栽牡丹吗？”

“见过，是从明朝的古画或是从照片上看到的。”

“我可以给你看一些照片。我自己也种植了一些。它也是一种很好的草药。”

江青用拇指和食指比划着几英寸的距离：

“四、五个月的时间，才能长高这么一点儿。所以它非常昂贵。”

“哦——，它能治什么病？”

我这也是第一次听说。

“具体治什么病，怎样治病？这就得问中国的中医了。不仅是牡丹，还有其它许多鲜花，在中国都能药用。”

“我患有慢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病……”

停了停，江青接着言道：

“后来严重到导致泌尿系统也出了问题。在过去，每当我发烧的时候，只能注射抗生素。然而，最近我改用了中药。每日服用四次莲子茎。病情好多了。”

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不知道什么是莲子茎？

她解释说：

“在水中煮十五分钟。像喝茶一样喝就好了。它有一种淡淡的香味。1969年以来，我一直在服用。我曾要求医学界对莲子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医学科学家只能分离出某种生物碱。可是，光吃生物碱是没用的。因为莲子茎里面还有许多的其它成分没有弄明白。我相信未来的医学家一定能做到这点。还有，现在有一种白色的黄花菜，也有说‘夜来香’的。像发夹一样开花，香味很浓。蛇蝎避之。整个植物都可以用来做药。目前，医学家也无法分析出它的成分。我们的医学还很落后，如果美国的医学科学家要是感兴趣的话，中美两国的医学家联手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一定会研究出结果，并造福人类的。中国和美国，纬度相同，在地球的两边。在我们这儿能生长的植物，一定也能在你们那儿生长。你见过莲花吗？”

一口气说了很长时间一段话。

“见过。颐和园里就有许多莲花。”

“颐和园的莲花是红莲。”

姚文元插嘴道：

“紫竹园里的莲花是白莲。”

“中国人一直说，莲花的所有部分都是有价值的。”

她继续说道：

“没有浪费。莲藕和莲子都可以做成美味的菜肴。无论是红莲还是白莲，在中国南方都是农民家族的重要副业产品。”

说到这时，服务员给每位客人送上来一个小碗。碗里盛着莲子粥，上面漂浮着几片白色的茉莉花。

江青解释说：

“这个叫‘莲羹八宝粥’，主料是小米。我的家乡就生产这种小米。小米比大米更有营养，并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低脂肪。”

共产党靠小米加步枪赢得天下。江青同志对小米情有独钟，可见一斑。

江青同志对每道菜，几乎都能说出它的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并且十分开心地向客人展示着她在这方面的知识。

第一道甜品上来了。

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瓜果。

江青同志即刻解说道：

“这个叫‘哈密瓜’，产自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1955年10月1日成立，位于中国西北边陲，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省级行政区。东南联接甘肃省、青海省，南部联接西藏自治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周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等八个国家接壤，是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现在又成为第二座“亚欧大陆桥”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边境线长达5400多公里，是中国边境线最长、对外口岸最多的一个省区，自治区现辖23个市、7个地区、5个自治州、68个县和自治县，首府为乌鲁木齐。

见我对这瓜很感新奇，江青同志接着说道：

“维吾尔族是我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这瓜很甜，你要是喜欢，今晚我就叫人给你送到北京饭店去。”

江青同志的兴致越来越高，说话中不小心将鸭子汁撒在了裤子上。她竟然像淘气的孩子一样向上举着手臂，一边笑着，一边嚷嚷了起来：

“来中国之前，在你心目中，我一定是一个长着三肩六臂的妖怪吧？”

我笑着回应道：

“彼此彼此，以前你们不也一直骂我们是‘洋鬼子’吗？”

“你的头发不是太长，裙子也不是太短。我俩都不是妖魔鬼怪。”

“哈，哈哈……”

我俩开心地大笑了起来。

“有时候认识的人太多，或者说周围的人都认识你，也是一件麻烦事。”

江青同志换了个话题：

“有一次，我想去颐和园，但忘了这一天是六一儿童节。到了那儿，还没下车就被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包围’了起来。动弹不得。我只好在工作人员的‘保护’下，摇起车窗，悄然离去。”

说到这里，江青同志的眼里闪出一道亮光：

“主席出去，要是被人看到，就更不得了了。每每都得周总理出来解围，握手握得手都肿了起来。”

餐后，我们一行人去了天桥剧院。

我们迟到了一个小时。

上演的是京剧，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是江青同志在文革期间亲自主抓的八个样板戏之一。

演出结束后，江青同志亲自引导我们一行人从一扇小门退场。我印象中记忆最深的是侧厅里的那张巨大的沙发。

分手时，江青同志盯着我的眼睛，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我真希望你能跟在斯诺夫妇后面，走同一条路。”

我回应道：

“他们是我的好榜样！”

不过，对我来说这种挑战也太难了点儿。但有一点我心里明白，至少江青同志对我们的信任是同样真实的。

“也许有人会说，我在给你洗脑。”

她换了种口气，揶揄道。

“你害怕吗？”

“不，不怕！对我来说，这不叫洗脑，应该说是净化心灵。”

“毕竟，”她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已经在这里。如果我可以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为什么我不能陪你呢？你可以参加总统竞选！”

她转过身，突然对我提了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

她告诉我说：

“对别人谈及自己的过去，你是第一人。尤其是你是一个外国人。你可以发表。但有一点你要认识到，我并没有将你当做一名普通的记者，而是作为自己的好朋友。

当然，会议记录必须先交总理审查。

今晚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毕竟我们（她和共产党领导人）走过的是一段曲折和艰难的路。虽说我现在已经是年过六十的人了，但在政治上还是要永葆青春的。”

我问道：

“所谓的‘政治青春’，是否有其它方面的含义？”

“没有更多的时间跟你解释了。下次来中国，我们再谈吧。我还得花时间给你准备一些纪念品呢。

我是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拍了一些照片。想送给你作为纪念。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可是班门弄斧了。

现在手头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最近我拍了一些飒爽英姿女民兵的照片，但好的已经被某些人拿走了。回家（中南海）之后，我再好好找找看。”

在天桥剧院门口道别后，我目送着江青同志离去。在随从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她的背景很快便消失在了黑夜里。

4

天桥剧院一别，成了我俩的永诀。虽然我不能期待与江青同志再次相见，但她的形象——意志顽强、勇于进取、能言善辩，却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脑海中。

一种从未有过的历史责任感鞭策着我，要将她的故事公平地告诉世人。无论中国的当权者对她的评价如何，历史迟早有一天终究会还她一个应有的清白的。

在古往今来的历史长河中，人们总是喜欢夸大或者是缩小其中的某个部分。

其实说白了，江青也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和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一样，不同的只是历史的某些机遇，使她的人生道路比他人更为曲折和艰难一些罢了。

从第二天开始，一连四个早上我连续在与以邓颖超为首的中国其他妇女领导人会谈。邓大姐说话有点类似周恩来的风范，知识渊博，用词得当，很有说服力。

邓大姐生于1904年，比江青年长十岁。属于与毛泽东同辈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早在二十年代初便参加了革命。

江青同志是三十年代早期投身革命运动的，战斗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早期并没有机会接触到毛泽东的革命核心红色区域。

邓颖超和蔡畅（李富春的妻子）同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领导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毛泽东有过一句名言：“革命不分先后。”

江青参加革命虽晚了十年，但在唤醒中国女性的政治觉醒，争取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斗争中，同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与邓大姐的会谈被安排在了每天的下午。

上午，苏珥薇和孙灵芸都会到我的房间，继续阅读江青的《讲话》。

苏和孙她俩都是超一流的翻译家，却不带任何学者和官僚习气。不但用词准确，而且政治嗅觉极高。

不过，孙灵芸的个人天分似乎要更高一些。不但学识渊博，而且人还长得漂亮、气质非凡。

六十年代中期，她曾在伦敦留学两年。回国后，便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2年她随同中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前往美国，为实现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小球带动大球，立下了汗马功劳。同年夏天，她在江青同志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年底回到美国，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随从翻译。1974年，她被提升为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的国家级工作人员。

更让我惊讶的是，孙与江青同志的私交甚好。并发表了一些迄今为止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一些毛泽东与江青四十年代在延安时期的照片。有些照片是彩色的，有些印在了瓷器（景德镇的瓷器，世界闻名。）上。还有些是江青同志拍摄的艺术照——风景和鲜花。效果处理得很好，就像中国的国画一样。另外她在美术和园艺方面，亦造诣颇深。堪称一位奇女子。

或许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同样，毛泽东、久负盛名的红军领导人朱德、郭沫若等其他高级领导人，他们不仅是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政治家，而且还都是古典诗人、文学家。

然而，他们的革命行径每每与所受到的传统教育背道而驰。包括江青在内，她自称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在我鉴赏她拍摄的照片时，却明明看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娱乐性。而这些恰恰正是被无产阶级所批判、所不能接受的。

无产阶级打倒了皇帝，因为皇帝总是用朱砂墨签名。而他们只不过是改用红色铅笔罢了。

通过孙翻译，江青同志曾有意无意地测试过我的摄影专业知识。她有一组作品，拍摄的是盆栽牡丹。从种子到发芽，纪录了植物生长的整个过程。美妙极了。她让我猜测是在什么时间段拍的？用的是自然光，还是人造光？

我猜测是自然光，在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拍摄的。

第二天，当江青同志得知我的答案后，开心地笑了。

后来，我从江青同志身边的保卫人员那里得知，实际上采用的是精心设计的人工照明系统，拍摄时间是黄昏。

访华的第五天，到了上海。是八月的第三个星期。

我的随从人员队伍变得越来越宏大了。除了从北京来的随行人员之外，上海方面又增派了五名妇女和一位男同志。他们是艺术家、科学家，要不就是外事办派出的管理人员。

当然，这些都是江青同志刻意安排的。《人民日报》就曾公开报道过此事。

在上海，我所见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一些革命性的奇迹。比如，用于子宫手术的针炙麻醉，手术中的女性患者，甚至能完全保持意识清醒，毫无痛楚感。神经堵塞加上政治催眠，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上海来的五位女性中有一位叫蔡晔盎，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她是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最小的女儿。她以及她父亲的生平经历，本身可说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个缩影。蔡元培一生结过三次婚，有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蔡晔盎一生未嫁，离休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研究员。60年代起，她先后担任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期间，我还接触了一些年轻的女作家。这些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她们脑子里除了“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竟然装不下其它任何东西。

还有一位叫王淑珍的“女劳模”，是一位纺织女工。三十刚出头，年纪很轻。1969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1973年再次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

令我们这些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中国，无论是位高权重者，又或是普通劳动者，只要你是共产党人，心里装得都是同一个信仰。

到现在，我才算是有点儿明白了：说共产党是‘小米加步枪’赢得的天下，其实并不完全。应该说是‘小米加步枪加信仰’，才是赢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障。

我在上海的访问，主要是在文化领域。江青同志是主抓上海的文艺工作的，姚文元则是当地的最高执行人。

白天，拜访了中国现代文学家鲁迅的故居。又与复旦大学的刘笪奇教授一起探讨中国十八世纪的另一部著名的文学著作《红楼梦》。

在中国，人们崇拜鲁迅，却对《红楼梦》持批判态度。只有毛泽东敢说话，叫大家看《红楼梦》。看一遍不行，至少要看三遍！

晚上，在姚文元的安排下，观看芭蕾舞剧。

今晚演出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是江青同志主抓的八个样板戏中的一个。

演出结束后，江青同志不仅上台与所有演员们一一握手，而且邀请主要演员与我一起座谈。

江青同志的兴致很高。

我也很喜欢《红色娘子军》。演员们舞跳得好，音乐也很美。只是不懂，女人们为什么要扛枪打仗？

过了深夜零时，我才疲惫不堪地回住所。

我们驱车逆时针方向行驶在上海的大道上，一边观赏着中国这座最具盛名的工业化大都市。

我发现我的中方随行人员全都看着老陈——我们中间年龄最大，最稳重的一位同志。

老陈突然情绪激动地宣布：

“我刚刚得到通知，江青同志已秘密飞往广州，并打算继续与你会谈。视情况，会谈可能进行一次或二次。这几天，你考虑好所有将

提出的问题。江青同志会尽量答复你的。今天上午，有一驾从北京飞来的飞机要去广东。

我再强调一遍：这次的行程须绝对保密！除了我们这几个人，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我心里直犯嘀咕：为什么要保守秘密？又有什么秘密可言呢？江青同志不是毛泽东的妻子——中国的第一夫人吗？

一会儿之后，情绪重归平静。大家又开始说笑起来。

无可否认，从此刻开始我心中的期待感突然高涨了起来。直觉告诉我，中国第一夫人真实的、活生生的往事，不久即将展示在我的面前。

第二天下午，上海方面的陪同人员全都赶到了机场为我送行。机坪上停放着一架很大的银色喷气式飞机。

从北京飞来的飞机里只有一位乘客——张英，中宣部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正站在机舱门口，微笑着朝大家挥手。

担任翻译的是孙炅芸和唐龙平——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我们一行人中唯一的一位男性。

飞机宽敞的内部结构和装修，全是中国人自己精心设计打造的。

我和张英被安排在了头等舱。舱内配备有书桌和餐台，各类配套的电子设备一应俱全。舱内还有一张很大的床。白色的床单和粉红色的枕头全是丝绸的，上面绣着精美的刺绣。

张英回忆说，参加革命前她只是重庆的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三十年代后期，她到了延安——共产党的根据地。在那儿，她第一次见到了江青。

在江青同志的直接教导下，她开始接触鲁迅的作品和共产主义思想。她进步很快，不久便成了宣传部门的一名小组长。

张头脑灵活、思路敏捷。却不乏对党的无限忠诚。始终不肯放弃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

我俩刚要拉开话头，两位惊人漂亮的解放军女孩敲门走了进来。年轻女兵手中的托盘里有烤鸭、甜品、馒头、水果、冰淇淋、白酒、啤酒和葡萄酒。

我很快便被中国的红酒“俘虏”了。张将我搀扶到床上之后，回主客舱去了。躺在丝绸床单上，真是惬意极了。在贪图享受这一点上，此刻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到底有什么区别？迷迷糊糊之中仿佛看到有一个人进来，拉上了白色窗帘。

一路上我睡得很沉，直到机舱里响起飞行员通知飞机即将着陆的声音。

离开酒店，驱车前往某地的途中，有人通知我说：

“江青同志正在等您。”

司机一路不停地按喇叭。广东的交通状况真是糟糕极了。道路尘土飞扬，除了人就是动物。

夜幕即将降临，小车已驶离市区。

郊外的道路更加崎岖不平，坡陡弯急的道路两旁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竹林。竹林后面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枪上的刺刀，在黄昏时分最后一抹阳光的辉映下熠熠生辉，隐约可见。

江青同志下榻的别墅，是一栋宽广、单层的现代化建筑。墙高院深，十分宁静。青藤爬满墙头，池中盛开着芙蓉花。园中漂浮着一股浓烈的木兰和茉莉花香。知了和小鸟亮开了嗓音，竞相歌唱。一派生动的热带花园的景象。

别墅的空间很大，但内部装饰一般。偌大的客厅里仅仅摆放着一只景泰蓝花瓶。墙壁上挂着几幅卷轴，有现代的作品也有泛着黄色、历史久远的古画。

此地距离北方的首都虽有数千里之遥，但仍给人一种模糊不清、透不过气来的压力。

当江青同志第一次身着便装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像一缕清风吹过，压力随之骤减。

江青同志衣着剪裁得体，保持着五十年代初的风格。白色塑料凉鞋和手提袋是我在北京见过的，不同的是手提袋上系了一条两端留有绒穗的围巾。

见我气色凝重，江青打趣道：

“我是在搞突然袭击，其实你不用紧张。”

“没，没有。我不紧张。”

边说边拿出了笔记本。

说实话，比起第一次在北京见到她，我的心情轻松多了。

空气有点儿湿热，我高高地卷起了衬衣的袖口。

“你，热吗？”

她似乎察觉到了这点，示意工作人员打开空调。

“咱们分手，只不过才两个星期。是周总理主动问我：‘想不想再见你一面？’”

江青同志拉开了话头：

“总理对我说，联合国代表团的约翰逊先生曾向他推荐，说你是一个对新中国充满热情的好青年。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属于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进步青年。有了总理的指示，所以我才决定另外找个时间再好好地会会你。”

在北京的时候，江青早就知道我已经拜会过邓（邓颖超）大姐，知道对某些问题我们之间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所以，她是有备而来，从不谈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只是安排我看革命样板戏——不是京剧，就是芭蕾舞。

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当然，问题是她并不了解我。准确地说，并不十分了解我。只是在北京的第一个晚上，给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而已。

她给我们的这次会谈定的基调是：“不谈政治，只谈私事。”也许这就是她刻意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此行已报周总理备案的原因吧。

早在四、五天之前，她就飞来了广东。

为什么选择广东？

对外，她是利用政府公假，来广东疗养的。实则，是来与我“私下”会谈的。

当然，她不会不知道我们的私谈，最后终究还是要被公开发表，公布与公众的。

江青同志的气色看起来比在北京时要好多了。这大概是远离了中国的权力中心，吃得更好、睡得更香的缘故吧。

最近几个月，她一直睡眠不好，记忆力消退，并伴有间歇性神经痛。现在也已经好多了。

怕我有什么误会，她特意解释说，去外地疗养，并不是她个人的特权。只不过是中共高级官员的一种例行公事罢了。社会名流、劳动模范同样可以享受。

她强调说：

“在北京，繁杂琐事太多。有时忙得叫人喘不过气来。”

这句话我也颇有同感。我同样也是一个不愿将时间浪费在鸡毛蒜皮的繁杂琐事上的人。

话虽是这么说，可就在我到达之前不久，她一直在处理群众来信。来不及整理的一大摞信封，向我公开了这个秘密。

到目前为止，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封闭式的国家，国家领导人很少与外界接触。江青同志此行的保密工作自然要格外加强的了。

除了她以及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八月底之前的这段日子，我生活在与外界完全隔离的环境中。也可以说，我被单独“软禁”在与外界完全隔离的花园式“监狱”里。

埃德加·斯诺是少之又少的几个长期与中共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外国人之一。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就到了中国的大西北，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促膝谈心，共商国事。

而我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整整比他晚了四十年，才踏上东方这块神圣而又神奇的土地。

到目前为止，我接触到的最老资格的革命家只有邓颖超一人。1919年年仅十五岁的她就投身于革命，参加了五四运动。而当年江青只有五岁，自然错失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言谈之中，对邓大姐的崇敬和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江青同志是1937年与其他一大批进步青年从大都市上海到大西北黄土高原延安的，1939年与毛泽东结婚。直到1947年，整整十年没有离开过毛泽东的身边。虽说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可江青同志是用她的纤纤素手和女性柔软的躯体，陪伴着毛泽东走过中国革命最困难的十年的。

邓大姐是1936年从中央苏区经过长征到达西北的。是被“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从江西一路追杀到陕北的。她的亲身经历验证了

毛泽东所说的一句名言：“没有一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军队！

中国人并不喜欢战争！

她坚持说，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共产党永远站在正义的一边，枪杆子永远握在人民的手中。

话题有点儿严肃，看看就要扯到“政治”上了。江青同志微笑了笑，伸手拿过一只细长的锦缎盒子。从里面拿出一把雕刻得十分精致的檀香扇。

脉脉含情地拨弄着：

“这把扇子跟了我许多年。是主席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丝绸扇面上，一面是手绘的傲雪怒放的梅花；另一面是毛泽东亲笔题词《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黑。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如此贵重的礼物，让我生平第一次有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要知道毛泽东的手迹，那可是极具收藏价值的艺术品。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弄到手的。有人说：“心一热，天就凉了。这才知道，梅花从不对任何人怒放。”万一将来有一天，梅花不再对江青绽放，我要是背叛

了江青同志的信任和厚爱，用中国人的话说：“那可是要天打雷劈，遗臭万年的！”就像被冻死的苍蝇！

江青同志挥了挥手，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指着墙上的一幅条幅：

“你看这字怎么样？”

见我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模样，这才意识到我是一个对中国书法一窍不通的美国佬。

“这是我临摹主席草书的赝品。不是行内的高手，还真分不出真假。”

片刻后，她决定送给我的女儿：

“她叫什么名字？”

“亚力山德拉。”

“怎么取了个俄国人的名字？”

我简单地向她说明了一下，我的第一任丈夫是俄国人；第二任是希腊人。对我的婚姻，她似乎并不太感兴趣。

她从桌上的瓷盘里拿起一束白色的茉莉花和玉兰花，放进水盆里，用手指轻轻地清洗着花瓣。在这之后的几个晚上，她几乎都要重复这个动作。会谈中，偶尔她也会摘下几朵花瓣，送给与会者。

夜晚，风扇连续摆动了几个小时，可空气依然浑浊。这时，端进一盆花来，房间里顿时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令人心旷神怡。疲倦感一扫而空。

休息片刻，江青同志挑起眉头，嫣然一笑：

“我们开始吧。”

我对江青同志的一切都很好奇，无论是她的现在或过去。只是我是一个西方人，必然要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提出问题。有时，甚至是争

辩。她似乎很能理解我的这种不可理喻的“美国精神”。于是，话题很快便从现代中国的革命史转到了江青同志个人的奋斗史。

我们从不谈论国家大事。我本来就是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

她的人生故事很长，既辛酸又极具罗曼蒂克。

突然，她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

“不要为写我而写我……”

她建议以她的人生故事为背景来讲述中国革命的发展史。并强调：

“任何一个个人，在历次革命运动中的作用，都是十分渺小的！”

语气也一下子变得坚定起来。

我常常与她发生争执，有时甚至还相当激烈。但这并不会损害我们之间的友谊。她唯一的要求是：

“不要扭曲我的意思，要实事求是。”

而我的回答是：

“我既不会阿谀奉承拍马屁，更不会无中生有求全责备。”

她很满意：

“鲁迅先生常说：‘对人要宽，对己要严。’这话，我很以为然。一定要有自我牺牲精神！”

她希望我不要因这次独特的中国之行，而产生骄傲的情绪。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无论多么伟大的人，都必须懂得保持谦虚谨慎。

她笑了。笑声中带着狡黠和智慧。

实话实说，我更感兴趣的是她的私人生活。而江青同志本身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从民族战争到国内战争。她一直在主席身边打日本、打老蒋。

离开了军事题材，要将一个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江青全面真实地介绍给我的读者，还真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我决定，先从她的童年开始。

此时已是晚上九点钟。吃过“晚”饭（真的很晚），我们便转移到了另一个房间，一直继续到翌日凌晨三点钟。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江青同志仿佛有永远也说不完话。而且看起来并没有想要中止的意思。只是苦了她的听众（我并不是她唯一的听众），身体过于娇贵，脑子也不听使唤昏昏欲睡。

不知是中国菜的热量很高的缘故，还是她说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样的辛苦，我日复一日地坚持了下来。

每天晚上，都是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或护士的再三“提醒”，甚至是医生直接“下令”，才能中止她的话头，让她安静地离开房间。

江青同志有一个喜欢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的习惯。

除了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房间里还有苏珥薇和孙炅芸二位翻译（她俩轮流替换着翻译）、中宣部副部长张英、政协副主席唐隆平（一行人中唯一的男性）。另外就是我带来的两个随从，余椒莲和陈老。

我偶尔也会与她（他）们交换眼神，大家会心地一笑。但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始终都保持着沉默。

第二天晚上，我们搬到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别墅（江青同志继续住在原来的地方），拥有更多的房间。每个房间里都配备有毛巾——大的小的、干的湿的、热的冷的，都有。茶具、香烟、干果、文具、麦克风及录音设备，一应俱全。

这样的“享受”，持续了六天。

同时，我的精神也伴随着江青同志的独白，从她的童年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革命的万里长征。

第二章 童年旧事

1

江青是1914年3月来到这个世界的，她之所以不愿意告诉我具体的日子，显然是担心一旦被我泄露出去，则很有可能成为群众自发地纪念她，为她过生日的日子。

渭河南岸有一个人口仅八万的小镇——诸城，距离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青岛约五十公里，位于渤海湾与黄海之间。

山东省是中国第一个沦陷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大都市。1900年，沿海城市烟台割让给了法国。1898年威海卫租借给了英国、青岛半岛租借给了德国。

江青出生这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机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地据为己有，成为今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立足之地。日本人血腥的殖民统治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暴行，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的记忆。

尽管帝国主义的阴影长期笼罩着这片土地，但从来就没有征服过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的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二十世纪末，山东省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农民起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著名的五四运动，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这样的反抗。

九年后发生的《济南事件》，开创了中日军事对抗的新纪元。

济南惨案是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及外交官员的血腥事件，又称五三惨案。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1928年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了山东省。酒井隆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进，他立即以“山东局势混乱、保护日本侨民利益”为借口，写信给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要求军部出兵山东。参谋本部根据酒井隆的报告和请求，借口保护侨民，于4月下旬，派遣日军第6师团五千余人从青岛登陆，入侵山东。

日军第6师团在青岛成功登陆后，酒井故意夸大事实，以局势极为混乱为由，擅自要求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火速赶赴济南。福田彦助在酒井的一再催促下，星夜兼程，终于在4月底赶到济南城外。

4月21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借保护侨民之名，派遣驻天津的3个步兵中队抵济南。25~27日，日军又连续在青岛登陆，沿胶济铁路运兵济南市，到28日，驻济日军已达3000余人。日军在济南商埠以纬四路为中心线，划为东西两个“警备区”，构筑工事，架设路障，实施戒严。4月30日，奉系军阀张宗昌撤离济南，5月1日，国民党军进入济南，方振武被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当蒋介石所率北伐军开进济南城后，酒井隆即唆使早已做好准备的日军四处寻衅。日军不仅随意捕捉北伐军的士兵。5月2日上午，第一军第二十三团营长阮济民等数人徒手行经纬五路时，被日军堵截后当场全部杀害。3日上午，日军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七千余人的武装。对日军的一

再挑衅，蒋介石再三地屈辱退让，命令北伐军各部“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而且准备“绕道北伐”，这更加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闯入山东交涉使署，将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尽数捆绑毒打。蔡公时据理痛斥日军，日军竟割掉蔡的耳、鼻、舌头，挖去眼睛，然后将他同众人一起杀害。是日，日军在商埠制造事端，惨杀中国军民多达1000人。5月4日晨，北伐军在济南城抓获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按照中国法律将他们处死。酒井隆借机再次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拍电报，夸大事实，宣称日本无辜侨民被杀害，并将数目扩大了20多倍。国民党军全部撤出商埠区。日军得寸进尺，继续扩大事态，不断增兵济南。5月8日，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普利门、麟祥门、柴家巷、迎仙桥一带发起猛烈攻击，守军退守内城。自9日开始，日军大举进攻内城，守军浴血奋战，死伤惨重，11日奉命撤离。日军占领内城后，抢劫财物，焚毁建筑，强奸妇女，枪杀战俘，屠戮百姓，罪恶令人发指。“济南惨案”发端于五月三日，故又称“五三惨案”。直到1929年5月，日军才在内外压力下撤离济南。

山东省是中国人口稠密的第二大省。

在江青童年的记忆里，山东的生活水平却是最糟糕的。普通的平民，一周难得吃上两顿饱饭。因肠道疾病和营养不良而导致的死亡率极高。饥荒肆虐地吞噬着老百姓的生命。

相对而言，江青的故乡诸城，在当时的山东算得上是最为富饶的了。这里文化历史悠久，教学之风盛行。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之后的短短数十年间，大批学子远赴日本、欧洲和美国留学。

尽管江青不在这些留洋学生之列，但她最终还是在这些留学归来的教师、作家、国民党左派和激进分子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江青第一次和我谈及她的童年，是在北京的一次晚宴之后。她很谨慎，言谈举止颇多顾虑之处。我俩在一起呆的时间长了，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老套的共产主义政治词汇逐渐减少，最后双方都放弃了意识形态的争斗。

到底还是应了江青所说的那句话：

“莫谈国事，只说家事。”

2

“既然你很想知道我的过去，那我们就谈谈吧。”

她首先拉开了话头：

“我生在旧社会，童年生活十分凄惨。我不仅恨中国的地主，更恨外国人！无论是东方的，或是西方的洋人，他们只会欺负我们，带给我们的也只有痛苦！弄得我们食不裹腹，衣不遮体。他们反倒要嘲笑我们是‘东亚病夫’。”

李青，是她参加革命之前使用过的诸多名字中的最早的一个。她有许多的兄弟姐妹，具体数字她没告诉我，（或许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担心她的家族成员会因为她的原因而受到不该有的政治待遇。中国有句古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毛泽东对自己的的亲属历来要求很

严，江青就更不敢造次了。)她唯一透露给我的数字是，最小的姐姐年长她十二岁。

生她那年，父亲刚过六十大寿。用她的话说。父亲是个“老头”。母亲则是四十刚出头，比父亲要年轻得多。在她童年的记忆里，母亲比父亲更慈祥，也更疼爱她。

父亲早年跟镇上的一个木匠学徒，后来成了这家作坊的老板。专门生产车轮（著名的山东手推独轮车车轮）。

“家里太穷，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所以父亲脾气不好，对母亲不是打就是骂的。”

为此，镇上的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骂人艺术家”。

父亲心不顺时，常拿孩子们出气。可只要他对母亲拳脚相向，孩子们都会扑上去，将母亲围在中间，尽全力保护母亲。

记得那年元宵节，许多孩子都跑去地主家看灯。父亲气不过地主炫耀财富，见母亲正要带着孩子们过去，他抓起一把铁锹就朝母亲扔去。铁锹先是打在母亲的后背上，然后落下来又切断了母亲的小手指。见状，江青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用自己幼小的身体挡在了母亲的前面。结果，自己被父亲打得满嘴找牙。母亲从此落下了残疾。

说到这儿，江青用手掀起上嘴唇，让我们看她儿时留下的疤痕：

“后来我才认识到，一个打女人和孩子的男人，决不是个好男人！可我并不记恨自己的父亲。说到底还是旧社会害了他，是贫穷害了他。”

母亲终于爆发，再也不堪忍受父亲的打骂。母亲委屈地低声向她哭述：“当初进这个家，我可是晒过红的……”（晒红，山东地方习俗。

新媳妇过门，翌日要将洞房花烛时染红的床单晾晒在外，以示清白身子。否则，会被族人瞧不起，是“破鞋”。终身难以在夫家立足。）是夜，母亲将江青背在背上，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家。

说到这儿，江青停顿了一下。

然后，若有所思地加了一句：

“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走夜路了。孤独地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妈妈。”

诸城镇上有一户地主，讨了好几房妻妾却无男丁。为延续香火，托人找江青的母亲说媒。一开始便遭到母亲的严词拒绝，可孩子还小，生活又无着落。为了能将孩子拉扯大，最后母亲还是点头答应进了这家人的门。条件是：“只帮佣，不做妾。”

江青回忆说：

“母亲出去做事，完全是为了赚钱让我上学。学校虽然免除了我的学杂和书本费，可我却常常饿肚子和吃冷饭。上小学，我就得了慢性肠胃病。”

江青说她现在依然碰不得生冷的东西，一看见粗粮大饼就翻胃，想吐。她消化功能一直不好，都是儿时坐下的病根。

江青儿时从未穿过新衣服。都是拣地主家小孩穿过的旧衣服。她头上总是扎着两只翘翘辫，没想到后来却给她招来了飞来横祸。

一天，母亲干活的这家地主家里的小女儿，见江青长得水灵比她漂亮，一时嫉妒心起，没来由地一把抓住江青的小辫，厮打起来。江

青毫不退让，拚全力将她摔了出去。这下糟了，地主家的人全都围了上来。结果是，母亲被撵出了地主的家门。

不久，母亲又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这次，是在一户“破落地主”家里帮佣。有道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败了家的地主，没了钱财，自然也就意味着没有饭吃。

某天夜里，母亲不在家。突然天降倾盆大雨。狂风夹着暴雨，从没贴窗户纸的窗口直往屋里灌。房间里只有一盏昏暗的小油灯陪伴着她。江青卷曲着身子，趴在炕（中国北方农村用砖砌的床。）上，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等候母亲回来。

天亮了。

雨停了。

母亲回来了。

母亲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母亲一把将江青抱在了怀里，眼泪夺眶而出。

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一片饼干，递到江青手上。尽管江青早已饥肠辘辘，可她却舍不得吃上一口，将饼干又送到了母亲的嘴边。一块饼干，就这样在母女俩之间推来让去。良久，才分而食之。

“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学会了走夜路找妈妈。”

这句话，她重复过好几遍。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她母亲一定是上夜班，找了份夜间的工作。

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孩在黑暗中独自一人漫游，成了她童年回忆的主题。

江青接着说，在她那个年纪，所有的小孩在黑暗中走夜路，都怕遇到什么鬼呀怪的。可江青从未有过这样的恐惧。打小，只有一件事让他害怕。那就是“狼”。她常听大人们说，在野外狼只要闻到了小孩的气味，就会跟踪围上来，最后把小孩吃掉。狼吃小孩的故事听多了，竟成了她内心深处的挥之不去的恐惧。

好在江青小时候并没有遇见过狼，也没有被狼吃掉。说到这儿，倒使江青回想起了另一件事。

事情就发生在陈庄。

可庄子里的人全都姓“李”。跟她一个姓。

那天，江青一天只吃了一顿饭。饿得她实在受不了，只好跑出巷子去找母亲。

陈庄人口稀少，却有许多的狗。

突然，几只大狗眼露凶光，吐着血红的长长舌头，狂吠着朝她围了过来。其中一只猛然咬住了她的小腿。

说到这儿，江青卷起了裤腿，踝关节上的疤痕历历在目。

狗叫声惊动了母亲。

母亲闻声急忙奔跑了过来，赶走狗后，一把将江青揽在了怀里。

为江青简单地止血后，母亲将孩子背在了背上。

回家的路上，母亲一直在哭，眼泪不停地流淌。

母亲到破落地主家做了女佣之后不久，江青便转学到诸城的另一所小学校。是学校里一个叫苏焕藤的老师资助她上学的。苏老师是著

名的五四运动发起人之一，极力倡导女孩应该像男孩一样上学，接受教育。

江青刚上学，苏老师就给她取了个新的名字：“云鹤”。她当时长得又瘦又高，从体型上看，倒也贴切。往更深处想，或许苏老师是希望他的学生将来“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吧。

学校是地主们出资修建的，上学的大多是地主家的女孩子。但也有象江青这样穷苦人家的孩子。人数很少，充充门面而已。

家里太穷，没钱买校服。

江青也只能是有什么穿什么。她的衣服大多是男式的，是男孩子们穿旧了的。破旧的鞋子张开大嘴，整个大脚趾都暴露在外面。鞋后跟有一只没一只的，走起路来像鸭子一样一跛一跛的。同学们轻蔑地称她为“老大哥”，也有人嘲笑她是“鸭蛋”。

地主家的“阿姨”和“侄女”（她们是地主家的亲戚，跟江青没有血缘关系。），也经常讽刺和挖苦她。

有一次，江青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她愤怒地冲向阿姨，猛击对方的乳房。

双方撕扭在了一起，却没有打起来。

为什么？

因为她（李青）实在是太小了。

事后，江青感到害怕了。

怕极了。

她跑去学校，打算休学不读了。江青哽咽着将打架的事告诉了学校，并作好了接受学校处罚的心理准备。

让她大吃一惊的是，学校宽容了她。

她知道这并不是因为她学习刻苦，家庭作业完成得好。而且因为她的老师在保护着她。

这件事后，学校对她的态度改变了许多。有些学生和老师甚至开始喜欢和接受她了。

但是，学校也有让她不开心的地方。

她特恨一个姓沈（教伦理课）的老师。

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她思想开了小差。结果被沈老师拖到厕所里，打了她五大板。当她知道，这个宣扬孔孟之道的老师也曾打过她母亲帮佣的那家地主家的女儿的板子。这才心里好受了许多。

下课后，沈老师主动找到她。向她赔礼道歉。看得出，老师的道歉是真诚的。江青原谅了她。

或许是因为另的什么事情，一个学期之后，沈老师还是被学校解雇了。

为这事，江青心里难过了好一阵子。

都说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可在江青儿时的记忆里，却残留着中国人残暴嗜血的一面。

江青小时候山东地面常闹“土匪”。其实，所谓的土匪，都是些没饭吃的老百姓。土匪抢地主的粮食，地主反过来再掠夺老百姓的。地主抢百姓的粮食没人管，可土匪要是被抓住了，不是被枪毙就是被砍

头。完事，还要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城楼上示众。小孩从城门经过，总要被大人蒙住眼睛。

诸城是一个富饶的地区。每到收割季节（尤其是丰收年），土匪和一些地主都在争着抢夺别人家地里的农作物。

城里住着两名军官，手里握着那些被捉住了的土匪们的生杀大权。

站在高高的城墙上数着枪声，江青就能估算的到今天又枪毙了几个人。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有一天江青登上了长长的城墙。亲眼目睹了那位军官是如何巡视监狱，并处决人犯的。

通常他们每天都要杀死十二个或更多的人。包括一些明显看得出来是无辜的人。

为什么要杀害那些无辜的人呢？

军政府给出的理由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

守城的军卒每天黎明和傍晚都要打开和关闭城门。因害怕有陌生人或不明身份者肇事，只要看到有不顺眼的人就随意开枪。

通过仔细观察，江青发现通常都是在小东门执行死刑。那儿有一座吊桥，每次只能允许一个人经过。

每次看到杀人，江青心里总是沉甸甸的很不好受。可她并不害怕。

小小年纪，她只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喜欢互相杀来杀去的呢？而且有些人还非常热衷于这种杀戮。

每当诸城要杀人的日子，象过节似地“有钱人”一大早就云集在了城楼高处观看行刑。

法场更是热闹。

每名囚犯背上都插着醒目的招牌，上面写着被朱笔画了圆圈的死囚的名字。

刽子手高高举起手中的鬼头大刀，手起刀落，死囚的脑袋应声落地。

江青从未去过法场。

但只要听到一阵掌声响起，就知道又是一颗人头落地。她也知道那些拚命鼓掌的人，都是些富人。

“我亲眼看见过死人的人头。”

江青接着说道。

江青她们家居住在诸城外城和内城之间的地带。学校也在城内。

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她听到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老头挑着一副担子在她跟前走过。扁担的两端一边挂着一颗人头。血淋淋的还在往下滴血。

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呆了。

她撞撞迭迭地跑回家。把书包扔在地上，一头便倒在了床上。她接连高烧了好几天。不省人事。

“我想，通过我说的这些事情，对我的童年，你应该是有所了解了吧。”

良久，江青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江青从小生活在一个动荡的中国。国家饱受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的蹂躏。

二十年代，上海、青岛等港口城市的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同时，进步青年也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引进了中国。

进步青年们上街游行，组织城市暴动，秘密煽动外资厂的工人罢工。抗议他们雇佣童工、虐待劳工。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而且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

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

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捕去学生四十余人，射杀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6月1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从而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涨的序幕。

为了在华的长远利益，从1920年开始，日本侨民便大批涌入济南和青岛。尽管江青当时还只是个孩子，可中国这段屈辱的历史已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1928年春，江青十四岁那年，蒋介石联合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二次北伐，统一了中国。日本立即以保护在华日侨的利益为借口，向中国派出了远征军。为遏制日本军队的行动，蒋介石抢先一步，5月2日将他的司令部移到了济南。

五月的第一周，日本兵和蒋介石的军队同时兵临济南城下。5月7日，蒋介石撤走了他的大部分兵力，重新开始北上打内战。济南重陷敌手。在这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日伪军和汉奸在济南城内实施暴政，打压进步势力，屠杀平民百姓，无恶不作。

江青在济南城内亲身经历了这段苦难的日子。

江青接着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1911年）被推翻之后，奉系的张作霖会同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和直系的吴佩孚联手，

分别从东北、山东、河南、直隶等地，共同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国民军在多处受到打击，战场形势对国民军越来越不利。

1926年3月，直奉联军占领天津。

3月29日，张作霖派褚玉璞代理直隶督办，李爽恺代理直隶省长。

1927年，江青和母亲搬到了天津，寄居在嫁给了褚玉璞手下的一名低级军官的姐姐家。

江青清楚的记得这一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

“我只有十三岁。却要干所有的家务活——拖地、打扫屋子、买菜和上当铺。这些个（体力）活，都得我做。我还想上学。可所有的学校学费都太贵，我们家根本就付不起。再加上我姐夫又丢了差事，家里的日子就过得更紧巴了。”

1928年6月6日，国民革命军打进了天津。

江青想去一家中国人开办的卷烟厂干活，弥补家用。当时的烟厂全是手工生产，老板雇佣的也全都是童工。但遭到了姐夫的极力反对。姐夫非常生气：“这样，会毁了你一生的！”为维持生计，姐夫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1929年，姐夫带着姐姐、母亲和她，又重新回到了济南。

他们在山东西部距黄河约六公里（距泰山二个小时路程）处的地方住了下来。

济南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闻名世界的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祥地，区域内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城子崖，有先于秦长城的齐

长城，有被誉为“海内第一名塑”的灵岩寺宋代彩塑罗汉等。中国首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谭人所作讽刺诗《大东》，是现存最早的有关济南的文献。济南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隋建四门塔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塔。

当时的城市人口已超过四十万，交通十分发达。

二十世纪早期，在改良主义的倡导下，公共教育办得十分出色。共举办了二百多所小学，外加几个高中和大学，其中包括著名的齐鲁大学。（齐鲁大学是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开办，其前身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1904年由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和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合并而成。）

整个教育体系，由一批具有现代改良主义思想的杰出的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中，国民党党员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

济南城市人口结构复杂。

自从市政府对外打开大门之后，不久便涌入了大批欧洲和德国侨民，最多的还是来自日本的移民。

江青初到济南时，城内日侨已超过五百多人。

明朝以来，济南的演艺业便十分发达。相反，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一些演员都是女性。

在这种历史文化的熏陶下，江青也萌发了想做一个演员的志向。

山东省实验艺术剧院，是一所寄宿学校。学费和生活费都由中华民国政府提供。作为回报，毕业生通常都得留校做几年（时间不定）不拿薪水的学徒。

江青说：

“1929年，我考入了山东省实验艺术剧院。这是一种艺术学校，在那里我主要学习现代戏剧，但同时也学一些古典音乐和戏曲。我十五岁之后，学校除了免费的提供学费和餐费之外，每月还发给二个大洋（约60美分）的零花钱。”

江青接着说：

“学校优先招收初中和高中生，甚至还有大学生。我没有学历，他们接受我，仅仅是因为学校里女孩子太少。

我只学了一年，可我学了许多东西。我很勤奋，每天起早贪黑的总是想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东西。”

在校期间，她不仅广泛阅读戏剧文学，而且学会了唱传统戏曲和现代歌剧。她精通各种乐器，尤其是钢琴。这些异国乐器，她只学了三个月。尽管老师是一个很古板的人，却很喜欢她，同时对她也格外严格。基础课练习时，伴随着节奏老师总爱用小木棒敲打她的手腕。一有出错，便加大手中的份量，打得她生痛。

江青他们班，共三名女孩。她是最小的。另外两个，跟学校其他同学一样，看不起她。因为她的旧衣服。

导演的妻子——于山，早年曾就读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也曾就读过这所学校。），是这两个女孩其中一个的姐姐。她是一个“反动派”，喜欢无休止地欺负江青。

还是毛泽东的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江青有自己的立场，她用自己的方法搞恶作剧来报复班里的这二名女生。

四十多年过去了，往事仍记忆犹新。她坦率地承认，并不是因为怨恨，只是为了好玩。

学校是由一所旧文庙改建的，一到夏天房间里特别闷热。学生们经常去庙堂里纳凉。

江青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庙堂里立着一尊巨大的孔子的泥塑像。身后排列着他的门徒——七十二圣贤。

一个闷热的晚上，江青独自一个到了大堂，倒在一张古老的藤椅上凉快。没多久，那二名女生也信步闲逛到了这里。

她们让江青交出椅子：

“哪儿凉快，上哪儿去。”

按照吩咐，江青默默地起身，将藤椅让给了她们。又温驯地端起油灯，为她们搬来了另一把椅子。

然后悄悄地溜出了大门。

她砰然关闭上大门，带走了油灯，将黑暗留给了那两位女生。

她听到了身后女孩的尖叫和乞求声。

几名男生闻声赶来“解救”了她俩。男生们提着灯笼朝江青逃遁的方向追了过去，一边高喊着：“要好好地教训她！”江青竭尽全力跑到小溪后面的灌木丛里躲了起来。心想，他们是绝对找不到这儿的。但是，女孩子们知道最终她还是要回宿舍睡觉的，不如就给她来个“守株待兔”。

江青捏手捏脚溜进屋，爬上床，轻轻地放下蚊帐。

刚松口气，江青便发现几只黑手悄悄地伸进了蚊帐。

这回轮到江青声嘶力竭地大声叫唤了起来。

她俩非常生气，仍想迫江青就范，保证今后不再搞恶作剧。

江青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看情况再说吧。”

在江青的记忆里，那段日子其实还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东西。

唱戏，必须用标准的北京话。

经商、教学，乃至政府官员，当时都流行说普通话。

江青出身山东，满嘴山东土话。常常惹得其他的学员哄堂大笑。别人的北京话都说得比她好。可江青并没有气馁，她找同学帮她矫正口型，一个字一个字地背诵台词。

有一次学校准备排演一出悲剧《戏剧人生》，是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创作的剧本。他领导的中国南方戏剧协会，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已具有相当高度的影响力。

导演的妻子——那位女同学的姐姐，负责分配角色。她刻意将江青的演出安排在了星期一，通常这一天来看戏的观众都不会太多。

江青演得很投入，也很成功。不仅博得了观众的眼泪，还赢得了他们的掌声。

演出结束后，学校的老师和导演一起走进了化妆间，通知她：

“这出戏，今后由你担任女主角。”

江青哭了。满眼泪水地从化妆间冲了出来。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告：

“我成角了。”

事实上，江青成角后，仍遇到许多人烦心的事。不过，她并没有细说这方面的事情。

江青说：

“当西北军的韩复榘（韩复榘，字向方，中国近代史上军阀之一，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声震西北、华北、中原各地，曾叱咤风云一时，后投靠蒋介石，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在抗日战争中，因其不战而放弃济南并密谋反蒋，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处决。）打回济南后，学校关闭了。”

学校关门后，江青加入了一个由学校部分教师和学生组织的巡回戏剧小姐，去了北京。

江青说：

“我没有告诉我母亲，只是在火车站给她写了一封信。那一年（1930），我十六岁。北京的生活，十分艰苦。我连买内衣的钱都没有。我带走了家里最好的棉被，可夜里仍然冻得一个劲地发抖。那时候的北京，白天，沙尘蔽日；夜晚，寒风刺骨。那时候，我还不懂得

什么是政治。国民党和共产党，我都没有概念。我只想挣钱养活自己。我喜欢戏剧。”

江青接着说：

“1931年早春，我去了青岛。”

青岛的冷雾和港口飘拂着的带着咸味的海风，给江青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尽管江青的家乡，出生地诸城离青岛还不到五十公里，可江青以前从未见过大海。

江青回忆说：

“我从前的老师——赵泰瑁，也是我的老乡。他曾经做过济南实验戏剧学校做过导演。现在青岛大学执教，是文学系的教授。他表示愿意帮助我进青岛大学（现山东大学）。”

赵泰瑁进一步表示，只要她愿意，可以在大学里开设一个艺术班。（可能是戏剧艺术，她没有明说。）并且还可以帮她报销来青岛时所发生的差旅费。江青很感动。可青岛对江青来说，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一时很难做出决定。与江青一起来的济南实验艺术学校的同学，全都怂恿她接受老师的好意。最后，江青点头同意了。

就这样，江青上了大学。

江青说：

“实际上，他（赵）属于国民党改革派。他对文学和艺术的看法与胡适非常接近。”

江青笑着追加了一句：

“当时，我并不厌恶资产阶级。”

她接着说：

“胡适集团的某些人，包括梁实秋和闻一多对我的影响也很大。闻一多是我在青岛大学上学时的老师，我经常去听他的课。”

江青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

“作为反面教材，我们真正的‘老师’是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9月18日之后，奉天，以及满州里东三省全都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去了。我们决不能忍受！我们决不甘心做亡国奴！作为我自己个人来说，我从来都是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当时，抗日救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许多同学都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去了。工人们也起来了。并迅速地向全国漫延。

江青对老师（赵）说：

“我也想去参加游行，跟他们一起请愿。”

老师制止了她：

“你——，也想去制造麻烦吗？”

闻言，江青目瞪口呆，几乎说不出话来。

江青车转身，跑了。

她独自一人跑到小山后面的林子里。陷入了深深的迷惑之中。心想，老师这是怎么了？他怎么可以说，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是“制造麻烦”呢？

良久，江青终于想明白了。

老师错了。

于是，她决定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共产党在青岛的外围组织）。青岛大学许多学生开始罢课、罢考。

“从那时开始，我拒绝接受他（赵）的任何帮助。我在大学里找了一份职员的工作。主要是写写卡片什么的。同时，我还在继续上课。我每个月的薪水是三十块钱（约九美元）。十个大洋寄给母亲，剩下的留给自己。青岛的物价很高，剩下的钱根本不够开销。你看，我说的不是自己用。我哪能用得了那么多钱。我得帮助其他同志。我们每个人都得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全部掏出来，用来支付剧组的开支。没有人给我们钱，只能依靠自己。每当我们在工厂或农村演出的时候，他们非常欢迎我们，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可他们实在太穷，自己过的日子也是紧巴巴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革命，就是要解救穷人！’不久后，我参加了共产党。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我懂得了更多的东西。那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1931年，江青到了青岛之后不久，一方面上大学读书，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海滨戏剧协会”是由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组织的民间团体。其目的就是要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到工厂、农村去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春节过后，海滨戏剧协会决定离开城市到广大的乡村去巡回演出。

1931年江西的红军，并不为众人所知。对国民政府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威胁。但是，在城市公开宣传苏维埃红色政权，依然是很危

险的。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海滨戏剧协会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到被日军占领的敌占区去，宣传发动群众抗日。

然而，实际行动起来，困难比他们原先所想像的要大得多。在农村许多地方，根本就买不到食物；也没有旅店。有的地方连可以住人的大车店也没有。他们常常忍饥挨饿走很长的路也吃不到东西。饥饿严重地影响了宣传队的士气。

他们到达的第一个村庄叫“老山弯”，离青岛的海岸并不太远。当演员们进了村时，村民们都围了上来“看稀奇”。男演员穿的西装，女演员穿的短裙和丝袜，都是村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

有村民给了他们一个银元，打发他们快点儿离开。也有情绪偏激的村民，说他们是来“好玩”的，并不是真正来给农民唱戏的。

可见，他们并不受农民的欢迎。

这件事对江青的震动很大，也让她明白了宣传发动群众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无论你宣传的共产主义理论好坏如何，首先，你必须懂得如何才能让乡亲们接受。

当他们准备离开老山弯的时候，有村民告诉他们最好是去王高庄。那是个大村子，有好几家旅店。而且离这儿并不是太远。

到了目的地之后，江青被分配到的工作是教孩子们唱歌。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青岛的整个沿海地区。

通过教唱抗日歌曲，江青与孩子们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有些孩子喜欢上了她，常邀请她上他们家去做客。

在江青的记忆里，那段日子是十分美好的。因为她象剧组里的其他演员一样，受到了乡亲们的肯定与欢迎。

巡回演出剧组在王高庄演出的几天日子里，江青的确做得很出色。乡亲们喜欢看她演出的节目，尤其是喜欢听她唱京剧。

尽管江青所学的专业并不是京剧，但她的京剧的确唱得很好。

巡回演出剧组在王高庄的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们也因此获得了乡亲们的好感与信任。于是，一有机会他们就向村民们讲述苏区和红军的故事。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最大的收获是，他们可以买得到食品和衣物了。

他们在王高庄演出的节目，大多是自编自演的原创。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

《放下你的鞭子》是由《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改编而成的独幕剧。1931年，由集体创作、大剧作家陈鲤庭执笔写成抗战街头剧。

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以后，从中国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一对父女在抗战期间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的故事。一日，女儿香姐正要提嗓，却因饥饿难熬，晕倒在地，老父即举起鞭子打她，观众中一名青年工人十分愤怒，大声高呼：“放下你的鞭子！”，夺下了老父的皮鞭，并加以指责。老父和香姐诉说了日本侵华、家乡沦陷等辛酸，全场感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激起观众的抗日救国情绪。

该剧十分流行，但很难见到剧本。当地的同行私下找到江青，请她帮忙给弄一本，手抄本也行。

一日，江青拿到剧本后，飞快地塞进口袋，悄悄地离开剧场，径直跑到墓地，将剧本藏在了一块墓碑下。

在王高庄看戏的观众中，有不少士兵。他们很喜欢看巡回剧组演出的节目。其中三人成了江青的“粉丝”。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士兵们对宣传国共合作的节目并没有任何的反感。尽管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政治分歧，但他们都赞成共产党的主张：“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她和他们友好地分手了。

分手时，当兵的送了一些礼物给她和她的朋友们。

那天晚上，她满载而归地回到了客栈。她收到的礼物有：棉被、卷心菜和当地最受欢迎的山东大馒头。

后来她才知道，这些士兵中有一部分人是参加过1927年大革命。也有人跟随蒋介石，在上海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早在1905年中国就已经明令废除斩首而采用枪决的方式进行处决。但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决裂，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目的最终没有实现。国民政府又再次将斩首恢复，将屠刀伸向了曾经合作的革命群众。

从上海撤离过来的中国共产党在王高庄建立了一个支部。但当时江青并不知道这些，也没有与他们有过任何联系。

江青是其后，在青岛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当剧组准备离开王高庄时，有些村民舍不得让江青走，想挽留她。江青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跟着其他演员们一起上路了。

朝着下一个目的地，他们就这样走啊，走的。而且常常是饿着肚子走路。

有一次，身无分文的他们像往常一样，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几小时后，司机将车停在了狭窄的山路上，要求他们买票。他们好言好语地恳求司机，并保证到达目的地后一定付钱买票。好说歹说可司机就是不买账。并且大声地嚷嚷，如果不买票，就把你们扔在这荒郊野外的山路上！

最后，还是本地的山民救了他们一命，替他们补了车票。

这令人尴尬的场景，深深地刺痛了江青的心。而山民的善举更让她感动。她一直在想，为什么越是“贫穷”的人，越有一颗善良的心呢？回去后，她将自己的感想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了青岛的刊物上。

提到这篇写于1931年的文章，提醒江青想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两班人马都在找这篇文章。一班人马是林彪的；另一班人马是被称之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为此，他们甚至将官司打到了周恩来那里。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指1967年北京一度存在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组织，利用五一六通知散发反对周恩来的传单。后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大批无辜干部群众被迫害。

所谓的“五一六分子”，是指在风云瞬间变幻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中，被“怀疑一切”的狂潮鼓动起来的一批造反派 红

卫兵而已。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炮轰周恩来”，认为周恩来为代表旧政府机构是“又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的总后台。所以他们要打倒这“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解决“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这一方面是因为周确实竭力保护他这些老部下；另一方面，周又在全国镇压了不少造反派（如湖南“湘江风雷”），引起部分省市造反派的强烈反弹。

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在一开始便坚决反对并阻止了“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从1967年八月至九月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近十次点名“五一六”为“反革命组织”，宣布“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

江青知道，林彪找这篇文章，是想保护她，怕她在文章中说了什么过头的话。江青更知道，林彪之所以这么做，并不全是为了她。更重要的是为了主席。林彪对主席的忠诚，江青是从不怀疑的。

至于五一六是何居心？那就不好说了。

迫于各种压力，周恩来屈服了，同意他们清查江青的历史问题。他们找到了一些当年巡回演出剧组的成员，结果也没问出什么材料来。他们又找到了后来江青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结果也没发现什么反动言论。

只有周恩来想方设法找到了一篇她写给一本妇女杂志的短篇小说。写的什么内容，江青自己也根本就不记得了。

周恩来将文章压了下来。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许多年后，“四人帮”被打倒了。专案组找到了这篇发表于1930年，年仅十六岁的女孩——江青写的文章。专案组在审讯她时，指责她写这篇小说只是为了赚钱！

试问，生活在家无隔夜粮的旧社会，写篇文章赚点儿钱——又有什么不对呢？

4

在民国政府统治时期，一个普通的穷学生能作为一名旁听生进大学，这本身就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虽然她象其他所有的同学一样的听课，一样的努力，可却得不到毕业文凭。

江青是个大学生，因为没有文凭，所以学历不被承认。

有人说她是靠巴结某位知名教授才进的大学。是的，就算在青岛大学作为旁听生上课走得是“不正当”关系。那么，后来江青在北京大学，在上海的几所大学都上过学，难道也都是走的“后门”不成？

对于这些诽谤之词，江青未可置否。她只是对我说，十七岁是一个人思想最活跃，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年龄段。在这个年龄，能作为一名旁听生进青岛大学，是她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江青一直都对文学很感兴趣。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她一直梦想当一名作家，写点什么东西留给后人。

她大学里的第一个老师，是闻一多先生。

教的是唐诗、小说、戏剧和中国文学史。

第二个老师，是杨振声先生，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杨振声师承蔡元培，效法“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广聘专家学者。经他邀请，闻一多、黄敬思、傅鹰、沈从文、梁实秋、游国恩等名家纷纷前来任教，青岛大学声誉日隆。以至于有评论称，他凭借个人的声望和地位，造就了该校校史上一段难以再现的盛况。

杨振声曾亲自为江青授课，教她如何写作。

方令孺是江青的学姐，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作为女性作家，方令孺当时文化圈内已小有名气。后任浙江省作协主席。

江青说：

“闻一多、杨振声和方令孺都在美国读过书，接受过西方教育。杨振声和方令孺一直活着，直到 1949 年解放。”

其他老师的名字，江青已记不得了。

她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是获得学校颁发的文学奖。她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曾受到校长杨振声的赞誉，夸文章颇有著名女作家谢冰心之风。杨振声拿江青写的短篇小说与当时已具盛名的青年女作家谢冰心相提并论，他对江青的赏识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才华横溢的江青，照理说应该将她的小说继续写下去。可是由于年轻气盛，性格狂傲，受不得一点儿委曲，仅仅因为一件小事，她便放弃了成为一名作家的理想。

杨振声曾多次夸奖江青是班级里最好的学生。

有一次在课堂上，杨教授点名批评了她：

“李同学，要注意文章里所描述的人物的语言特性。比方说‘去死吧’，这句话如果是出自土匪的口里，就不够力度，不够粗野。”

老师善意的批评，江青竟一时接受不了。她没有做过土匪，也没有被土匪抓去，与土匪有过接触。她哪知道土匪说话的语气和用词？

历史仿佛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几年之后她嫁给了中国最大的“土匪”（赤匪），成了他们大掌柜的“压寨夫人”。

此乃后话，下回自有分解。

言归正传。

江青不写小说，改写剧本了。

1931年有夏天，江青写了一个剧本《谁是罪犯？》。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和他体弱多病的母亲。警察抓不到这位革命者，便将他的母亲抓了去顶替。为救母亲，儿子挺身而出，自投罗网。母亲却早已死在狱中。

江青借这位青年革命家之口，发出了她自己的呐喊声：

“革命有罪吗？”

“警察滥杀无辜，草菅人命，难道不是在犯罪吗！”

不过，江青在文章中没有讲明革命者的身份。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声称自己是“革命者”！

说到这儿，江青笑了：

“你能告诉我，共产党和国民党闹革命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吗？”

我哪知道啊。国共两党打打和和闹了几十年，这个问题恐怕到现在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弄明白。

江青接着说：

“戏不重要，重要的是宣传。我在戏里扮演了三个角色。也正是这个时候，我开始观察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并最终选择了共产党。”

那年秋天，江青平静的大学生活被打碎了。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而“九一八”事变的真正罪魁祸首，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

许多像江青这样自认为是“民族主义者”的热血青年，他们虽有一棵爱国之心，认为国家的完整性高于一切。但他们只是待在大学里，喊喊口号而已。这些受人尊敬的“爱国者”，并不是真正决心抵抗日本侵略，而不惜任何代价。

即便是喊喊抗日救国的口号，也有人看不顺眼，说她是“麻烦制造者”。这个人就是江青曾经的恩师赵太侔。江青与他在课堂上公开辩论了一场，从此断绝了师生情谊。

江青走出了校门。

外面是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广东八月底的夜晚，依旧十分闷热。

宽大的会客室里，我和江青不知不觉地已经交谈了好几个小时。无论是听的，还是说的，都回到了过去，沉湎于往事的回忆之中。

江青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四肢，提议：

“换一个房间，换换空气。再接再厉，如何？”

我们走进了另一间房。

和前面的那间一样的大，一样的宽敞。房间里同样摆放着书写文具和录音设备。茶水、点心以及热的、冷的、干的和湿的毛巾一应俱全。

我们坐下来后，江青重新开始讲述她那未完的故事。

在青岛大学就读时，江青曾从师沈从文学习写作。

沈从文住在他姐姐沈周周家里。沈周周发现了江青的文学天赋，常邀请她上家里授课。

沈从文试图改变她的写作风格，让她每周写一个故事。但是，江青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做。她有自己的想法。

从她的角度来说，自己只是一个穷学生，而沈家非常富有。她一直没想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帮自己？

沈周周似乎看出了江青的窘境，想在经济上给她一点儿支援。她知道江青很要面子，于是换了说法，请江青给她打一件毛衣，她愿意支付工钱。

江青拒绝了。

后来她才得知，沈周周曾就读于北京的一所法国教会学校。那是一所贵族学校，每学期的学费高达五、六百个大洋。

江青说，她的学业是在济南、北京和青岛完成的。她上了一年（1929年至1930年）艺术学校；后来在青岛大学和滨海戏剧协会又“深造”了两年（1931年至1932年）。

她打小就是喜爱小说和诗歌。她也喜欢翻译过来的外国诗歌。并且发现大多数的诗歌其实是没法翻译过来的。因为中国人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外国人。就像外国人不可能完全了解中国人一样。

江青年轻时写的一些诗歌曾经出版发行过。她也曾试着写过一些散文和随笔，但不是很成功。日本入侵后，象每一个有爱国心的青年人一样，她觉得革命比写作更为重要。

江青总结说：

“小时候，我受过八年的正规教育。包括五年小学教育。我上过大学，但不是大学生。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我真正的知识是在‘社会大学’里学到的。”

1933年，江青走进了社会大学，开始了她的新的课程。

第三章 入党前后

1

江青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的，从此她的人生轨迹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已从一个空有满腔热情，只会“制造麻烦”的热血青年，成长为理想、为主义而奋斗、而牺牲的共产主义战士。

时间退回到1933年，社会上有成千上万的象她这样对社会不满，不愿做亡国奴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人。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之后，国民党成了新的统治者。他们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大肆追捕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尤其是共产党员。

江青是在青岛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的。

白色恐怖下的城市地下党，组织结构采取的都是单线联系。除了自己的上级，接触不到任何其他同志。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

对于一个十九岁的小女孩来说，她能知道多少呢？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0日在这里秘密召开，各地的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了12名代表出席，他

们代表了全国的 53 名共产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旅日代表周佛海，此外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中共一大南湖续会在一艘中型游船上举行，这次会议议程有：审议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审议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选举中国共产党全国领导机构。会议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在南湖游船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局领导机构。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

党纲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共产党成立了。

人民有了新的希望。

人民有了自己的救星。可当时的统治者，依然是国民党。

1926年11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南昌后，便加紧和帝国主义、旧军阀官僚勾结，公开反共，镇压革命。

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第14次纪念周的演讲中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3月6日，蒋介石指使驻赣州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枪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

3月17日，蒋介石嗾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

3月23日，蒋介石又指派杨虎等收买一批地痞流氓，在安徽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安庆市党部，以及安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筹备处。自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南京不断用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同时，越来越重视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对蒋介石的反共态度极为关注。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即公开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进一步投入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他通过报界宣布：“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并派员到英、美、日、法、意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者清楚地看出，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

特许他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侵华军队帮助其镇压革命。他们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 300 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 3 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

3 月 28 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

4 月 2 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黄绍、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

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

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

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

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刚到上海，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

4月6日，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蒋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绪后，于4月9日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监督执行其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计划。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

度。但是，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

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信。之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

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

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事件发生后，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 1 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 100 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 3 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 300 多人，被捕者 500 多人，失踪者 5000 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

4 月 15 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2000 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 200 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

4 月 28 日，李大钊和其他 19 名革命者从容就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

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这是几十年之后，中国人自己总结出的历史。

当时的江青并不知道这段历史。她只知道，要抗日，就要入党。要入党，就要入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真心打日本的。而入党是很危险的，随时都有被捕、被杀头的可能。因为蒋介石不让你入共产党。

不仅仅是国民党在打压共产党，在共产党内部也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争斗。主要表现在是走农村包围城市，还是直接发动城市武装暴动？

1928年，毛泽东和朱德带着七、八个人，十几条枪上了井冈山。与蒋介石在江西省周旋了好几年，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御驾亲征的四次围剿。一不小心，红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鸟枪换炮了。根据地有了。苏维埃政权也建立起来了。

于是，有人不高兴了。

谁？

苏联老大哥。

老大哥派来了个年轻漂亮的小后生——王明。

王明(1904-197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领导人，原名陈绍禹，又名陈绍玉，字露清，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1904年4月出生於小商人家庭。

王明资质聪颖，6岁入私塾，8岁能为乡邻写春联。后入大王庙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六安第三农业学校，民国13年，他和进步同学共同组织豫皖青年学会。翌年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国民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

中共中央于 1931 年 1 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 10 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

1931 年到 1934 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王明在 1937 年 11 月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地区的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

1938 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

1945 年 4 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此期间，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制定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 30 年，到 1980 年才修改。

1956 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但已去苏联就医，从此拒不回国。

60 年代及 70 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先后撰写、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攻击毛泽东，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 年 3 月 27 日在莫斯科病逝。

王明留过洋，受过正规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他既有文凭，又有学历。

他到了井冈山，振臂一呼：

“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红军要枪对枪、炮对炮，御敌于国门之外！”

别说，后生哥喊口号还是蛮有鼓动性的。许多人愿意听，也喜欢听。就连不少毛泽东身边的爱将也提着驳壳枪，跟在王明的身后呐喊着打正规的、绝对符合国际标准的阵地仗去了。

小后生喊口号行，打仗不行。

结果，仗打输了。

红军打垮了。阵地打丢了。扔下根据地开始撤退了。三十万红军到了湘江边，傻眼了。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红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 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 军团

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撤退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红军走到贵州，再也走不下去了。

怎么办？

开会。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

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大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

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会开完了。

红军又重新开始跟随毛泽东钻山沟，打游击。爬雪山，过草地。最终到达陕北，与日本鬼子真刀实枪地干上了。

可是有人不服，说是毛泽东运气好，没有遇上真正的强敌。如果是毛泽东领着过湘江，照样打不赢湘军。

笑话，五次围剿，毛泽东打了四次，胜四次。成功率百分之百。第五次如果还是让毛泽东打，根本就用不着败走湘江！

湘军不是厉害么，你可知道毛泽东是哪儿人？

湘军不是能打么，他得听蒋介石的。

蒋介石不是能剿么，他得听毛泽东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着蒋介石在赤水河来回走了两趟，三转二转就把蒋介石给转晕了。你说，是湘军厉害，还是毛泽东厉害？

江青参加革命时，她只知道共产党，并不认识毛泽东。

江青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为生存而挣扎之中度过的。她从小就性格叛逆，很少有女孩子象她那样做任何事情可以完全不顾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的反对。只要她自己认为是对的，八头牛也拉不回。

她参加革命，其实就是性格叛逆的具体表现。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斗争完全陷入瘫痪。地下组织几乎全部被国民党摧毁。大多数幸存者明哲保身学会了沉默。

“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他们中许多人甚至已经忘记了入党时的誓词。

只是中国的历史学家没有人敢客观地记录下这段真实的历史罢了。

2

江青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问道：

“你不是很想知道我是怎样入党的么？”

答案就隐藏在江青在青岛生活的那两年的历史事件中。

当时，她仍是一个旁听生、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演员和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

入党后，在党的教育下才逐渐扩大了她的知识视野。并有了自己的理想和人生的追求目标。

历史和机遇，如同一对孪生姐妹，二者缺一不可。

在青岛的两年中，有两件历史事件改变了江青的历史命运并影响了她的整个人生。

一是“九·一八；二是“上海保卫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打响了入侵中国的第一枪。紧跟着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当中国的领土被分割、遭外敌蹂躏的时候，和许许多多的年轻的激进分子一样，江青也加入了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并施行严厉的抵抗日本的政策游行请愿行列。

不久，当她怀疑自己最尊敬的教授实际上是赞同不抵抗主义的“卖国贼”时，她便义无反顾地与他划清界限，离开了青岛大学。

她决心去寻找对国民更富同情心，对日本不屈不挠坚决抵抗的更激进的社会团体。

她找到了。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1931年，江青加入了共产党青岛支部领导的左翼联盟剧作家和左翼联盟作家协会。

革命，首先得“保命”。你得养活自己。没了命，你拿什么去革命？

江青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找了一份普通职员的工作。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为她饥渴的大脑提供着取之不尽的营养。她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上。她阅读过的第一部马列著作，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引起了她对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的极大兴趣。

当江青描述她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的往事时，我突然联想到了她的丈夫，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当年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一年左右的普通职员。毛泽东也是在图书馆工作期间第一

次接触到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还是他俩前世就有缘呢？

当我说出心中的感受时，江青连忙摆手：

“你怎么能拿我和主席相提并论呢。是主席领着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那可是被压迫了好几千年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第一次昂首挺胸地站起来。你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吗？

而我，不过是解放战争期间，在主席身边做了一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罢了。”

青岛的政治局势，只能用“黑暗”这两个字为形容。

由于受“左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的影响，早在1930年青岛支部就已经支离破碎，土崩瓦解了。只有一小部分人转移到了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所有成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

1932年，江青被介绍给了青岛地下党的秘书李泰章。李秘书后来作为党代表被派往四川（中国最大的省份）工作。

李泰章二十几岁时，就已经是一位名声鹤起的专业革命者了。尤其是地下斗争经验十分丰富。

江青的上线，是组织指派给她的一位男同学。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和搜查，中共地下党常采用这种“乱点鸳鸯”的手段。如《永不消失的电波》等电影中所描述的就是这种情节。

这些为革命事业而牺牲个人情感的假夫妻，有弄假成真的；也有同床异梦——或者是同房不同床的。

前者居多，江青属于后者。

江青学过戏剧，做过演员，更何况这是组织交待下来的任务。与异性同学扮演夫妇，自然不会被外人看出端倪。

江青做的很成功，同年二月，她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江青的杰出表现，赢得了大家对她的尊敬与肯定。有些同志跟她开玩笑，给她取了个昵称，亲切地叫她“二根刺”。江青身材苗条、亭亭玉立，双脚格外修长。

江青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意志力十分坚强。

江青每天吃得很少，几乎不吃东西。（每天就两张薄饼——中国北方农村常见的小麦煎饼。）同志们见她一天天地消瘦，好心地劝她多吃点。而她却撒了个善意的谎言：“我正在减肥。”

江青每天只吃一餐。通常是在大学饭堂里用餐。就这样，每个月也得花八块钱的伙食费。

江青精打细算吝啬得出了名。比如说买张三等的戏票，她却常常坐到了头等包厢里看戏。

我忍不住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省吃俭用？”

她回答得很干脆：

“剩下的钱，都给了李泰章。”

她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显然，这些钱，她都交了党费了。

3

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那年春天过后，新左派的作家、艺术家和剧作家就由数百人发展到成千上万人了。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上海——这座有着东方巴黎美誉的城市。他们不仅享受着来自西方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在尽情地吸收来自西方的精神文明。

上海——是一座巨大的政治舞台，像一块不可抗拒的磁铁，吸引着每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激进分子和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之中叫嚷声最高的是蒋介石：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然而，背地里却悄然举起了屠刀。

1927年，上海成了“革命烈士”的坟墓。

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破裂之后，又迎来了白色恐怖。

国民党利用帮派、特工和军警，四处搜捕共产党人。矛盾的是，政治利益两极分化最突出的上海，同时，也存在着一块缓冲区——英租界和法租界。

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同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准许英国商人带家眷在五通商口岸居住、贸易，准许英国政府在五口岸派驻领事、管事官“专理商贾事宜”。次年10月，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又具体规定由大清地方官

与英国领事会同商定英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区域。根据这些规定，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来沪。11月17日正式宣布上海开埠。巴富尔经过同上海道台宫慕久多次谈判。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以告示方式公布了这些协议，即《上海土地章程》，达成辟设英租界协议。

此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1854年7月，英法美3国成立联合租界。1862年，法租界从联合租界中独立；1863年，英美租界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在租界中，外国人投资公用事业，兴学办报。租界当局负责市政建设，颁布一系列租界管理的行政法规。

租界是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毒瘤和耻辱。

租界留给中国人民的不仅是耻辱，同时也为处于襁褓期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保护。

历史总是这样，叫人捉摸不定，哭笑不得。

江青既兴奋又害怕地离开了青岛。

一些朋友到码头为她送行。在那里，他们将她介绍给了一位年轻人，（在我们的谈话中，江青始终不肯透露他的姓名。）作为她的“男朋友”，一路陪伴她到上海。

既然是组织的安排，江青并未提出异议。

生平第一次乘船航海，留给江青的是终生难忘的可怕的梦魇般的记忆。

江青体质很好，极善爬山。在青岛大学与同学们一起爬山曾经得过“爬山虎”的美称。可她却奈何不了大海。

晕船带来的恶心，使她呕吐不止。

她试着向所有人求助，包括组织指派给她的“男朋友”。

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

旅程即将结束，轮船快要驶入码头时，“男朋友”提出了一个令她始料未及的问题：

“到上海后的第一个夜晚，我俩住一个酒店吧？”

江青本能地感到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未加思考便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

江青有些气恼，甚至可说是愤怒。她开始觉得对方不是“好人”。

江青知道上海有许多女子公寓。

她提出：

“上岸后，我一个人直接去女子公寓！”

她打算找一辆出租车或黄包车，他们（司机）会送她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男朋友”改变了策略，声调也低了下来：

“你只要出十五块钱，我可以帮你找到一个适合你住的地方。”

江青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

上岸时，“男朋友”帮她提着行李，似乎并没有将江青的拒绝放在心里。

码头上十分热闹，有许多前来接客的亲友。

突然，江青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她二话没说，便简直朝他“冲”了过去。直到上了对方的小车，她才发现自己的行李还在“男朋友”的手里。

江青到达上海后的第一个晚上，就住在这位熟人家里。

他是到码头来了接刚从老家返回的太太的。

此人江青早就认识，他从前是海鸥剧社的一名导演。现在俄国人的一个剧社工作。（1932年12月12日，南京政府与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他的剧社正在中国农村各地演出“进步节目”。

翌日，他邀请江青去饭店用餐。

用餐时，她听到大街上传来阵阵古怪的女人的尖叫声。

她惊愕地问道：

“那是什么啊？”

对方十分淡定地答道：

“没什么。是妓女在拉客。”

这就是江青到达大上海后所遇见的第一件事情。

这件事之所以令江青终生难忘，其实是因为后面所发生的事情。

陪同江青来上海的“男朋友”给组织写了一份报告，详细而又真实地汇报了一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唯独遗忘了说他曾经向江青提出过同居一室的要求。

他只记得说：

“刚上码头，她就被一个中年男子接走了。当晚，就住在那个男人家里！”

组织上并没有因为此事而追究江青的过失。不过，材料却留在了她的档案里。

后来，在延安当江青与毛泽东恋爱时，有人将此事讲给了毛泽东听。

主席听后哈哈大笑，连说了几个“不错”：

“不错嘛，小小年纪就知道逃跑，知道保护自己。这有什么不好？”

说到这儿时，江青的脸颊上竟然泛起了红晕。（要知道此刻我对面的江青已不是十几岁的少女，而是六十好几的老太婆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江青初到上海时的话题。

江青在上海呆了四年。

江青第一次接触到了田汉创立的春秋剧社。田汉同时还兼任着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党团书记。他并不知道早在1931年，江青就已经加入了左翼剧社的青岛支部。田汉很看重江青的才华，还有她的“泼辣”。在戏剧专业方面曾给予江青很大的帮助。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寿昌，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者。

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原籍湖南长沙。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

田汉出身贫民家庭，少年时代受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人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具有反帝爱国志向。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6年得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翌年，创作了剧本《环珞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

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

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渝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此后，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

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编导拍摄《到民间去》，未竟。

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

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同一时期，田汉主编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

《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1920~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度。《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之作。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把话剧由校园推向了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带头作用。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4月田汉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

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

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能全面发展的时期，他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18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和给予经济补助。翌年，改编并演出了6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

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5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七七”事变后，创作了5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不久，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审查了田汉被捕后的表现，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8月，田汉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田汉南下长沙，旋返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2月武汉联合公演《最后的胜利》，接着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起草了成立宣言。1938年初，据抗敌剧

协“决议”，田汉与马彦祥、廖沫沙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后去长沙，又筹办了长沙《抗战日报》，并着文明确提出，“现阶段的剧运路线是戏剧游击战”，号召戏剧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1938年2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1938年11月，撤离武汉到长沙，团结湖南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抗日救国之演出，并亲自写作了《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曲剧本。

1940年应三厅召赴重庆，期间与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创办《戏剧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汉曾先后主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皖南事变”后，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南岳住了近半年，随后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组建了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同时写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与洪深、夏衍合编了《再会吧，香港》。

1944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检阅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戏剧队伍和大批优秀剧作的演出，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田汉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了《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这个时期，田汉主要是以公开身份组织领导演剧活动。除了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演剧团体之外，田汉更注意戏曲艺人的团结和民族传统形式的运用和改造，广泛动员戏剧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他紧密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推动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改编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

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田汉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剧协主席和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解放后，田汉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文革初期，1968年田汉病死狱中。

说到这儿，江青象是在喃喃私语：

“为什么不来找我？其实，我是可以给他写材料证明的……”

言语中多有悼念之情。

“既然你已经是一名党员，为什么在上海找党组织还是如此困难呢？”

我开口问道。

她解释说，由于受王明路线的干扰，上海党组织已逐渐削弱。1931年，几乎完全被解散。因此，其他城市分支组织的党员要想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根本不可能。

用她的话说：

“我们能够生存下来，就已经够幸运的了。那时候，上海党组织中有许多人脱党，叛变。许多人的个人组织关系也是后来假造的。”

说这话时，江青的心情显得有些沉重。

在上海最初的日子，田汉是江青的直接领导。

她只会说山东话和北京话，上海话半句也不会。与当地根本无法沟通。她的第一项工作任务，就是学说上海话。

江青住的地方十分隐蔽。

地下党选择住址有两个必备条件：

一是离电话亭近；

二是便于撤离。

江青是剧组里最年轻的女同志。她身边都是一些著名剧作家或党的高级领导。江青从不畏惧这些位高权重影响力极大的领导，反而与他们处得十分融洽。

我有些好奇地问道：

“许多人都怕领导，尤其是怕跟高级领导打交道。你是怎么做到不怕他们的呢？”

江青答道：

“答案很简单，就四个字。‘虚心求教’”。

本人不敢完全苟同。或许她的天真与诚恳，才是与领导建立和谐关系的基础。

江青很好学。

于是，田汉将她介绍给了自己的弟弟——田洪。

田洪的专业是丑行，主演反派人物。

江青不喜欢丑角，故一开始并不喜欢田洪。

田洪居无定所，有好几个落脚点。

江青与他初次见面是在他母亲家里在。具体地址现在已回想不起来了。记忆深刻的是，他母亲是一个和蔼可亲、令人敬佩的女人。

她邀请江青在家里小住了好一阵子。

夜晚，常与她促膝谈心。她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田汉的家成了革命的堡垒户，避风港。

不久后的一天，田汉、周扬和阳翰笙一起来看江青。

鉴于江青做过演员，又有表演天赋。对于她今后的工作安排，组织上想征求一下她个人的意见：

“你是想继续做舞台演员，还是去演电影？”

没想到江青的回答是：

“两个都不想。我想去做基层群众工作。”

这说明江青她不沉迷于名望，而宁愿做日常宣传工作。

组织上结束了对江青的考察。

事后，三人联名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份报告，认定江青诚实可靠，可通过正当的渠道按照组织程序恢复她的党籍。

江青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江青在上海所接触的第二位知名人士是陶行知。正是陶行知将她送上了延安，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陶行知，1891年生于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

祖籍浙江绍兴，6岁蒙馆，14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

1910年靠教会资助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与胡适同乡又同学。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陶行知在投身平民教育时，也时刻关注社会上的政治运动。1930年春，晓庄师范师生为抗议英商和记洋行工人被殴，举行游行示威。时值蒋冯大战，因陶行知与冯玉祥有私交，蒋介石断定晓庄

事件是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遂怒令关闭晓庄师范并通缉校长，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通缉解除，过了一年陶行知才回到上海，从此更立志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沪期间，陶行知经黄炎培举荐被聘任为国内有名的《申报》的顾问，曾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时评。当时，蒋介石以“剿共”之名进攻共产党领导的苏区，陶行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时评，语惊天地地指出：“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国民党当局很快查明这些文章出自陶行知之手，蒋介石大发雷霆，批示：“申报禁止邮递”。为申报馆的生存计，总经理史量才忍气吞声，表示今后不再续登陶行知的文章，蒋介石方解除禁令。

晓庄师范学校的办学宗旨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

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

“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

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

“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群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因此“社会即学校”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

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意味着原则上任何政治都是可以接受的。

随着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逐步升级，一些公开提倡民主和无政府主义的进步青年被逐出学校。

江青亲眼目睹了一些共产党和青年团学生被国民党反动派当局逮捕。他们是昂首挺胸高唱着《国际歌》走出校门的。他们的勇敢行为深深地感动了她。

田汉将江青派到山海工学团之后，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生活上对她也是十分关心。他让自己的亲弟弟田洪负责照料江青的一切，并直接向他汇报。

可是江青并不领情，她认为田洪对她管教得太严。受不了。于是，脑子一热，小孩子气提笔就给田汉写了一份报告。

要求调离。

报告中，她称田洪为：“坏人”。

正是这二个字，当年江青的无心之过没想到多年之后竟然会给田洪带来无尽的“麻烦”与“灾难”。

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通过田汉，江青被介绍给了另一位著名的左翼联盟剧作家廖沫沙。

廖沫沙，原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曾和贺绿汀组织文学社，办文学刊物，做过报纸副刊的助理编辑。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在《南国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燕子矶的鬼》等戏剧小说作品。

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职于上海明日书店，后又任《远东日报》编辑。1934年加入“左联”。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先后在湖南《抗战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晚刊、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去香港恢复《华商报》，任副主编、主笔。

抗战时期写过一些历史小说，1949年结集为《鹿马传》由三联书店出版。解放后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人民日报》曾为他和夏衍等人开《长短录》杂文专栏；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曾为他和邓拓、吴晗开《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1966年5月和邓、吴三人被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

1927年，廖沫沙从长沙师范毕业，辗转到上海当了一年大学旁听生，从此踏上了自学道路。这期间，他与同学合租一间破旧的房子，人住楼顶。白天去图书馆读书，晚上在“斗室”整理笔记练习写作。

1930年，江青认识他时正是他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经济本来就拮据，加上老婆又怀孕了。

这期间，江青尚未被组织重新接纳，仍在考察期内。

廖沫沙邀请她到家中小住，以便就地接触了解她。

此时，江青也没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她接受了对方的邀请。

廖沫沙住在阁楼上，本来地方就狭窄。江青来了，只能睡在一张小书桌旁。就这样，也占了房间四分之一的空间。廖沫沙夫妻俩经常为柴米油盐吵架，江青是局外人，没法劝架。只是晚上有时吵得她无法入眠。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1930年至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江青一直与廖沫沙夫妇住在一起。并继续在上海大学做一名旁听生。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曾谈及“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今天开“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大会，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集会！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过去几次我都没有能参加，今天我是非常兴奋地来参加的。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已有了一百年的反帝反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再加上共产党十八年的斗争经验，什么事情还会办不到呢？这样看来，中国的事情比以前是更加好办了。我们一定要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出一个民主共和国！现在虽然还有帝国主义者和“申公豹”们不断地阻碍我们这样做，但是不要紧的，我们现在是聪明了，是有力量了，我们已不是昨天的我们，而是今天的我们了。帝国主义者、“申公豹”们，是你们滚蛋的时候了！”

毛泽东作报告时，江青就坐在最前面的第一排。

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江青的思想“极为”左倾。哪是有学生示威，哪里就能看到江青的身影。

一开始学生们喊喊口号，国民党当局并没当一回子事。可是，喊口号的学生多了，尤其是当部分教职员工也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之后，蒋介石就再也坐不住了。

特务们抓了许多学生，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当江青重新走向课堂，继续旁听上课时，天气开始转热。

在廖沫沙家里住的时间长了，江青从他夫妻俩身上潜移默化地学到了许多与人谈话的经验。包括如何与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人打交道。这对江青在大学里开展学生运动，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上海大学与江青“交朋友”（当年地下党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展学生运动的。）的女学生中，也有富家子弟。为帮廖家解决经济危机，江青找到一位最要好的女孩，张口就向她要借二十元钱。要知道二十个大洋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女孩一开始有些犹豫，嘴巴里嘟哝着刚刚付了大学学费什么的，手头并不宽裕。可最后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将钱给了她。（故江青回忆这段往事时，不愿提及她的名字。）

江青拿了钱，匆匆赶回阁楼。

廖夫人怎么也不肯收：

“这怎么行呢，老师怎么可以拿学生的钱呢。”

“没事。就当是借给你们用。等什么时候你们有了钱，再还给我好了。”

为免伤师母的自尊心，江青将钱“借”给了她。

只是后来师母一直忘记了“还”钱。

江青的钱是借来的。

为还这笔数目不菲的“贷款”，江青只好自谋良策。

江青不得不在好几家中学做兼职教师，教授国文。她只记得是按小时付费的，不记得每小时多少钱了。

江青唯一的花销是在路上。

为了赶课，她不得不使用“交通工具”。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约定时间内，江青还清了这笔“贷款”。对她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解脱。

廖沫沙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他没有还钱，也从没跟江青说过一声“谢”字。只是在多年之后，打倒了《四人帮》，当江青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他才想起此事。

主动向组织揭发：

“江青常用资产阶级的下流手段拉拢腐蚀革命干部。当年在上海，她住在我家的时候，曾给过我老婆二十个大洋。说是‘借给’我老婆的。想想，她小小的年纪，哪里搞来这么多的钱？

这钱的来路肯定有问题！！”

只见他义愤填膺，满脸正气的样子。

4

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所有像江青这个年龄段的左翼分子，政治示威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方法。在国家问题上向政府请愿，有组织的团体比独立无援的个体更为猛烈，也更具影响力。

1933年，江青开始了她的教学生涯。

同年8月，她代表部分老师和城郊妇女带领着一群学生和工人去码头迎接英国工党的马利主教和法国的保罗·威兰特女装设计师。他们是来上海参加九月的第一个星期由世界反法西斯组织发起的“反帝国主义”集会的。

江青带去了两个钢管乐队。游行队伍一路上挥舞着红色的旗帜，敲锣打鼓，鞭炮齐鸣。

以教授和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有序地行进在上海宽阔的马路上。没有暴乱，当局也没有出动警察冲进队伍里来抓人。

江青回忆说，1933年至1934年间，上海的党组织仍然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路线。有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甚至表现得比王明还要王明（更为左倾）。

左倾路线带来的结果是，国民党蓝衣社派出了大批特务打入组织内部。凡有游行，必定抓人。而且一抓一个准。

有些游行，国民党是不抓人的。

如声援十九路军出兵抗日，江青领着学生们上街募捐。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简称“十九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一支部队，前身是邓铿为师长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1926年粤军第一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陈铭枢为第四军当中第十师的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属下团长。北伐战争中，第四军屡有战果，被誉为“铁军”，第十师亦扩编为第十一军，下辖第十师、第二十四师、及第二十六师。

192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第十一军时由叶挺任副军长，第二十四师及十师均参与其事。但第十师后来离开中共控制，转往福建并重新由陈铭枢节制，改向蒋介石效忠。

1930年的中原大战，助蒋介石击败冯玉祥及阎锡山，番号改为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之后十九路军参加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三次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防上海，陈铭枢任京沪卫戍司令。同时蒋介石受压下野，南京国民政府由广东派系主持。

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夕，何应钦得知十九路军将领欲在上海抵抗日军，曾下令十九路军换防离开以避免开战。

1月28日，日本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十九路军即奋起迎战抵抗，因而成为在全中国声名大噪的抗日军队。

后来日本多翻增援上海；蒋介石亦复出主持局面，并即派出中央军编成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到上海增援共同抗日。最后一二八事变以外交谈判解决，第十九路军从上海撤下，被调到福建剿共，蒋光鼐兼任福建省长。

十九路军在福建与红军作战最初取得一些胜果，占据部分的红军根据地。但后来与彭德怀的部队交战失利。蔡廷锴等将领在前线与共党展开和谈取得停火。而陈铭枢则联络桂系、广东的陈济棠等，商议另立政府。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以大军镇压。由于闽变未取得其他势力支持，十九路军内亦有反对意见，在敌我实力悬殊下终告失败。最后十九路军主力被中央军击破，部分则向中央军投降。只有少量十九路军军官到广西投靠李宗仁重组，其余被收编之部队中级以上军官全被更换，十九路军番号亦被取消。

十九路军中央化后，取消了路军级别番号，保留师级部队番号，正规部队有60师、61师和78师等三个师，都脱离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系统，成为中央军。唯一获得蒋介石信任的原十九路军高级将领是区寿年，继续担任78师师长，后升至兵团司令。蔡廷锴蒋光鼐长期赋闲，后留在大陆加入民主党派。

十九路军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战斗力极为强悍，是中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在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时，十九路军是唯一能和红军主力打成平手的国军部队。

但在福建事变后，因为优秀指挥官流失，战斗力大大下降，改编为中央军后，也没能完全恢复元气。

1932年7月18日，江青与一名年龄与她差不多一般大的男生上街募捐，正好遇上一群学生卧轨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

此事对江青的撼动很大，她认为每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都应该像这些不怕死的学生一样，洒一腔热血，存浩然正气。

从这一刻开始，江青便看破了“生死”，做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

只是没想到这一刻让她等得太久了。直到1991年5月14日。

频繁地参与街头示威，而且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只要学生领袖一声令下，支持者们便会从四面八方按指定的时间涌向指定的地点。警察和便衣刚在这儿驱散了他们，不一会儿他们又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

在游行队伍中，每每夹杂着国民党特务和共产党的叛徒。这些“自己人”喊起口号来，声音比任何人都高：

“宁死不做亡国奴！”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可是没过几天，那些在游行中与他们走得比较近的人，便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了。

回忆当年的游行示威，江青依然显得格外激动。

以陶先知为首的教育家，包括部分左联的教授，他们不仅同情学生运动，而且是幕后的策划者与支持者。

江青在示威游行中的积极表现，自然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包括真正的自己人——上级领导，以及冒牌的“自己人”——蓝衣社的便衣特务。

在一次示威游行前，廖沫沙交待她照看好两位刚刚加入队伍的女工。从见到她们的第一刻起，江青就觉得她们哪儿不对劲？她发现这两名女工比别人的衣服穿得都好。

这怎么可能呢？

江青穿着入时，是因为她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她一个人兼职了好几所中学的国文教师。

难道她们也跟自己一样，有较好的收入，或者是有父母、亲友或同志们的支持？

然而，她没法证实自己的想法，更何况是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

她只能将怀疑藏在心底。

江青做过演员，演技本来就好。这些自然不会太困难。

她们很快便成了好朋友，而且江青还成了她们的“老大”。

记得那天下午（9月18日），江青正在演出（由日本电影《杀婴案》改编的戏剧），为英美卷烟厂罢工的工友们募款。像往常一样，还剩下好些张票。

普通票价每张仅二、三角钱。最贵的却要五至十元。

门票收入一直不好。

剧团的赞助人陶先知不得不包下了所有的特等票，用来支付演、职员工的薪水。

江青平常演出时很少留意观众的反映。可那天观众的反映却她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观众情绪特别是容易激动，不断有人站起来高呼口号。

原来这是工会组织的一次活动。

演出即将结束时，剧场开始骚动起来。

警察进来抓人了。

大幕刚刚落下，演员们来不及卸妆便成鸟兽散从后门跑了。

当所有人都走了之后，江青这才发现整个剧场里就留下自己一个人。

此刻的江青虽然又饥又渴，却并不觉得害怕。

她掏出钱袋，想看看还有没有打车回家的路费。

钱包里空空如也，分文不剩。别说车费，连今晚吃饭的钱也没有了着落。

江青突然想起，附近有一家白俄餐馆做的罗宋汤相当不错。江青认识店主，她相信只要自己开口，白俄罗斯老头会为她打破“没有免费的晚餐”这条禁例的。

刚走进餐馆，江青就觉察到气氛有点儿不对。

许多食客停止了用餐，正注视着她。

许多人认出了她。

他们刚刚看过她下午的演出。女演员李云鹤这个名字给他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不仅是她的演技，更让他们折服的是她的勇气。

警察抓人，这个小女孩却留在了最后。

有人在店主耳边低声诉说了些什么。小老头一高兴，为江青提供了一餐免费的丰盛的晚餐。

翌日，江青必须去参加一个抗日示威游行。上级派了个女人为她带路。一不小心，半路上江青将带路的人给弄丢了。

江青急了。

急忙赶往附近的内盛桥，一个熟人也没有找到。她急忙赶往另一处地点，却发现周围全被警察给包围上了。

被包围的人是英国殖民政府锡克教代表。

绕开这一危险区域后，她继续坚持寻找示威游行的集合地点。碰巧路上遇到了一个熟人，告诉她集合点已经改在了北京西路。江青一口气跑到了爱文一路大街，却没有发现一个人。

江青没有放弃，一路追赶下去。

直到看到大街上出现一群尊贵的先生们。（这些“衣冠楚楚”准备参加示威游行的男人，全是作家和学者。）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下来。

说到这儿时，江青的情绪有些低落。说话的声音很低，近乎耳语。

沉默了片刻，才重新恢复过来。

这几天，她一直靠吃安眠药才能冷静下来，小睡一会儿。昨夜，因服食了过量的安眠药，不小心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是护士发现了她，并将她弄到了床上。当江青笑着跟我说了这事儿之后，我才注意到她身边今晚多了几个人。

年轻力壮的警卫员小乔、一名护士和医生。他们随时都在观察江青的反映。生怕有任何闪失。

午夜了。江青仍然“精力充沛”，谈笑风生。

警卫员小乔似乎胆子比医生护士都大。中途好几次打断江青的说话，提醒她时间不早，该休息了。而根本不理会江青对他瞪眼或是翻白眼。连我这个“外人”都看得出来，江青对身边的这些小伙子、小丫头片子过于宠爱。“没大没小”的惯了。弄得他们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只当她是“奶奶”，而不是国家“第一夫人”。

没奈何，江青只得站起身来，大步走出了房间。走动时，她腰间的丝绸腰带飘动着，像是在舞蹈，姿态优美极了。

但愿她今晚有个好心情，睡个好觉。

接上回书，让我们继续跟随江青回到示威游行的队伍里。

江青注意到一个年轻的男孩，像是自己过去教过的学生。他背着一个大包袱，样子有些古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包袱里不是藏着武器就是传单什么的。

果真如此，小伙子的行径引起了一名锡克骑警的注意。骑警举起了手中的警棍，径直朝他冲了过去。没等小伙子反映过来，警棍已经粗暴地落在了他的手臂上。小伙子身体失去平衡，应声倒地。

这一幕刚巧被江青看在了眼里。

江青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根本就没考虑自己的鲁莽行为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下一个被打翻在地的是她自己。

半路上，江青冷静了下来。

为了不引人注目，她放慢了脚步，假装在看橱窗里的时装，目光却在搜索观察周围的情况。

此时，有一名中年妇女走了过来。此人（老王）江青认识，曾在一起工作过一年多的时间。

她示意江青跟着她走。

江青没有多想，便跟着她一直走到了爱文一大街。

再往前走到立胜桥附近时，江青突然发现身后跟着“尾巴”。江青使眼色示意老王先走。自己“领”着警察拐进了胡同里。江青对这一带很熟悉，三转二转便将尾巴甩掉了。

江青安全地回到了学校。

继续她的教学生涯。

尽管江青不是中央或省委的成员（甚至连上海支部的成员都不是。），可是随着她的名声越来越高，她也越来越重视在示威游行中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

她甚至发明了一种“飞行会议”——那种即开即散的碰头会。

她可不想被人抓住，在监狱里过一辈子。要知道外面还有许多工作正等着她去做呢。

江青和她的朋友们总在不停地争论，为了不引起警方的注意，采用什么样的战术才是最成功的？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从事地下工作，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胜任的。

那年秋天，她收到了一封信。纵向折叠起来就能看到信封上的两个字：“云鹤”。

不过，“鹤”字只写了半边，去掉了右边的“鸟”字。

这么做，只是为了安全起见。也是白区地下工作常见的一种联络方式。

信的内容通常都很简单，根本看不出什么端倪。

信上说，听人说她被疯狗咬了，正在住院治疗。对此深表同情。并希望她安心养病，早日恢复健康。

这是地下组织事先决定好的暗语。

意思是：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这是一道令人十分恼火的密令。好不容易在上海站住脚，工作刚有了一点成绩，就要撤退。实在是心有不甘。

要知道江青在上海的这段日子并不好过。她一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一边是中央在上海的分支机构，另一边是左翼联盟。两边下达的指令，大部分是相互矛盾的。

到目前为止，左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左，左到“王明路线”上去了。共青团和其他一些革命青年和学生的组织也都跑到“左”边去了。

就像她说的那样，一个要坚持城市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另一个要上山打游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不管你去哪儿？只要离开城市就行。

是走？

是留？

起初，江青也很矛盾。

最后，她还是接受了组织的决定，搬到了北京。

在江青的回忆里，北京的白色恐怖是最残酷的。随着国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地的国民党政府都加大了清除共党的“剿匪”力度。

在这种环境下，独立无援的个人斗争，变得越来越脆弱，也越来越危险。只有依靠组织，才有生存的可能。

到达北京之后，江青第三次踏进了大学校门，在北大（北京大学）做了一名旁听生。在青岛大学和上海大学，江青所学的专业课是社会

科学。而这次在北大，江青主攻的是马克思理论。她的指导老师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李大钊先生。

这段日子，江青每天都要重复的动作是，悄悄地穿越校园里的草坪，然后溜进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与学生“打成一片”。

刚进北大，江青身无分文。她的收入仅是母亲每月寄给她的七元钱。支付房租后，每顿饭只能吃四分钱。

北大，是毛主席曾经工作和学习过的地方。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学府。即便是旁听生，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参加各种讲座和自由自在地进出教学课堂。

江青设法弄到了一张图书馆的借阅卡。

几个月来，她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里。阅读，丰富了她的知识和大脑。同时维持着她身体营养所需的只有扁平的面包和白开水。

讲述北大校园生活的经历时，江青的脸上不时闪烁着少女的红晕，嘴里也情不自禁地爆发出阵阵笑声。特别是当她讲到第一次在北京学骑自行车的“惨痛”教训，更是忍俊不禁。连摔了好几个跟头，她才找到骑车的窍门。

年轻时，她的确在许多方面都很笨拙。她承认，她的平衡感很差。但是，她的意志力很强。

意志力不仅帮助她学会了骑车，同时也帮助她克服了人生所面临的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春天，江青又秘密地从北京“潜”回了上海。

这次是左联上海支部派遣她回来的。

这意味着组织对她近一年多时间的考察正式结束了。

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左联和其他左翼组织近几个月以来，在上海许多行业，尤其是在各大、中、小学发展十分迅猛。

用江青的话来说：

“已经掌控在我们手中！”

江青被组织派到了一所夜校，教女工学习文化。同时，上海支部又派她到了基督教女青年会。

江青对基督从来就不感兴趣，再说“基督教女青年会”又是当时出了名的“极其反动组织”。

在没有更多的解释的情况下，让江青同时服务于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两个相互矛盾（对立）的阵容，对她来说，确实是一次更为严峻的考验。

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他的共产主义合作者——背叛了革命。共产党领导的大多数工会都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不久之后不是被其他组织所替代，便是被国民党所控制。

随后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客观上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忙，使共产党有了喘息的机会。

1932年，共产党在江西省建立了红色政权。创建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同时，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渗透到中国国民党组织内部去，是当前上海地下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1930年上海基督教会已发展为“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两大机构。成员遍布各级工会组织。因其“国际背景”，国民党政府都要对它“高看一眼”，而从来不干涉基督教的内部事务。

凡基督教信徒，可以公开游行集会，从事各种爱国及反政府活动。

基督教女青年会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基督教新教的社会活动组织。简称 YWCA。1855年创立于伦敦。创办初期主要是为组织青年妇女参加宗教活动，为离家自立的职业妇女提供住处，救济贫困。后逐步成为培养妇女德行、进行广泛活动的社会机构。

1890年，基督教女青年会由美国传入我国，1908年成立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1911年创设了体育会，鼓励女性参加体育活动，走向社会。1915年创办了体育师范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女子体育专门人才的学校。1923年，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在上海诞生。1930年创办了女工夜校，开展“给女工一把钥匙”活动，培训了大量女工。1949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成立时，女青年会是三大初创单位之一，同年，全国青联成立时，她是4个团体会员之一。

100多年以来，女青年会历经中国社会变迁，扎根于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女青年中，关注各个时期妇女的利益和需求，

为她们提供服务，帮助她们提高自身素质和适应能力，激发她们的社会责任感，鼓励她们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同样，在上个世纪的抗日救亡、解放战争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等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女青年会的爱国行动都有过出色的表现。

女青年会的会训是“尔识真理，真理释尔”，宗旨是：本基督之精神，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之发展，培养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积极参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作贡献。

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需要一名懂得行政管理又有妇女运动工作经验的管理员。江青恰好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江青被派去了基督教会。

江青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负责接待乡下来的农民、主持妇女工作以及帮助起草一些要求各工厂主改善工人工作条件、提高工薪待遇和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文件。

基督教女青年会同时还开展了抵制日货、宣传抗日的演出和演讲等爱国活动。

基督教女青年会中潜入了大批的激进分子，他们大多来自左联。有教育家、作家和剧作家。其中大多是共青团或共产党。他们不仅具有爱国热情，而且本身素质极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得他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1934年，江青被派去从事工人运动。

尽管江青过去从未有过与产业工人打交道的经验，但她很快地便融入到了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当然，她不是像其他女工那样从事体力劳动。而是作为一名教师，用她的知识和手中的教鞭，唤醒女工们的阶级意识，引导她们起来革命。

江青说，派她从事工运的是 Y W C A。

一段日子过后，Y W C A 又指示江青进一步与工友们打成一片，直接走进她们的家庭，了解她们的真实生活状况。

江青回忆说，这是她生活中最快活的一段日子。

没多久，她又被派去从事调研工作。调查小型工厂，尤其是外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的工友们的健康状况。

江青工作很快便上了手，成了调查和写报告的“专家”。不久之后，她的工作范围扩大到了较大的工厂，尤其是那些外资厂。

有时候，进门都很困难。

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十分害怕有记者混入厂内。一旦有任何劣迹曝光，必将引起工人情绪波动，进而引发抗日风潮。影响工厂的正常生产。

因为他们只对生产感兴趣。而从不把工人的死活——换句话说，是从不将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健康状况放在心上。

由于江青打着的是 Y W C A 的旗号，无论大厂或是小厂，大多数情况下，她都能走得进去。

如果不走进去，外面的人是很难想象工厂里面工人们的生活状况是一幅怎样的情景。

他们通常与外界完全隔离。

他（她）们住在所谓的“宿舍”里，与家人完全不通往来。国民党还将男工和女工隔离开来，严格看管。

江青的宿舍，就在工厂区内。

她个人在后面占用了一间小房子。前面的房子被用作教室。空闲下来时，则成了女工们的“寝室”。

刚开始时，江青过得并不顺心。

比如说，备课常常花去她许多时间。这让她没法脱身去参加外面的社会活动。

因为备课和修改作业，江青不得不时常熬夜。疲惫和沮丧，成了她这段日子的主旋律。

江青的学生，大多是来自纺织厂的女工。这些工厂，其中大多数属于日本人，但中国人管理。另外的有英资企业开办的香烟厂，以及英美合资的烟草公司的女工。

她们的工作时间是早晨六点钟。

江青回忆说，住在宿舍里的女工，每天早晨四点钟就得起床，走夜路摸黑去工厂。这些还不算是最苦的。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作条件最差，工人们形容说，简直就是“地狱”。女工的最高工资每月只有十七、八元。童工的工资更低，几乎等于零。

盛夏，空气非常潮湿。所有的窗户都是关着的，整个工作车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蒸汽浴室。

寒冬，则刻意打开所有的窗口，使空气对流。让工人在刺骨的寒风中劳动。

仅仅因为业主们担心舒适的工作环境会使工人变得迟钝。所以他们就用酷暑和严寒来控制劳动力。

大型卷烟厂的厕所，污浊不堪，臭气熏天。难闻的气味熏得人直翻胃，很难呆在里面“偷懒”。

卷烟厂几乎没有任何设备，偌大的车间里只见一排排的木质长凳。

希望得到工作的孩子们前一个晚上就得通宵达旦地去排队。那些足够幸运获得了工作机会的孩子，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她们被强迫着连续轧制香烟，不停地将烟卷装进盒子里。

在一家卷烟厂，江青亲眼目睹了一件事。让她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有一个“富人”家的女孩，（她没有解释富人为什么会送自己的女儿去臭名昭著的卷烟厂工作。）前一个晚上非常早地就去排了队。可是第二天早上，工头却要将他自己的人安插在了她的前面。女孩不服，与工头争吵起来。结果，工头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将她狠狠地摔倒在地。然后，一脚把她踢下了楼梯。女孩的身体被摔碎了，一动不动地躺在楼梯底下。没多久，便咽气了。

所有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一条幼小的生命消失在她们面前。她们就这么麻木不仁地看着，宛如司空见惯了似地没有任何反映。

除了卷烟厂以外，江青的学生也有人来自附近的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小型袜厂的工人。那里的工资甚至比卷烟厂的更低。工人们每月

最高能拿到十二元钱，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就这样，她们还要遭受更残酷的剥削。

针头断了，得工人负责。

一根针，罚款一元。

她的一个学生赶巧一个月里断了八根针。支付了罚款之后，几乎分文不剩。她没钱付房租，也没钱给家人。她不做了。

临走时，江青将自己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了她。当时江青还只恨自己没本事，挣得太少。没能力帮助她更多一些。

这些脆弱的女孩之所以能接受工厂的非人待遇，是因为有大批条件比她们更差的“合同制”工人。

为保障各工厂有足够的劳动力，有一些“供应商”，或者应该叫他们“人贩子”，定期前往农村招收农民工。然后，再将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带回城市。

他们欺骗无知而又贫穷的农民。将大上海说成是“人间天堂”，即使最普通的农民，也可以轻易地赚到一大笔钱。

于是，农民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与他们签订合同。将自己的孩子“卖”给了这些人贩子。

这些“包身工”，等他们进了工厂才知道，原来“天堂”是“地狱”。

不但工作时间非常长，而且，倒班的工人都被关在笼子般大小的小房间里。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他们每天只能得到一点配给的稀粥和水。他们都患有营养不良。许多人死了。

江青发现，不仅是国民党敌视她的政治工作，连自己人——左翼团体中的某些激进分子对她也颇有非议。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常常传到她的耳边。

江青虽然被派到工厂担任女工们的教师，但她仍然积极参加外面的各种社会活动。尤其是共产党上海支部和共青团发起的各种集会和示威游行。江青恰到好处地利用自己的教师身份，在工人队伍中颇有成效地物色和发展党、团员。并多次受到支部领导的口头嘉奖。

同时，江青在扫盲和宣传等基础工作中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某些青年团成员对她有了好感，试图“讨好”她。借着协助她工作以及便于保护她的理由，想方设法接近她。

一天，一名青年团成员出现在女子宿舍她的房间里，从后面一把抓住了她，企图不轨。

江青没有反抗，只是轻声地对他说了一句话，便机智地化解了这场危机：

“要想赢得女孩子的芳心，靠武力不行。你得在政治上有突出表现才行！”

一提到“政治”，对方果然就松手了。

说到这儿，江青接着补充了一句：

“他要真想动武，也绝对讨不到什么便宜。要知道，我可是从小在戏班子长大的。会功夫。三、五个男人，别想近身！”

此人，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故江青没有提及他的姓名。他也没有忘记这段历史往事，只是在打到了《四人帮》之后，他才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深揭狠批江青青年时期的生活腐化问题。

摆脱了他的纠缠之后，江青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一年一度的纪念“九、一八事变”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中。

在大城市里，当然，主要的敌人还是国民党。遍地都是国民党的警察、特务和便衣。他们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

环境越恶劣，越能锻炼人。

江青越来越成熟，斗争经验也越来越丰富。

一天，江青和她的同事正在公交车上。她突然发现前方有警察在拦车检查，她马上请司机停车，机警地溜走了。

没想到在另一个路口又突然遭遇到了警察。见躲避不开了，江青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很有礼貌地回答了警察盘查时提出的几个问题。警察没有怀疑她，也没有搜查她。就让她这么大大方方地走了。

其实，传单就藏着她身上。只要警察伸手一摸，准能查到。倒是跟在她身后的另一位女同事，被警察盘查了半个小时，身上里里外外被搜查了个遍。

回去后，想想还真有点儿后怕。

带着这种传单走路，要是被警察查到了，不是就地枪毙，就得被抓去坐牢。

国民党的政策可是：

“宁愿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女子夜校是她们经常开展政治活动的地方。因为这是她们自己的地方，所以要粗心大意得很多。

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一名女学生将传单直接带到了课堂上。认为这是扫盲和识字的最好的教材。

这事一下子就激怒了江青。

她将所有传单都是收集过来，当着学生们的面，一把火将传单烧成了灰烬。然后，下令让那位女学生去厨房烧了一壶开水，浇熄灰烬，抹去所有的痕迹。

江青的日常工作是教两个班的学生。一个是早上教上夜班倒班的女工，另一个是晚上教白班倒班下来的女工。她下午从不教课，这段时间主要是用来从事外面的社会活动。

有一个晚上，她回家晚了。修改作业，一直忙到凌晨四点才上床睡觉。

正赶上夜班女工破晓之前回宿舍。

像往常一样，经过她房门口时，女工们都要脱掉鞋子，穿着袜子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她们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生怕弄出声响吵醒了她。

江青的房间通风不良，有时候睡觉时她会打开一条门缝透气。

那天凌晨，江青觉得楼梯间的声音有点儿异常，好像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击在了墙壁上。

江青疑惑地打开房门，想看过究竟。

只见女工们排成一行纵队，手里抱着一大捆东西。

通常，下班时她们手里只会拎着一只小盒子。里面装着工具和材料。

这引起了江青的警觉，她让女工们径直地走进自己的房间。

她要检查。

平时性格十分温和的她，为什么此刻会做出如此蛮横无理的事呢？

现在想来，还真是有些过分。

但当时女工们都很敬畏“李老师”。

当李老师命令她们打开可疑的包裹时，她们害怕受到惩罚，萎缩地挤成一团，谁也不敢动手。

江青不耐烦了。她不得不自己动手。

结果发现包裹里面藏着的是传单和报纸。

“怎么这么蠢呀！”

江青气得尖叫了起来。

她让女工们打开所有的包裹，将传单分离出来。

报纸体积大，又引人注目。

她下令：

“统统扔掉！”

接着，江青不但严厉地批评了她们的愚蠢做法，而且言传身教向她们直接面授机宜。

江青让她们将传单藏在伞里面。这样，途中如果遇到搜查，只要倒转伞把，就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扔掉里面的传单。只要不被国民党直接从身上搜出“证据”，她们就是无辜的。也是安全的。

同时，江青还提醒她们：

“散发传单时，如果有可疑人员或情况不对时，要赶紧撤离现场。如果有“尾巴”跟踪，不要直接回家，可以去其它的地方，或者是逛商店。”

一天晚上，当几个女工未能按常规时间回宿舍时，江青睡不着，开始担心她们可能会遇到麻烦。

几个小时之后，所有人都回来了，但仍有二人彻夜未归。

江青开始感到不安起来。

顾不得多想，为了安全起见，天亮前，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悄然离去。

6

江青搬到了另一个住处。

一天，江青外出寄信时，无意中撞见了一位从青岛来的老朋友。他身着白色制服，十分抢眼。

他告诉江青说他在上海邮局上班，在国际结算部做收银员。这工作不过是打掩护用的，其实他仍然隶属于某种左翼组织。见到江青真高兴，这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接下来，他不停地向江青打听：

“现在，在哪儿教书？”

“还对以前的工作感兴趣吗？”

“能否继续合作，帮我传递一些消息？”

“跟组织还有联系吗？”

他热情得过了头，引起了江青的不快与疑惑：

“没有。早就不跟这些人来往了！”

江青回答的很干脆。

她在说谎。其实她早就恢复了党籍。

江青向组织如实地汇报了此事。上级指示她，如果再次与他见面，继续保持联系。

几天之后，江青在兆丰公园散步时，与他不期而遇，撞了个正着。

兆丰公园又名极司菲尔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取名兆丰是由英商兆丰洋行这个名字命名之故。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清政府同意工部局在租界以外修造马路以备军用。当时由英商兆丰洋行大班福格筹资修筑静安寺至梵皇渡（今已改名为万航渡）的马路。中文名为“梵皇渡路”，外文名叫J e s s f i e l d R o a d，今名为万航渡路。这一带有不少的地产，均属兆丰洋行。

清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购得兆丰洋行地产84亩，创建圣约翰书院，即后来的圣约翰大学（今万航渡路1757号），今为华东政法学院。兆丰洋行将多余之地建造私家园林，即兆丰公园。因为花园在极司什尔路，所以也称作为极司菲尔公园。

所谓“极司菲尔”（J e s s f i e l d）这个名字，还有一段趣闻：相传上海开埠之初，有一位葡萄牙商人路过虹口一马戏场侧，听到帐内有一少女哭声甚哀，于是就付金为之赎身，并托付于一位美国传教士。后来这位少女随传教士赴美，就读后复回上海，嫁给传教士。这传教士即为她在沪西购地建屋，因为这位女子名叫极司（J e s s），所以这里的地名便叫“J e s s f i e l d”，意即“极司之地”。由于这一风流艳闻在当时旅沪的外国人中流传甚广，故“极司菲尔”在外国人中也是知名度很高的地名。

1914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向福格的后人征购兆丰花园，辟为公园，所以此公园又称“兆丰公园”、“极司菲尔公园”、“梵皇渡公园”等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租界，第二年（1942年）所谓“收回租界”，故这个公园也随着租界一起收回，并改名为中山公园。

此公园规模较大，占地达三百二十余亩，其总体为西式格调，园之大门为典型的英国乡村建筑风格。园内建筑当然多西式风格，但也有一些日本式、中国式等东方建筑风格，如塔什干柱子的罗马式花棚，日本式的餐厅，歇山顶的中国式亭子，以及现代派的露天音乐厅等，称得上是“海派”风格了。园中林木很有特色，讲究整体性、大块面，如今这些树木长得更为高大，在上海各园林中，如此成片的高大林木唯此为最。园中早年还养有动物。

江青买的是月票，可以随时入园。

江青掏出事先早就准备好的，组织让她转交的信（她并不知道信的内容。）亲手交给了他。

他们说了几句话，便分手了。

几天后，他俩再次在兆丰公园碰面。

他交给了她一份左翼刊物——《世界知识》。

分手时，他提出想请她吃饭。

江青说：

“现在没时间。”

拒绝了他的邀请。

江青没有按照往常的路线离开公园。而是走的另一个方向，那儿是居民区，路上行人很多。

在那儿，江青又遇到了另一个熟人。仍是她在青岛工作时结识的朋友。是个女孩。

女孩邀请她上家去坐一会儿，江青谢绝了她的邀请。

此地不宜久留。

从这儿到她要去的目的地没有公交线路。她只能加快步伐，步行离去。

她刚离开那个女孩，便听到身后响起了男人的叫骂声。回头一看，只见二个男人正朝她这个方向追过来。其中一人边跑边骂：

“你这个蠢猪！”

江青机警地拐进另一个路口。

当她自以为摆脱了追捕，刚将心放进肚子里的时候，不想被另外二个男人拦住了去路。

这二人，一人一身工人打扮；看另一人的穿着像个做买卖的商人。

江青脑子里第一时间闪过的念头是：“绑架！”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她很愤怒！气愤的是，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租界！

你们怎么可以在租界随便绑人呢？！

租界，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人，无论是官方或是军方都不得在租界内抓人！

江青大声地抗议。

可是无人答理她。

她被带到了警察局。

值班警长不在。

或许是她一路上大声叫骂和抗议的缘故吧，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对刚抓进来的女孩子都要脱衣搜身。

他们只是在她身上搜到了那本《世界知识》。这可是公开发行的刊物，并不违法。

尽管没有足够的理由将她继续留在警局，但还是决定将她强制性地“押解”出城。

这也是国民党对“麻烦制造者”最简单的处理方法。

江青依旧在大声抗议，说她害怕一个人走夜路！

她的抗议依旧无效。

他们再次仔细检查了一遍江青身上穿着的花里花哨的天鹅绒旗袍，却放过了她贴身穿着的一件羊毛针织背心。里面就藏在一份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名单——这可是最确凿的“罪证”。

到了城外，刚脱离他们的掌控，江青便一头扎进了黑夜里。

像其它所遇到的可怕的事件一样，江青一生中经常交替出现某种超现实主义的事情。

江青加大步伐，气喘吁吁，疲惫不堪地沿路飞奔。眼看着就要进城的时候，背后一双粗糙的大手突然抓住了她。

江青奋力挣扎，但失败了。

“我又被绑架了！”

江青心想。

“救命——！土匪抓人啦！”

她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尖叫，可这些都是徒劳的。在这城乡接壤的空旷之地，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人听得见。

江青冷静了下来，不再做徒劳的挣扎。这才发现抓她的不是警察，是身着便衣的特务。

特务盘查她：

“这么晚了，一个人出城？”

“走亲戚！”

“在哪儿？”

“前面。”

趁他不备，她假装跌倒，故意摔倒在路旁的一片农田里。她趁机掏出藏在羊毛背心里的秘密文件，一把塞进嘴里，大力地嚼了嚼，一口吞咽了下去。

别说，当她将文件吞进肚子里的时候竟然有了一种别样的奇特的感觉。

不知是该为保住了的秘密文件庆幸，还是为接下来自己的安危担忧。

特务将她从水田里捞了上来。护送她到警局，把她锁在了监狱里。

江青无意间听到特务打电话，向上头报告说抓到了一名嫌疑犯。请他们派一辆黑色牌照的私家车来将疑犯带走。

上头没当回事，让他们随便找辆出租车将疑犯送来即可。

1930年至1931年间，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上海共产党组织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国民党正忙着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那里顾得上一名小小的嫌疑犯呢？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史上，曾有一个亲共产国际的左倾集团：“28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集团内的28半中共党员，以自己因留学苏联而掌握纯正的“马列主义”为资本，激烈批评甚至藐视国内的革命实践，其领袖王明也因此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掌控了我党的最高领导权。但后来他们脱离实际的观念和行为使我党付出了惨痛代价，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从1925年开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远涉重洋，辗转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

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历程。但是，中山大学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其中“28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在中山大学诞生的。

其领头者就是王明。中大第一期的300多名学生中，王明在入学一年后就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在中大崭露头角。原由很简单，就是他紧紧跟随中大副校长米夫，取得了米夫的信任。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又逐步获得了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信任。他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将一批学生拉拢在自己周围。

1929年夏，中山大学照例召开了一次学期总结。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山大学党支部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在当时，路线问题无疑是一个决定生死的问题。大会争议异常激烈，迟迟难以下决断，一直开了10天，史称“十天大会”。在无法找出更圆满的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大会只好决定，用举手表决的方法，看谁拥护中大支部局的报告。结果大多数学生反对这个报告，只有29个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因为年纪小、个子低、态度也不坚定，还只是个团员，被称为“半个”。从此，人们便把他们称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

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就是从这 29 个人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没有记录，29 个人的名单并不确定，按学界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以下 29 个人而言的，他们是：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新。

“28 个半布尔什维克”归国以后，其结局大不相同，有的成了开国功勋，有的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有的则成了可耻的叛徒，有的则默默无闻，还有的下落不明。

言归正传。

江青被带到了市警察局。

从警察审问她的对话中，江青很快便弄明白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那个与他约会的人，显然是告密者。江青在兆丰公园与他接头，早已受到特务们的监视。

特务之所以不敢在租界对她下手，的确是害怕触犯外国治外法权，引起国际纠纷。这才装模作样地将她送出城外，来了个欲擒故纵。

没想到江青勇敢机智地及时销毁了身上带着的“罪证”，令特务们竹篮打水，空忙活了一场。

面对敌人的审讯，江青笑了：

“你们应该去抓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在这里滥抓无辜！浪费时间！”

从昨晚到凌晨，差不多熬了一个通宵，江青依然精力充沛、谈兴正浓，不见丝毫疲惫之色：

“抓进去之后，我在国民党的女子监狱里被关了八个多月！”

这是江青从未对外界透露过的事情。说到这儿时，脸上露出了些许矛盾的表情。

监狱里拥挤不堪，人满为患。

囚犯——监狱里被关押的所有的政治犯而不是罪犯中，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党员对江青说：

“你的发型太短，看起来就像个激进分子。”

在这位大姐的建议下，江青开始装傻。装成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

江青本来就擅长装傻。

当其他囚犯大唱革命歌曲的时候，江青独自一人哼唱京剧。只是无论她表现得多么愚昧无知，却收效甚微。

后来她才知道，在同室的女囚中有一位“叛徒”。

是她向警察通风报信：

“李云鹤她是在装疯卖傻！”

在女子监狱这间斗室里共同被关押了八个月之后，这位“叛徒”向江青坦白了自己的过去。

其实，她也是因叛徒出卖而被抓进来的。

出卖她的是一个代号：“黑大汉”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她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的代号。他是王明左倾路线的追随者。是中共江苏省的中央委员。当组织派他到上海来开展地下工作的时候，不慎被捕。抓进去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叛变了。成了国民党的秘密特务。

他继续伪装进步，骗取同志们的信任。

并且没多久就赢得了一位女同志的芳心。

这位女同志住在法租界。那儿比较安全，组织上所有文件都交由她保管。从未出过任何事情。

“黑大汉”将她骗到手之后，劝她搬家，说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与她呆在一起。

她刚走出法租界，便被警察包围，被抓到了警察局。

官方的报纸，说她是自愿“自首”的。她所保管的文件，也都落在了敌人的手上。

她被扔进监狱之后，“黑大汉”开始追逐另一个女人。没多久就与她结了婚。

结婚后，妻子才知道他是一个性变态狂。

一次，他毫无理由地强迫妻子平躺在地面上，将一块砖头放在她的脚踝下，然后他庞大的身躯一屁股坐在了她的腿上。她的膝盖骨被压碎了，成了终生残疾。

“女叛徒”被捕之后，由于文件丢失，她很快便被组织开除出党。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敌人也开始对她威逼利诱，严刑拷打。让她写《悔过书》，申明脱离共产党。但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

这时，“黑大汉”出现在了她的面前，替代她写了一份《悔过书》，并让她继续潜伏在女子监狱，争取立功受奖，重新做人。

于是，她就这样成了一名国民党的特务。

不知是她天资不足，或是良心未泯？她一直没有找到“立功受奖”的机会。她只是向敌人告密，说她感觉江青是在“装傻”，而没有任何的事实和证据。

反倒是在江青的感召下，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怕死的共产党人！由于她长期没有“立功”表现，最后被敌人折磨死在了监狱里。

关押在女子监狱里的江青，继续装疯卖傻。她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与外界取得联系？

她心里残存的最后一点希望，就是尽早与组织取得联系，向组织表白自己的清白。

她向原先曾经做过兼职教师的夜校写了一封信，希望学校能给自己提供证明和担保。

她等待了数周，她寄出的信如同泥牛入海，音信皆无。

江青只能苦苦等待，却从未放弃过心中的信念！

其实，组织并没有“忘记”她。

不久之后，有人开始给她送被子、面包和钱。警察扣下了钱，只是将被子和一大堆面包屑完好无损地送到她手中。

送东西者，没有留下姓名。

但江青却真实地感受到了党组织并没有忘记她！

没多久又有一批新囚犯关进了女子监狱。江青向囚犯的行列扫了一眼，惊讶地发现有五、六人曾是她教过的学生。其中二人正是从狱外给她送钱、面包和被子的人。

从她们的眼里，江青看到的是“怨恨”。

一定以为是江青出卖了她们。

她们也一定会对自己进行报复的，江青心想。

江青直接冲进狱长办公室，大声嚷嚷起来：

“你们不去抓真正的共产党，只会欺负我们这些小女人！你们干脆枪毙我好了！”

江青声调越来越高，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狱长上来给了江青一个耳光。嘴里一边骂着粗话。

江青愣了一下，接着马上与他对骂了起来。

江青是故意骂给她的学生听的。她的目的达到了。学生的眼里不见了“敌意”，剩下的只有“失望”。

彼此之间的失望。

江青站在窗前，透过狭窄的窗口向外张望。

又有人死了。

狱警正在向外搬运尸体。

监狱早已“人满为患”，他们就用这种残酷的手段，通过杀戮为新的囚犯腾出空间。

江青开始做同室的女囚的工作，教她们如何应对敌人的审讯：

“一定不能承认！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来看游行，没有参加游行。无论他们怎么打你，都不能松口！否则，你就完了！”

在监狱里时间呆得长了，江青注意到了—一个现象：

如果一个女人哭了，很快其他人都会陪着她一起掉眼泪。

对，有时候眼泪也是“武器”，尤其是女人的眼泪。

江青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她以前的—一个学生，并让她开始哭泣。

乖乖，像得了传染病—样，整个监狱都大哭了起来。

大家的哀号声，弄得狱警们手足无措。他们无情地举起了手中的鞭子。可是，越是鞭打，哭声越大。

很快，大家都哭成了一团。甚至包括—一些守卫。

新来的囚犯，每个人都要经过单独的审讯。

那些经受不住痛苦的人，被“留”了下来。最终，—大多数的女人拘留几天之后都被释放了。

可他们为什么不释放江青呢？

江青解释说，是因为她—一时间找不到“证人”来为她担保。

当她的—一个学生被释放之前，江青让她设法找到组织，告诉组织，她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未被狱方发现。她仍然在坚持与敌人斗争。

她不知道女孩出去后有没有找到或者是找过党组织。

她依旧被关押在监狱里。

一天，江青突然想起，国民党最怕外国人。只要有外国人肯为自己说一句话，绝对管用。

她告诉另一个即将被释放出狱的学生，让她去 YWCA，说明自己的困境。

没多久，当一个外国人走进监狱，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之后，翌日，她便被释放了。

出狱后，因为害怕牵连别人，江青没有再回以前居住的地方。

1935 年 2 月初，正是农历新年。

江青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一天，翻开了新的篇章。

第四章 左翼联盟

1

中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

这座城市，比长安——唐朝鼎盛时期的首都发展得更为蓬勃。在八世纪和九世纪初，以佛教徒为主的商人和传教士，络绎不绝地从中亚以及南亚迅速地汇集到了上海。

1840年6月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2年6月 英军攻入上海。

1842年8月 《中英江宁条约》（《南京条约》）签定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

1843年11月14日 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

GEORGE BALFOUR 宣布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开埠。

1844年7月 《中美五口通商贸易章程》（《望厦条约》）签定。

1844年10月 《中法五口通商贸易章程》（《黄埔条约》）签定美国及法国获得与英国相似的在华特权。

1845年11月29日 《上海土地章程》公布，正式确定了第一块租界的范围，计830亩（约553278平方米）。

1848年11月 英国将租界面积扩大至2820亩（约1879812平方米）。

1848年 美国开始在虹口地区购地，造成租界事实。

1849年6月 法国建立租界，面积986亩（约657267.6平方米）。

1854年7月11日 成立租界行政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不久更名为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中文名为工部局。

1857年 法租界成立“管理道路委员会”。

1861年 法租界成立“管理道路委员会”。

1862年 美英租界合并 同年 法租界“管理道路委员会”更名为“公董局”（CONSEIL MUNICIPAL），职能与工部局相似 同年 大英自来火房(英商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筹建，于1865年供气。

1881年 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成立，1883年供水。

同年 上海大北电报公司开始兼营市内电话业务。

1882年由英商德律风公司接办。

1882年 英商上海电光公司成立。

1893年 美英租界面积扩展至10676亩(约7116621平方米)。

1899年 美英租界正式更名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并再次扩展到33503亩（约22333099平方米）。

同年 法租界扩展至2135亩（约1423191平方米）。

1914年 法租界扩展至15150亩（约10095990平方米）。

在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大炮的双重作用下，随着与各列强国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上海对外敞开了门户。

欧洲和美国的商人，带着他们的基督教传教士从四面八方沿着不同的轨迹蜂拥而来，张开他们贪婪的大嘴疯狂地吮吸着中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不久，他们的触角便扩张到了中国所有的城市。

上海，也随之成为了中国现代教育、出版、新闻以及表演行为艺术的中心。

江青回忆说，她个人在上海的亲身经历便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近代史。

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富人和穷人、反动派和激进分子、汉奸和爱国者——无一不体现着在极端制度化之下的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

结果只能是像她这样的弱者，痛苦地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三十年代早期，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总计不到五万人。他们只占上海市三百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然而，他们却占据着上海市大部分的土地。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喜好和优势——在租界内住着带花园的豪宅。他们有自己的管弦乐队、芭蕾舞公司、电影院和书店。

外国资本在上海催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中国资本家。

他们不仅将外国资本引入中国，同时也将共产主义引进到了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上演好莱坞大片的赛璐珞影院、雅致的鸡尾酒酒吧、巴黎的时装、国际美食、舞会、出租车连同被称之为“黄色的靡靡之音”的平克劳斯贝的流行歌曲，充斥着上海的街头巷尾。

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1901年5月2日生于华盛顿州塔柯玛。原名哈里·里利斯·克劳斯贝。自幼音乐天赋很高，在孔萨加大学读书期间仍热心于唱歌奏乐，曾同好友艾尔·林克组织了一个小型乐队，他担任鼓手兼独唱。1926年，被爵士乐大王保罗·惠特曼看中，应邀加入了他的蜚声全美的大乐队。此后，他经常在夜总会表演，还灌制了唱片。“平”这个名字是他从自己所拍的一部喜剧短片里的一个角色那里借用过来的。这位歌手擅用低声哼唱忧伤曲调的歌，而且一边唱一边还会做些动作，在当时颇受欢迎。后来，他在广播里搞了个专题歌曲节目——其主题歌是《蔚蓝色的夜晚在哪里》，又大量发行自己的唱片。就这样，平·克劳斯贝很快成为三十年代美国娱乐界最出名又最成功的人物了。

上海的街头不仅流行平·克劳斯贝的靡靡之音，而且还有许多白俄罗斯女人的按摩院和中国人自己的妓院。

在享受异国情调的奢侈生活中，逐渐淡薄了国民党新贵们的政治良知。在他们心里再也装不下：“争取民族的完整性”、“解救穷苦大众”等无产阶级意识。

反倒是一个新的声音，发自“左联”的革命之声盖过了平·克劳斯贝的靡靡之音。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现代文艺团体。简称“左联”。1928至1929年间的革命文学论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高了革命作家的思想理论水平。通过论争，各方的观点逐渐接近，提倡和发展普罗（英语 proletariate 音译“普罗利塔利亚”的简称，意为“无产阶级”）文

学成为他们的共同要求。资产阶级文艺家对于革命文学的攻击，从另一个方面促使革命作家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苏联的“拉普”（全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日本的“纳普”（全称“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革命文学国际局”先后成立，也对中国革命作家的联合起了推动作用。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及其由于论争而暴露出来的弱点，引起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视，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帮助革命作家成立联合的团体。

“左联”成立之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当时的形势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努力下，“左联”于1930年的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了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1936年春，根据形势的需要，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6年，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

随着二十世纪通信技术的发展，文字传播的速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通过广泛分布的出版物，激进的声音被更进一步地放大。充满政治色调的戏剧和电影，加剧了清朝的灭亡和共和国的诞生。

当时的中国歌剧，通常只有一些简单的情节，夹杂着哑剧和杂技等传统艺术。所有的角色都由男性扮演。

当外国歌剧连同他的新思想、新的角色和新的哲学概念一起涌入中国的时候，共产主义思想也随之快速地进入到了中国的戏剧领域。

1907年，一群中国学生在东京成立了“青柳社”，一群清一色的男性演员，成功地演出了中国版的《茶花女》。

《茶花女》是法国亚历山大·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年7月27日-1895年11月27日）的代表作，他为了与同名作家的父亲作区别，多称小仲马（Dumas, fils）。

他本身是法国剧作家、小说家。《茶花女》是小仲马的代表作。《茶花女》（*La traviata*）亦是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作曲的三幕歌剧。意大利文剧本由皮亚威（Francesco Maria Piave）编写，改编自亚历山大·仲马于1848年出版的小说《茶花女》（*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La dame aux Camélias*）。

歌剧于1853年3月6日在威尼斯凤凰歌剧院（Teatro la Fenice）首演。

作品名称“*La traviata*”译作“流浪的妇人”，或“失落的人”。故事的原著小说，亦被改拍成电影《茶花女》（*Camille*）（1936）。《情陷红磨坊》（*Moulin Rouge!*）（2001）亦是以茶花女作蓝本改编。

《茶花女》最早由林纾（即林琴南）译作汉语。

剧情十分简单。

巴黎名妓玛格丽特为青年阿尔芒的真挚爱情所感动，毅然离开社交生活，与阿尔芒同居乡间。阿尔芒之父责备玛格丽特毁了儿子的前程，玛格丽特被迫返回巴黎重操旧业。

阿尔芒盛怒之下，在社交场合当众羞辱她。玛格丽特一病不起，含泪而死。

阿尔芒读了玛格丽特的遗书，方知真相，追悔莫及。

值得一提的是，《茶花女》是第一本流传到中国的外国小说，由著名的翻译家林琴南先生用文言译就。

现在也有很多翻译家译出的不错的译本，其中以王振孙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都出版这个版本）、郑克鲁的译本（译林出版社出版）流传较广。

1920年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易卜生,斯特林堡,尤金·奥尼尔,G.B.歌剧，以奥斯卡·王尔德为首，先后出现在了中国的舞台上。

与此同时，使用历史和现代的主题，模仿和创新让中国剧作家制作出他们的口语戏剧。

到1920年代中期，洪深、曹禺、欧阳予倩和田汉等一批中国进步青年的作品已是家喻户晓，风靡一时。

洪深，中国早期电影的开拓者。导演，剧作家，戏剧批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学名洪达，号伯骏，号浅哉，字潜斋，曾用笔名庄正平、乐水、肖振声等。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

1894年12月31日生于官宦世家，1955年8月29日卒于北京。他从中国话剧和电影的草创时期开始，就进行了编剧、导演、表演等全面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是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奠基人之一。

曹禺（1910年-1996年），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他一生共写过8部剧本。

“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

曹禺共有三任妻子，第一任妻子郑秀，第二任妻子方瑞，最后一任妻子李玉茹是著名京剧旦角演员。曹禺共有4位女儿。郑秀所生——万黛，万昭（音乐家），方瑞所生——万方（剧作家），万欢。

欧阳予倩（1889—1962），中国著名戏剧艺术家；湖南省浏阳县人，1889年5月出生；1902年留学日本，1907年加入青柳社，演出话剧《黑奴吁天录》；1910年回国后组织新剧同志会；1916年起做京剧演员，创造了独特的舞台表演风格；1919年创办南通伶工学社；1925年底步入影坛；1926年加入南国社，创作剧本《潘金莲》等；1929年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1931年加入“左联”，抗战时期编写历史剧《忠王李秀成》等；抗战胜利后编导《关不住的春光》等电

影；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院长；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9月去世。

田汉（略，前文已作简介。）

作为一个演员，江青的青少年便是生活在这种新旧交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

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一些激进的左翼作家开始重新思考，放弃了民族自尊心，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学说开始顶礼膜拜起来。

“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 口号是法国人的发明。但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对康德与席勒美学的一种粗浅而通俗的表述。我们知道,德国古典美学深奥的思辨性与晦涩的语言,即使是专业人士也备感艰难,而“为艺术而艺术”的成功之处也正在于此。它汲取了德国美学的要义与精髓,又除去其繁琐的细节,以精炼的法语铸造成一句响亮的口号,成为法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一面醒目的旗帜。

“为艺术而艺术”的诗歌要求形式上的整齐完美；用严格的、古典诗的格律，经过细磨细琢、雕词凿句的一番功夫，表现客观事物的外形美；诗人在作品中不能流露自己一丝一毫的感情。

另一方面，大多数爱国的文化人，则在为：“唤醒民众，拯救国家！”而奔走呐喊。

左联，便是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

表面上他们只是一些专业的作家、剧作家、教师、记者和评论家。尽管他们不一定是共产党员，却将许多的年轻男女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

江青，便是 1931 年在青岛加入左联组织的。

期间，她不仅在上海大剧院参加了田汉改编的《西线无战事》的演出，同时也加入了海滨剧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到处演出。

二十世纪早期，女演员在中国还只是一个另类。尤其是在专业剧院。

传统的戏剧（京剧）完全由男演员所垄断。他们踩着高跷，象征性地表现女性美丽的小脚。

在广州，男人和女人最早同时出现在粤剧舞台上。在浙江，实际上所有的角色都由女演员所垄断。她们在舞台上扮演着男性角色。

一位浙江本地的知名作家鲁迅，就曾说过他喜欢女扮男装的越剧和黄梅戏。

然而，无论是男演员又或是女演员，在旧中国，他（她）们都没有社会地位。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他们也只能在舞台上扮演屠夫、罪犯、流浪汉和妓女。

1920 年代，著名的剧作家和导演洪深，这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高才生，是第一个坚持使用女演员的吃螃蟹者。

他的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南方戏剧协会，1920 年成立于上海。紧接着又在山东济南开办了实验艺术电影公司。

江青是 1929 年注册入学，不久便加入了左翼联盟。作为一名业余爱好者，逐渐在“小舞台运动”中渐露头角，赢得公众的注意。

2

江青深情地回忆说道：

“1930 年的上海，是一个艺术家的大舞台。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艺术家协会。”

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领域同样极尽反共之能事，他们严格审查非正统的出版物、毁灭打击前卫艺术、抑制创新电影以及不断缩减文化教育经费。

正是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左翼联盟，保护了许多现代艺术家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

诚然，每个联盟都有自己的“政治色彩”，且表达着各自领导人的意识形态。

1930 年代中期，联盟中的左翼作家、教育家、戏剧家以及社会主义联盟，最终都团结在了以阳翰笙为首的左翼文化联合会旗下。

阳翰笙（1902—1993），编剧、戏剧家、作家，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笔名华汉等，四川高县人。

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7 年底参加创造社。

1928年初起陆续发表小说，并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艺理论的文章。

1933年以《铁板红泪录》开始电影创作，著有《中国海的怒潮》、《逃亡》、《生之哀歌》、《生死同心》、《夜奔》、《草莽英雄》等。

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等职。1949年以后曾任中国文联秘书长、副主席等职。

阳翰笙著述丰厚，一生写下了70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

1933年底，江青第一次遇到了这位左联领导人阳翰笙。

当时的左联，不同的联盟在组织上是分离的，成员与成员之间的联系也是单独的。他们的队伍中，既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有成分极其复杂的局外人。

1935年农历新年，江青被释放出狱后，很快便恢复了她的演艺生涯。

一些左翼团体通过地下关系联系上了她。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她还是一名成熟的中共党员，却真实地展示了她的“革命个性”。并赢得了组织的认可。

刚出狱时，江青的身体十分虚弱。由于在监狱里关押时间太长，加上缺乏食物和医疗条件，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来月经了。并且经常在下午发冷、发烧。

上海市委组织知道了她的情况后，决定送她去浙江省内的一个气候条件比较温和的地方疗养。

她拒绝了。

她已经失了太多的时间，必须加倍努力追赶回来！

为庆贺江青出狱，田汉给了她一张金城剧院的戏票。那儿正在上演田汉不久前刚完成的话剧《回春之曲》。

3幕话剧《回春之曲》写于1934年底，1935年1月上海舞台协会首演。

剧中塑造了爱国青年高维汉和梅娘的动人形象。原在南洋教书的高维汉，在“九·一八事变”后告别热恋的华侨学生梅娘，回国投入抗日战争。

他在上海“一·二八”战役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梅娘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回国参加了救护工作。

剧本把青年忠贞的爱情和民族解放的崇高爱国之情结合起来，把主人公悲欢离合的遭遇和群众斗争的热烈场面结合起来，开拓了新的境界。

剧本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描写都比较单纯，但作者擅长抒写感情场面、设置情境，使爱国之情和纯洁的爱情分外激动人心。

江青非常高兴地收下了戏票。

可临了却犯了愁。

她没有衣服穿。

她冬天的衣服，入狱时都被监狱没收了。

江青回忆说：

“最后，我不得不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件大衣，去看演出。”

几天后，她陪同党内的一位领导去看另一出戏。两人相互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她坐在包厢里，一边等待开幕，一边悠闲地看着其他看戏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从她跟前经过。

突然，她眼前一亮。

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一个身着华丽服饰（漂亮的高跟鞋、黑色的毛皮大衣。）的女人，某位知名人士的夫人。

她刚从苏联回来，那天晚上她并没有注意到江青也在剧院里看戏。

几个月之后，她才了解到江青是左联的人。但并不知道江青已是中共党员。（早在青岛的时候，她就已经认识江青。）

春未的时候，江青乘火车去了一趟北京，呆了好几个星期。期间，她继续去北大旁听李大钊先生的讲座。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市图书馆里打发掉的。

当她得知田汉等一批知名左翼分子被捕入狱的消息之后，着实害怕了好一阵子。

对她而言，失去组织的保护，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毫无安全感。

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坚决主张反共的，在北京就连看场苏联电影都有危险。有一次，江青去看了场苏联电影（片名已不记得了）。快散

场的时候，她提前从侧门溜了出去。如果走正门退场，则极有可能遭遇特务盘查。回答稍有不慎，便会被当作“可疑分子”抓进监狱。

溜达到大街上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不如去找田洪，向他打听田汉或其他同志的消息。

结果，扑了个空。

不久之后，她突然从左联的一个教育家那里得到一个消息。有人请她回上海，在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中担当娜拉这一角色。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挪威语：H e n r i k J o h a n I b s e n，1828年3月20日—1906年5月23日），生于挪威希恩，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

《玩偶之家》（1879），又译《娜拉》或《傀儡家庭》。

女主人公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为丈夫海尔茂医病。丈夫了解原委后，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怒斥妻子下贱无耻。

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时，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

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愤然出走。

恩格斯曾指出，娜拉是有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代表。

剧本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和妇女解放等问题，但没有也不可能作出解决。《玩偶之家》演出后，引起了激烈的反响。

娜拉要求个性解放、不做“贤妻良母”的坚决态度，遭到上流社会的责难和非议。但易卜生并没有在责难面前退却，他继续创作问题剧，揭露社会问题。

江青十分崇拜剧中的娜拉。

江青欣然应允，回到了上海。

在随后的几周内，江青还在左联剧作家他们创作的一系列话剧《暴风雨》、《双城记》中，饰演女主角。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完整的杰作。

剧情大意是：普洛斯彼洛是意大利北部米兰城邦的公爵，他的弟弟安东尼奥野心勃勃，利用那不勒斯国王阿隆佐的帮助，篡夺了公爵的宝座。

普洛斯彼洛和他那三岁的小公主历尽艰险漂流到个岛上，他用魔法把岛上的精灵和妖怪治得服服贴贴。

几年后，普洛斯彼洛用魔术唤起一阵风暴，使其弟弟和那不勒国王的船碰碎在这个岛的礁石上，船上的人安然无恙，登岸后依然勾心斗角。

普洛斯彼洛用魔法降服了他的弟弟和阿隆佐，使他们答应恢复他的爵位。

最后大家一起回到意大利。

本剧还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友谊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

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所著的描述法国大革命一部大时代长篇历史小说，“双城”分别指的是巴黎与伦敦。后来被改编拍摄了多个版本的电影，也有音乐专辑以此为名。

1775年12月的一个月夜，寓居巴黎的年轻医生梅尼特散步时，突然被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强迫出诊。

在侯爵府第中，他目睹一个发狂的绝色农妇和一个身受剑伤的少年饮恨而死的惨状，并获悉侯爵兄弟为了片刻淫乐杀害他们全家的内情。

他拒绝侯爵兄弟的重金贿赂，写信向朝廷告发。

不料控告信落到被告人手中，医生被关进巴士底狱，从此与世隔绝，杳无音讯。

两年后，妻子心碎而死。幼小的孤女路茜被好友劳雷接到伦敦，在善良的女仆普洛斯抚养下长大。

18年后，梅尼特医生获释。这位精神失常的白发老人被巴黎圣安东尼区的一名酒贩、他旧日的仆人得伐石收留。这时，女儿路茜已经成长，专程接他去英国居住。

旅途上，他们邂逅法国青年查理·代尔纳，受到他的细心照料。

原来代尔纳就是侯爵的儿子。

他憎恨自己家族的罪恶，毅然放弃财产的继承权和贵族的姓氏，移居伦敦，当了一名法语教师。在与梅尼特父女的交往中，他对路茜产生了真诚的爱情。

梅尼特为了女儿的幸福，决定埋葬过去，欣然同意他们的婚事。

在法国，代尔纳父母相继去世，叔父厄弗里蒙地侯爵继续为所欲为。当他那狂载的马车若无其事地轧死一个农民的孩子后，终于被孩子父亲用刀杀死。

一场革命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得伐石的酒店就是革命活动的联络点，他的妻子不停地把贵族的暴行编织成不同的花纹，记录在围巾上，渴望复仇。

1739年法国大革命的风暴终于袭来了。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把贵族一个个送上断头台。远在伦敦的代尔纳为了营救管家盖白勒，冒险回国，一到巴黎就被捕入狱。梅尼特父女闻讯后星夜赶到。医生的出庭作证使代尔纳回到妻子的身边。

可是，几小时后，代尔纳又被逮捕。在法庭上，得伐石宣读了当年医生在狱中写下的血书：向苍天和大地控告厄弗里蒙地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法庭判处代尔纳死刑。

就在这时，一直暗暗爱慕路茜的律师助手卡尔登来到巴黎，买通狱卒，混入监狱，顶替了昏迷中的代尔纳，梅尼特父女早已准备就绪，代尔纳一到，马上出发。一行人顺利地离开法国。

得伐石太太在代尔纳被判决后，又到梅尼特住所搜捕路茜及其幼女，在与普洛斯的争斗中，因枪支走火而毙命。而断头台上，卡尔登为了爱情，从容献身。

演出获得了成功，但江青依然认为小说比话剧的译本要更好一些，尽管小说中所表达的观点有些“反动”。

至于她扮演的娜拉，报纸和期刊对她好评如潮。但她怀疑是她的熟人和上海文化界一些重要的知名人士人影响了那些为她说好话的评论家。

只有张肯，两年前在上海工学剧团做过她的导演。现在是上海党支部的负责人。对她提出了负面的批评。认为她的表演风格“过于自然”，她所扮演的娜拉的这一角色，超越了易卜生的原始概念。

张肯是一个传统观念极强，对演员要求十分严格的人。

他说话非常难听，从不顾及对方的感受。

当他训斥江青时，眼泪一直在江青的眼眶里打转。

江青心服口不服。咬牙默默改进。

演出结束，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便是对她的付出的最好的回报。

观看了江青的演出之后，鲁迅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娜拉走后，会去做什么？》的评论：

“她能找到工作吗？她唯一的出路，是争取妇女解放！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通过表演现代戏剧，江青在上海的舞台崭露头角。而有生以来第一次与著名男女演员同台献艺，更让“李云鹤”（她的艺名）变得家喻户晓，广为人知。

虽然表演能给观众带来极大的乐趣，然而“精神食粮”毕竟填不饱肚子。

随着猖獗的通货膨胀急速上升，演出成本的增加，演员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每况愈下，日趋艰难。

贪婪的剧院业主收取过高的租金，使本来就贫穷的无产阶级戏剧，变得更加贫穷。

例如，如果一场戏能卖出五百元的门票，这个数目的一半必须支付给剧院老板，作为场地使用费。

经济上的压力或多或少可以平摊给每一位演员，而精神压力却因人而异。尤其是那些早已成名成角的名演员，不仅瞧不起她，而且还担心江青过多地参与左翼的社会活动，会给他（她）带来麻烦与危险。故常常不给她好脸色看，弄得她精神沮丧。白天，提不起神；夜晚，睡不着觉。

她日渐憔悴，迷茫了好一阵子。

江青是一个个性十分要强的女孩，越是被人瞧不起，越是发奋努力。

戏剧——最重要的特征是用声音来代替正常的说话。掌握好发声技巧，便是一个演员成功的诀窍。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江青的表演技艺的逐渐成熟，那些曾经鄙视她的人，终于向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作为一名业余剧团的演员，在完成了精典的欧洲剧目的演出之后，江青又迷上了描写中国当代主题的“民族主义戏剧”。

1936年11月，在著名的上海金城大剧院，上演了一出《孽海花》。

江青在剧中饰演妓女赛金花。引起轰动效应。

赢来一片喝彩声，还有叫骂声。

甚至有人威胁：

“要杀了她这个婊子养的臭婊子！”

赛金花闺名赵灵飞，乳名赵彩云（一说姓郑），小名三宝，清朝同治十一年十月初九生于安徽黟县，后随父亲移居到苏州。赛金花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中国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子。

其初名为赵彩云，又名傅彩云，赛金花 安徽黟县人，约生于1872年。幼年被卖到苏州的所谓“花船”上为妓，1887年（光绪十三年），适逢前科状元洪钧回乡守孝，对彩云一见倾心，遂纳为妾，洪时年48岁，傅彩云年仅15岁。

不久，洪钧奉旨为驻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荷兰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遂借诰命服饰给彩云，命她陪同洪钧出洋。

90年代初，同洪钧归国，不久洪病死。

1894年，傅彩云在送洪氏棺柩南返苏州途中，潜逃至上海为妓，改名“曹梦兰”。后至天津，改名“赛金花”。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居北京石头胡同为妓，曾与部分德国军官有过接触，也曾改换男装到皇家园林西苑（今中南海）游玩。

1903年在北京因涉嫌虐待幼妓致死而入狱，解返苏州后出狱再至上海。晚年生活穷困潦倒，1936年病死于北京。

赛金花本人并没有令人惊艳的倾国之色，却只因不同寻常的经历，成为一连串传奇故事的主人公。

传说，洪钧未中状元之前，曾经受到过一个妓女的资助，这个妓女有的作品里称之为小青。和所有“公子落难美人相救”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样，洪钧和小青订下了白头之约，但是也同样没有跑出这类故事的套路：中了状元的洪钧觉得娶妓为妻有损自己的体面，于是抛弃了前盟。而不知内情的小青最初沉浸在被人称为“状元夫人”的喜悦中，得知真相后愤然上吊自杀。

因此，在《孽海花》中，出场时的“花榜状元”傅彩云脖子上有一圈与生俱来的红丝，足以让男主人公金雯青（洪钧字文卿，此处影射很明显）明白她是小青的后身，遂有隔世重逢之感。而因了这段没有了结的前世孽债，许多作品将洪钧的死因归为小青对他的报复：彩云后来私通幼仆、玩弄戏子，最终将洪钧气死。

甚至后来彩云与戏子孙小三的一段不解之缘，也有传言说，因为孙小三的前身在那段前世姻缘中曾经为小青鸣过不平，所以今生里得到彩云的以身相报。

不过曾朴的《孽海花》并不满足于以上这样因果报应的简单故事，小说对彩云的个性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加工，使人们更容易相信这位状元夫人的不同凡响。在做“公使夫人”期间，彩云不但很快学会了欧语，其美貌和聪明也到处引起轰动，甚至德国皇后也与她合影留念；与此相对照，大清国的公使金雯青却处处显出迂腐和无能，危难之时甚至要求救于他这位如夫人。

而傅彩云在金雯青死后要求脱离金家的一段表白里，其坦率和敢作敢当也不乏令人称道之处：

曾想图个好名。“我何尝不想给老爷争口气，图个好名儿呢？可是天生就我这副爱热闹寻快活的坏脾气，事到临头，自各儿也做不了主。……若硬要把我留在这里，保不定要闹出不好听的笑话，到那一步田地，我更要对不住老爷了！再者我的手头散漫惯的，从小没学过做人家的道理……我阔绰的手，一时缩不回，只怕老爷留下来的这一点死产业，供给不上我的挥霍，所以我彻底一想，与其装着假幌子糊弄下去，结果还是替老爷伤情面，害子孙，不如直截了当，让我走路，好歹死活，不干姓金的事，至多我一个人背着个没天良的罪名，我觉得天良上倒安稳得多呢。”

1887年，洪钧奉命出使欧洲，夫人王氏不愿去异域洋邦，赛金花便代她去。在海上走了一个月，到达意大利港口热那亚后改乘火车，直达德国柏林。

由于赛金花年轻美貌，长于辞令，很快闻名于欧洲上流社会，这是她一生最为亮丽的三年，也使她人生的传奇进入了高潮。

德国皇帝和皇后召见了她。赛金花身姿绰约，娇嫩雪白的肌肤和水灵灵的一双妙目传达无限情意，细瓷般的气韵震住了德国皇帝和皇后，让他们真正见识到东方美女的风采。

在欧洲三年，赛金花凭她的聪明伶俐，居然学得了一口流利的德语。这是她传奇经历到达巅峰的筹码。

实际上，假如傅彩云在洪钧死后心甘情愿地为他守节而不是下堂求去重操旧业，“状元夫人”的名声就不可能作为一种成名的资本。

而在赛金花的时代，象明末名妓董小宛那样从良后心甘情愿作一名贤妇的妓女可谓聊胜于无。

清末的妓女，许多因为挥霍太过、债务缠身，经常靠嫁人来摆脱债务，不出三、五月到一年，即想方设法地脱离夫家，重张艳帜，名为“泡浴”。

赛金花虽未能免俗，但她到底是在洪钧死后才明明白白地下堂求去，倒也不失为一种光明磊落。

因此，在燕谷老人的《续孽海花》里，历史上赛金花在送灵回南的途中潜逃到上海，被描述成经过洪钧原配夫人默许的行为，因为如此则彼此都不伤体统。

到沪后赛金花挂牌接客。回到沪上的赛金花挂牌接客，果然效果颇佳，名声大噪。

和议既成，联军退兵，两宫回銮，乱哄哄论功行赏之时，自然没有赛金花的份。相反，虽然“议和大臣赛二爷”的名声增加了不少“生意”，也不过依旧做着倚门卖笑的生涯。以至于后来的虐妓致死一事，赛金花并非没有责任，但似乎也别有隐情，例如吴趼人就认为，她是因为招摇的缘故才被解返原籍的。

“招摇”二字似乎颇有深意，乱世之中，一个风尘女子身份大起大落，巨大的反差很容易反映出世态炎凉。因此，《九尾龟》就大胆的虚构了一个卑鄙的卜部郎，赛金花因为看不惯他的市侩样，得罪了他，后来他就借虐妓一事大做文章进行报复，使赛金花最终被迫铩羽南归。

此后的赛金花虽然又在上海重张艳帜，只是秋娘已老，传奇的故事也离她而去。不过一个身份低贱的风尘中人，一生中两次与历史风云际会，虽为流星一闪，却也足以引起世人的向往与凉叹，因此，时人曾预言：

“照他这样侠骨奇情，不但比古来的苏小、薛涛，只以歌舞诗词传为佳话者不可同年而语，就是比那些绀青拖紫的贵人，弄月嘲风的名士，碌碌终身，汶汶没世，也就有上下床之别，将来自必为一代传人。”

不过促成赛金花再次成名的却是庚子事变。

1900年，庚子年。在慈禧的暗示下，义和团杀死了很多在华洋人，这其中包括德国公使克林德。

列强以此为借口，进攻北京，慈禧和皇帝逃往陕西。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奸、杀、掠、抢无恶不作。赛金花因为通德语，她用德语告诉德国士兵：我是你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皇后维多利亚的好朋友，并拿出了她当年同德国皇帝和皇后的合影。德国士兵认出了他们的皇帝和皇后，立即举手行礼。

第二天，德国士兵便开来一辆轿车接赛金花去见她在西洋时就认识的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这次旧情复燃，亲密异常；也凭借这一层特殊关系，赛金花借机为慈禧求情，又劝瓦德西整肃军纪，少侵扰百姓，下令安民。

瓦德西第二天便下令禁止士兵违纪妄为。但瓦德西对战争赔款一事开价却很高，谈判一开始，他便提出要慈禧太后赔克林德公使的命，皇帝要道歉。

当时，李鸿章卧病在床，他便对庆亲王说：只有试用赛金花了。

赛金花奉命又再一次展开外交手段，对瓦德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说服了克林德夫人。

在她的游说下，八国联军同意议和。辛丑和议成功，赛金花功劳自然不小。

因此京城人对她多有感激，称之为“议和人臣赛二爷”。

民间还称她为“护国娘娘”。

这类传说也正是赛金花故事中最引起争论的地方。

从历史上看，出生于1832年的瓦德西时年已68岁，似乎不大可能与赛金花有什么私情可言。

不过，在北京众多的倚门之娼当中，精通欧语的确可以使赛金花脱颖而出，为“结与国之欢心”提供方便。

至于赛金花是否对辛丑和约发生过作用，从事实上可以说是无据可查，不过民间叙事却是另一回事了。

在当时多数人的记录中，乘车与欧人招摇过市的赛金花至少并没有引起普通人的反感，“议和大臣赛二爷”倒是名满九城。传说不见得具有细节的真实性，却并不排除一定的合理性。

这段难以揣测的公案给小说家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另一本清末小说《九尾龟》是这样叙述此事的：赛金花到紫禁城与瓦德西叙旧，看到国人眼中神圣的皇家宫苑被联军占领，面目全非，本能的爱国心由此被唤起：“我虽然是个妓女，却究竟是中国人，遇着可以帮助中国的地方，自然要出力相助。”因为华德生（影射瓦德西）请她作翻译文案，赛金花借此劝说华德生不要虐待中国人，释放被押的中国官员。

更为人称道的是使出她的娇媚手段，帮助中国的议和大臣洪中堂（影射李鸿章）说服华德生在和约上签了字。

对于这一段功劳，一般的文人赞扬起来喜欢咬文嚼字，什么“他在那枪林弹雨之中，谈笑而劝敌帅，颐指而策番奴，飘零鸳燕，因赖他作个金铃，即贵居王公，也都靠他一枝明杖”，更本色一点的想象大概更符合主人公的身份，我们可以设想，赛金花打着一口婉转的苏白，向别人表明自己简单的动机：“谢不谢倒没有关系，只是让大家看看，

知道我们吃把势饭的人也不是一点点用场也没有，别人说起来总是堂子里的倌人没有好人，其实也不见得。”

赛金花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她出入豪门，沦落风尘，命中克夫（三次嫁夫，三次孀居），无有儿子，于1936年去世，终年67岁。葬于陶然亭公园。著名画家张大千为她作肖像画，齐白石为她题写墓碑。她亲笔题写的“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至今犹存博物馆中。赛金花她那爱国之心，比起当时卖国贼、汉奸犹胜千万倍。“自古风尘出侠女”这是对赛金花一生的真实的写照。

是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妓女风流史。

从

李香君扇舞媚香楼；

李师师艳满京都城；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陈圆圆调戏李自成；

梁红玉擂鼓战金兵；

潘金莲诱杀西门庆；

到

小凤仙助蔡锷反袁。

再加上眼前的赛金花，真让人弄不明白，尤其是让我们这些外国佬搞不懂的是：

“中国的好女人，怎么都跑到青楼里面去了？！”

更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唯有毛泽东时代，中国不见了鸦片，没了妓女？！

话说回来，随着江青演技的日渐成熟以及知名度的提高，追随她的粉丝也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就有那位曾经对她要求十分苛刻的导演张肯。

1935年，张肯和另一位导演苏茂苑同时被提拔进了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班子。

随着地位的提高，张肯的大男子主义作风也逐日渐长。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他把上海作为了他的私人领地。飞扬跋扈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凡是 he 看中的女演员，不管人前人后，他总喜欢吹嘘：

“她是我的女人，谁也不许碰！”

而对于不肯上手的女孩，自然是“小鞋”伺候。伺机打击报复。

好几次开完会后，张肯示意江青留下了与领导一对一地一起“领会”会议精神。但都被江青严词拒绝了。

这让他觉得丢了脸，再也挂不住了。

于是，他以上海市委组织的名义，禁止左翼联盟的剧作家与她来往。更为下作的是，他甚至散布谣言，说江青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俄国与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领袖，工农红军、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

1905年俄国革命中26岁的托洛茨基被工人群众推举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而当时布尔什维克多数干部却还在讨论是否支持苏维埃，这些干部后来被回到俄国的列宁痛击）。

1917年革命托洛茨基率领“区联派”与列宁派联合，并再次被工人推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对于十月革命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革命，托洛茨基赢得了不朽的历史地位。后来成了托洛茨基死敌的斯大林，当时作为革命组织领导者之一却写道：“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

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迅速站在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后，当反托成为政治需要时，此类评价都从斯大林文章中删掉了。）

甚至连后来狂热的斯大林派雅克·沙杜尔，当时却也写道：

“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居支配地位，是起义的钢铁灵魂。”

不仅在起义中，而且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捍卫、巩固方面和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方面，托洛茨基也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外交官、苏联国际革命政策负责人、苏联红军以及共产国际的缔造者）。革命后若干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十月革命之后到列宁病逝之前，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发言结束均高呼口号：

“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

在欧美共运中托洛茨基的威望极高。

由于官僚极权对信息的封锁，后人常常根据极端偏颇的材料而认为托洛茨基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文人，其实他文武双全，且谙熟军事指挥艺术，还曾亲临战场。正是他作为十月革命的最高军事领袖（十月革命期间他与士兵一起在战壕里作战），并且在1918年缔造并指挥苏联红军，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列宁曾对朋友、著名作家高尔基说，除了托洛茨基，谁还能给我迅速地造成一支上百万人的强大军队？）。

国内战争期间，他甚至坐装甲列车冒着枪林弹雨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差点被炸死；当反革命军队进攻彼得堡时，当时的彼得堡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吓得半死（这事使他丢脸），托洛茨基却从容不迫指挥作战。

同时托洛茨基又是一个高明的外交家，他曾强硬要求英国政府释放因反战宣传被囚禁在英国的俄国流亡革命者，否则不许英国公民离开俄国，连英国政府方面都觉得此举无懈可击；他还把盛气凌人的法国到访者当场轰出他的办公室（革命前法国一直是俄国的头号债主与政治操纵者），却彬彬有礼地欢迎前来缓和冲突的法国大使，一高一低的姿态显示了托洛茨基高超谋略智慧，堪称有理、有力、有节的外交典范。

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对工人代表议会中的质询做了巧妙答复（托洛茨基说他“代表苏维埃”宣布没有任何武装行动的决定，但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当然没有义务承认党中央的机密决定；苏

维埃作为工人民主政治机关的决议是公开的，而党中央有权保留机密决定；但托洛茨基不止于此，他补充说道：“如果事变的进程迫使苏维埃决定武装行动，那时工人和士兵一定会像一个人似的站出来响应苏维埃的号召。”）。

这样的答复——既保守了即将起义的军事秘密，又鼓舞了革命者的战斗意志，同时严格遵循现代民主与公开原则，这些政治答复被波兰人多伊彻誉为“外交辞令的杰作”。

托洛茨基在国民经济管理与研究工作中颇有创造：是苏俄新经济政策的首先提议者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首先实践者、提议者。

1928年斯大林迟迟开始的计划经济实验，是对1923年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拙劣剽窃和粗暴翻版。因为统治者的政策迟到，使得新经济政策到1928年已产生了一个威胁政权生存的农村资产阶级，而苏俄工人阶级国家不得不强力解决——而且是不得不借助已蜕化为官僚集团的强力来解决冲突——结果导致了1929年到3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对农民的大量冤枉错杀。

另外，托洛茨基还对文学理论有很高的造诣，其著作《文学与革命》甚至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国际左翼知识分子（包括中国的陈独秀、鲁迅、胡风、王实味等人）。他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留下了150多卷《托洛茨基全集》，其生动而真诚的自传和大量私人日记、信件，给人留下了研究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宝贵财富，更是追求社会进步与解放的历史道路上的重要知识库之一。托洛茨基在哈佛大学留下的《托洛茨基全集》属于无价之宝。

托洛茨基于1879年10月26日出生，祖先是犹太人。原姓布隆施泰因。

1896年开始参加工人运动。

1897年，参加建立南俄工人协会，反对沙皇专制制度。

1898年在尼古拉也夫组织工人团体，被流放西伯利亚。

1902年秋以署名“托洛茨基”的假护照逃到伦敦（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个名后来比他的真名更著名），参加V. I. 列宁、G. V. 普列汉诺夫等人主编的《火星报》的工作。一度热烈拥护列宁的主张，曾被人安上绰号“列宁的棍子”。

1903年在党的二大上却激烈反对列宁的“雅各宾主义”，倾向于马尔托夫等人（后者开始被称为“孟什维克派”），也与当时的罗莎·卢森堡（对列宁派“独裁的组织方法”的激烈抨击）的观点一致。

1904年9月脱离孟什维克，长期游移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从芬兰回国，12月被推举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经历了短促却异常激烈的革命高潮，不久被捕。

1906年在彼得堡狱中写了《总结与展望》，提出他一生活动的理论基础——不断革命论，即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的不断性，认为俄国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阶级通过建立起自己的阶级专政来领导、完成，并由此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且率先预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将从俄国革命开始。

1906年12月被判处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次年2月在押解流放地途中逃脱，流亡国外。

1912年组织“八月联盟”，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内部出现的错误倾向。

1912—1913年曾作为一家自由派报纸《基辅思想报》的记者奔赴巴尔干半岛采访，托洛茨基成功地扮演了一名精力充沛而独立敏锐的新闻记者、报人以及分析出色的史学家，“他写的所有巴尔干通讯……都具有新闻写作的宏伟风格，体现出革命前俄国的激进自由派报纸的特点……至今还是1914年巴尔干编年史的无价之宝”。

在1903年特别是1905年革命之后长期鼓吹布派与孟派之间的统一，并且强调自己的“非派别性”。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托洛茨基先在欧洲后赴美国，坚持国际主义，主张革命，反对战争。但他既不愿公开接受“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列宁派口号，也反对第二国际各党支持各自所在国战争的沙文主义右翼势力，仍在布派与孟派之间斡旋。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还在进行时，托洛茨基就采取了最激进的不断革命立场（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把革命推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匆忙启程由美国辗转回国以参与革命，途中遭英国政府非法逮捕于加拿大某集中营里（英国政府视托洛茨基等俄国流亡者为极端危险的人物），后遭到（在苏维埃的巨大压力下）俄国临时政府的强烈抗议而获释放。

5月17日返抵彼得格勒，当即发表演说鼓吹将革命立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当即被推为彼得格拉苏维埃执委之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尔什维克内部长期对革命阶段论（先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完成民主革命、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不断革命论的关系混淆不清，列宁也一度宣扬革命阶段论，导致二月革命后当列宁从瑞士回国后鼓吹立即把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时（这几乎与托洛茨基同时主张），布尔什维克干部纷纷反对（甚至像诺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资深老革命家也起来反对），当时许多人指责列宁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结果被俄国临时政府逮捕。

同时他也因这一戏剧性的天真冒险在工人群众中赢得了巨大声望（当然，后来1919年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被暗杀证明列宁是更有先见之明的）。同年7月坐牢中的托洛茨基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缺席选为党中央委员。9月初代表革命工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包括托洛茨基被怯懦的临时政府释放出狱。

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担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

1918年1月在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提出“不战不和”的主张，代表多数派反对列宁的意见，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3月，被免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最后和约以微弱多数票（仅多一票）得以通过，而托当时恰恰投了弃权票并且保留自己意见，但他的中立举动等于帮了列宁那一派，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列宁是对的。

托洛茨基后被任命苏俄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并缔造了苏维埃红军，担任其总司令。9月改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

1918—1920年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在建设红军和战略战役指挥方面发挥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1920年11—12月他撰文主张改革工会，加剧了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1923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头结成私党，代表新兴官僚层的利益（并且部分地反映着因新经济政策而崛起的富农利益），篡夺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特别反对托洛茨基。

1923年，随着德国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牵头的40多名老布尔什维克联名发表“新方针”，提出振兴革命的新纲领，包括遏止新经济政策、实行计划经济、扩大工人阶级民主的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但遭到斯大林等当权派打压。

1924年1月21日 列宁逝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头执政，合谋排挤托氏。

斯大林在1924年提出了著名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这是对第二国际右翼伯恩斯坦有关理论的继承发展，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修正，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斯大林主义路线。

斯大林派从他们的观点出发将马列主义者攻击为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托派”，将早已被许多人淡忘的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旧分歧提出

来，指责“托洛茨基主义”违背了“列宁主义”。列宁还曾忧心忡忡地对人说，我担心有人会利用我和托洛茨基过去的旧分歧搬弄是非；列宁生前把斗争矛头直指斯大林，并多次在病榻上要求托洛茨基代表他反对斯大林等人。

1925年1月，斯大林派支配的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托洛茨基言论的决议》，批评他“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25年1月被迫辞军事人民委员之职。改任电气技术发展局局长，兼工业与技术委员会主席。从此斯大林修正主义通过种种合法及非法手段逐步篡夺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权。

5月，托洛茨基出任租让委员会主席，后任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

同年的联共（布）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名代表在大会发言结束时按照惯例呼号：“我们的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对不起！”回头看了看政治局诸位成员，“也许是加米涅夫，万岁！”全场哄堂大笑，季诺维也夫抚掌狂笑，斯大林笑得喘不上气来，托洛茨基也为之莞尔，加米涅夫却一脸肃穆、压根儿笑不出来。

1926年4—5月结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围绕工业化道路和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批判斯大林的反动观点。

1927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决定，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职务。

1927年，托洛茨基坚决反对斯大林修正主义对中国大革命的瞎指挥，被开除出党。

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

1929年2月12日被逐出国，抵土耳其。

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

在斯托斗争中，左翼反对派以托为首严重低估了官僚化倾向，错失斗争良机（在1925年之前左翼反对派有人提出武装推翻斯大林集团、将之关禁闭，但遭到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当时甚至私下说要把斯大林送上绞刑架。托当时宁愿把斯大林当做同志、将斗争控制在党内范围，直到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问题才得以公开）。

更要命的是，在当时论战双方都把列宁当做最高权威抬出时，托洛茨基等人却坚决反对公布列宁遗嘱（即列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上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非常高，却公开说斯大林“粗暴”，建议把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

另一个重大的主观原因是当时俄国革命者早已出现了分化，话说不到一起，对问题的敏锐性也有很大不同，致使左翼反对派不能在同一个时期里聚集起足够的力量。

从客观方面看，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低落（1923年后），三年内战和反帝国主义干涉战争造成的最优秀的一批革命者和革命工人死伤、脱离大工业，以及俄国工人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到的初步实

惠，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左翼反对派的政治基础。但反对派在斗争的主观方面的失利无疑是其失败的更直接原因。

托洛茨基错过1924—1927年的斗争良机而使左翼反对派失利后，拒绝承认苏联官僚化的不可逆转，仍寄希望于在苏联无产阶级推动下的上层政治改良，并且要求各国左翼反对派留在共产党内为革命路线而斗争。

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才宣告第三国际无可救药，并认为只有一场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能够挽救堕落了苏联工人国家，并指导其支持者为第四国际而斗争。

1937年1月23—30日，苏联最高人民法庭开庭审讯所谓“托洛茨基反苏案”，13名“托派份子”被判处死刑。

而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被作为“人民公敌”被控为各种旨在颠覆苏联政府的阴谋、破坏、暗杀活动的主谋和指使者。

1938年3月，莫斯科又宣判，托洛茨基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勾结，还与英国和波兰的政府达成卖国协议；同时被控暗杀基洛夫和企图谋害斯大林等人，又指控其谋害高尔基等人。

就这样，托洛茨基被足足三次缺席判处死刑。

张肯不仅在政治上以托派分子的口实打压江青，在工作中也同样对她是百般刁难。

1935年3月（也许是1936年？具体年份已记不清了。）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江青负责组织一场演出。

她通知了所有的参与者7日晚上进行最后一次彩排。可是，到时间却没有一个人来。

显然，是张肯在背后取消了这次彩排。

说到这儿，江青的声调变了，脸上带着明显的厌恶的表情。江青很愤怒，也很困惑，甚至于绝望。

因为那时几乎所有的票都已售出。其中大部分的戏票是她忠诚的朋友陶先知出资为工人们购买的。

江青调动一切可以动用的人力，终于在最短时间内找齐了所有演员，进行彩排。

彩排结束，当她离开剧院时，不小心滑了一跤，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

然而，比这更糟糕的是，有人找到旅馆通知她说，演出已被当局取消！

闻讯，江青大惊失色。急忙找到国民党高官黄少荪的侄女，通过她打通关节，终于在最后一刻拿到了政府相关部门下发的批文。

当演出安排妥当之后，江青跑到后台大声抗议。

原来这一切都是张肯在背后捣的鬼！

江青一时间的情绪失控带来的后果是，演出中她竟然忘了台词。她也听不到提词员的声音。

她哭了起来。

哭得特别伤心。

没想到她的情绪感染了观众，台下的观众也跟着哭泣起来。

台上台下，哭声一片。见状，一位男演员随机应变假装酒醉，上台将江青背了下来。生生地化解了一场危机。

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

然而，此刻江青却虚弱得没了登台致谢的力气。

她病了。高烧41度。

她早就感冒了。为了演出，一直在坚持着。就这样，普通的感冒恶化成了肺炎。

朋友立即把她送到了医院，在那里调理了好几天。

4

1935年，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而言，都是关键性的一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经威胁到了整个世界。

阿道夫·希特勒，奥地利裔德国政治人物，1921年成为纳粹党党魁，1933年被任命为德国总理，1934年成为德国元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兼任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他被公认为二战的主要发动者。

在二战前期，德国及其他轴心国占领了大部份的欧洲、北非、东亚及太平洋诸岛屿。

然而1942年之后，盟军开始反攻，德军渐居劣势。

1945年德国战败，他的下落成为历史之谜。

不仅如此，希特勒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未解之谜的人物，一个非德国本土出生的人，既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资金和政治背景，居然成为了德国元首，并发动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二战。

贝尼托·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党魁，独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

1922年至1943年期间任意大利王国首相。

墨索里尼在1925年1月宣布国家法西斯党为意大利唯一合法政党，从而建立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独裁的统治。

墨索里尼与德国总理希特勒于1939年5月22日签订意德钢铁条约。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正式加入轴心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建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

1945年4月27日，墨索里尼在逃亡途中被游击队发现并俘虏，翌日，墨索里尼和他的情人克拉拉·贝塔西在科莫省梅泽格拉被枪决。后被愤怒的群众暴尸。

在东亚，激进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垂涎三尺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的东三省。

共产主义世界也没闲着，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组成了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同盟。

然而，要将共产国际的成功经验照搬到中国来，谈何容易。刚刚经历了军阀混战的中国，还没来得及从痛苦中恢复过来，又爆发了全面的内战。

共产党和国民党这对生死冤家，从瑞金一直打到了延安。毛泽东率领红军跑了二万五千里，蒋介石不依不饶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追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

打来跑去的结果，证明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

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领着共军打阵地战、正规战。三下五除二，没几个回合，就被国军打得落花流水，稀里哗啦地败下阵来。损失十分之九。

倒是毛泽东的“逃跑主义”挽救了红军。更匪夷所思的是，星星之火经过农村包围城市，走了一圈回来竟然成了燎原之势。一把火，最后将蒋介石烧到台湾去了。

可是，1935年的上海却是另一回事。

江青描述说，上半年的政治气候一直处于“不均衡状态。”左派分子，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着从莫斯科发来的政策指令。尽管左翼组织完好无损，但其会员在过去的四年中却有了很大的改变。

7月下旬，剧作家协会更换了领导班子。

八月初，江青出席了新任领导班子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会上宣读了八一宣言。

1935年8月1日，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意味着中共关门主义的结束，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开始。

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论述“九一八”以来爱国将士、民族英雄前赴后继，英勇作战，救亡图存，在伟大精神和必胜信念之后，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同以前的统一战线口号、主张相比，《八一宣言》有许多特点。

宣言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

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的联合，而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要求更有成效、更高级的联合。

宣言虽未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但却号召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比1934年所提六大纲领，更为完善。

宣言的发表，不再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是真诚地要求付之实践，要求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并表示我党愿作发起人。

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并表示中共愿意作为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愿意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基本形成。在实践上，它获得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巨大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这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刊登，后辗转传入国内北平、上海等地，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华北党组织发动一二·九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由于张肯暗中作祟，1935秋天的这段日子江青就像一个没了娘的孩子，根本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

但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与信仰，仍设法维持着与其他左翼团体的联系。

其中有，电影救国协会、妇女救国协会和苏联友好协会等新成立的抗日救国团体。这些根据从莫斯科发布的《八一宣言》，在“统一战线”战线旗帜下刚成立不久的政治团体，成分参差不齐，良莠难分。

一些表面看起来是亲共的团体，实际上是反共组织。尤其是有些“左翼”组织的领导人中，不少人是“汉奸、叛徒和特务。”有的人甚至是双料特务。

尽管所有的协会都宣称是1935年8月成立的，但要整合这些五花八门的救国协会，却是件令人头痛的事情。进展十分缓慢。直到两年后江青离开上海去了延安，仍无结果。

这些政治团体中的年轻人要革命，而领导人却越来越趋向于“保守”。

年轻人如何证明自己的“革命性”呢？

尤其是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只能依据他们自己的“交待”。根本无法查证。

江青回忆说，就像她自己这样，刚到延安的时候，也曾受到过怀疑。

比如说，共产党理论家艾思奇是一个真正的好同志，可当时在延安，许多人并不这么认为。

艾思奇（1910年—1966年）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蒙古族后裔。

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和顺李家大院。

1925年考入云南省立一中，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与聂耳结为好友。

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5～1936年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

1937年到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积极与各种唯心主义哲学论战，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他在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亦有一定成就。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主编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

艾思奇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他的哲学学术生涯和革命生涯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他一生刻苦学习，勤奋写作，立场坚定，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勇战斗，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人们称他为“人民的哲学家”。

他在1966年3月去世时，年仅56岁。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准备了悼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笔加上了“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一语。

这是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对艾思奇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的光辉的一生所作出的最为恰当的重要评价。

就是这么一位好同志，当年差点儿没被共产党当作“反革命分子”给毙了。

还有林基路——江青在延安党校学习时的一个同学，也曾受到错误的批判。

林基路，原名林为梁，1916年出生于广东台山县都斛镇大江村。1933年在上海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8年2月，林基路受党派遣到新疆工作，先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专区教育局局长、库车县县长、乌什县县长等职。

1942年9月，反动军阀盛世才将大批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逮捕入狱。敌人对林基路等共产党员严刑逼供，林基路等坚贞不屈，在狱中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继续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和崇高气节。林基路在著名的《囚徒歌》中表达了对革命的忠贞和坚定的信念：“坚定信念，贞守立场！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1943年9月27日，林基路与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员英勇就义，为中国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

江青后来才知道，毛泽民原是毛泽东的亲弟弟。

毛泽民，1896年4月3日生，湖南湘潭韶山人。

毛泽民是中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国民经济部部长，他是毛泽东的大弟，1921年，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他毅然离开了朝夕劳作的韶山冲，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

毛泽民1922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毛泽民手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指派，到江西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

他在工人夜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员，深入矿井、工棚同工人谈心，了解工人疾苦，宣传革命道理和思想。为了方便工人的生活，减轻中间剥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于1923年3月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毛泽民是该社的负责人之一。

7月合作社大整顿，毛泽民专任营业主任，实行平价廉价，增高消费额，并收来新街合作社，发展为总社，毛泽民任总经理。

1931年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同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毛泽民幼年只读了4年私塾，自小就学习务农，是一个勤劳憨厚的农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担任十五大队队长，负责部队的供给。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任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党中央决定让他取道新疆，前往苏联治病。

1938年2月1日，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由于中苏边境发生鼠疫致使交通断绝，一时不能成行。他接受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

表邓发的建议并征得党中央的同意，留在新疆工作，化名周彬，担任省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之职。

当时的新疆因连年战乱，经济凋蔽，财政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上任后采取了调整税收、改革币制、平稳物价、发行建设公债、节支开源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在短短3年时间里，将新疆财政整顿得井井有条，促进了工农牧业及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1941年2月，调任民政厅厅长，主持制定了《新疆省区村制章程》，实行了民主选举，在全疆整顿和扩建了17所救济院，举办了医药医疗训练班，培养出一批少数民族医务人员。

1942年，新疆督办盛世才背信弃义，投靠蒋介石，9月17日软禁了毛泽民等在新疆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并于1943年2月7日投入监狱。

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施以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1943年9月27日深夜被敌人秘密杀害。

说到这儿，江青停顿了片刻，默默地站起身来：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语气相当迟缓，心情也相当沉重。

江青转身离去的时候，我瞥见她掏出手帕偷偷地擦拭眼泪。

是啊，为了中国革命，毛泽东一家牺牲了六位亲人。作为中国第一家庭的长嫂，想想那些为革命献身的亲人和好友，江青的心情能不沉痛么。

江青走了。

这是二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江青没有陪我一起熬夜。

翌日。

继续昨夜的话题。

期间，江青在上海经历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史称：《七君子》。

七君子指的是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爱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史是七人中唯一的女性。）

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对此，国民党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国民党政府被迫将七人释放。

历史仿佛是开了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原本被国民党以共党分子抓起来的七个人中竟然连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没有。倒是一个月之后，国民党的大头目蒋介石作梦也不会想到他自己也被人抓了起来。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

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只是此时的江青并不知道张学良捉蒋放蒋的故事。

由于失去与组织的联系，江青一如既往地坚持做基层群众的宣传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被某位知名的电影导演看中，做了几个月的电影演员。

像是唤醒了尘封已久的记忆，说到这儿时，江青的情绪开始激动了起来。

5

江青年轻时，曾崇拜过二位偶像。

一位是政治偶像；另一位是文化偶像。

无疑，毛泽东是她心中的政治偶像。而另一位文化偶像，便是知名左翼作家——鲁迅。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汉族。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豫亭。

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

鲁迅先生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

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600万字，其中著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

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的家族是浙江绍兴会稽县的一个周氏大家族，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官员，周家在周福清时代很好，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周福清的大儿子，读书至秀才，但考试总是不中。

当时清朝的官场作弊成风，周福清疏通官场，让周伯宜去作弊，不料被告发，周伯宜在考场被拘留。

其时周福清在上海，听说儿子被抓就迅速回到绍兴，主动向回稽县衙自首。

为了疏通关节，鲁迅的母亲变卖资产，向官府层层送礼，几经波折，周福清才由死刑变为“监候斩”，也就是说，周福清的命可以暂时保住，但每年行刑的时候他仍有被处斩的危险。

于是家里人为保全他的性命，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钱财去送礼，去贿赂官员。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六七年，周家遂由小康转入了困顿。

就在周家元气大伤之际，鲁迅的父亲又卧病不起。这个时候，鲁迅只有十三四岁，他每天都要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

花了无数的钱，父亲的病仍未医好，周伯宜于一八九六年十月离开了人世。

家道的衰败使鲁迅认识到了世态炎凉，他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鲁迅的母亲鲁瑞看到鲁迅去意已决，就为儿子筹集了八元川资，送鲁迅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其时鲁迅刚好十八岁。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作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又名《旧事重提》）等专集。

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辑在《坟》《而已集》《三闲集》《二

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

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

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祥林嫂、爱心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

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

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

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

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

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的原则。

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

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

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鲁迅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

《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

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

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等16部杂文集。

在这16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

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

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

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先生1931年在上海倡导发起了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新兴木刻从诞生那天起，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相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连。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气肿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

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

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如果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说起鲁迅，不知怎么地江青总有那么多话要说。

服务员进来换了好几次茶水。热毛巾凉了，又热。

人们只知道他手中的笔，和他写的文章。而他为革命做过的一些具体事迹，却鲜为人知。

1933年，鲁迅在上海居住期间，白色恐怖十分猖獗。地下党组织经常遭到破坏。有时候，同一天就被端掉好几个窝点。

尽管鲁迅从来就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却保护了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

6

1930年代中期，江青她只是个小人儿，哪里知道鲁迅其人其事？但她后来得知，毛主席早就与鲁迅神交已久。当年毛泽东转战西北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手里总拿着鲁迅的文章。

在她成为主席的妻子之后，更让他吃惊的是，主席手头竟然有那么多的书，包括一些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经过了万里长征，那么艰苦的岁月主席也没舍得扔掉。

江青是念过大学的人，自然知道这些书籍的价值。尤其是那些主席亲笔批阅过的书籍有多么宝贵。

1935年，红军到达陕西省北部之后，主席曾派人去寻找鲁迅，希望能保护他，并将他带到根据地来。

来人首先去了上海。无果而归。接着，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了全国。仍无济于事。

江青说，如果主席派去的人在上海找到了鲁迅并将他带到了根据地，或许鲁迅就不会病死于1936年。又或许，他会活得比自己更命长。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来不得半点假设。

1936年10月，她和一些工友们参加了鲁迅的葬礼。

江青回忆说：

“我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我们四个人一排，手挽着手，一路高唱着《国际歌》。”

在送葬的队伍中，江青还看到了丁玲、萧参、胡风和其他一些知名的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

有人对江青说，当年鲁迅曾去戏院观看过她的舞台演出。并问江青知不知道此事？

江青回答说：“不知道。”脸上却泛起了红云。

这是江青第二次在我面前红脸。故印象尤为深刻。

中国有句俗话：

“一字不过三。”

二个月中，江青总共在我面前红过三次脸。

见江青脸红，我有些惊诧地问翻译小王何故？

小王说，江青并没有见到过鲁迅其人。只是在延安与主席结婚后，见主席床前桌后到处都能找到鲁迅的文章，读来读去，自然“日久生情”。

完事，小王反问我道：

“难道你年轻时就没有过日思夜想的心中偶像？”

“有。”

“谁？”

“不告诉你，反正说了你也不认识。”

小王心领神会地笑了。也没再继续追问下去。

尽管如此，当他得知毛泽东带领红军到达西北之后，鲁迅曾派人专程送火腿和其它一些食品去延安。不知是途中遗失或是被他人“劫”食？总之，主席没有收到他的礼物。

鲁迅生平从未给人送过礼，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江青与主席结婚几年之后，结识了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并成为了好友。

许广平与江青有着同样的经历，二人都嫁给了比自己大得多的“大”男人。（注：英文的“大”（g r e a t）含有“伟大”的意思，或许此处翻译成：二人都嫁给了最伟大的男人，更准确一些。）

许广平1927年10月3日与鲁迅同行到上海，不久与大她17岁的鲁迅结婚，时年29岁。

许广平曾对江青说过：

“有一段日子，我跟先生上街根本不敢走在一起。我俩分开地走在马路的两边。万一有一个被国民党抓去了，另一个还能及时逃脱。”

当时的斗争环境就是那么的恶劣。其实，鲁迅他早就作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

许广平是鲁迅先生的第二任妻子，1926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在校期间与鲁迅一起发起揭批驱逐北师大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许在毕业前一年在报上公开表达对她的老师鲁迅的感情，1927年两人在广州同居。不久移居上海。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3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闻讯，江青曾伤心了好一阵子。

江青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手臂，示意我过去旁边的房间。

隔壁房间的桌面儿上堆放着一叠高高的书籍。足有二十卷之多，用红线捆扎好了的。

江青笑着对我说：

“这是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绝版，书店和市面上绝对找不到。个别私人手里虽说有几套收藏，但人家同样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的。我手头的这套，就送给你了。希望你能喜欢。”

给读书人送书，哪有比这更好的礼物？

我能不喜欢么？

只是后来我才知道这套书的价值远比我想像的要贵重得多，得多，得多……。堪比无价之宝。

《鲁迅全集》在1950年和1960年虽有两次再版，但部分章节已被修改，成了赝品。

奉旨捉刀对鲁迅著作进行修改的人是中国文坛久负盛名的四大才子。周扬、田汉、阳翰笙和夏衍。

究竟是奉了谁的旨？又或是有人假传圣旨？让他们四人对鲁迅的原著进行了篡改。江青没说，我也就更不得而知了。

中国人喜欢搞“秋后算帐”，也有人说了：“永不翻案！”谁是谁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读者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难道不是吗？

第五章 新秀残影

1

江青对电影十分沉迷。她认为，电影是现代文化必不可少的。电影和文学在她心中密切相关，同等重要。

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与她见面时，偶然听她谈及外国文学：

“我曾试着写过一些小说、戏剧和诗歌。但都不是很成功。我结识的第一位美国作家是厄普顿·辛克莱。以及他的作品《石油》、《煤炭王国》和《丛林》。辛克莱是个改革派。后来，我还读了杰克·伦敦和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实话跟你说吧，看不懂。我这人肚子里墨水不多，比较喜欢看电影。这么跟你说吧，我看过许许多多的电影，大多是罗斯福时期的电影。都是一些基于文学作品拍摄的电影。我常常跳过吃饭的时间，饿着肚子去看电影。为了省下几个钱。我最钦佩的女明星是葛丽泰·嘉宝。她还活着吗？”

厄普顿·辛克莱 1878年9月20日出生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祖上是名门贵族，传到他的父亲时，家境已经破落。父亲以卖酒为生，收入微薄。后全家迁居纽约。

他一边工作，一边求学，先后在纽约市立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15岁开始给一些通俗出版物写文章，靠稿费维持生活。

1902年参加社会党；曾对芝加哥的劳工情况进行调查，并据而写成长篇小说《屠场》（1906）。

1906年以后30年间，辛克莱继续创作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黑暗面的长篇小说，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描写科罗拉多州煤矿工人罢工事件的《煤炭大王》（1917），抨击垄断资本家的《石油》（1927），揭露政治腐败和警察暴行的《波士顿》（1928）等。

从1940年开始，辛克莱以《世界的终点》为总题，写了11部长篇小说，描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和欧洲各国的社会情况，其中《龙齿》（1942）曾获得普利策小说奖。1962年出版自传。

他这人思想很激进，以致列宁在1915年6月写的《英国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一文中所指出的：“辛克莱是一个有感情而没有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

杰克·伦敦，原名为约翰·格利菲斯·伦敦（J o h n G r i f f i t h L o n d o n），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共创作了约50卷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野性的呼唤》《海狼》《白牙》《马丁·伊登》和一系列优秀短篇小说《热爱生命》《老头子同盟》《北方的奥德赛》《马普希的房子》《沉寂的雪原》等。

美国小说家。生于旧金山，他来自“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的贫困不堪的底层阶级”。是个占星术家的私生子，在一个既无固定职业又无固定居所的家庭中长大。是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

美国传记小说家伊尔文·斯通在他的《马背上的水手》里称他是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

他的作品不仅在美国本土广泛流传，而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都享有崇高地位。

杰克·伦敦 24 岁开始写作，去世时年仅 40 岁。

十六年中他共写成长篇小说 19 部，短篇小说 150 多篇，还写了 3 个剧本以及相当多的随笔和论文。

这些作品共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陌生又异常广阔的世界：那荒凉空旷又蕴藏宝藏的阿拉斯加，波涛汹涌岛屿星罗棋布的太平洋，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线，形形色色的鲜活人物，人与自然的严酷搏斗，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病榻上时，曾特意请人朗读小说，其中就有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列宁给予这部小说很高的评价。

他的作品独树一帜，充满筋肉暴突的生活和阳刚之气，最受男子汉的欢迎。

有人说在他之前的美国小说大都是为姑娘们写的，而他的作品则属于全体读者，不但普通读者欢迎，就是大家闺秀们也喜欢放下窗帘关上大门偷偷去品味他那精力旺盛、气势逼人的作品。火一样的性格——杰克·伦敦就是这样的性格。

他血管里有火，生气勃勃，一身丈夫气，喜欢粗犷强烈的生活，他喜欢叱咤风云，每每参加斗争常要斗争到极限。他把冒险里的困难当做享受，把拓荒中的遭遇当做欢乐。

我们在《海狼》里看见了许多的令人荡气回肠的经历，尽管这些已经经过了艺术的折射。

就是在他富裕的日子里，他的生活也是充满冒险的。他买地产，办牧场，种树木，修建豪华的新居，宴请宾客，过着沸腾的生活。

约翰·斯坦贝克（J o h n S t e i n b e c k，1902. 2. 27—1968. 12. 20）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熟悉并同情社会底层的人们，他的许多作品都以他们为主人公，表现了底层人的善良、质朴的品格，创造了“斯坦贝克式的英雄”形象。

同时，他的小说艺术造诣很高，将写实风格与幻想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后来美国文学，尤其是西部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其代表作品有小说《人鼠之间》、《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珍珠》、《伊甸之东》、《烦恼的冬天》等。

斯坦贝克一生写了17部小说，许多短篇故事、电影和电视剧本，以及非小说作品。由于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感的观察”，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葛丽泰·嘉宝（G r e t a G a r b o，1905年9月18日—1990年4月15日），电影女演员。原名G r e t a L o v i s a G u s t a f s s o n，G a r b o是其艺名，是瑞典导演莫理兹·斯蒂勒·贝利取的。

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其父为清洁工（1920年病逝），母为厨娘。

16岁被导演相中而成为演员，17岁报考瑞典皇家戏剧学院。

1925年6月到美国好莱坞，与米高梅公司签约，36岁隐退。

1990年4月15日因肺炎逝于美国纽约。她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女明星之一。曾获颁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三次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提名。

1999年，她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

中国人一般都很谦虚。江青读了那么多的世界名著，仍说自己“不学无术”，在她面前我就更不敢班门弄斧了。

我老实回答：

“还活着。听说，她在纽约过着隐居的生活。”

江青很为嘉宝抱不平：

“我必须为她美言几句，你们美国人太不公正，她演了那么多的好戏，却始终不肯给她一个奥斯卡奖。我相信，这是美国当权者的错，而不是美国人民。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与一名叫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的美国记者谈论过嘉宝的事。”

“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现在是美国著名的《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家。”

“难怪，他那么能说。他，还在纽约吗？”

“是的。不过，已经退休了。”

“如果你再见到他，给带句话。就说我还记得他。如果你见到嘉宝，请带我问候她。她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葛丽泰·嘉宝是“伟大的嘉宝”！她是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作品的最杰出的表演家。她有一颗叛逆的心和正直的人格。值得我们尊重。”

估计我能见到嘉宝的可能性不大。替江青给她带话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她住在纽约第五大道，那并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去的地方。要说在电影上再看到她，这种可能性倒是蛮大的。

“是的，她是独一无二的！”

江青仍在为嘉宝忿忿不平：

“必须给她颁奖。我建议米高梅公司将《卡米尔》和《克莉丝蒂娜王后》这两部电影重新拷贝，重新放演。然后给她颁奖。这样做，才是唯一正确的。她是瑞典人。我这儿就有这两部电影的拷贝。”

我惊奇地发现，嘉宝的电影仍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上演。某些非无产阶级的著作，即使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仍被作为“反面教材”在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人群内流传。

嘉宝和卓别林的电影，在中国曾经有过一个狂热的时期。

查理·卓别林，20世纪著名的英国喜剧演员，现代喜剧电影的奠基者，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卓别林幼年丧父，曾在游艺场和巡回剧团卖艺或打杂。

1913年，随卡尔诺哑剧团去美国演出，被美国导演M. 塞纳特看中，从此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

1914年2月7日，头戴圆顶礼帽、手持竹手杖、足登大皮靴、走路像鸭子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影片《威尼斯儿童赛车记》中。这一形象成为卓别林喜剧片的标志，风靡欧美20余年。卓别林戴著圆顶硬礼帽和礼服的模样几乎成了喜剧电影的重要代表，往后不少艺人都以他的方式表演。

从1919年开始，卓别林独立制片，此后一生共出演80余部喜剧片，其中在电影史上著名的影片有《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舞台生涯》等。这些影片反映了卓别林从一个普通的人道主义者到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过程。卓别林以其精湛的表演艺术，对下层劳动者寄予深切同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辛辣的讽刺，对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1952年，他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迫离开美国，定居瑞士。在瑞士期间，他拍摄了尖锐讽刺麦卡锡主义的影片《一个国王在纽约》。

1972年，美国隆重邀请卓别林回到好莱坞，授予他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称他“在本世纪为电影艺术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卓别林最出色的角色是一个外貌流浪汉，内心则一幅绅士气度、穿着一件窄小的礼服、特大的裤子和鞋、戴着一顶圆顶硬礼帽、手持一根竹拐杖、留着一撇小胡子的形象。在无声电影时期卓别林是最有才能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他自己编写、导演、表演和发行他自己的电影。从在英国的大剧院作为孩童演员登台演出到他88岁高龄逝

世他在娱乐业从事了70多年的生涯。从狄更斯式的伦敦童年一直达到了电影工业的世界顶端，卓别林是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人之一，他本人成为了一个文化偶像。他一生中私生活和公众生活受到了一些人的高度赞扬，也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严格批判。

在卓别林对现实的讽刺影片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他1918年拍摄的《狗的生涯》。这部影片中，深思代替了嬉笑，忧郁代替了嘲弄。通过这部影片，他放弃了滥用的低级趣味，而以发人深省的笑代替了纯生理的笑；用同情的微笑代替哈哈大笑。“不朽的流浪者”夏尔洛，露宿街头，处处受辱，当他从职业介绍所碰了壁狼狈地走出来时，茫然地看见门口的几只狗正在争夺一块骨头。这辛酸的一笔正是残酷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童年卓别林的真实写照。

我问江青：

“那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电影，真的能在中国上映吗？”

江青回答道：

“我们可以从中学习某些演员的演技以及电影的制作技巧。只是，我们缺乏拷贝。”

听了江青的话，我打算回美国后找一些好片子送给她。可是，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没能实现自己对江青的承诺。

江青承认：

“要想搞到外国电影，很难。尤其是在美国。”

接着：

“美国有一部《音乐之声》的电影，我们想方设法从香港拷贝了过来，可惜颜色太差。后来我们又从其他国家搞来了几套，效果仍不尽人意。这是部反法西斯的电影。导演真了不起！”

这些年来，江青看了不少的电影。尤其是她特别爱看纪录片。俄国导演罗曼·卡尔曼导演的一部片子，她竟然一天里接连看了三遍。

江青说：

“我读过一本小说《乱世佳人》。（也有翻译成《飘》的。）是你们美国一位女作者写的。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野性和美丽的女人》。”

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的前夕，塔拉庄园的千金小姐郝思嘉爱上了另一庄园主的儿子艾希利，但艾希利却选择了郝思嘉的表妹——温柔善良的韩媚兰为终身伴侣。郝思嘉出于妒恨，抢先嫁给了韩媚兰的弟弟查尔斯。

不久，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了。

艾希利和查尔斯作为征兵上了前线。查尔斯很快就在战争中死去了。郝思嘉成了寡妇，但她内心却一直热恋着艾希利。

一天，在一次举行义卖的舞会上，郝思嘉和风度翩翩的商人白瑞德相识。白瑞德开始追求郝思嘉，但遭到她的拒绝。郝思嘉一心只想着去追求艾希利，结果也遭到拒绝。

在战争中，美国南方军遭到失败，亚特兰大城里挤满了伤兵。郝思嘉和表妹韩媚兰自愿加入护士行列照顾伤兵。目睹战乱带来的惨状，任性的郝思嘉成熟了不少。

这时，从前线传来消息，北方军快打过来了，不少人家惊惶地开始逃离家园。不巧韩媚兰要生孩子了，郝思嘉只好留下来照顾她。

在北方军大军压境之日，郝思嘉哀求白瑞德帮忙护送她和刚生下孩子的韩媚兰回塔拉庄园。白瑞德告诉郝思嘉他不能目睹南方军溃败而不去助一臂之力，他要参加南方军作战，他留下一把手枪并和郝思嘉拥吻告别。郝思嘉只好独自勇敢地驾驶马车回到塔拉庄园，这时家里已被北方军士兵抢先洗劫一空，母亲在惊吓中死去。

不久，战争结束了。生活依然困苦。北方来的统治者要庄园主缴纳重税，郝思嘉在绝望中去亚特兰大城找白瑞德借钱，但得知他已被关进监狱。

归来的途中，郝思嘉遇上了本来要迎娶她妹妹的暴发户弗兰克，为了要重振破产的家业，她骗取弗兰克和自己结了婚。

郝思嘉在弗兰克经营的木材厂非法雇用囚犯，并和北方来的商人大做生意。此时，白瑞德因用钱贿赂而恢复了自由。两人偶然碰面，再次展开爱恨交织的关系。

弗兰克和艾希利因加入了反政府的秘密组织，在一次集会时遭北方军包围，弗兰克中弹死亡，艾希利负伤逃亡，在白瑞德帮助下回到韩媚兰身边。

郝思嘉再次成为寡妇。

此时，白瑞德前来向她求婚，她终于与一直爱她的搞私运军火和粮食致富的白瑞德结了婚。

婚后，夫妻二人住在亚特兰大的豪华大宅。

一年后，女儿邦妮出生，白瑞德把全部感情投注到邦妮身上。郝思嘉偶然翻阅艾希利的照片被白瑞德发现，终于导致了二人感情的破裂。

其后，在艾希利的生日会前夕，郝思嘉与艾希利相见时热情的拥抱引起旁人非议，但韩媚·兰不相信他们之间有暧昧关系。白瑞德可不这样想。

当郝思嘉告诉白瑞德她已经再次怀孕时，白瑞德怀疑地问那是谁的孩子？

郝思嘉在羞怒之下欲打白瑞德，却不慎滚下楼梯引起流产。白瑞德感到内疚，决心同郝思嘉言归于好，不料就在他俩谈话时，小女儿邦妮意外坠马摔死了。

与此同时不幸的事也在另一个家庭里发生，韩媚·兰终因操劳过度卧病不起。

临终前，她把自己的丈夫艾希利和儿子托付给郝思嘉，但要求她保守这个秘密，郝思嘉不顾一切扑向艾希利的怀中，紧紧拥抱住他，站在一旁的白瑞德无法再忍受下去，而转身离去。

面对伤心欲绝毫无反应的艾希利，郝思嘉终于明白，她爱的艾希利其实是不存在的，她真正需要的是白瑞德。

当郝思嘉赶回家里告诉白瑞德，她是真正爱他的时候，白瑞德已不再相信她。

他决心离开郝思嘉，返回老家去寻找美好的事物，被遗弃的郝思嘉站在浓雾迷漫的院中，想起了父亲曾经对她说过的一句话：

“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

她决定守在她的土地上 重新创造新的生活，她期盼着美好的明天的到来。

“那是一部描述美国内战时期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电影。”

姚文元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插嘴道：

“南方的奴隶主赞成奴隶制度。美国当时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奴隶主害怕失去他们的奴隶。再过四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二百周年纪念日。二百年的美国历史值得我们去研究。只有分析和了解过去和现在的美国，才能知道美国的未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提到《乱世佳人》吗？”

江青问道：

“这并不是说这本书它有多大的文学价值。相反，这部电影却让我们了解了美国南北战争是怎么回事。”

“我读过一些文学作品。年轻时也曾研究过美国历史。但很多事我已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华盛顿和林肯。华盛顿领着一个人口只有三百万的国家，打败了有着三千万人口的英国。（实际上，华盛顿时期，美国有一千万人口。）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华盛顿后来犯下了屠杀印第安人的罪行。你是学过美国历史的美国人，不能跟你比。从历史上来看，印第安人曾帮助过他抗击法国人。但他在打败英国人之后，却对印第安举起了屠刀。不管怎么说，华盛顿仍是一个伟人！”

我承认江青说的是对的。后来的美国政府一直在补偿印第安人。算是赎罪吧。

“这就是垄断资本集团犯下的罪行！”

江青肯定地说：

“我们劳动人民是不会那么做的。加州垄断集团是后来者，1830年他们吞併了比他们更落后的东部。1830年，白人屠杀印第安人是非常野蛮的行径！”

“开发美国西部是1830年的事情。可惜当时还没有纪录影片，不能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我赶紧补充了一句。

1900年，印第安人开始了重建他们的家园。

“西部开发，奠定了美国强盛的基础！”

江青站了起来。

结束了这次会谈。

2

某天晚上，用过很晚很晚的晚餐之后，江青特意邀请我散散步。

我们就围着小别墅的走廊转圈。

江青满脸容光焕发地告诉我，今晚要犒劳我。为我专门放映一场电影——嘉宝主演的《克里斯蒂娜女王》。1933年出品的版本。

她已经令人将影片专程从北京送来广州。

江青对我说，她几乎收藏了一套完整的嘉宝主演的电影。可是由于囊中羞涩却没钱收藏卡米尔的电影。最令她遗憾的是，她看中的《安娜·卡列尼娜》，至今都没钱将拷贝买下来。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品。

本书通过女主人公安娜的追求爱情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安娜·卡列尼娜的哥哥奥布朗斯基公爵已经有五个孩子，仍和法国家庭女教师恋爱，因此和妻子多丽闹翻，安娜从彼得堡乘车到莫斯科去在莫斯科为哥嫂调解，在车站认识了青年军官渥伦斯基。

渥伦斯基毕业于贵族军官学校，后涉足于莫斯科社交界，以其翩翩风度得到了多丽的妹妹凯蒂的垂青，但他只与她调情，并无意与她结婚。

而深爱着凯蒂的康斯坦丁·列文也从乡下来到莫斯科，他打算向凯蒂求婚。但早倾心于渥伦斯基的凯蒂却拒绝了他的求婚，她正想象着与渥伦斯基将来的幸福生活。

渥伦斯基是一个身体强壮的男子，有着一副和蔼、漂亮而又异常沉静和果断的面孔，年轻英俊而风流倜傥。他的整个容貌和风采，令许多贵族小姐倾心。

在他看到安娜的一刹那，那刻被安娜所俘虏，他在薛杰巴斯大林基公爵家的舞会上，向安娜大献殷勤。而凯蒂精心打扮想象着渥伦斯

基要正式向她求婚，在渥伦斯基眼里，安娜·卡列尼娜是那样的出众：“她那穿着简朴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带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可亲的，在舞会上……”

凯蒂发现渥伦斯基和安娜异常地亲热，这使她感到很苦闷。安娜不愿看到凯蒂痛苦，劝慰了兄嫂一番，便回彼得堡去了。随后渥伦斯基也来到彼得堡，开始对安娜的热烈的追求，他参加一切能见到安娜的舞会和宴会，从而引起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起初，安娜还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不久渥伦斯基的热情唤醒了安娜沉睡已久的爱情。

安娜的丈夫亚历山大·卡列宁其貌不扬，在官场中却是个地位显赫的人物，是一个“完全醉心于功名”的人物。他根本不懂什么是倾心相爱的感情，他认为：他和安娜的结合是神的意志。他责备妻子行为有失检点，要她注意社会性的舆论，明白结婚的宗教意义，以及对儿女的责任。他并不在乎妻子和别人相好，“而是别人注意到才使他不安”。

有一天，安娜与丈夫卡列宁一起去看一场盛大的赛马会，比赛中渥伦斯基从马上摔了下来，安娜情不自禁地大声惊叫，卡列宁认为安娜有失检点，迫使她提前退场。安娜无法忍受丈夫的虚伪与自私“我爱他……我憎恶你……”。卡列宁考虑了决斗但又怕死；离婚又损名誉，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不能因为一个下贱的女人犯了罪的缘故使自己不幸”，于是他要安娜维持表面的夫妻关系。

安娜已怀了渥伦斯基的孩子，在她分娩时，由于产褥热而感染重病，拍电报给到边远省份去调查的卡列宁，卡列宁匆匆赶回，但心里

希望妻子早点死掉，安娜在昏迷中呼唤卡列宁的名字，请求他与渥伦斯基和好，卡列宁深受感动，原谅了她和渥伦斯基的背叛。

由于卡列宁的令人吃惊的宽厚，渥伦斯基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卑劣、渺小。安娜的爱情和自己的前途又是那么的渺茫，绝望、羞耻、负罪感使他举起了手枪自杀，但没有死。死而复生的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更加炽热，渥伦斯基带着安娜离开了彼得堡，他们到国外旅行去了。

在奥勃朗斯基家的宴会上，列文与凯蒂彼此消除了隔阂，互相爱慕。不久他们结婚了，婚后他们回到列文的农庄，凯蒂亲自掌管家务，列文撰写农业改革的论文，他们生活很幸福美满。

旅行了三个月，安娜感到无比的幸福，但她却以名誉和儿子为代价。归国后，她没有回家，而是住在旅馆里，由于思念儿子，在儿子谢辽沙生日那天，偷偷去看他，天真无邪的谢辽沙不放妈妈走，他含着泪说：“再没有比你更好的人了。”

他们返回彼得堡，遭到冷遇，旧日的亲戚朋友拒绝与安娜往来，使她感到屈辱和痛苦。渥伦斯基被重新踏入社交界的欲望和舆论的压力所压倒，与安娜分居，尽量避免与她单独见面，这使安娜感到很难过，她责问道：“我们还相爱不相爱？别人我们用不着顾虑。”

在一次晚会上，安娜受到卡尔塔索夫夫人的公开羞辱，回来后渥伦斯基却抱怨她，不该不听劝告去参加晚会。于是他们搬到渥伦斯基的田地庄上居住。渥伦斯基要安娜和卡列宁正式离婚，但她又担心儿子将来会看不起她。3个月过去了，离婚仍无消息。

渥伦斯基对安娜越来越冷淡了，他常常上俱乐部去，把安娜一个人扔在家里，安娜要求渥伦斯基说明：假如他不再爱她，也请他老实说出来，渥伦斯基大为恼火。一次，渥伦斯基到他母亲那儿处理事务，安娜问他的母亲是否要为他说亲，他要安娜不要诽谤他尊敬的母亲，安娜认识到渥伦斯基的虚伪，因为他并不爱他的母亲。

大吵之后，渥伦斯基愤然离去，她觉得一切都完了，安娜准备自己坐火车去找他，她想象着现在正和他母亲及他喜欢的小姐谈心，她回想起这段生活，明白了自己是一个被侮辱、被抛弃的人，她跑到车站，在候车室里接到了渥伦斯基的来信，说他10点钟才能回来，她决心不让渥伦斯基折磨她了，起了一种绝望而决心报复的心态，最后安娜身着一袭黑天鹅绒长裙，在火车站的铁轨前，让呼啸而过的火车结束了自己无望的爱情和生命，这段为道德和世间所不容的婚外情最后的结果由安娜独立承担，留下了无限感伤。

卡列宁参加了安娜的葬礼，并把安娜生的女儿带走了。渥伦斯基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志愿参军去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作战，但愿求得一死。最后以安娜，渥伦斯基和凯蒂，列文做对比，对比了两个家庭的截然不同的结局。

100多年来，《安娜·卡列尼娜》的巨大成功不断地得到人们的肯定与高度推崇，它的成就和影响无疑是空前的。它把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最高峰，树起了一面高耸入云的丰碑。

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安娜·卡列尼娜》当做俄国19世纪现实的教科书。

正是通过它，许多人了解到了俄国19世纪70年代的社会现实。

俄国后来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对社会的攻击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列宁曾反复阅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以至把封皮都弄得起皱了。他说：“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

100多年来各国作家按自己的理解把安娜搬上舞台、银幕、荧光屏。安娜形象一直激动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这正说明安娜形象的艺术生命力是不朽的。

江青的眼睛在放映机光线的辉映下一闪一闪地闪着亮光。黑暗中，江青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这部电影，她看过不知有多少遍了，仍是百看不厌。

手提放映机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光线忽明忽暗，的确是一部不知被人看了多少遍的老掉牙的电影。演员的动作极不自然，像慢镜头似的。声音也是时有时无，有时候根本就听不见。

银幕上也不再出现中文字幕。

可这些丝毫也没有影响到江青的兴致。看样子，她能将剧本从头到尾地背下来。

江青担当了义务解说员，在我耳边喋喋不休地讲解剧情。王海容超一流水平的同声翻译让我仿佛觉得江青在直接跟我说英语似的。毫无语言障碍。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克里斯蒂娜女王生于1626年12月8日，1632年因为父王战死，而继承王位，成为瑞典女王，1654年退位。

克里斯蒂娜女王天分过人，她马术精湛，并学习过剑击和射击。此外她还精通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克里斯蒂娜女王信奉天主教，终身未婚。

1626年12月8日（当时仍用儒略历，相当于今公历12月18日），克里斯蒂娜生于斯德哥尔摩。虽然人们期待的是一个男性继承人，但她出生的当夜曾发生罕见的天体“合”现象，星相奇观让大家纷纷猜测这个女孩子在未来会以怎样的姿态登上世界的舞台。

她出生之前，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曾有过两个女儿——1620年降生的一个未命名的女婴，但次年便夭亡和1623年出生的长女公主克里斯蒂娜。这两个夭折的女儿都被葬于斯德哥尔摩的骑士岛教堂。

故勃兰登堡的玛丽亚·埃莉奥诺拉王后1626年的第三次怀孕被抱以极大的期望。

她诞下孩子时，宫内一片欢腾——人们认为王后生了一个男孩，因为新生儿毛发浓密，而且哭声响而嘶哑。

克里斯蒂娜在自传忆述道，“在场的女士发现这错误时，都感到万分尴尬。”国王却十分欢喜，说“这女孩一定会很聪颖，看她作弄了我们所有人！”

她的性别之所以会引起混淆，可能是因为她出生时被几乎完整的羊膜包着；但斯堪的纳维亚传统把这种羊膜称为“胜利外衣”，视之为

好兆头。国王很疼爱女儿，而公主也很敬爱父亲；然而王后却因自己没有诞下男孩而对克里斯蒂娜很冷漠。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为了捍卫新教率兵远赴三十年战争前，申明若他此去无回，则由克里斯蒂娜继承王位，而他确实在1632年11月的吕岑战役中阵亡。

国王命令把克里斯蒂娜视为王子抚养，而克里斯蒂娜登基时宣誓为“国王”而非“女王”，她因此有了“女孩国王”的绰号。来自霍亨索伦王朝的母亲——勃兰登堡的玛丽娅·埃莉奥诺拉是个脾气古怪暴躁的人，她曾多次试图将生产时的痛苦怪罪到克里斯蒂娜的头上，在童年时代受此所产生的心理阴影很可能是克里斯蒂娜不愿生下继承人而终身未婚的原因。

1632年，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于吕岑阵亡。虽然克里斯蒂娜是个很少流泪的孩子，但她为了父亲的死哭泣了三天。五岁时用德文写给父亲的信件还在，如今已经成为了令人心碎的纪念。她的母亲把国王的遗体从德意志带回国，并下令直到她去世与丈夫合葬为止不能下葬国王。玛丽亚·埃莉奥诺拉还要求棺材必须是一直打开的，每天上午她都去抚拍他的遗体，对于尸体的腐化毫无反应。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于1632年11月6日驾崩，直到18个月后的1634年6月22日才下葬。不久王后就开始进入墓室，试图接触国王的尸体。最终尴尬的最高总理大臣阿克塞尔·奥克森谢纳（Axel Oxenstierna）没有办法，只得下令在陵墓设卫兵以阻止王后的进一步行动 [4]。

由于和先王长得很相似，克里斯蒂娜忽然引起了母亲迟来的：由起初的漠不关心，变成现在变态式的体贴。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大概是曾有感于妻子的性情，在生前下令若他不幸战死，克里斯蒂娜应交由姑母公主瑞典的凯瑟琳照顾。凯瑟琳嫁与茨韦布吕肯—克里博格的王权伯爵约翰·卡西米尔，于三十年战争爆发后迁回瑞典。

克里斯蒂娜与姑母夫妇二人十分要好：凯瑟琳的女儿茨韦布吕肯的玛丽亚·欧弗洛希妮后来与克里斯蒂娜的好友结婚，而她的儿子卡尔·古斯塔夫后来更继承了克里斯蒂娜的王位，即瑞典的卡尔十世·古斯塔夫。然而玛丽亚·埃莉奥诺拉王后却不满先王遗令，将小姑凯瑟琳逐出宫廷。

接受母亲“照料”的克里斯蒂娜此后不得不忍受王后时常忽然爆发的哭泣，房间密闭不允许光线进入。

最高总理大臣阿克塞尔·奥克森谢纳逼不得已，只得把玛丽亚·埃莉奥诺拉放逐至格里普斯科尔摩城堡，并限制她要得枢密院同意方可见女儿。

自此，克里斯蒂娜得姑母一家人作伴，度过了三年愉快时光；但凯瑟琳1639年去世后，奥克森谢纳着令她家人迁出王宫。

克里斯蒂娜还是婴儿时，看顾她的保姆们曾不小心把她掉在地上，使她断了一块肩骨，两边肩膀终生高度不一。但她马术精湛，并学习剑击和射击。

六岁的克里斯蒂娜在1633年三月15日继位为女王时已经很成熟，她成为君主后完成的第一个任务是接待俄罗斯大使代表团，女孩给俄罗斯大使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先王指派给她的导师，神学家约翰内斯·马蒂亚·哥图斯（Johannes Matthiae Gothus）教授她宗教、哲学、希腊语和拉丁语。

此外，她也学习瑞典历史和现代语言。她语言天份十分高，1645年法国大使皮埃尔·赫克托·沙纽来到斯德哥尔摩时曾大惊说：“她的法文（说得那么好），就像在卢浮宫内出生的人一样！”；曾在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之女莉奥诺拉·克里丝蒂的宫廷中任职医生的奥托·斯伯林，于1653年冬天在瑞典会见过克里斯蒂娜。曾在意大利生活过四年的斯伯林用意大利语与年轻的女王交谈，惊叹她虽然从未到过意大利，却说得像当地人一样。她研究伊斯兰教，还阅读《三无赖论文》（De Tribus Impostoribus，一部否定所有宗教的真实性存疑的书）。

克里斯蒂娜是个模范学生，教授她政治学的奥克森谢纳曾不无骄傲地写道：“她完全不像女孩子”，相反，她遗传了那位研究伽利略·伽利雷的父亲的智慧而“天资聪颖”。

奥克森谢纳和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曾经把王室领地赏赐给贵族和将领，以换取他们的效忠；克里斯蒂娜后来意识到这个政策改变了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势力平衡。

她的曾祖父古斯塔夫·瓦萨改信新教后，国王拥有的教会和修院财产大大增加，当时国王领有瑞典土地的三成，自由农夫领有约一半，贵族领有两成。

但古斯塔夫二世不断赏赐臣下，使克里斯蒂娜继位时，国家约七成五的土地都属贵族所有。在克里斯蒂娜的执政后的十年里，贵族家族的数目从300增长到了600——这是她唯一可用的奖赏战功的方式[6]。有时封地在匆忙中给与，根本来不及登录在案，有时同一片土地甚至被下封两次虽然克里斯蒂娜女王成功地管治了瑞典超过十年，但她在1681年的自传写道：

“我认为女人永远不应管治国家。”

她十六岁时获枢密院邀请参与政事，但她请求像父亲一样，待十八岁才亲政。她顺利完成与丹麦交好的首要工作：丹麦把哥得兰岛和厄塞尔岛（今爱沙尼亚萨雷马岛）转让给瑞典，同时瑞典也从挪威得到耶姆特兰省和海里耶达伦，这两处今天依然是瑞典的领土。

奥克森谢纳不久后发现，女王跟自己的政见不同。他认为三十年战争持续下去对瑞典最有利，派遣了儿子约翰·奥克森谢纳出席1645年在德国举行的和会；然而，克里斯蒂娜却无论如何都渴望和平，因此也派遣了自己的代表约翰·阿德勒·萨尔维乌斯。在《威斯特法伦和约》签订前，女王不理睬奥克森谢纳的反对，任命了萨尔维乌斯为枢密院成员。

此举引起人们极大的震惊，因为萨尔维乌斯并非出身贵族，但女王的意图即是与枢密院中的贵族势力抗衡。她在1645年也任命来自汉堡的本尼迪克特(巴鲁)·尼哈米阿斯·德·卡斯特罗为“常驻医生”。

克里斯蒂娜女王知道人们期待她诞下瑞典王位继承人。她的表哥卡尔对她有意，而卡尔于1642年赴德国参军前曾与她秘密订婚。克里斯蒂娜却在自传写道她“对婚姻感到无比厌恶”，也“对女性所谈论和做的所有事感到无比厌恶”。她每晚只睡3至4小时，主要时间是在学习；她忘记梳头、匆忙地换上衣服、为了方便穿男式鞋子，但据说女王仍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她最要好的女性朋友是艾芭·斯芭尔(Ebba Sparre)，克里斯蒂娜称她为“Bellevue”。

1653年克里斯蒂娜亲自主持了艾芭和雅各布·德·拉·加尔迪的婚礼，但艾芭的丈夫五年后在埃尔西诺(即赫尔辛格)被杀。他们三名子女都早夭，而艾芭守寡四年后也去世了。直到她去世为止克里斯蒂娜一直保持和她的通信联系，并经常表达她对好友的挚爱。

1649年2月26日，克里斯蒂娜女王公告她不打算结婚，并且立表哥卡尔为王位继承人。贵族对此表示反对，但其余三个国民等级——神职人员、资产阶级和农民——都同意接受。

加冕礼于1650年10月举行，她在雅各斯达尔宫(今称乌尔里克斯达尔宫)登上以绣金黑天鹅绒装饰、以六匹白马拉动的马车。车队十分之长：首辆马车到达斯德哥尔摩大教堂时，还有马车未离开雅各斯达尔。

分属四个等级的国民均被邀请赴王宫的晚宴。市集的喷泉里流着美酒，烤肉飘香宾客穿着华丽衣服，就如身处嘉年华会。

自卡尔九世起，除了叛乱的王子和被废黜君主的后裔外，瓦萨王朝持有的瑞典王位一直以父终子及的方式传承。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弟弟已死去多年，故家族内只有女性。尽管古斯塔夫·瓦萨其他儿子有女性后人在世，但克里斯蒂娜是古斯塔夫二世指定的假定继承人，故得以继位。

克里斯蒂娜虽然常被称为女王，但她的正式头衔是瑞典国王。作为统治者她经常如同男性一般态度强硬，在1650年的瑞典国会上，她坚决驳回了来自“其他阶级”（即神职人员、资产阶级和农民）要求减少贵族免税土地所有的要求。

欧洲多国的王公都曾想追求她，但都被她拒绝。

克里斯蒂娜于1654年6月5日退位，并属意表哥卡尔·古斯塔夫继承王位，以便能公开信奉天主教，和认识文艺复兴的艺术和科学。耶稣会派了教士保罗·卡萨提来斯德哥尔摩判断她皈依天主教的诚意。

然而，她并不是全然因为转信天主教而退位，还有当时对她太随心所欲和挥霍的批评——她在10年间册封了17个伯爵、46个男爵和428个低级贵族，并卖掉或抵押了价值1,200,000瑞典银元的财产，以缴付他们的俸禄。她也很明显开始对征服大片国土后，但仍维持省级的政府感到厌倦。

在乌普萨拉城堡的退位仪式上，克里斯蒂娜身穿的王位标记被一件一件摘下；但负责摘去王冠的佩尔·布拉赫却不忍心动手，她不得不自行把王冠脱下。

她身穿一件普通的塔夫绸白袍，声音颤抖地发表告别演说，感谢所有人后便把王位移交给身穿黑服的卡尔十世。佩尔·布拉赫曾写道：“她站在那里，开始流畅而优美地讲话，中间几次让人感到她的热泪就要喷涌而出；女王陛下的讲话，感动了所有真诚的男人和女人，而所有在场的女人都已泣不成声。

人们无不感动惋惜和痛苦，女王陛下居然在上帝允许之前，就中止了她君临天下的职责；而她在那个时候，美丽如同天使！”

她的退位，结束了瑞典历史上最为风云激荡的瓦萨王朝（1521年～1654年）。

在经济上，退位后的克里斯蒂娜依然有保障，她的收入来自包括诺尔雪平、哥得兰岛和厄赛尔岛，波美拉尼亚等其他地方。

1654年夏，她在边境改穿男人衣服，像男人般骑马越过丹麦。当时瑞典和丹麦关系仍然紧张，刚退位的瑞典女王不可能安全地进入丹麦。

他在8月到达当时受西班牙控制的安特卫普。当地的人举办了宴会欢迎她，沙纽大使和前挪威总督Hannibal Sehested也有到场。1654年12月24日，她在布鲁塞尔的利奥波德大公礼拜堂皈依天主教，但她不敢公开宣示，因为恐怕瑞典枢密院会停付她生活费。

由于她仍未公开宣告她的新信仰，教皇和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也不敢公开支持她。她自行以贷款筹集大额资金，以供她和255人、247匹马的随行人员到达意大利。提洛尔公爵几乎因她的到访而倾家荡产。

教皇的传讯员卢卡斯·霍尔斯特在因斯布鲁克会见了她。1655年11月3日，克里斯蒂娜在因斯布鲁克城堡皈依天主教后，写信通知了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和表哥卡尔十世。

1689年2月，62岁的克里斯蒂娜患了重病，接受了临终圣礼。教皇亚历山大八世亦抱恙在身，无法亲往探望，但派人向她致意。她的病情看似稍有起色，但4月中她又患了肺炎并发高烧。弥留之际她向教皇传讯，请求宽恕她以往的不敬；教皇答允了。

临终时，阿佐利诺红衣主教一直陪伴在身旁。克里斯蒂娜于1689年4月19日病逝。

克里斯蒂娜复杂而有争议的性格使她成为当代多个女同性恋和女权主义团体的偶像人物。她传奇的人生也成为多部文艺作品的灵感来源，最著名的当属1933年由著名瑞典女影星葛丽泰·嘉宝所主演的电影Queen Christina。

正是现在江青陪我观看的这部电影。

灯亮了。

蒙胧的灯光下浮现出江青那极具独特个性的轮廓——伤感、疲惫的眼神。

我偷偷地瞄了一眼手表，已是翌日凌晨二点。

我的这个小动作并没有逃过江青的眼睛。

她微笑着打趣道：

“别着急，这只是幕间休息。”

接下来放映的是纪录片。

记录的是在毛主席的出生地，湖南长沙马王堆正在进行的考古挖掘工作。

马王堆位于长沙市东郊浏阳河西岸、长浏公路北侧，距市中心约4公里，属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乡（原属东屯渡乡）。原为河湾平地中隆起的一个大土堆，据地方志记载为五代时期楚王马殷及其家族的墓地，故名马王堆。堆上东西又各突起土冢一个，其间相距20余米。两冢顶部平圆，底部相连，形似马鞍，故也有人称其为马鞍堆。

马王堆汉墓两千多年来从未被盗，保存完好，因此出土了大量的文物，特别是一号墓出土的历两千年不腐的神奇女尸及三号墓出土的大量帛书文献，为西汉初期历史考证提供了翔实的资料，震惊了世界。出土时，一号墓由于用白膏泥密封好，因此女尸历经二千年仍保存完好，被发现时，曾有气体喷出燃烧，但由于没及时收集气体，不知具体成份，成了千年女湿尸仍保存完好的难解之谜。

我啰啰嗦嗦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话，如果不是观看纪录片或是亲临现场，估计所有的美国人都会对我说：

“N o！不明白。”

我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死了好几千年的人，还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第二天下午，我们去了紫竹园荷花池的望月台。

回到室内，江青吩咐警卫员小乔叫人搬来了好几盆竹子盆栽和一盏巨大的室内照明灯。我俩相互给对方拍照，忙乎了一个多小时。

3

1936年至1937年，江青做了两年的电影演员。为此，却招致了一生的毁誉。引来无限的遐想。

一个年仅21岁的女孩，正值豆蔻年华，做做明星梦，又有什么错呢？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江青从十八岁开始演戏。从最基层的普通演员做起，薪水也是最低的。除了演戏，她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

江青直视着我的眼睛，对我说：

“我知道，外国人并不欣赏那些为共产主义做事的人。尤其是你们美国人。但如果你是中国人，又生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只要稍有爱国之心，你一定会跟我一样，甚至会比我更积极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的！”

她说的很肯定，也很自信。

她沉默了片刻，眼睛专注地看着前方，像是在思考什么深刻的问题。

多年来，为了她曾经演过电影这件事，她遭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包括党内和党外的。

江青回过头来，脸上又有了笑容：

“我这一生都在搬石头。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在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说我英雄也好，说我狗熊也罢。有则改之，无则加冕吧。”

她演电影，绝不是为了追求名利。只是因为她戏演得好，一时间名声鹤起，自然引来了多家电影公司对她的关注，并企图与她签约。

演电影，应该是一件既风光又愉悦的事情。然而，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江青却显得有些苦涩，甚至是痛苦。

江青出名之后，招来了各种各样的人和组织的各种各样的非议和诽谤。其中有民族主义者，也有共产主义者。有的曾经密谋要杀死她。

除了上海的《大公报》，几乎所有的媒体——电台、报纸和其它有影响力的出版物，都被动员了起来反对她。当时的上海，本来就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某些媒体还要火上浇油散布谣言，说她被人绑架了。也有说她试图开车自杀。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比真的还真。

也许这就是江青的命。

刚出道，就被人张扬她要“自杀”。多少年之后，她却“真”的死于“自杀”。

你信吗？

我不信。相信你也不信。

道理很简单。十七岁的江青没有“自杀”，难道七十一岁的她还会去“自杀”吗？

还弄了份“遗书”，也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其实，要弄明白此事十分简单。只要看看江青死时身边的人（所有人，包括煮饭和打杂的。）后来的结果——是高升了？出国了？又或是莫名其妙地“病”死了？那么此人便是“知情者”。

只是弄明白，又能怎么样呢？

其实，年轻时的江青本来就十分孤立和脆弱。生活在恐怖之中的她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没多久，她就病倒了。

30年代的江青，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

她是一个文化工作者，同时又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她是一名教师，同时又是基督教徒。但骨子里，她自始至终都是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幸运的是，她的薪水提高了。

江青从痛苦的回忆中走了出来。

但大部分的钱，她都拿去养“家”了。

“家？”

“两个同志和其他一些朋友。”

她没有明说是哪些朋友。

江青生活在演艺圈，自然要经常出入高档酒楼和饭店。可让朋友们不解的是，她的饮食习惯实在有些奇怪？上饭店吃饭，她总是只吃馒头，而且从不点菜。她吃的很慢，一个馒头能啃半天。

除了生活必需品和支持“家”用，剩下的钱，她都拿来买书了。她经常花许多的时间在书店里逗留。时间久了，书店老板也认识她了。并且很信任她。要是她有她看上的书，就算手头没钱，老板也会让她把书带走。

只要有了钱，江青就会去还书钱。从不失信。

当时的上海，钱——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个棘手的问题。对于成千上万的无助的失业者来说，抢劫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的钱包，就被抢了好多次。”

江青笑着说道。

钱被人抢了，她别无选择，只能去当铺。

铺天盖地的海报，使许多人都认识江青这张脸。刚开始时，这让江青和当铺老板都感到十分尴尬。

最后，江青可以用来典当的私有财产只剩下手表和钢笔了（这可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身份象征）。

当她把手表和钢笔放在柜台上的时候，当铺老板没有作价，反而先开口问她：

“当多少？”

“五元。”

老板没有像通常对待典当的顾客那样讨价还价，一声不吭地静静地
地将钱递给了她。“占”有了她的手表和钢笔。

这笔交易，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这说明当铺老板同情她的
遭遇与困境。

后来的交易，就容易多少。只是有了钱，江青就会将自己的东西
赎回来。

没钱，最令江青头痛的是坐车。

记得有一次她要去一个较远的地方参加党员会议。会议结束时，
已是漆黑的夜晚。她好不容易赶上最后一班电车，可口袋里的钱只够
支付一半的路费。

余下的路程，她只能选择步行。

那天晚上她走了好几十里。（一里等于三分之一公里。）注：此
处笔者错误，应等于二分之一公里。

当她好不容易走回女工宿舍时，腿都走肿了。

另一次是她去北胜庄开会，开完会正赶上刮台风。公交车停开了。
她只能去找黄包车，可车夫叫她先付钱。她口袋里空空如也，无有分
文。没办法，只能走着回家。

原以为顺风好走，没想到被风吹着根本就是收不住脚，更费力。
急中生智，她急忙抱住了一棵大树。没等她喘过气来，“哗啦”一声，
树枝被大风吹折了。

江青在风雨中一路跌跌撞撞蹒跚而行，一路发着高烧。到家时，
她几乎是爬上小阁楼的。

小木屋里住着她和另外几个工人学生。

小木屋被大风吹得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江青虽然在工人寄宿学校教书，但却跟她的工人学生一样忍饥挨饿。同时，她还在一家业余剧团兼职。每星期有三个晚上要演出。即便如此，剧院总是亏损。演员们不得不常常自掏腰包，为了维持剧院的生计。

有时候吃不饱肚子的江青还得捐款。

“像个爷们一样！”

说这话时，江青眼里闪烁着女权主义骄傲的亮光。

在追求男女平等的女权运动发展史中，江青早就是一名身体力行者了。

所以，我们应该清楚江青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江青语调有些沉重地说：

“我从来不贪男人的便宜。”

在旧中国，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出去的时候，总是男人付费。

她从未那样做过。她如果没钱，她会告诉那人：

“这一次你付钱，下一次我来买单。”

有一次剧院正在上演嘉宝的新片。江青穿了一件男式外套，带着的钱包也不是一个女人的钱包。当她跑去售票亭买票时，只剩下阳台上一元钱一张的座位了。这个位置不好，看不清银幕。江青宁愿去二、三等的剧院，而从不买二、三等的戏票。

她离开了售票亭，打算去另一家电影院看看。

在她穿过马路时，她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她。离她很近，可她又不敢回头。快到戏院的时候，正好在路上遇到了一位朋友，一个男人。别误会，不是男朋友。此时的江青还没谈恋爱呢。

当他们开始买票时，江青才发现她的钱包不见了。

刚才在街上跟踪她的神秘人一定是扒手。江青是即生气又尴尬。她担心朋友会误以为她是故作姿态，想揩他的油。又怕朋友知道她被小偷偷了为她难过，想为她做点儿什么。

于是，她像想起了什么事似的，飞快地与朋友告别。说她要去买点什么急需的东西。

江青叫了辆人力车，匆匆地离开了戏院。

那个月，她连生活费都没了。

她不得不去钱庄，借了一笔高利贷。

江青有些羞愧地对我说：

“在我去延安之前，一直没法还清这笔贷款。”

连日来高烧不退，反复发作。

江青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情绪也变得郁闷起来。

外面的报纸大多是关于她的八卦新闻。不看也罢，越看越生气。不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冤枉她呢？那是因为群众的眼睛有时也是最容易被蒙蔽的。

她的一位朋友——《大公报》的一名女记者。得知她的境遇后，很为她抱不平。说要写文章反击那些诬陷她的人。但遭到了江青的拒绝。江青说：“清者自清，何必浪费口舌。”

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写文章骂过她的记者。是位男性记者。当他主动地伸手过来的时候，江青笑着握住了他的手，压低嗓音对他说：

“请老兄下次骂我的时候，务必保持现在这样的好心情！”

1936年，对江青个人来说，是危机四伏的一年。她想过要离开上海，尤其是当双十节（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快要来临的时候。但此时她已与一家电影公司签了合同，故不可能随便离开这个城市。

那个时候，一些亲密的朋友捣鼓她，劝说她写一点“务实”的文章，摆脱当前的困境。

想想也对。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为了吃饭，江青提笔写了第一篇文章。只是在文章中她还是使用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句术语。排版工排字的时候，拿掉了后面的“帝国主义”四个字。江青很生气，认为歪曲了她的意思。见她如此执拗，朋友们好心劝她：“别再自找麻烦，小心被抓进去！”

殊不知早在二年前，她就已经被抓进去，关了好几个月。

几个月后，她的文章发表在了上海《生活》杂志上。1937年5月25日，《左翼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赞誉她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

江青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演员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未知的世界。通常人们会羡慕他们，说：“喔——，看他们过着多么逍遥自在的生活！”或许，某些自以为是的新生贵族会嘲弄我们：“哼，他们不过是一群放荡风流

的戏子。”对其他人来说，我们参加新戏剧运动，就像是眼睛里掉进了一粒沙子，极欲除之而后快。我们就像危险的易燃物一样，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帝国主义现在看起来似乎很强大，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想要维持他们的旧世界和已有的特权。他们像猎狗一样，四处搜寻。一旦找到目标，就会跳起来摧毁……新戏剧运动。在国际贸易和法租界，肆意攻击我们的演员。狼吞虎咽地撕咬着。

江青 1930 年写的文章现在读起来感觉是有点儿怪怪的，但主题思想十分鲜明。

男女演员必须要有强壮的身体、思想和精神。

江青接着说，他们不仅仅是娱乐的工具，也不是别人手里的玩具。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演员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他们必须深刻地认识现存的社会问题，其实他们的工作与导演和剧作家是完全平等的。

多年来，只要一提起“李云鹤”这个名字，就会引起江青对过去那段往事的回忆。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更多的是痛苦和辛酸。

不错，30 年代的上海电影演员很风光，生活也很优裕。可江青是个从小性格叛逆的人。再加上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满脑子里飘扬着的旗帜都是共产党的红旗。

江青说：

“哪怕是在睡梦中，我都常常梦见中国大地插满了我们自己的红旗。并且坚信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遍地都会插上共产主义的红旗！”

说话时，江青眼里充满了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求。

4

电影院，伴随着现代戏剧，开始于世纪之交之始。

虽然电影制片厂大多分布在香港和其他几个大城市，但电影制作和拍摄现场却都集中在上海。

中国电影事业发端于 20 世纪初。

1905 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

1913 年，美国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

191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时事短片。次年成立活动影戏部，此后拍摄了两部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阎瑞生》和《红粉骷髅》。

1922 年，张石川与郑正秋、周剑云等组织明星影片公司，1923 年完成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影片严肃地涉及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表现手法具有较浓的生活气息，演技自然、亲切、朴素。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较具规模的影片公司。

邵醉翁兄弟于 1925 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于民间故事，拍摄一批古装片，并在上海掀起拍摄古装片的热潮，还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场。

1925~1927年间，上海先后成立 140 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广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摄影片。

1928 年明星公司开拍《火烧红莲寺》后又形成一股武侠片热潮。此后的 4 年间上海各公司拍摄了 400 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烧”、“武侠”、“神怪”之类光怪陆离、粗制滥造影片。

1928 年，民新、大中华百合等影片公司组合成联华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了《恋爱与义务》、《恒娘》、《桃花泣血记》等片。

1930 年，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联影片公司试制成功蜡盘发音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

1931 年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在日本完成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晴》。到 1935 年，中国完成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过渡。

1930 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深感时代需要反映现实的影片。

1932 年 5 月，明星影片公司聘请黄子布（夏衍）、郑君平（郑伯奇）、钱谦吾（阿英）担任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一起组成编剧委员会。

1933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由夏衍任组长，成员有钱杏邨、司徒慧敏、王尘无和石凌鹤。电影小组的成立推动了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的电影创作，也影响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电影创作。当年生产了《狂流》、《都会的早晨》、《春蚕》、《姊妹

花》、《民族生存》、《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一批优秀影片，左翼电影运动取得辉煌成就。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开展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强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针对这种更为尖锐、复杂的形势，左翼电影工作者进行更加隐蔽的斗争，创作出《渔光曲》、《新女性》、《大路》、《神女》、《生之哀歌》、《逃亡》等有影响的片目，与此同时，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开辟了新的制片阵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优秀影片。这个时期还创作一批优秀电影歌曲，如影片《大路》里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歌》，《桃李劫》里的《毕业歌》和《风云儿女》里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随着影片的放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将中国人民爱国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上海电影界为适应新的形势，建立起电影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1936年2月，“国防电影”作为电影创作口号也被提出。

1936~1937年7月，上海各电影公司拍摄出一批不同题材样式和内容的国防电影，有《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影片。

中国的新电影制作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虽说是在国外接受的专业培训。但他们使用现实和自然风格的表演，巧妙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溶合进了电影艺术之中。尤其是许多电影探讨的主题是，发展中的城

市建设、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贫穷孩子的教育问题、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的权利，以及失业问题等，极具进步意义。

尽管中国的电影发展十分迅速，但外国电影仍占主流优势。1936年，这一年江青完成了她的处女作，其中 373 个分镜头虽说是在好莱坞制作，却是在上海首发的。

中国电影制片厂，无论是技术设备还是制作风格，仍受好莱坞所左右。

从 1920 年开始，接受过美国电影技术人员在上海训练的中国同行，接手了美国人留下的烂摊子、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过时的好莱坞设备。尽管这此设备有缺陷，尤其是资金短缺，但他们却拍摄出了许多优秀影片，并“制造”出了许多耀眼的明星。

1930 年早期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尽管他们擅长于现代戏剧，但他们已经觉察到了电影宣传的潜在优势。电影不像戏剧，不需要观众就能演出，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放映。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占领军空袭上海之后，以田汉、夏衍和阳翰笙为首的一批激进的左翼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地下电影公司。

193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自己的电影杂志《电影艺术》。目标是“公开斗争和客观批评”，即在意识形态上对电影进行正确的分析。

1933年2月，共产党继尔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作为组织电影生产和反帝斗争的桥头堡。并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引入到了中国电影。

在随后的几年里，江青一边教学一边继续从事工运。

明星电影公司生产的影片，揭露了国民党的道德腐败，招致了国民党的打击报复。所有涉案的记者、作家和出版商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1932年11月，蓝衣社解散了相对保守的华影制片厂。杀一儆百，以儆效尤。警告其他电影人只能拍摄单纯的娱乐片，不得涉及政治问题。

“蓝衣社”，前面已多次提到这个名字。想来读者并不陌生。然而，真正对其有所了解的又有几人呢？尤其是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的外国人。

蓝衣社（The Blueshirts）是1930年代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内部组织，1930年代初，中国国民党内具有理想主义刻苦清廉的人士发起成立蓝衣社，又称为“力行社”，企图克服日本入侵危机、制止国民党腐化堕落。

蓝衣社积极效仿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褐衣党（brown shirts）和黑衫党（Blackshirts）。于日本侵华后和中国自己对德、意宣战以后的20世纪四十年代解散。

1930年代初，中国国民党内具有理想主义刻苦清廉的人士发起成立“蓝衣社”，企图克服日本入侵危机、制止国民党腐化堕落。

蓝衣社领袖贺衷寒提出“第二期革命”：

“削藩”以统一国家、重整军备以抗战、禁烟、反腐败、复兴农村
“第二期革命”后为蒋介石接受并提倡。

蓝衣社理论家刘健群：

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所痛恨。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蒋介石为蓝衣社拟定的“宗旨”：

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矢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

“第二期革命”的主旨是重塑国民党作为革命党的形象和灵魂，但是这个以法西斯主义为指导的国民党革新工程并未获得成功。

蓝衣社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长征后进入苏区大肆报复屠杀。

蓝衣社发起人：滕杰（黄埔四期、曾在日本留学）第一任书记长，蓝衣社真正的灵魂，其妻子也在蓝衣社。

蓝衣社领袖贺衷寒（黄埔一期）(第二任书记长)因西安事变中主张武力解决，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终不得志。

蓝衣社理论家刘健群。

蓝衣社重要人物：戴笠。原是街头混混，后加入蓝衣社。后受蒋介石青睐，任蓝衣社“别动队”副队长，最后发展为军统局局长。

蓝衣社的缘起，竟是一群忧国忧民的黄埔青年才俊。他们在日本留学期间发现日本侵华战争迫在眉睫，而内患积重内乱不已的政府国民或浑然不觉或熟视无睹。蓝衣社创始人四下游说，终于联合国民党军内的一群有志青年，结成社团，肩负起救党救国，抵御外侮的历史使命。这时的蓝衣社与戊戌六君子，黄花岗烈士和秋瑾、孙中山无异，都是壮怀激烈的革命志士。

蓝衣社成立之初，对内励精图志纪律严明，这在腐败成风的民国政坛不啻是吹入一缕清新的气息；对外则是复兴狂飙廉政风暴，锋芒所指贪官污吏日寇汉奸。就抗日而言，东北义勇军的首领马占山是蓝衣社护送去外蒙古，以从而保留了东北抗日力量的火种。蓝衣社还在长城与日寇血战，损失惨重。江南的忠义救国军也是蓝衣社领导的。日本特务组织对蓝衣社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当然，蓝衣社反共也是很坚决的，曾重创红四方面军，并对苏区进行封锁，给中央根据地带来极大的困难。从政敌的角度讲，蓝衣社确是我们的死敌；但从该组织的自身逻辑上讲，它反共与抗日肃贪的宗旨是一致的。

蓝衣社的命运是典型的物极必反。它应运而生，在一群青年精英的努力下，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国民党三大派系之首。其它两个是CC系和政学系。然而辉煌了短短几年，蓝衣社就衰亡了。其原因很复杂，分析研究是历史学家的事。

蓝衣社的悲剧在于，这些青年志士的爱国热血为独裁者专制主义所利用，成为他们党同伐异的利器。而当蒋介石利用蓝衣社度过内忧

外患之后，又对蓝衣社的发展壮大深感不安。擅长权术的老蒋打击排挤最终解散改编了蓝衣社。

蓝衣社更大的悲剧在于青年人自己。他们最初像反抗恶婆婆的儿媳妇，等到自己做了婆婆，并不因为当年反得辛苦而有所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地压迫下一代。如此循环往复陈陈相因直至反抗越重压迫越深。蓝衣社的悲剧也是旧中国青年人的悲剧。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康有为，又如汪精卫。

蓝衣社的主要人物有所谓“十三太保”（沙陀国王李克用有子及义子十三人，称为“十三太保”，“太保”等于清代的“贝勒”，即“王子”之意），著名的有曾扩情、贺衷寒、酆悌、戴笠、康泽、邓文仪、刘健群等，另外还有潘佑强等几个不著名的人物，其中除刘健群一人外均为黄埔学生。

刘健群在抗战时期因受黄埔系排挤，曾一度出家做和尚（表面的原因是为了失恋）。

曾扩情、刘健群、贺衷寒三人均做过军委会政治训练处处长，主持过部队政训工作（即部队中的特务工作）。

曾扩情于民国二十五年任“西北剿匪司令部政训处长”，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没有逮捕他，他自告奋勇，在西安广播电台广播，号召蒋系军队拥护张副司令、杨主任的主张。蒋介石被释放后，曾扩情也到了南京，上了一个万言书，解释他在西安时行动的用意，在保护蒋的生命，并如何发生作用。蒋介石在呈文的后面批了四个字“无耻之尤”，把曾送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去关了好几个月。

酆悌于抗战初期任长沙警备司令，民国二十七年放火烧毁长沙全城，因此被枪决。火烧长沙城后，谣传放火的目的是出其不意地烧死周恩来将军，因为武汉失守后周将军那时在长沙，而国民党要人则不是到了重庆，就已到了衡阳，放火的命令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与酆悌商定下的，执行者是酆悌。

出事后舆情大哗，蒋介石派员去查办，张治中和酆悌商议，由酆悌承认全部责任，张治中可以从中斡旋，理由是如果两个人都牵涉在里面，就没有人好发言，酆悌一人担当了，张治中就有权发言了。

酆悌同意这个办法，把一切责任承认下来，并在调查报告上签名画押，查办大员马上取出蒋介石的手令来，上面有八个大字：“查明主犯，立即正法。”

酆悌才知道上了张治中的大当，临刑时大骂张治中做了圈套害他（另有人传说：枪决的不是真酆悌，真酆悌放走了。理由是酆悌死后，他的老婆几乎没有哭过。此说不足信，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蓝衣社常做假事情，惯于偷天换日，所以有此传说流行）。

因此，蓝衣社活跃的人物，就只有贺衷寒、戴笠、康泽、邓文仪四人。

蓝衣社的工作，可分为：调查（情报）、行动（监视、禁锢以及暗杀）、组训、筹款四大类，尤以情报与行动为主，筹款则比较简单，除财政部拨给军事委员会的巨额机密费，及向各地方军事、行政长官索取报效（实际类于摊派，如借口举办事业，代募股金，或收买货物，代垫货款等）外，主要就是制造贩卖吗啡、海洛因等毒品。

抗战之前，上海就有两个大规模的制毒机关，一个在上海北郊长江边的浏河镇附近，是蓝衣社直接经营的；一个设在南市保安队队部里面，是孔祥熙、吴铁城、杜月笙经营的，要缴纳一定的利润给蒋介石作机密费用（即蓝衣社特务费）。

后者的开始，是在蒋介石自兼禁烟总监，雷厉风行地禁烟之后，在汉口抄到一批鸦片土，有五十余万两（是四川军阀的，他们贩运这批烟土，没有和蓝衣社合作，所以被抄没了），蒋介石就交给孔祥熙去制造吗啡，孔即转交给吴铁城（那时的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和杜月笙办理。

这个吗啡厂就设在南市一个保安队的中队部，当然十分保险，没有任何人敢去碰它。这个事情很秘密，怎样会暴露出来的呢？

因为上海市保安队（杨虎统率的）不知道浏河的吗啡厂是蓝衣社开设的，想去发横财，把这个吗啡厂抄没了。

后来杨虎和吴铁城知道了，把抄没的东西大部分发还，但“太保”们认为奇耻大辱，就采取报复行为，冲到保安队所保护的吗啡厂去，把毒品和制造机器都搬走了。

这样一来，就闹得满城风雨，上海市知道的人就不少。吴铁城因为他的吗啡厂是蒋介石批准的，当然于心不甘，但蓝衣社却提出证据，说五十余万两烟土早已过头了，过去虽是“奉命”，现在却是私造，制毒贩毒成为蓝衣社的独占副业（抗战中期，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又在川康滇黔各省“严厉禁烟”、没收了二千余万两烟土，结果贴

上“军用品”的封条，运到广东去转销于沿海各省，这次由孔祥熙与蓝衣社合作，没有内哄起来）。

组训工作就是各种“训练团”及部队中的政治训练，其目的有二：一、灌输法西斯思想，加强盲从教育；二、监视并侦察受训人员。他们在“训练团”中常发动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蓝衣社份子常首先发言，把一些官吏痛骂一顿，以引起别人说出心中不满的话，因此判定谁是“不稳”份子，加上种种帽子。

这一工作，主要由贺衷寒、邓文仪两人负责。贺衷寒在抗战以前任军委会政训处长两年多，还兼任“中央新闻检查所所长”一年多（在贺衷寒之前这一职由国民党中宣部叶楚傖兼任），一开口就骂新闻记者没有“国家观念”，是一个极端狂妄的人。

据说他读过很多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什么问题，而是从一字一句中去找“漏洞”（不顾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以充实他的反共理论。抗战后曾任政治部的厅长及第一战区的政治部主任。

邓文仪现任“国防部新闻局长”，蒋军中的政训机构现已改变名称为“新闻处”或“新闻室”，“新闻”两字的意义就可想见。

上面曾说过邓文仪曾干过情报，这一部分工作被戴笠所并吞了。

在这同时，邓文仪还是蓝衣社文化工作的主持者，有一个叫做“中国文化建设学会”的团体，办了几十个刊物，每月的经费达二十万元之多（是民国二十一二年的事）。后因航空署长徐培根火烧飞机场案件，蒋介石派邓文仪去调查，徐培根拿了八万元钞票出来，对邓文仪

说：“飞机场的失火事件确是我有意纵火的，我并对你说真话，我挪用公款去做交易所，本想赚一些钱，不料一次次蚀本，累积到两三百万元，无法弥补，所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飞机机件、机场设施等报销。造假报销的钱除送在交易所扣我用去外，只剩下这八万元。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你收这八万元代我弥补过去；另一条则是你不收这八万元，我就一枪先打死你，然后开枪自杀。你如据实报告，我就有性命危险，同是一死，不如请你陪我一陪，做鬼也热闹些。”邓文仪经徐培根一耍流氓手段，吓慌了，就把八万元收进了，事后报告蒋介石，说：“飞机场因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热蒸发而起火。”但另外有人报告蒋介石，徐培根撤职后，在南昌关了一年左右，而邓文仪也一度失宠，不仅原来已预定的南昌市长没有到手，每月二十万元的文化事业经费也取消了，“文化建设学会”就为 CC 所主持的“文化建设协会”所代替（文化建设协会的实际主持者为后来投敌任汪记中央大学伪校长的樊逆仲云，主要的“理论家”为托匪叶青。叶青在 CC 系统下虽十分卖力，但并不得意，抗战前后转入蓝衣社后，始被胡宗南优待。国民党六全大会时以反共有功被提拔为中委）。直到日本投降前后，邓文仪才逐渐取得重要地位。

情报工作与行动分不开，主要由戴笠负责。戴笠（字雨农）在黄埔学生中班次较低，资望较浅，但实权则最大。

在抗战之初，戴笠的阶级是上校，但他的部下却有不少“少将”，还有经过他保荐而做民政厅长的，当然他是最得蒋介石信任的。

蒋介石对他所以特别信任，其原因之一也是为了他是浙江人。戴笠所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为国民党特务的中心机关，其工作分为下列几方面：第一位的当然是对付革命党派与革命民众，其方法为阴谋破坏与血腥镇压，从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收买威胁、打入内线、做情报、分化破坏，到行刺暗杀，以及勾引极少数败类叛变，还有制造假团体、假冒进步、淆惑群众等，这是阴谋的一套；

另一套则为监视、绑架、非刑拷打、劳动集中营，以至活埋枪杀，这是镇压的一套。关于这方面，大家知道得很多，无庸细说。其次是对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分子、知识分子，或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者，威胁殴打，强迫解职，绑架囚禁，以至于暗杀，如对杨杏佛、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马寅初、马叙伦等。其次就是对付地方势力，那些地方势力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分别，同样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但不愿为蒋介石所并吞，因此内部有矛盾。

蒋特的方法，分为：刺探内情，收买分化，造谣挑拨，配合军事压力，造成内哄，而瓦解分裂之，必要时则加以毒害暗杀，如对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及四川的刘湘。

刘湘的死得不明不白，已成公开的秘密；鲁涤平则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中风而死，明白真相者甚少，需稍加叙述：民国二十四年蒋特刺杀史量才于沪杭国道，蒋介石为掩人耳目，令鲁涤平严缉凶手。

鲁涤平奉令后果真认真查缉，而这个暗杀案做得并不机密，杭州、海宁一带的人民都知道凶手坐的是杭州警官学校的汽车，主要布置这

一暗杀案的是警官学校的教务主任赵龙文（警官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校务主任即实际校长是戴笠）。

这一来，蒋介石和戴笠都慌了，怕重蹈袁世凯刺宋教仁的覆辙（民国二年袁世凯使代理国务总理内务总长赵秉钧、总统府秘书洪述祖布置暗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于上海北火车站，事后为掩人耳目，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缉凶）。

程应将真凶捉到，把赵秉钧、洪述祖等的往来电报和其他证据都抄查出来，加以公布，使袁世凯非常狼狈，结果毒死赵秉钧，洪述祖最后亦被正法），于是先下手为强，将鲁涤平毒死。

鲁涤平的猝死，他的如夫人曾看出疑点来，于是第二天她也死了，说是“殉夫”。再其次是监视嫡系与准嫡系，卫立煌赌钱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蓝衣社中如果那一个人想自己形成一套势力，或代替蒋介石做了比较重要的机密工作，那就要遭杀身之祸。

前者如杨永泰之死，后者如唐绍仪的惨遭横死。

抗战以后，蒋介石为刺探日寇的“和平”条件，叫唐绍仪在上海与土肥原往来，土肥原要唐绍仪“出山做总统”，谈好了许多方面可以“自主”的条件，后来又向北平去劝吴佩孚，要吴佩孚做“副总统”，吴佩孚也敷衍他：“如唐少川上台，我也可以考虑。”土肥原回东京覆命，说“唐、吴均肯出山”，日本政府就命令土肥原来华“导演”这出傀儡戏，而唐绍仪以刺探日本态度的目的已达到，向蒋介石报告了，任务已完，拒绝与土肥原见面。

土肥原无法交代，就通过陈中孚与蓝衣社合作刺唐，而蒋介石正要杀唐以灭口，于是把七十几岁的唐绍仪用利斧劈死。

唐死后，蒋介石政府下了一道褒奖令，但刺唐的凶犯被上海法租界捕房逮捕了，因为是“中国政府机关人员”，以“驱逐出境”送到宁波完事。

为了这件事，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曹某也被蓝衣社暗杀了。最后则为国际情报，除派遣大批特务出外做“见习领事”与“领事”（从民国二十六年开始）之外，没有什么特殊业绩。

以戴笠为首的蓝衣社特务系统，除军统局与中美合作所两个（实际是一个）公开特务机关外，还有几个重要部门：第一是警察，从杭州警官学校开始，逐渐遍及各大都市，这一方面以曾任内政部次长、警务署长的唐纵为第一号狗头，戴笠死后即由唐纵负责。

第二是武装部队，抗战时期为“忠义救国军”，日寇投降后大部分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这一部分原来是抗战开始时戴笠与杜月笙合作搞起来的，绝大部分为地痞流氓，抗日毫无用处，殃民则有余，因此声名狼藉，为了与顾祝同的部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讦，蒋介石曾一度要取消它，戴笠发急了，就求救于胡宗南，由胡宗南推荐马志超当“总指挥”，才算保留下来（抗战时期还有一个“交通监察处”，旅客往来，特别是买飞机票，一定要经它批准，但实际上即由军统局兼办，不过有一个公开名义而已）。

第三是联络参谋与谍报参谋，上自军委会军令部，下至各级参谋处，大部分是军统局可以直接指挥的特务。第四是宪兵，所谓“中央”

嫡系的宪兵团几乎全是特务，不过其中有一部分则和戴笠系统有矛盾（因争权夺利），不能完全指挥如意。

以“铲共义勇队”起家的康泽，资格虽高于戴笠，但他极端死硬顽固，而且专信任他的四川同乡（最相信是同县而又是中学小学时同学的），只要是同乡同学，不论是怎样饭桶，都得到重用。抗战以后就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处长，三青团是他的势力范围。虽然其他部门也渗杂一些康泽系统的人，因为大部分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才，所以作用并不大。

1938年5月18日，蓝衣社按蒋介石“停止一切团体活动”的手谕，在原“两湖书院”旧址--当时的武昌大江中学宣布解体。其30余万成员，绝大部分转入三青团，剩余的大约八九万人，转入一个全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

就是这么一个蓝衣社，当年曾派出大批特工混迹于各电影制片厂。他们有的伪装成左派艺术家修改脚本，有的插手电影广告造谣生事。杀人放火，跟踪绑架，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

5

江青踏足演艺圈正值中国现代文化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为避免政府当局的迫害，左翼电影人以地下斗争的方式，继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江青第一次与电影公司签约原本打算用的是“李云鹤”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她参加革命后，老师给她取的化名。虽然名字是化名，但姓氏是真实的。为慎重起见，左翼联盟的一位领导干部人建议她重新思虑一个新的化名。

于是，江青想到了“蓝平”这个名字。

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只是她比较喜欢的蓝色。她喜欢蓝色的衣服和其它以浅蓝色为基调的东西。

不久，她就要离开上海去北平拍外景。她想到了北平，（北平，寓意“北方和平”，即现在的首都，北京。）于是就取了北平的“平”字。这个平字，同时也含有“和平”的意思。象征着“蓝色和平”。

以“蓝平”为名签署的电影合同，提交上去之后，有人觉得这个名字不够响亮，也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于是为她改了一个字，而保留了原来的发音。这样，和平的“平”就变成了苹果的“苹”。为她改名的就是鼎鼎有名的大剧作家，左联负责人田汉。

江青回忆说：

“1930年早期的电影制作人与我们走得很近。当一个国家处于危机之中的时候，颓废和淫秽的电影根本就找不到市场。群众要求民主和抗击日本。

美国电影仍占主流。几乎占领了中国百分之七十的市场。但门票昂贵，劳动人民买票不起。

这时候，上海出现了一些相对民主的电影。尤其是一些描述劳苦大众电影，如果主题或多或少牵涉到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那就更受欢迎。

但是，制片人不敢直截了当地宣扬抗日。他们知道，如果这么做，立刻就会遭人绑架。

我就曾经遭国民党绑架，被拘留了好几个月。”

江青没有提供更多的关于她拍摄电影的细节。

1934年10月，明星电影制片厂的保守派否决了一部制作了二年的电影纪录片。理由是影片含有“颠覆性”内容。并解雇了编导兼剧作家夏衍。也有人说，夏衍他是“怒发冲冠”，自动辞职的。

据文化部的老人回忆说，夏衍这个人“好糊弄”，反之周扬就不行。说周扬不好糊弄这很有道理，一方面他为人比较严肃，做事严格；另一方面他是湖南益阳人，益阳出的汉子都是魏延邓艾之辈，才华横溢之外棱角分明，容易发生人际问题。

周扬当然也不例外了。说夏衍“好糊弄”并不是说他糊涂，二七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夏衍可不是糊涂人，“好糊弄”是说他宽厚和气，容易接受他人意见。

说到底夏衍骨子里的文人气质浓厚，对于做官是不太认真的，当时有说法讲夏衍与狗肉将军张宗昌有一比。

张宗昌有三不知，是不知道“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

夏衍也有三不知，是不知道“级别多高，工资多少，待遇有多好”。

不知道待遇多好是讲解放到上海后实行配给制，夏衍坐车吃饭都应该公家报销，他要好久以后才知道；不知道工资多少是讲夏衍过日子都靠稿费，刚解放事情乱，有关部门好些日子忘了给他发工资他居然也没发现；不知道级别多高是因为解放后评定职称居然给夏衍定了个“兵团级”，要知道五五年授衔的时候兵团级一共才一百五十多个，其中除了四个少将全是中将上将，自己居然有这样高的级别，夏衍知道后吓了一跳。

说夏衍是兵团级有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解放初期对于知识分子的级别普遍定得比较高，这主要是一个待遇问题，物以稀为贵。

实际的权力是另外一回事。萨爹他们文革期间到旅顺做课题，几个干巴拉瘦的知识分子到部队居然一人给配了一个警卫员，住的地方也极为舒适，两位研究员居然还各给配了一个护士一辆车。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老九们这才发现自己最低也是“县团级”，稍微高一点的就是“地师级”也。要从这个角度说，所谓臭老九“闻着臭吃着香”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只是“闻”的时候多了些，“吃”的机会少了些。

要说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居然登报和人打官司，那肯定是给欺负急了。

夏衍真的登报和人打过一次官司，这个人就是明星的大导演张石川。

夏衍和张石川打官司真是有些希奇，说起来张石川还是夏衍的朋友，而且是挺够意思的朋友呢。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军入侵上海，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打得日军三易主帅，大涨中国人的威风。

战后，张石川拍了一部纪录片《上海之战》受到极大欢迎。这部片子张石川是请了军队来真枪实弹拍的，所以十分真实。

当然太真实了也引起一些问题，比如这部片子的一些镜头就被后来的一些影视作品引为战场实况资料，造成了一些误会。

不过总的来说片子十分成功，以至于蒋委员长也要见一见张石川。蒋委员长召见这位明星公司的总经理，主要目的是要他为江西剿共前线拍摄纪录片。但是两人见面以后，委员长说的两段话却让张石川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一段是好话，谈到日本的入侵，蒋委员长很有勇气，告诉张石川日本人不可怕，中国是有办法的。这句话张石川记住了，所以后来日本人以烧明星公司要挟他当汉奸他也不肯，孤岛沦陷后被迫加入日伪电影公司也只作闲职，不做导演。

后来他说之所以困难之中不下水，原因一个是洪深对他说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可以当汉奸。为了和朋友见面，他得撑着。一个就是有老蒋这句话，他总是对国家有信心。

一段就有些危险了，蒋委员长告诉他共产党很危险，还问他知不知道上海电影界有谁是共产党？这段话可把张石川吓坏了，他虽然贪财，出卖朋友的事情可干不来，只好支吾应对。出来的时候，随行的周剑云见他满脸虚汗，张对周剑云说：带牛字边的事儿可沾不得啊。牛字边？就是“特务”的“特”字么。张石川认为蒋介石是想让他当特务。

难怪张石川出虚汗，那夏衍，虽然身份不公开吧，猜一猜也能猜出是戴红帽子的，就在他明星公司里面搞编剧呢！还有贺绿汀。。。这一干人看着都不那么安分。。。但是张石川的确够朋友，他不但没有出卖其中任何一个左翼的朋友，而且继续让夏衍等人在明星干下来。夏衍是1934年才离开明星公司的。

其实张石川的紧张有些多余，他是有点儿没见过大世面。蒋委员长反共不假，但亲自动员一个电影公司老板当特务还是太夸张。有国民党将领回忆，这位蒋委员长喜欢训话，但讲起话来经常心血来潮，离题万里，以至于国民党庐山训练团的军官们普遍认为不听老蒋训话时候对他的敬意如果有八分，听完了就剩下了四分——足足打一个对折。而老蒋对此一直没有感觉。这次对张石川，大约也是委员长一时跑题了吧。

既然张石川这样够朋友，夏衍还和他打擂台，不是太不够意思了吗？

那是因为张石川太气人了。

原因是两部电影，《前程》和《脂粉市场》。这两部电影都是夏衍编剧，张石川于1933年导演的。

夏衍是共产党，也是出色的文人，所以他写出来的作品如《包身工》都对下层人民充满同情，而且多少有些唤醒民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意思。这一点和同样是出色文人的郑正秋就不一样，郑也同情下层人民，却主张通过办教育，办工厂这类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他是不

讲究阶级分析的，张石川也特别习惯拍他编的戏，两个人珠联璧合。等换了拍夏衍的戏，就怎么拍怎么别扭。

《前程》这部电影写的是一个女演员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女演员为阔少所追求，离开了舞台，但在家庭中却饱受摧残，最终选择了离婚重返舞台的经过。夏衍的深意，是有一点妇女解放的含义在里面的。

张石川也确实是按照夏衍的剧本来拍的，戏拍完了夏衍看看内容全对，就是感觉有些不对味。

原来这出戏经过张石川的再创作，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这位女演员在家中怎样对缺德的丈夫逆来顺受，怎样努力的去维护一个家庭，最后无奈的怀着一颗伤感破碎的心重返舞台。。。看完片子，大家都对男主角恨之入骨。而。。。女演员的独立解放问题呢？好像谁都没感觉到。

不过前面说了，夏衍是个老实人，大度人，这刚跟张导合作，对自己的感觉也有点儿把握不准，也就没多说什么。

但是到了《脂粉市场》，情况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脂粉市场》是夏衍的一部力作，它的主要内容是女职员阿芬在商场里受到资本家和恶势力的多重欺压，既没有办法清清白白的生活，又没有办法追求光明正大的爱情，最后，她终于不堪忍受，选择了辞职出走，融入人民群众的反抗洪流之中。这是一部典型的左翼作品，女性的逼上梁山。

然而，到了张石川手里，这部作品又被拍得有些变味，原因是夏衍写了一个商场的小职员小钱对阿芬的追求，而阿芬因为受到恶少的

胁迫而不敢接受。结果张就把这段大大的拉伸起来，演出了小钱与阿芬的一幕幕悲欢离合，几乎取代了夏衍所要说的阶级，社会这些严肃的主题。

但总的来说这片子还没算太离谱，仅仅如此，夏衍也就忍了。

谁知道片子送到审查官那里，对左翼敏感的检查官觉得这片子有点儿粉红，不肯放行，要明星再改。

一般，片子被审查的扣了，制片的都会有些恼火，而这一次张石川却颇为兴奋。

原因是他本来也对这部片子的剧本有些看法，正愁没办法绕过夏衍这个编剧的动手大改呢。

他又什么看法呢？张后来对人讲过他拍片子的原则和方法——片子开头，女主角要很惨很惨，受欺负，吃苦头，让人看了可怜，这样，才能把看片子的太太小姐眼泪勾出来，要让太太小姐们都哭湿几条手帕他们才肯来看的。但是，也不能一直让她们哭下去，那样以后她们就不看电影了。所以最后结尾一定要好，要让太太小姐们笑着出门，看了高兴她们下次才会买票子。

如此看来好莱坞电影大团圆的模式是张石川发明的呢。

对《脂粉市场》，张石川的看法是把太太小姐的眼泪勾出来是没问题的，但最后让阿芬出商场往人流里一走就算完了太不够味道，不过夏衍就写到这里，张石川也不好意思给他乱改。

现在检查官的话出来了，张大导演如奉尚方剑，立刻不管不顾，按照自己的思路改将起来。阿芬出了商场，不但没有去汇入人民群众，

反而又找了一家公司干起来，很快提升作了白领，然后小钱再来找她，二人成就美满姻缘，还用两个人的积蓄开办起合作商店来！

如此一来，夏衍原作的深邃思想，就算是彻底完蛋了，他是把阿芬逼上梁山，让她必须革命，张石川却在梁山上办了个招聘会，让这女孩子柳暗花明，前途一片光明。

这下子老实人夏衍也吃不消了，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劝张石川无效之后，一怒之下登报声明片子不是自己编的，是张石川肆意篡改，与夏衍毫无关系！

还好，通过这件事，夏衍也算是了解了这个张石川，以后两个人还有合作，完成了如《压岁钱》等精彩作品，只是拍摄的时候夏衍订得格外紧了些，严防死守不让张导再偷梁换柱。

张石川呢？他倒无所谓，有钱赚就行。

这件事，说起来怎么算都是张石川没理，然而，《脂粉市场》经此一改，却卖得很好，成了明星的一棵摇钱树。究其原因，大约当时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如阿芬这样受气的女工女店员恐怕不在少数，而又有哪一个不是期盼着有电影里阿芬那样的好结局呢？

夏衍和张石川，一个告诉大家出路，一个给大家梦想，谁更有道理一些呢？

天晓得。

江青也不晓得。

她只是对我说：

“我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只是在新演员中表现得突出一点而已。我可以选择去基层工作，到工人中去，做他们的（戏剧）导演。当然，是做无产阶级的导演，演工人自己的戏。我也去学校。我做了许多这方面的事情。”

多年来，有人一直在猜疑江青为什么要去演电影？以及她的个人动机？并试图贬低她的电影明星形象。

有传闻说，江青结婚后，毛泽东下令销毁了所有江青出演过的电影。殊不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的谎言。且不说毛泽东会不会这么做，就算他想这么做，可历史事实是，江青演电影的时候，共产党还没有掌握政权。江青是在私人电影制片厂当演员。1950年初，电影制片厂的档案和拷贝，绝大部分被送往香港和其他海外华人社区。

你说，1950年，毛泽东的手能伸到香港或香港以外的地区去么？

实话实说，其实毛泽东是很想看江青年轻时主演的电影的。可国内根本就找不到拷贝，一盘都找不到。主席也就只好作罢了。

传闻，打倒《四人帮》之后，当专案组派人前往香港调取江青早年的电影拷贝和相关资料时，扑了个空。有人先专案组一步，出巨资买走了所有的胶片和文件。只留下一张海报和令人无限的遐想。

就是这唯一现世的一张海报也遭人恶搞，将嘴唇和脸蛋儿涂抹的血红。

30年代的电影明星比江青更为出名的是白杨和赵丹。

白杨，原名杨成芳，中国著名电影、戏剧表演艺术家，1920年4月生于北平。幼年时代因其父母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将她托给奶妈在农村生活。贫境与苦难伴随了她的童年。

1931年其母病故。为了生存，她来到联华影业公司在北平设立的第五分厂的演员养成所，成为该所最小的学员。由于她勤奋好学，进步很快，在无声电影《故宫新怨》中扮演了一个小丫头。不久影厂解散，白杨加入到“苞莉芭”剧团，演出过话剧“乱钟”、“战友”等。不久该剧团也被强行解散。

1934年白杨先后参加了中国旅行剧团和中国舞台协会等剧社，开始了职业演员的生涯。在话剧“回春之曲”、“黎明之前”、世界著名话剧“梅萝香”、“茶花女”中的表演，充分显露出她的表演才华。

1936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二厂成立，经著名戏剧家洪深介绍，白杨与二厂签订合同，主演了她的第一部影片《十字街头》，在影片中她成功地塑造了杨艺瑛这一青年女性的形象。

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与陈白尘，沈浮组成影人剧团，深入人民生活进行宣传抗日救国话剧的演出。1938年，白杨与沈西苓、赵丹、魏鹤龄等电影工作者，来到重庆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拍摄了《中华儿女》、《长空万里》、《青年中国》等影片，此时，她接触到斯坦尼表演理论，“斯坦尼”丰富、开拓了她的艺术视野，激励了她在艺术表演上的探索 and 追求。与此同时，她又在重庆和成都开始了她的舞台艺术活动，主演了“屈原”、“雷雨”、“日出”、“天国春秋”、“复

活”等著名话剧，扮演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使她的表演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被誉为当时中国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

1946年抗战胜利，她回到上海，在昆仑影业公司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新闺怨》、《还乡日记》、《乘龙快婿》等影片，之后，她又去香港参加《山河泪》等影片的拍摄工作。解放后，她从香港回到北京，先后在《团结起来到明天》、《为了和平》、《祝福》、《春满人间》、《冬梅》等影片中，塑造了各种优美动人的妇女形象，她的表演艺术也在国内外赢得声誉。

1957年《北京日报》、《沈阳日报》举办的最受欢迎的影片、演员的评选活动中，白杨主演的《祝福》、《为了和平》都名列前茅，评选的五位最受欢迎的演员中，她又独占鳌头。同年，她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捷克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祝福》一片获特别奖。

白杨的一生，从坎坷中走向光辉，这与她从艰苦的逆境中生存，在成功后保持平凡的心态是分不开的。曾因《《冬梅》一片的拍摄，同周总理、陈毅同志促膝交谈。她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代表了自我，在《祝福》中走向新的高度，在《冬梅》赢得真诚，无论戏中戏外，她都如此“优美”、“自然”、“含蓄”的将东方女性特有的美感，彻底地展示在舞台与银幕上。

她还著有表演艺术专著《电影表演技艺漫笔》、《电影表演探索》及诗文集《落入满天霞》。

80年代还在电视剧《洒向人间都是爱》中塑造了宋庆龄的形象。成为中国影坛上负有盛名，卓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

1996年去世，享年86岁。

赵丹，原名赵凤翱，祖籍山东肥城，出生于江苏扬州，居江苏南通，赵丹于1915年6月27日诞生于扬州，父亲赵子超，时任北洋军阀营长，公馆在东关街，母亲黄秀芝，是当时出名的扬州美女，与个园黄家关系很近。

1916年赵丹两岁时随父母迁居于南通。赵丹的父亲在南通开设影戏院，少时受家庭熏陶，酷爱艺术。中学时代，曾与好友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等组织“小小剧社”，演出过一些进步话剧；毕业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专攻山水。其间参加了美专剧团、新地剧社和拓声剧社，并积极参与“左翼剧联”的活动，改名“赵丹”，深入工厂、市井、学校，演出抗日救亡剧目；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1932年被明星影片公司著名导演李萍倩看中，在无声片《琵琶春怨》中扮演一纨绔子弟，从此成为明星影片公司的基本演员。先后参加拍摄了《上海二十四小时》（1933）、《时代的女儿》（1933）、《三姐妹》（1934）、《到西北去》（1934）、《女儿经》（1934）、《空谷兰》（1934）、《乡愁》（1934）、《落花时节》（1935）、《热血忠魂》（1935）、《小玲子》（1936）、《清明时节》（1936）等二十多部影

片；由于他热爱表演艺术，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加之形象好，极有表演天才，很快成为引人注目的“明星”。

与此同时，他还活跃在舞台上，曾在世界名剧《娜拉》中饰演海尔茂、《大雷雨》中饰演吉洪、《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饰演罗密欧。在影、剧两个方面，均显露出他的艺术才华，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话剧演员和电影明星。

1936年—1937年，主演了中国电影史上经典影片《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在《十字街头》中扮演失业大学生老赵，刻画了这个天真、纯朴、热情，并带有几分傻气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在《马路天使》里，赵丹在表演上有了新的突破，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从生活出发，经过概括提炼，真实而又自然地塑造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淳厚质朴、又爱自作聪明的吹鼓手小陈的形象，受到广泛赞许，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一位艺术大师的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丹加入抗日救亡演剧三队，辗转各地，宣传抗日，并于1939年参加影片《中华儿女》的拍摄。1939年6月，他与徐韬、王为一等前往新疆开拓进步戏剧工作，后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监禁，系狱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上海，主演了影片《遥远的爱》和《幸福狂想曲》，并导演了一部讽刺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下山摘桃”进行掠夺，标榜接收，实为“劫收”的影片《衣锦荣归》。

1948年后，在昆仑影业公司拍摄了《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影片。他在《乌鸦与麻雀》中饰演的“小

广播”肖老板最负盛名，他把这个生活在旧社会都市里的小市民典型，刻划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建国后，历任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影协和中国剧协常务理事、中国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并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他先后主演了《为了和平》（1956）、《李时珍》（1956）、《海魂》（1957）、《林则徐》（1958）、《聂耳》（1959）、《烈火中永生》（1965）等影片，创造了李时珍、聂耳、林则徐、许云峰等熠熠生辉的银幕形象，代表了中国50—60年代电影表演艺术的水平。达到了他一生表演艺术的高峰时期。这一切，跟周恩来的关怀、爱护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之余，喜欢跳交谊舞。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每年赵丹要到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会，或者为电影事业出差，经常应邀参加周恩来举办的舞会。有时周恩来为了让赵丹赵青父女俩在晚会上及时欢聚，还特地打电话通知，并且专派他的警卫员乘坐总理的小轿车来接父女俩。

周恩来经常选赵青为第一个舞伴，然后他就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赵丹、赵青父女俩翩翩起舞。一次晚会上，周恩来把赵丹请到身边谈心。赵丹向周恩来诉苦，说是上海的“棍子爷们”（指当时在上海主管党务、宣传工作的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老要整他：“抓住我一两句话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周恩来鼓励赵丹：“不要害怕，有什么说什么！放心演好

你的戏、拍好你的电影，这就是你最大的任务。我了解你。”为这个，亲友们总是劝告赵丹：“管住你的嘴巴别走火！”但是心直口快的赵丹有时仍然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赵丹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老爷们不要再斗我！不要随便对我们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为国为民拍它几十部杰出的影片……请你一定要给我发一张免斗牌呀！”

1961年周恩来主持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就是说，脱下了反动剥削阶级的帽子，加上“工人阶级一分子”的桂冠。这是赵丹最高兴的时刻。

1962年在北京香山举行的全国电影讨论会上，为了一个艺术问题，赵丹竟然跟周恩来公开争论起来，争得面红耳赤，不肯相让。周恩来只好说：“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某人也是一家之言嘛，两种观点可以同时并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嘛！你赵丹完全可以不同意我周某人的看法，坚持你自己的看法。这是正常的。这是你作为艺术家的权利嘛！”

周恩来总理还喜欢请赵丹一起吃饭，他甚至给赵丹起了一个外号，因为赵丹胃口特别好，吃到最后总是把满桌子的残汤剩菜一扫而光，所以周恩来开玩笑叫他“赵光腩”！

有一年中秋节，周恩来、邓颖超特意请赵丹到中南海西华厅他自己的家里，共桌吃螃蟹。持螯对菊，赏心悦目。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月白风清之夜，赵丹竟然敢说：“总理呀，你知道我是艺术家，不是弄臣！艺术家有良心，不会拍马屁；弄臣尽拍马屁，可没良心哪！”

说得周恩来哈哈大笑：“好！我最欣赏阿丹这豪放不羁的个性！”

白杨回忆道：“阿丹为人奔放、洒脱。性格坦率、爱诙谐。出言机智幽默，有时令人捧腹不已，给人以感染、以欢乐；有时又语多痛快淋漓，往往一针见血，赤诚相见……”

当年江青刚出道在上海演电影时，有人欺负她。是赵丹挺身而出为她解的围。

于是，赵丹死后，又蒙受了另一场更大的不白之冤。

有人说，30年代在上海的演艺圈内，赵丹跟蓝苹的关系好的不正常。

于是，人们便生出了许多正常的想法：

赵丹跟蓝苹一定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6

江青的电影生涯与中国共产党 1935 年推行的统一战线政策密不可分。

民族拯救协会要求各无党派人士紧密地团结在左联周围，要求所有作家和艺术家，将民族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不可直截了当地暴

露和揭发国民党政府的虚伪的嘴脸，目的在于唤醒所有的爱国之士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来。

此后，电影院上演的电影只能通过间接的风格，来表达对国民政府的不满。

江青出演的第一部电影《狼山喋血记》，就是以寓言的方式，间接地表示了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的不满。

故事情节生动感人：

狼群威胁着村民们的生命，老张主张只有打狼才能过上安心日子，李老爹和女儿小玉相依为命，茶馆老板赵二不主张打狼，猎户刘三的老婆也不让丈夫打狼。

赵二先生的儿子哑巴和老张等人一起上山打狼，但他们因为无人指挥一只狼也没打到，老张还误伤了小玉，赵二先生因此幸灾乐祸。

一天，李老爹去镇上收帐回来的途中受到狼群攻击，等到村人赶来时，李老爹已经伤重死去，狼群窜入刘三家咬死了刘三的儿子，他们的死激起了大家的愤怒，但赵二先生还只是求神拜佛，哑巴和大家一起与狼群搏斗。

哑巴在临死前对着父亲说了一生唯一的一句话：

“打狼！”

儿子的死使赵二先生醒悟过来，他拿起枪和大家一起参加战斗。

电影题材取自工人作家沈浮写的《冷月狼烟录》。由著名剧作家费穆改编成电影剧本。

费穆，字敬庐，号辑止，1906年生于上海，1951年病逝于中国香港。中国早期电影著名导演，代表作有1932年指导的《城市之夜》，1936年指导的《狼山喋血记》，1948年指导了《小城之春》。

费穆(1906年10月10日—1951年1月31日)是中国现代一位有卓越才能的电影导演。

他对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艺术手法和对电影写实的艺术特性，都有精深的理解与把握，并在创作中努力探索两者的完美结合。他的导演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他善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和特征，特别擅长以生动的细节，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并调动电影从各种艺术因素为塑造人物服务。因此费穆执导的影片“另成一派，与众不同”。镜头凝炼，构图优美，节奏缓慢，清丽淡雅。他拍摄过《城市之夜》、《狼山喋血记》等10部故事片，其代表作为《小城之春》。这部描写一个家庭情感波澜的影片，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和电影化的作品，它表现了一种具有普遍的人的感情、道德意识和民族的心理特征、行为方式，这种表现又寄寓于一种淡雅、优美、精致的电影形式之中，使人性真实与艺术美感受到了和谐统一。这部影片在80年代被海外影评家评为中国电影十大名片之首，为中国电影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1916年费家迁居北京，因长年苦读，致左眼失明。后开始接触电影，撰写影评，办电影杂志，翻译英文字幕和撰写说明书。

1932年至上海任联华影业公司导演。同年执导了《城市之夜》，反映人民疾苦，这部电影充分显示出他的导演才华。之后，他又陆续导演了《人生》、《香雪海》、《天伦》。

1936年由他导演完成影片《狼山喋血记》，被认为是国防电影的代表作。抗日战争爆发后，费穆拍摄了《北战场精忠录》。“孤岛”时期，导演了《孔夫子》、《世界儿女》及京剧戏曲片《古中国之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后，费穆转向戏剧舞台。抗战胜利后重返影坛。

抗日战争爆发后，拍摄了宣扬同仇敌忾、团结救亡的《北战场精忠录》。“孤岛”时期，为民华影业公司导演了《孔夫子》、《世界儿女》及京剧戏曲片《古中国之歌》。在当时内容平庸、粗制滥造的“古装片”充斥银幕的情况下，《孔夫子》不失为一部颂扬浩然正气，鄙夷奴颜媚骨，制作严肃的作品。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后，他凛然拒绝与敌伪合作，转向戏剧舞台，参与建立上海艺术剧社，后又创办新艺剧团和国风剧团，导演了《杨贵妃》、《秋海棠》、《浮生六记》、《清宫怨》等话剧。

1947年，他执导了由京剧大师梅兰芳主演的戏曲片《生死恨》。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他与梅兰芳配合默契，对写意与写实的统一、传统艺术程式化的表演与电影艺术的表现方法的有机结合，以至布景的处理、道具的使用，均作了有益的探索与大胆的创新，达到了建国前戏曲片拍摄的最高水平。

1948年，他导演的《小称之春》集中体现了他对于电影本体的精深理解和在艺术表现上所具有的独特的色彩。他善于刻画人物、发掘人物的性格特征，特别是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底蕴，更是描绘得细致入微，开启了在中国电影史上比较完整的散文结构、诗话电影的先河，

成为一部经得起风雨洗刷、时间检验的艺术珍品。《小城之春》和他导演的其他影片，构图优美，镜头凝练，节奏舒缓，韵味深长，各种艺术元素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1949年5月去香港，创办龙马影片公司，执导影片《江湖儿女》，片未竟而病逝。

费穆凭借《小城之春》开启了中国诗化电影的先河，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开始发现费穆，认为他把中国传统美学和电影语言进行完美的嫁接，开创了具有东方神韵的银幕诗学。

《小城之春》的导演费穆被尊为“中国现代电影的前驱”。他的素养可称学贯中西，法文非常流利，也通英、德、意、俄等外语，博览群书，喜爱中国诗词、古典文学作品并造诣颇深。费穆是儒雅的、有深厚人文情怀的导演。人们说，“费穆有三多：看书多、看事多、看影戏多”。

1933年，费穆拍出了处女作《城市之夜》。当时就因其艺术精湛、风格独特为人注目。在国内，他第一个在默片中配上民族音乐，第一个拍彩色片——梅兰芳主演的《生死恨》。

1951年，费穆在香港抑郁辞世。

作为知识分子导演，费穆尊崇独立思考的能力，维护艺术理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既不媚政治，也不媚俗，始终如一。正如前苏联电影理论家弗雷里赫评价萨特说，“始终如一并不意味着像一块铁板。始终如一是一个道德上的概念”。

《小城之春》是费穆的颠峰之作。据影片编剧李天济讲，费穆是按苏东坡《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意境和韵致构思全片视听形象的。词中写道，“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声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词境中的哀怨感伤，黯淡怅惘，化为《小城之春》的淡墨山水小品，苦涩的茉莉香片。“色淡而隐然可见内里颜色，味苦正如离乱年代坎坷人生”。费穆拍片力求完美，速度一向较慢，而如此细致精美的《小城之春》只拍了三个月。费穆带着同病相怜的深切感受把它呈现在观众面前，几达物我两忘、得心应手的澄明心境。而作品的气韵，必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疆界。

费穆说，“必须是使观众与剧中人的环境同化，如达到这种目的，我以为创造剧中的空气是必要的”。此中“空气”，即为“氛围”。

影片中寂寞萧瑟的小城，残破颓败的家园，杂草漫生的蜿蜒小道，让人“触目愁肠断”。而三角恋情中一双男女“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含蓄蕴藉，辅以徐缓节奏，低沉情调，看来凄凄惨惨戚戚，却闪烁着颓靡之美。特定历史环境中，一幅关照人们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和文化心理结构的灰色画卷。影片中多两人或多人镜头，镜头空间完整深远，昭示导演复杂多义犹疑不决的态度。

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说：“人有人的命，戏也有戏的命”。

1948年的《小城之春》显然生不逢时。

散发着颓靡风格的远离社会主流的知识分子情感纠葛的作品，与奔腾活跃的时代脉搏南辕北辙。

影片公映时，有评论说，“《小城之春》是一首真正的古中国诗——温柔醇厚。但春光局促于颓域的一隅带着一些狭窄、保守、陈旧、隐逸的气味。”这还是最温和的批评。

有评论者称它为“东方电影”的经典，“体现了我们东方人对感伤经验、感伤文化的态度……迷而不乱，恨而不惘”。有评论者认为这部“诗情电影”是中国的先锋电影，这种“细腻而诗化的心理片传统”是由费穆开创的。

影片隐隐透出的雅文化性，整体的压抑和封闭感，得益于费穆精练的电影语言和超前的电影思维。故事虽然是情节剧的重要叙事模式，叙说方法却自中国古文化传统中寻找理想。精到的人物心理刻画，恰到好处的情绪渲染和环境气氛营造，十足的中国古典美学写意风韵。

抗战胜利不久，京剧“伶王”梅兰芳复出，重返舞台，在沪上引起了轰动。在庆祝抗战胜利艺术公演中，著名电影导演费穆与梅兰芳的一次合作，至今仍传为美谈。

1945年夏，山河光复，举国欢腾。梅兰芳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剃掉胡须，准备重披歌衫。消息不胫而走，重庆、北平、上海等地的戏迷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这年金秋时节，上海各界筹备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组织艺术公演演出委员会，推举上海闻人杜月笙主持公演。委员中有商界巨子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费穆担任演出委员会委员兼演出组副组长（组长为杜月笙）。

费穆是中国电影界最著名的导演之一，所摄《小城之春》被选为“中国十大名片”之一。他还是中国戏剧界第一位提倡为话剧作音乐伴奏的人。

那年在研究庆祝抗战胜利艺术公演剧目和演员时，杜月笙、费穆等首先想到了大名鼎鼎的梅兰芳，大家一致鼓掌通过。

杜月笙是京剧票友，与梅兰芳相识多年，由他出面相邀。梅兰芳欣然应允，不开任何条件。制作节目说明书也是“重头戏”，这是演出包装，各方都很重视。费穆自告奋勇，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抒情散文，祝贺梅氏复出。文字优美，言简意赅。他把京剧比喻为“中国画”，赞美这两门国之瑰宝有异曲同工之妙。笔锋一转，赞梅兰芳是傲霜斗雪、艳丽绝代的梅花。文中写道：梅先生铁骨冰心，表现了艺人的劲节。今日东山再起，实给人无限的喜悦。此时此刻，梅兰芳沉浸在幸福的暖流中，倾心走笔，画了一幅梅花图。那没骨的枝干遒劲挺拔，曲折蜿蜒；那一圈圈花朵疏密有致，风姿绰约，迎春怒放。楷书题款，字如其人，端庄秀逸。此画与费穆的祝词叠印在节目说明书宣纸上，黑字红梅，名臻其妙，珠联璧合，组成了一幅完整的书画作品，受到戏迷的青睐。这本 16 开数十页的节目说明书，今日已是珍贵的收藏品。

告别舞台 8 年，当时又不能吊嗓子（怕被日寇汉奸知道逼他出来演出），导致演唱荒疏，声调总是拔不高，梅兰芳为此忧心忡忡。就在他殚精竭虑之时，京昆名小生俞振飞突然来访。

30 年代，他与梅兰芳曾长期同台演出，结为挚友，情谊甚笃。俞比梅小 8 岁，谦称梅为“畹华兄”。促膝长谈，梅兰芳吐露了嗓子欠火

候的苦恼。俞振飞是文人“下海”，思维敏捷，出了一个主意。他操着一口苏州话，慢条斯理地说：“畹华兄，你不是也擅演昆剧吗？昆剧曲调细腻婉转，优美柔和，何不以昆剧打泡！”梅兰芳觉得此话有理，他感叹地说：“近年来演唱昆剧的人很少，实在可惜。”梅兰芳以前的琴师都在北平，一时无法南下，演昆剧谁来吹笛？俞振飞毛遂自荐，表示愿吹笛助演。他肯屈尊伴奏，梅兰芳感激涕零，一再道谢。两人商定：演昆剧折子戏《费贞娥刺虎》。

费穆任艺术公演演出组副组长，是实际负责人。梅兰芳要改演昆剧，前来向他征求意见。费穆听后，满口赞成，他说：“京昆艺术相通，本是一家。你演昆剧，我很赞成。以前我观看过你和俞振飞合作演出的昆剧折子戏，你们演得很好。《费贞娥刺虎》是一出宣传爱国思想的剧目，演这出戏很有现实意义。”费穆和梅兰芳在抗战时期都不愿当日寇的“顺民”，一再拒绝与日寇合作。今日梅兰芳要演出《费贞娥刺虎》，与他见解相同，一拍即合。

费穆在安排剧目出场次序时，让歌曲合唱、古乐独奏、舞蹈等剧目先演，请梅兰芳唱压台戏，可谓心灵相通，配合默契。

1945年10月11日晚上8时30分，上海市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在兰心大戏院举行艺术公演。观众如潮，座无虚席。在许多剧目献演之后，深夜时分，梅兰芳登场亮相，使演出达到了高潮。

梅兰芳时年52岁，剃去胡须，精神焕发，加之身材匀称，长得俊秀，化装后而使岁月倒流，韶华再来，看上去如同青春丽人一般。随

着悠悠清脆的笛声，梅兰芳碎步拂袖出场，全场观众不禁心头一热，送给他一个碰头满堂彩！……帷幕降下，观众久久不愿离去。

为回报热情的观众，一个多月后，梅兰芳在美琪大戏院连演 10 天昆剧。同年冬日，梅兰芳完全恢复了嗓子功能，决定重演京剧。

1946 年春，他先后在北京电影院（今上海音乐厅）、中国大戏院表演自己的京剧代表作，第一场推出折子戏《宇宙锋》。费穆几乎场场必看，并撰文在报刊上介绍梅氏的艺术成就。

1951 年，费穆驾鹤仙逝，享年 45 岁。梅兰芳闻讯十分悲痛，逢人便说：“费氏不仅是大导演，他对电影、戏剧、音乐都很精通，文章也写得好，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英年早逝，太可惜了！抗战胜利后他与我的一次合作，使我终身难忘！”

跟很多人一样，喜欢费穆是从多年前看《小城之春》开始的一一女主角韦伟那份含蓄却又带点不避嫌疑的风情，她那冷冷的、梦呓似的独白以及充满弦外之音的对话……欲望本来是被尘封在破败家园的瓦砾堆里动弹不得，却在此起彼伏的“唔”、“哦”和有意无意的眼波流转之间被解了咒似的，泼泼如鱼虾初出网。

费穆和女性似乎特别亲近，他的头三部作品《城市之夜》（1933 然后）、《人生》（1934 年）、《香雪海》（1934 年）都刻画了女性的生存状态。三片的女主角皆阮玲玉，想来断非纯粹的商业考虑，更非偶然。阮玲玉身世凄凉，其坎坷的一生与《人生》中误堕风尘万劫不复的可怜女子极为相似。对阮玲玉的悲剧，费穆并没有象其他人

那样，痛心疾首地委罪于“人言可畏”的社会，倒是小心翼翼地潜入阮玲玉那脆弱而又荒芜的内心世界。

费穆与角色之间的这份彼此相契、知遇知心的触觉，在《小城之春》里尤其显得肌理细腻，体贴入微。从娜娜柳枝轻柔的镜头运用到娉婷曼妙的形体活动，从溶溶月色的心猿意马到摇曳我的情不自禁，泄露了春色的兰花到一扇又一扇心灵之窗，从败心死的姜枪到洞彻红烛的涉涉……每每都那么令人心醉，令人动容。身处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听惯了铿锵有力的声音，每每将艺术家们对美的追求视为浅薄轻浮，将委婉宽容的胸怀曲解为苍白病态，将文化的观照贬抑为政治的反动。回首费穆走过的创作道路，我们会发现他那“美的历程”是一生一世的事。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不徐不疾地稳步向前，择善而固塘，且最终能够自我完成，这在深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中国电影史上、确是异数。

费穆与孙瑜、吴永刚都是三十年代联华影业公司旗下的导演。细算起来、孙瑜说得上是老大，他比费穆年长六岁，费穆于 1933 年完成他的处女作《城市之夜》时，孙瑜已拍过了《潇湘泪》（后改名《鱼叉怪侠》）、《风流剑客》、《故都春梦》、《野草闲花》、《自由魂》、《野玫瑰》、《火山情血》等多部影片，并不同年推出了《天明》和《小玩意》。但是感觉上，费穆倒更象哥哥，他的作品深沉世故，与孙瑜电影中的活泼天真，对比强烈。吴永刚则比穆年幼一年，他于 1934 年拍出他的第一部影片《神女》，风格沉郁凝练，气质上二人倒比较接近。

三人之中，当数孙瑜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最深。他早年于清华大学毕业后，便公费负美国，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西方接受电影专业训练的导演。他认为“在目前（即 30 年代）我们所需要的是接受欧美文明、推翻一切旧道德。……我们在电影中应写出压迫都与被压迫者，而被压迫者应当反抗。”但是他天生一片冰心。爱从善良正义中看到光明。

当年不少评得称他为“空想主义者”，却忽略了正正是这份单纯令他排除了现实生活中种种杂质和噪音的干扰，创造出许我童话般美丽的人物来。吴永刚生于一个旧知识分子的家庭里，自幼生活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童年常常是孤独寂寞的；但他家中藏书甚丰，形成了他无书不看的习惯，从唐诗到“五四”以后的新文艺广阔的天地。

相对于孙瑜，吴永则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内向、敏感、直觉锐利，《神女》和《浪淘沙》显示了他对事物的本质比对现象更为关注，而作品所显示出来的内省深度在中国电影里亦不寻常。可是他出更容易受到伤害。时代的戾气令他没有足够有信心将自己的探索发展下去。不进则退，吴永刚是一个夭折的天才。

费穆出身书香门第，虽然他没有晋身过最高学府，却勤于自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素有修养，而他中学时期就读于法文高等学堂，令他对西方文化亦早开眼界。费穆家中长子，自幼和母亲特别亲近，兄弟四人的关系亦和煦敦睦。

少年时，他是典型的文艺青年，看外国电影，写散文影评，却能从容地接受父母的安排，与素未谋面的巫梅小姐结为夫妇而无怨无悔。

但是他也不是毫无原则地盲从家长之言，他放下安定的文书工作跑去拍电影，便要面对来自父母家庭的压力。

在伦理与自我，传统与现代之间，费穆似乎自乎其上，其电影世界便充分反映了他源于小康又超乎小康的伦理观念，其电影风格更体现了他那立足于传统而又与现代接上头的美学追求。

在费穆的作品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期的影片是《天伦》（1935年）。现存拷贝是1936年发行美国的版本，由美国片商得新剪接翻印，将下四本缩为七本，音乐重配，字幕也进行了修改。

由于剪接过度，很多地方连戏也接不上了，幸而尚存原来的剧本，可以填补不少空漏之处。

影片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精神为出发点，一方面描写了新旧交替三代父母子女的伦理关系，却又不局限于一家一室，而是将孝悌之道推及广义的人类之爱上去。

原剧本的线一节，孙儿玉堂为了医治重病的祖父礼庭，亏空了孤儿院二百元，礼庭得悉后，当着满堂的孤儿，指责下堂的行为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们吸食民脂民膏来孝敬自己的父母没有两样。

最后玉堂自首，礼庭在妻子、儿孙和众孤儿的默祷中含笑而逝；《天伦歌》声响起。论胸襟，这个结局当然比现存版本中的儿女孙儿都鸟倦归巢一家人团聚来得博大深厚了。

早于《天伦》的《人生》，可说是《天伦》的原形，它以阮玲玉的沉迷于七情六欲而终至不能自拔来衬写出许多不同的人生面貌，特别是林楚楚那大地之母般的宽容温厚。当年有舆论批评《天伦》，《天

伦》的父权意自然显得保守和要领化，罗明佑的影响肯定不少，但是在题旨上还是与前作一舫相承的——费穆是希望以切合孔子精神的大同理想去感化道德败坏的现代社会，而不是苟地回归到虚伪的教悌忠信上去。

当然若燕的处境也是可以理解的。外而面的世界繁花似锦，正值青春少女的她又怎耐得住这份诱惑呢？正如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南往着一种新形态的生活，不愿再留在那枯燥呆滞的旧环境里，那种焦虑不安是极为自然和不难想象的。

只是费穆比很多同辈人清醒，他看到了不顾后果地前进的危险，却也同时明白历史的快车不会放缓，让人有前顾后的从容。若燕的角色令人想起《小城之春》里的玉纹，大家都同样生活在一个纹风不动的封闭环境里。

在《天伦》里，费穆很明显是站在礼庭的角度去看人海变纪、同情着他，并一厢情愿地幻想儿孙们都回到自己身边、分享他的理想。

十多年后，若燕已变成心如止水的玉纹，她不再生活在老父的庇荫下，倒反过来要照顾患病的丈夫，这回，费穆将观看人生的任务交到了玉纹的手里，我们随着她那浮云般的思绪到处游移，有时候在破落萧条的家园里，从一个厢房到另一个厢房，有时候在透迤起伏的旧城墙上，漫无目的地溜达。

“他说他有肺病，我想他是神经病。……我没有勇气死，他，好象是没有勇气活了。”

平缓得如一池死水的独白，道尽了礼言玉纹这对离群索居的夫妇心境，大概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写照吧。

相对《天伦》，《小城之春》的视野更广、胸襟更阔、袁怨更深。旧情人章志忱的突然到访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另全家人都活过来。家里的小妹妹是早已向往外面的世界，玉纹也禁不住吹皱一池春水，就连礼言也开始走到阳光里去了。

《天伦》里的外间世界只有颓靡淫佚，而礼庭则是一个力挽狂澜的孤独“圣人”；《小城之春》里的外面世界是是怎么模样，我们不知道、但它依附在章志忱身上送来的却是阵阵清凉的春风。

费穆看到了历史潮流的不可抗拒，却也很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归在哪里。他比以前更包容，也因而更悲凉。在人人都兴高采烈地走向“美丽新世界”时，他却如玉纹夫妇一样，轻轻抖落身上的尘埃，收拾断井颓垣般的心情，在旧的基础上重新出发。

7

左翼批评家挺身而出，抨击国民党的媚日卖国行径。

其中30名激进分子，进而组织了一个新的社会团体——艺术家协会。新组建的团体，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秘密组织。其成员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其中就有曾向江青求婚遭拒的张肯。另外还有电影制片人陈百芝、蔡楚生和李素。电影演员兼电影评论家唐纳（化名：马季良）。

唐纳1914年出生在苏州，原名马骥良，从影后曾用名马季良、马继良、马耀华，在上海从事电影评论后开始用笔名罗平。

唐纳则是他使用最多、影响最大的笔名之一。

唐纳爱好文艺，喜看电影、话剧，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中英文俱佳，也是一位篮球健将，身手矫健。在求学时，写影评、剧评，在《晨报》、《申报》上刊载，有相当知名度，参加夏衍主持的影评人小组，他加入电通影业公司，担任编剧和演员，并主编《电影画报》。

那时，蓝苹（原名李云鹤，江青曾用名）从山东济南来沪，在影剧界活动有年，她加入剧联的无名剧社，以主演话剧《娜拉》（易卜生名剧）获得好评。她也加入电通为演员。蓝苹与唐纳同年，爱出风头，夸夸其谈，但也学识渊博，胆识过人。他俩一个爱出风头，一个风流倜傥。两人在一起时，倒也有话可谈。

“八·一三”抗战爆发，唐纳担任《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奔走于东部战场。其后唐纳到了陪都重庆，一度在英国新闻处工作，还为一家当地报纸主编影剧副刊。

在重庆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唐纳与安娜（陈润琼）邂逅，安娜是一位外交家的女儿，精通英、法文，担任英文《自由西报》记者，两人一见倾心，情投意合，因而论交。

唐纳仿西方风俗，每天向兰心慧质的佳人送上一束鲜花，经常去西郊虹桥俱乐部度美好的周末。后来唐纳到香港时，安娜在纽约，两地书不断。1952年，唐纳和安娜在法国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谈情说爱的时光长达7年之久，彼此相知有素。不复早年那么少年孟浪了。

1947年5月，《文汇报》因支持爱国学生运动及正确报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实况，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停刊。

女记者麦少楣被中统特务非法逮捕坐了黑牢。

唐纳、孟秋江等人的名字也上了黑名单，唐纳不得不去香港避难。

《文汇报》不接受国民党的无理要求，断绝了在上海复刊的打算。

于是，香港《文汇报》在1948年9月9日诞生。

当年的编辑部，编辑、记者、校对不过二十来人，除了香港有寓所的外，大都住在云咸街36号二楼的两间租借的集体宿舍里，临街的一间小房，徐铸成和马季良对榻相居。

当时，宋云彬的《中国近百年史》在香港发行，唐纳挤出时间来阅读，还作了眉批，好用功啊。他期盼将来能出版一部实事求是的中国近代史。

1948年12月，唐纳提出要离开香港到美国去，担任《文汇报》驻联合国的特派记者。

后来，唐纳和安娜在法国开设的一家中餐馆。按照法国的规定，年逾60岁的店主，不能再经营了，唐纳退下来，店务由安娜打理。

真想不到，就是这一年的秋天，他一病不起，竟成永诀。终年74岁。

唐纳是一位爱国文化人，报坛前辈。他与陈润琼的女儿，他取中文名为马忆华。在忆华学的是医科，如今也是一位有经验的医师了。

唐纳风流倜傥，身边美女如云。

下面的一段文字，便是曾经与之有染的一位女友的回忆：

“我要说的是唐纳是用着怎样的方法在热恋着我。他是在用同时爱着别人又在热恋（？）着我的方法！那是在“电通”的时候，我还没有和他恋爱之前，那时我们是好朋友（什么公司的同事以及他的朋友），都知道他那时在爱着一个女孩（为了不要牵上别人，恕暂不提名）。后来，他同我恋爱起来之后，我曾问他这事。可是他说那是个烟幕弹，是为了怕人知道他在追求我。对一向不曾怀疑过爱我的人会对我说谎的我，这事像一颗流星在心上一闪就过去了，没在心上留下一点痕迹。可是在去年（1936年）的“三八”节，那时我们是很穷困的，同时我在病着，可是为了青年妇女俱乐部的游艺，我是带病在大冷天里跑着，我带着病上台。因为一点儿误会，朋友们都不来帮忙了，事情是更加繁重了。我就在一种异常痛苦的情绪下干着这繁重的工作，游艺会终于在几个朋友的努力之下结束了。可是我，我也毁了！我单独的，带着很高的热度和一个灌了铅一样重的头，坐了一部黄包车回家。那时我们住南洋路。回到家忘了是为了找什么，在桌子上发现了 he 写给别的女人（在“电通”时所追求的那位）的情书及那位姑娘给他的情书。啊，天哪！你们想象得到一个人会有那样的痛苦吗？朋友们不谅解，病，再加上爱人的不忠实，熔成一枝巨大铁棒，迎头痛击了我！当我醒过来，给他留了一个条子就走了。我没有地方去，我跑到白天排戏开的一个房间里。因为我知道俱乐部的朋友们会来，他们是会替我想办法子的。等了一会儿，门开了，进来的是唐纳。他要我回去，

我说既然这样，我们没有再在一道的可能。可是他哭了，哭得哀痛极了！他说就是有什么回去说清楚了再分手，在那时我怕在旅馆里闹出什么不好的事来，我就同他回去了。可是我跟他说好，没有再同居下去的余地，等天亮了我就走。啊！我永不会忘记他哭的那可怜的样子！后来他逼着我说原谅了他，可是我不开口。他回头就走了。因为他走的神气很不对，我跳下床，在外间桌子上发现了他留的条子，大意是他要死去。在一种惊急的情况下，我拼了全力跑到外边，追上他了，要他回来。可他问我爱他不，原谅他不，天哪！在一个要死的人跟前我说什么呢？我说我爱他，我原谅了他！只是没想到后来有人将唐纳二次殉情自杀的账算到了蓝苹的头上，叫我又恨又气。就这样从那天起，我就挣扎在40度左右的热度里，我胡说，我捶床，我骂人，我要疯了啊！感谢唐纳那时是很好的看护过我。为了穷，他伴我到他家，在苏州他的一个亲戚家里，我躺了将近两个月。”

现在读来，依然感人。

唐纳生性风流，但决不下流。

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唐纳毅然上前线，后转移武汉办报。

1941年他到陪都重庆后，又出任过昆明货运专员、英国驻华使馆译员等多种工作。

1945年8月下旬，作为国共会谈重要联络人的张治中将军筹办一次欢迎毛泽东的桂园酒会，唐纳收到了张治中的请柬。当天中午，唐纳特别整理了发型，又穿上了他只在公众场合才穿的那套雪白的笔挺西装欣然赴宴。

唐纳发现被张治中请来赴宴的都是他认识的重庆高官和名士。他忽然感到有些不合时宜，想离开这让他憋闷的宴会厅时，忽听楼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众人都起立鼓起掌来。唐纳见一位在报上经常见到的伟岸身影，已在张治中伉俪、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陪同下，快步从二楼上走了下来。

唐纳急忙往客人的后边让去，他不希望与毛泽东直接见面，只求远远打量一下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毛泽东已经依次与前来赴宴的客人握手，走到神色紧张的唐纳面前了。

主人张治中上前，指着唐纳对毛泽东介绍说：

“润之先生，这位就是在上海报上经常发表文章的唐纳先生。”

“哦，我记得了。”

毛泽东那锐利的目光越过众人，凝视起唐纳那张国字型的脸，然后紧紧握住唐纳的手，说了句让唐纳深感意外的话：

“和为贵！”

唐纳忽然感到自己在这位伟人面前的渺小。而毛泽东很快就离开了他，继续沿着大厅向前走去，与张治中请来的其他客人见面握手去了。

没想到毛泽东一句“和为贵”，让旁边的记者捕捉到了。于是，便生出了有关他与毛泽东的妻子，当年在上海与女演员蓝苹一块儿演戏时，许多该发生或不该发生的绯闻来。

记者们当初的目的，旨在诋毁毛泽东，打击共产党。没想到多年之后，打倒了“四人帮”，却让专案组的人捡了个大便宜。藉此想象出更多、更精彩的“爱情”故事来。

1938年夏，唐纳写出了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演出后获得了各界好评。就在此时，他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同年10月，他们经香港返回上海，不久生下一个儿子。

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纳离开上海赴重庆。陈璐和他们的儿子则留在了上海，后来陈璐改嫁了一个盐商。在和陈璐分手后，唐纳在数年中一直独身，忙于写作。

1945年上半年，他才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他们一度在重庆打得火热，但在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又告分手了。

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唐纳又回到了上海。在《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邀请下，出任《文汇报》的总编辑，当时的总主笔是徐铸成，副总主笔是宦乡、陈虞孙。

1947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唐纳应邀出席。

当时，《自由论坛报》的一位女记者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令他顿生爱慕之情。

这位女记者是国民政府前驻法大使陈的三女儿陈润琼，她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也很纯正，谈吐非凡，举止端庄，堪称才貌双全。

唐纳对陈润琼一见倾心，而陈润琼却没有很快作出回应。于是，唐纳开始了一番苦心孤诣的疯狂追求。

1949年，陈润琼赴香港工作，唐纳也调往那里，出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

1949年2月，陈润琼去美国到联合国工作，唐纳也随着到了美国。他先在《纽约日报》社供职，后又到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

1951年，陈润琼来到巴黎，唐纳照样跟踪而去

唐纳如影随形，紧盯不舍，而且每天都给陈润琼献上一束花，同时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这一份痴情，使陈润琼深受感动。

渐渐地，她发觉唐纳不仅富有才华，而且为人善良，极重感情。

1951年，陈润琼终于答应了唐纳的求爱要求，两人在巴黎举行了婚礼。

从此，唐纳“改邪归正”。唐纳的感情才最终有了真正的归宿。在巴黎，这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了饭店。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到后来“京华饭店”，再到“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越做越红火。

陈润琼不仅善解人意，而且为人精明能干，善于经营，是唐纳名副其实的“贤内助”。

1979年唐纳退休后，饭店便交由陈润琼全权经营管理。

此后，唐纳身边再无其他女人。

上海新兴中产阶级发言人并不太担心激怒日本，他们更关心的是电影制作成本和视觉效应。他们往电影里加了些“性”色素，称之为：“软”电影。尤其重视能否勾住妇女们的眼球，让她们产生一种“看电影，

就像在吃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对男性观众而言，则是骄奢淫逸的肉和大腿，更好的胸部曝光和更诱人的妆。

虽然《狼山喋血记》是获正式批准上映的，但随后在1936年秋天即被国民党和英国国际制裁委员会所禁演。相关剧作家和电影制作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欲加之罪”的政治迫害。

一些史学家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赞扬了蓝苹扮演的农妇在失去孩子之后，终于觉醒，加入了打狼的队伍。她的表演也深受观众好评。

江青出演的第二部电影是《王老五》。电影故事取材于现实生活。主人公王老五是一个年过35岁的贫穷的单身汉，是一个有“良心”的劳动人民，只是政治觉悟不高。

穷姑娘老父去世，无力安葬，王老五仗义相助，才博取穷姑娘的好感，终于以身相许。

婚后，他俩生了四个儿女，是以家庭生活益窘。艰难的生活压得王老五喘不过气来，只能依靠酒精求得一时的麻痹。1932年1月，日本袭击上海，加剧了他的抑郁症和酗酒，家庭生活迅速恶化。

不久，一二八战起，汉奸工头企图收买王老五纵火烧毁棚户区。王老五受骗，拿着手榴弹正要放火时，突然察觉工头残害棚户区贫苦居民的罪恶阴谋，高呼抓汉奸，将手榴弹向工头掷去。工头开枪击伤王老五，反诬其为汉奸，纵火烧了王老五的棚屋。王妻和孩子们逃出火海时，工头正煽动众人指骂王老五为汉奸，王妻竭力为丈夫辩护。这时，火光引来敌机掷弹轰炸，棚户区被毁，王老五也被炸死。

王妻在血泪交流中抬起头来，满怀深仇大恨，将孩子们搂在怀中。

说起电影《王老五》，不能不提及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此剧的原作家蔡楚生。

作为一个苦出身的穷孩子，蔡楚生能走上导演之路并不容易，这中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因此，他也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

在同行当中，蔡楚生属于出道较早的一个，1933年他成功地编导了《都市的早晨》，尤其是次年他编导的《渔光曲》创下当时国产影片最高上座纪录，并在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上获得荣誉奖后，他已名符其实地成为中国影坛的一位大牌导演。

可以说，他的拍片机会不会比其他任何一位导演少，但是他的创作态度却极其严肃，故作品也少得出奇，几乎平均一年才出品一部。而在他本来就不多的作品中，《王老五》又是较少引起人们关注的一部，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和影片的问世时间有关。

1936年，蔡楚生在完成《迷途的羔羊》之后，受命参与集锦故事片《联华交响曲》的拍摄，担任其中两部短片《两毛钱》和《小五义》的编导工作。

同时，他也在紧张地筹备着自己的下一部影片《王老五》的拍摄。

1937年2月，《王老五》正式开机，男女主角分别由王次龙和蓝苹（江青）饰演，这也是蓝苹从影以来第一次担任主角。

影片写流浪汉王老五其貌不扬，但秉性善良，因家贫，年三十五仍未娶妻成家，却单恋着邻家泼辣的穷姑娘。

不久，穷姑娘老父去世，无力安葬，王老五仗义相助，博得穷姑娘的好感，终于以身相许。

婚后他们生养了4个儿女，生活益窘。

不久一二八战起，汉奸工头企图收买王老五纵火烧毁棚户区，王老五识破汉奸用意，因与汉奸斗争而被杀，家也被火烧了。

王老五的老婆在血泊中觉悟了，她抬起头来，准备承担生活的重担。

影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属于“国防电影”之列。片中有一首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插曲，后来曾广泛流传，歌词是：“王老五呀王老五，说你命苦真命苦，白白活了三十五，衣服破了没人补……”影片拍摄了约半年，到1937年夏已基本完工，只剩一些扫尾工作。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战争”的爆发，将中国导入了全民抗战的轨道，原有的一切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王老五》的进展和公映也因此延宕了下来，一拖就是好几个月。

1938年3月底，上海的报上刊出了一则署名蔡楚生的奇特启事：

十万火急招寻“王老五”。

启事写道：

“战事发生，‘王老五’因环境关系，迄今杳无下落，全沪人士，望穿秋水，特此登报招寻，见报速速归来，至要至要！”

（《蔡楚生谨启》，载1938年3月30日《新闻报》）

这恐怕是中国电影史上难得一见的一则“启事”，但显然是电影公司别出心裁的宣传手段，因为此时蔡楚生早已离开上海赴香港在编导《孤岛天堂》了。

电影公司出此一招显然有其特殊考虑，因《王老五》一片的拍摄已过了将近一年，观众可能已无印象，刊出这样一则奇特的“启事”，就是为了引起观众的注意，诱发他们的好奇心。

果然，4月2日，《新闻报》在头版刊出了影片《王老五》的大幅广告：“《王老五》影片公映，一切国产巨片肃静回避！”3日，该片首映于新光大戏院。应该说，在当时的新片中，《王老五》的宣传攻势是十分豪华的，这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纸就可以知道了。

但《王老五》的头轮首映期只有仅仅两周，至16日就停映了；以后于同年10月由中央大戏院又复映了两周。

这和蔡楚生以前影片的上座纪录简直难以相比。但在当时，这已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抗战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其他一切与之相比都算不了什么。

《王老五》公映以后，一些敏感的观众（特别是以前曾和蔡楚生并肩工作过的朋友）发现影片和原先发布的电影故事不尽相符，尤其是影片结尾部分作了很大改动。

原来汉奸工头企图收买王老五纵火烧毁工棚，王老五因觉悟拒绝而被杀害等等情节都被删去，而代之以这样“温馨”的结尾：

王老五的朋友阿毛终因贫穷离开了痛苦的人世，他老婆呼天抢地，懊丧自己以往对丈夫欺凌太甚。

王老五的老婆看在眼里，也深悔自己对待丈夫过于严酷。回到家里，她向王老五哭着忏悔前非，“从此夫妻间显得融融洩洩，亲密逾恒”。

他们立即在报刊上发文，揭露此事，并表达他们的不满。

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电声周刊》这样写道：

“蔡楚生在电影界为第一号慢导演，《渔光曲》前后摄制至十八个月之久，其新作《王老五》经公司当局一再限以时日，仍需十个月。所幸者此片已于战前摄竣，略事剪辑，尚能于今日付诸公映。然有一憾事，即该片具着深刻之讽刺气息，蔡楚生曾为之耗费不少心血者，而今皆牺牲于剪刀下矣。蔡之作品，复杂而有劲，观后不易忘怀，《王老五》以喜剧方式出之，更见精湛，惜以剪刀作祟，我人在目前见到之《王老五》，仅仅是一滑稽片耳。”

（《蔡楚生战前之作，〈王老五〉作风已变》，载1938年4月15日《电声》7卷8期）蔡楚生的朋友李一他们则化名发文表示：把《王老五》原先的故事“和现在银幕上的来对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有许多不对点了，最显著的，那个结尾是没有了。

原因何在呢？

是作者自动的把故事更改了？

还是受制于‘客观环境’不得不如此呢？

依我想，后者的原因是多于前者的。

根据现在的来看，那不单是一段说不过去的‘光明的尾巴’，这‘光明的尾巴’并且是架空得可以的……当我看完了戏出来，我自己问：《王老五》的主题何在呢？

想了好久，我答不出来。

因为我看到的只是一大堆一大堆的穿插，这中间要找出一根骨干来，是不容易的……

我希望能够读到蔡楚生关于《王老五》的文章，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史楫《关于〈王老五〉》，载1938年4月14日《电星》1卷10期）

在发表文章的同时，李一他们很快将有关《王老五》的种种情况发函告知了正在香港的蔡楚生。也就在《王老五》在上海首映后的第20天——1938年4月22日，蔡楚生在这天的日记中记录了此事：

七时返苏怡兄处，得李一、汉臣、培元等来函，汉臣函中夹有《王老五》被“斩脚”之本事。李一函嘱我发表对被割裂后之《王老五》意见，乃草一公开函。因颇倦，深夜二时余始竣事。（《蔡楚生文集》第3卷《日记卷（1937—1952）》，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6月版）

这封公开函后来通过李一他们发表在《电星》1卷13期上。

蔡楚生在信中写道：

“朋友，一切都没有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当一件作者虽然曾经为她的完成而呕心沥血的艺术作品，但在她没有摆脱‘一切是商品’的

枷锁以前，遇到某种环境上的困难时，是必然会受到这样的遭遇的。我不能怨谁——因为事实并不是单纯的‘人事’问题。然而所不能愀然于怀的，就是我虽然已经离开上海，却仍被在鼻子上抹上白粉，被莫名其妙地推到观众面前的台上去跳跃一番，又被莫名其妙地推下来，想到这些，眼球不免有些湿润。”

蔡楚生表示：现在大家看到的《王老五》已经是“只有残骸而没有灵魂的作品了”

（《〈王老五〉编导蔡楚生给本报的信》，载1938年5月7日《电星》1卷13期）。

蔡楚生在信中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

一、现在的《王老五》已缺少了灵魂，不能算是自己的作品了。

二、《王老五》的被删改并非“人事”问题，而是环境的产物。

这在当时上海已沦为“孤岛”的语境下，应该是最得体的表态了——既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又对公司的做法表示了一定的谅解。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王老五》这个版本的来龙去脉。

本来，事情到此就应该结束了，但蔡楚生在日记中还记载了有关此片在建国后的一件轶事，颇值玩味。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大陆解放，蔡楚生此时已成为新政府电影部门的一个重要负责人。

当时，由原“联华”一些成员组成的文华影业公司接收了“联华”的部分资产，他们想拿出部分旧片来放映以获取一些营业收入，其中就包括《王老五》。

他们在上海打了一个电报向正在北京的蔡楚生请示。蔡在日记中记载了此事：

1949年7月30日

影界集者约近百人，以周副主席未至，即先事看太原、淮海等战役之新闻片，复由吴本立、翟超两摄影师谈战地摄影的经过。

十时余周副主席至，我首以“文华”来电拟复映《王老五》（因片中毛夫人任女主角，“文华”未敢造次）事，请示于周，周为纵笑，并答允征毛夫人之同意。

1949年8月1日

柯灵来，云明日将返沪，彼见“文华”致我之电，乃为挠头不已……草致邦藩、陆洁二先生函，告以《王老五》复映事接洽之经过，并云如复映，需附一字幕于片末：“本片尚有‘抗日除奸’之收场，但已于抗战初期时被国民党的反动政府强迫剪去，足见其媚敌之一斑。”此函即自送请柯灵兄携沪。（《蔡楚生文集》第3卷）

不知由“毛夫人任女主角”的《王老五》当年是否复映过，但从蔡楚生的“片言只语”中，我们还是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因“人事沉浮”而带来的那种微妙氛围，以及在这种氛围之下人们谨小慎微的言行。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由蔡楚生亲笔撰写的《王老五》电影本事当年是发表过的，我们今天也都能看到。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之后出版的《蔡楚生文集》第一卷（蔡小云等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中，收录的却

是“孤岛”时期被阉割肢解过的那个版本，这显然不妥，且有违蔡楚生的本意，应该在再版时予以更正。

这部电影放映之前，正值蒋介石被捉，（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张学良以领袖的生命为代价，迫使他采取坚定的统一抗战的政策。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全国形成了统一的抗战局面。

因剧中的工头有影射国民政府之嫌疑，故直到1938年4月才公开发行。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上海，是一个灾难性的事实。迫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流离失所，痛失家园。

在逃难的人群中，也有江青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公映之前，国民党从头到尾对影片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被剪裁后的《王老五》，不仅是电影的艺术完整性遭到破坏，更重要的是，影片的结尾被篡改为老百姓默许了日本的扩张主义。

这一切也促使了江青离开影界，离开上海，去寻找革命道路。

8

江青的政治生涯始于脆弱的极不稳定的战时环境。另外还有一大群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演员也都在这场民族灾难的漩涡中挣扎。

1930年文艺界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已然过时。取而代之的是：“为电影而电影”的现实主义抬头。

“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口号是法国人的发明。但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对康德与席勒美学的一种粗浅而通俗的表述。我们知道，德国古典美学深奥的思辨性与晦涩的语言，即使是专业人士也备感艰难，而“为艺术而艺术”的成功之处也正在于此。它汲取了德国美学的要义与精髓，又除去其繁琐的细节，以精炼的法语铸造成一句响亮的口号，成为法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一面醒目的旗帜。

19世纪法国文学的重要潮流，对于后来的法国文学影响深远，不但直接影响帕尔纳斯派，而且也影响象征主义和现代法国文学。

19世纪30年代以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逐渐演变为不同的倾向，其中一种倾向就是所谓“社会小说”。乔治·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小说和雨果的《悲惨世界》等，都是这种“社会小说”的代表作。与此同时，出现了与“社会小说”对立的倾向，它反对文学为现实生活所限制，反对文学艺术反映社会问题，反对文学艺术有“实用”的目的。这一种倾向成为“为艺术而艺术”的潮流，在19世纪末叶的法国文学上曾经占过短时期的优势。

1832年浪漫主义诗人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在他的长诗《阿贝杜斯》的序言中宣称：“一件东西一成了有用的东西，它立刻成为不美的东西。它进入了实际生活，它从诗变成了散文，从自由变成了奴隶。”1834年5月，戈蒂耶为他的小说《模斑小姐》写了一篇长序。他认为：“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那是某种实际需要的表

现，而人的实际需要，正如人的可怜的畸形的天性一样，是卑污的、可厌的。”这篇序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宣言。

戈蒂耶为艺术而艺术美学观点的具体实践是他的诗集《珉琅与玉雕》（1852）。这部诗集为帕尔纳斯派诗人奉为艺术典范。1875年，在这部诗集重版时，戈蒂耶在集中增加了一首结论式的诗，题为《艺术》，大意如此：人间的一切都是过目烟云，昙花一现，只有艺术是永恒的；连天上的神明都会灭亡，可是高妙的诗句永垂千古，比青铜更为坚硬。

“为艺术而艺术”的诗歌要求形式上的整齐完美；用严格的、古典诗的格律，经过细磨细琢、雕词凿句的一番功夫，表现客观事物的外形美；诗人在作品中不能流露自己一丝一毫的感情。

“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戈蒂耶是公认的帕尔纳斯派的前驱。帕尔纳斯派的主要诗人邦维尔在他的《法国诗歌格律简论》（1872）中，勒孔特·德·李勒1887年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说《雨果颂》中，都发挥了“为艺术而艺术”这一中心思想。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象征派诗人瓦莱里在他关于诗歌的言论中，还提出诗歌艺术的目的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任何其他作用，所以他说：“一句诗并没有别人强加于它的意义。”

19世纪法国文学的重要潮流，对于后来的法国文学影响深远，不但直接影响帕尔纳斯派，而且也影响象征主义和现代法国文学。

19世纪30年代以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逐渐演变为不同的倾向，其中一种倾向就是所谓“社会小说”。乔治·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小说和雨果的《悲惨世界》等，都是这种“社会小说”的代表作。与此同时，出现了与“社会小说”立的倾向，它反对文学为现实生活所限制，反对文学艺术反映社会问题，反对文学艺术有“实用”的目的。这一种倾向成为“为艺术而艺术”的潮流，在19世纪末叶的法国文学上曾经占过短时期的优势。

1832年浪漫主义诗人戈蒂耶在他的长诗《阿贝杜斯》的序言中宣称：“一件东西一成了有用的东西，它立刻成为不美的东西。它进入了实际生活，它从诗变成了散文，从自由变成了奴隶。”1834年5月，戈蒂耶为他的小说《模斑小姐》写了一篇长序。他认为：“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那是某种实际需要的现，人的实际需要，正如人的可怜的畸形的天性一样，是卑污的、可厌的。”这篇序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宣言。

戈蒂耶为艺术而艺术美学观点的具体实践是他的诗集《珉琅与玉雕》（1852）。这部诗集为帕尔纳斯派诗人奉为艺术典范。1875年，在这部诗集重版时，戈蒂耶在集中增加了一首结论式的诗，题为《艺术》，大意如此：人间的一切都是过目烟云，昙花一现，只有艺术是永恒的；连天上的神明都会灭亡，可是高妙的诗句永垂千古，比青铜更为坚硬。

“为艺术而艺术”的诗歌要求形式上的整齐完美；用严格的、古典诗的格律，经过细磨细琢、雕词凿句的一番功夫，表现客观事物的外形美；诗人在作品中不能流露自己一丝一毫的感情。

“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戈蒂耶是公认的帕尔纳斯派的前驱。帕尔纳斯派的主要诗人邦维尔在他的《法国诗歌格律简论》(1872)中，勒孔特·德·李勒1887年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说《雨果颂》中，都发挥了“为艺术而艺术”这一中心思想。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象征派诗人瓦莱里在他关于诗歌的言论中，还提出诗歌艺术的目的在于它本身，而不在任何其他作用，所以他说：“一句诗并没有别人强加于它的意义。”

一方面屈服于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为了缩小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差距，导致了一些作家想通过电影的形式来探索一般社会和政治问题。

说到此处，江青举了一个实例。一位像她一样生活与命运多舛的电影明星——阮玲玉。

阮玲玉(1910——1935)，中国早期影星，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广东香山(今中山)南朗左步关村人，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因为当工人的父亲早逝，孩童时代就随母为人帮佣。母亲节衣缩食，让她上学读书，就读于上海崇德女子中学。

1926年，为自立谋生，奉养母亲，考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主演处女作《挂名夫妻》，从此踏入影坛。

阮玲玉的父亲在她6岁时病故，她与母亲二人相依为命，在上海崇德女子中学(现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就读。

1926年（16岁）时，经张慧冲介绍，考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其电影艺术生涯，主演《挂名夫妻》等5部电影。

1928年转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主演《情欲宝鉴》等6部电影。

1930年转入黎民伟、罗明佑创办的联华影业公司，主演《野草闲花》（饰演卖花女）一举成名，奠定她在影坛的地位，一生共主演29部电影。

阮玲玉的作品风格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明星、大中华百合时期）多主演通俗社会片，甚至神怪片，饰演低下阶层的堕落女性，如妓女一类人物；或者是在旧社会受欺压而不反抗的弱女子。

后期（联华时期）受新兴电影运动（又称左翼电影运动）影响，表演风格有所转变，转折点是在卜万苍导演的《三个摩登女性》中饰演对旧社会觉悟的女工周淑贞。其后主演的作品如《香雪海》（饰演农村妇女、尼姑）、《小玩意》（饰演抗日的农村手艺人）、《神女》（饰演妓女）、《再会吧，上海》（饰演女教师）等，演活了社会各阶层不同的女性形象。有人赞誉她为中国的嘉宝、褒曼。

之后，相继在“明星”、“大中华百合”公司主演近20部影片，所扮演在爱情、婚姻方面屡遭不幸的少女或娇媚泼辣的风流女子。

1930年进联华影业公司，主演该公司创业作《故都春梦》，扮演妓女燕燕获得成功，奠定了她在影坛的地位。

此后，她在《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城市之夜》、《人生》、《归来》、《再会吧，上海》、《香雪海》、《神女》、《新女性》、《国风》等一系列影片中担任主角，在这批暴露社会黑暗，表现下层劳苦群众生活的影片中，成功塑造了各种饱受苦难的中国妇女形象。

这些形象中，有女工、村妇、教员、舞女、妓女、艺人、作家等。人物大多身世悲惨，经历坎坷，屡遭磨难而一直奋斗不息，虽然最终都是以自杀、出家、入狱、惨死为结局，但都能保持善良正直的天性和纯洁美好的心灵。

其中，《神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她以精湛的演技，把一个品格崇高的母亲与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奇迹般地融合为一体，出神入化，令人心灵为之震动。

《神女》导演吴永刚曾用“感光最快的胶片”作比喻，给予她高度赞誉。在30年代的中国影坛上，她以重拍次数最少而成为导演们乐于与之合作的演员；又以使观众“每片必看”而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同时，阮玲玉是江青最欣赏的女演员。江青的眼光，放在今日的“小资”们当中，毫不逊色。在国产片中，江青坦言：当然我那时是不懂什么内容和形式的。现在我只看过《女人》、《渔光曲》、《新女性》、《桃李劫》、《姐妹花》、《重归》等等。图为阮玲玉。[当时的阮玲玉、胡蝶、周璇等明星范儿成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审美标准，她们的明星气质有了强烈的示范意义。于是，名妓花魁时代日益衰落，

代之兴起的是一代上海滩上具有摩登色彩的名媛贵妇，也带领上海也进入交际花时代。

阮玲玉端庄大方，清丽脱俗。对待表演艺术，她勤奋刻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不懈追求。表演中，她能够准确地体味人物的情感，捕捉到人物感觉，并用适当的眼神、表情、动作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准确的内心感应力和形体表现力结合得又非常自然，显示出她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功力。

《野草闲花》（1930年）——一个直面人生而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爱情故事。拒绝包办婚姻的音乐学院毕业生，爱上一位从灾区流落上海的卖花女，并把她培养成歌唱家，两人一起勇敢承担生活的风雨。

《三个摩登女性》（1933年）——通过一个男青年和三个女青年对生活道路的不同选择，寄寓了时代环境与个人命运关系的现实思考，构成了沉沦或新生的时代特征。刻片上演后引起轰动，被誉为“新兴电影运动”的“第一只报春之燕”。

《神女》（1934年）——向观众展示的是一位身处都市最低层的下等妓女的生活遭遇。年轻女性阮嫂在环境逼迫下靠出卖肉体养活孩子。某晚，为躲避警察追捕而误入流氓章老大住处，从此被章老大霸占。她把孩子送进学校，然而孩子的身份却又为校董们所不容，她正打算与孩子一起离开，却又发现章老大把她的血泪钱全部偷去赌博，绝望中她赶到赌场用酒瓶砸死章老大，她自己却被关进了监狱。

正如编导吴永刚所指出的：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这是社会经济制度的病态！影片的矛盾头正是指向那些依附这个病态社会的吸血鬼。而在深切的人道主义同情中，发掘出弱者身上所潜藏的美质与反抗意识。

《神女》的风格属于“冷隽型”的美学观。而阮玲玉“清丽优美的表演风格和善于刻画人物性格的天才演绎，使得影片在不可能凭藉对话（因当时是默片时代），而又极少使用字幕的情况下，却以自然质朴而又蕴涵深刻体验的表情和形体动作、细腻、准确、传神地表现出人物思想的跃动和灵魂的震颤，从而使影片成为默片时代的经典作品，代表着默片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

阮玲玉一生中拍摄的29部影片均为默片，直到最后一部《新女性》才开始在伴奏音乐之外配有若干插曲，从而成为无声片向有声的过渡的尝试。可惜阮玲玉不久竟在“人言可畏”的巨大压力下猝尔辞世，这是中国电影艺坛的无可估量的损失。

阮玲玉的表演才华横溢，光芒四射，达到了中国无声电影时期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赢得广大观众由衷的倾慕。然而，这位卓越的女演员婚姻生活十分不幸。

1935年，封建恶势力利用有关她的婚姻讼案大作文章，造谣中伤，把一桶桶脏水泼到她的身上。她不堪被辱，留下“人言可畏”。

阮玲玉的死因真的是人言可畏吗？

一句人言可畏把所有的人都解脱了。

一句人言可畏把阮玲玉的死归咎于小报记者，归咎于无聊的小市民，所有的当事人都干净了，都没有关系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的历史资料的被披露，特别是当年的一些当事人，当他们进入晚年的时候，他们为了求得自己良心的安宁，他们开始打开了自己记忆的，封存的那些资料，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阮玲玉的死不是像我们当初以为的那样是人言可畏。

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大概每一个人都会在想，阮玲玉只有25岁，多么年轻的生命。阮玲玉在25岁的时候已经拍了29部电影，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历史上默片时代最优秀的，没有人可以和她竞争的一个女演员的时候，她为什么要用那样决绝的手法终止了自己的生命，终止了自己的艺术，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

这时候有一部电影找到了她，那就是叫《新女性》。这部《新女性》是由一位年轻的导演，后来也是非常著名的导演蔡楚生拍的。

《渔光曲》就是蔡楚生拍的。

当年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是获得国际大奖的。

这是中国电影导演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就是蔡楚生。

当时蔡楚生正好是要拍一部进步电影叫《新女性》，女主人公就让阮玲玉来演。

当演到最后一场戏自杀，并且自杀拯救不过来的时候，阮玲玉躺在床上，她当时已经把药吃下去了，但是她忽然又觉得她不应该死，她觉得她死了，所有的罪恶也便随着她的死消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她

反倒有一种求生的欲望，这个时候剧中人在临死之前她对医生说：“救救我，我要活”。

这个镜头拍得相当出色，在场所有的人都被阮玲玉的表演所打动，全部是潸然泪下。她为什么这个戏演得那么好，演技是其一，感同身受自己的经历和剧中人的经历何曾相似是最主要的。

这个时候导演蔡楚生就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退场，他一个人坐在床边默默地陪着阮玲玉，等到阮玲玉的情绪平复下来以后，阮玲玉就对蔡导演说：

“我多么想成为这样的一个新女性，能够摆脱自己命运的新女性，可惜我太软弱了，我没有她坚强”。

1935年3月8号，阮玲玉在家中留下了“人言可畏”的遗言，离开了这个令她心力交瘁的人世。

她的死，真的是因为“人言可畏”吗？在阮玲玉逝世之后，一份湮没了几十年，被人们认为是真实的遗书来到了世人的面前，这一份真实的遗书的背后又揭示了什么呢？

为什么到了3月8号，阮玲玉就会自杀了呢？

所有的人对这件事情一直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当年大明星阮玲玉自杀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震动，有不少喜爱她的观众依然追随其香魂而逝。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的项福珍女士，听闻噩耗，随即吞服了鸦片自杀；绍兴影迷夏陈氏当天吞服毒药自杀；杭州联华影院女招待员张美英也因痛悼阮玲玉服毒自尽。单是1935年3月8日这天，上海就有5名少女自尽，其他地方的追星成员也

有多位。她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阮玲玉生前名闻天下，死后的哀荣也是极一时之盛。

1935年3月14日，她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移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阮玲玉生前的好友差不多都到齐了，将近300人。

下午1时10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十二位影界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

这天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灵车所经之处，万人空巷，沿途夹道挚爱者多达30万人。

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见状极为惊奇，特意作了“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的报道。文中还配发了一幅插图，送葬行列中有一壮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其寓意为：“倘若中国还有皇帝的话也会前来参加葬礼。”

江青与阮玲玉似乎是命运相同，然而，结局却大大的不同！

阮玲玉死了。

阮玲玉自杀死的。

江青死了。

江青也是“自杀”死的。

阮玲玉死了这么多年，所有人仍对她的死因持怀疑态度。

江青没死多少年，却无一人对她的死因持怀疑态度。

人们该说，这究竟是江青的悲哀，还是人性的悲哀呢？

究竟何时才能还真实的历史一个历史的真实呢？

江青踏入演艺界前后不到两年时间，总共出演了三部电影，仅做了一回主角——给穷汉子《王老王》生了四个孩子。没想到却给人们留下了N个疑问号与N个惊叹号。

江青不想补阮玲玉的后尘，淹死在口水沫中。

江青决心离开上海。离开这是非之地。她选择了去革命圣地——延安。

第六章 延安之路

有时候，
偶然看上一眼，
就能知道一个人的未来。

——谚语《红色的梦》

翻译：大卫·霍克斯

江青十分健谈，口若悬河。只要话头一开，就像开了闸的渠水，一泄千里。想止都止不住。

每天晚上十点或十一点的时候，秘书总要轻声对她重复好几遍：“晚餐已经准备好了。”才能让她止住话头。

然后，她会站起来大声宣布：

“有谁喜欢洗碗？我可以满足她的要求。一会儿餐厅见。”

在一间十分宽敞，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大房间里，摆放着一张同样很大的圆桌。白色的亚麻布桌布上摆放着的瓷器和筷子，显得十分洁净、淡雅。具有中国南方特色的餐具，一看就知道是出自景德镇的名产。

在餐桌上，江青也很难安静下来。一边吃，一边津津乐道地说些什么。我和其他人的反应大多一样，尽情享受美味的食物，基本上

保持沉默。但她总能将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将大家的注意力从菜肴上吸引到她的身上。连我这个“鬼佬”，也不例外。

这是我在广东度过的第一个夜晚。

餐桌上的谈话比起正式的会谈来，要轻松得许多。坐下来后，我习惯性地拿起了笔和笔记本。

江青挑起眉头，故露温色：

“怎么啦，难道你想影响我们大家的食欲吗？”

我耸了耸肩，无奈地补充了一句：

“这（笔和本）可是我吃饭的家伙。看来要被你剥夺了。”

江青笑了。责备我：

“你工作太努力了！”

这话，我怎么听怎么都觉得她是在表扬我。

第二天晚上，在年轻漂亮的女助手的帮助下，我已经学会了用左手舞动手中的筷子，尽管它们不是那么听话。

我们的食物，谈不上奢侈却也十分丰盛。主菜是花样百出的肉和家禽——真不知道中国的厨师们怎么就能将同一块肉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来？像变魔术一样，第一个地方菜系，都有自己的绝活。

饮料有茶、葡萄酒和烈性酒。后者是中国著名同时也是誉满全球的“茅台”酒。

贵州茅台酒独产于中国的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是与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酒之一。1915年至今，茅台

酒共获得 15 次国际金奖，连续五次蝉联中国国家名酒称号，与泸州老窖，杏花村汾酒并称我国三大名酒，是大曲酱香型白酒的鼻祖。

茅台酒因产于黔北赤水河畔的茅台镇而得名。由于茅台镇地处河谷，风速小，十分有利于酿造茅台酒微生物的栖息和繁殖。

端起茅台酒杯，江青的兴致又高涨了起来。给我们讲了许多有关茅台酒的故事：

1935 年 3 月 16 日，红军攻占茅台。为了保护遐迩闻名的茅台酒生产作坊不受损失，军委政治部分别在茅台镇上生产茅台酒最多的成义、荣和、恒兴三家酒坊门口贴上布告：“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属于我军保护范围。私营企业酿制的茅台老酒，酒好质佳，一举夺得国际巴拿马大赛金奖，为国人争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甑、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从这张通告中可以看出红军对民族工业、对知名产品的高度重视。

为了欢迎红军，当地群众捧出茅台酒。茅台酒好，当时红军的很多高级领导人都知道。红军工兵连长王跃南回忆说，他与毛泽东的警卫员陈奉昌从酒坊买酒回来，正巧碰上毛泽东，毛泽东问，你们提的么子？陈奉昌回答，买的酒，驱驱疲劳擦擦腿。毛泽东笑着说：“茅台是出名酒的地方，不过，用这酒擦脚太可惜了！”

然而，对于当时的红军队伍来说，茅台酒恢复疲劳的功能和治病疗伤作用更是终生难忘。据参加过长征的我军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后来回忆：“1935 年 3 月，我们长征到贵州仁怀县茅台镇。由于长途劳累

和暂时甩掉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大家都希望能轻松一下。当时听说当地酒好，芳香味美，大家很高兴。有的用酒揉揉手脚，擦擦脸，擦过之后，真有舒筋活血的作用，浑身感到痛快。同志们喝了酒后，长途行军的疲乏全消失了，因风寒而引起泻肚子的同志喝了酒也好了。”

著名作家成仿吾在其《长征回忆录》中写道：“因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用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自长征途中与茅台酒结下不解之缘后，周恩来经常向同志们介绍：“这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了金奖的茅台啊！”

抗战末期，周恩来在重庆曾经对作家姚雪垠说：“1935年，我们长征到茅台时，当地群众捧出茅台酒来欢迎，战士们用茅台酒擦洗脚腿伤口，止痛消炎，喝了可以治疗泻肚子，暂时解决了我们当时缺医少药的一大困难。红军长征胜利了，也有茅台酒的一大功劳。”

毛泽东第一次赴苏联赠送给斯大林的礼品之一就是茅台酒；日内瓦会议，新中国外交战线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周总理说茅台酒功不可没；尼克松首次访华，打破中美关系坚冰后，与周恩来开怀畅饮的是茅台酒；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田中首相回国带给女儿的贵重礼物是周恩来送的茅台酒；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结束后，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共同举杯相庆的是茅台……可以这样说，用茅台来招待国家贵宾几乎已成惯例；茅台，作为中国的国酒，对外交往的国礼酒，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

江青爱茅台，却不贪杯。

她端起玻璃酒杯，只是在嘴唇上轻轻碰了一下，实际上只喝了一小口。

当她看到我的酒杯举在半空中没动，笑了笑，假装生气：

“我拿中国最好的酒来招待你，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哟。”

“敬”酒、“罚”酒都是酒。我不明白有什么区别？

看我一脸茫然的样子，江青咯咯地笑出了声：

“看来你我是一丘之貉，都是软硬不吃的主呀……”

貉，哺乳动物，外形像狐，穴居河谷、山边和田野间；杂食鱼、鼠、蛙、虾、蟹和野果、杂草等，皮很珍贵。

一丘之貉，中国人当反义词用，美国人却视貉为珍稀动物。

酒精，削弱了我的神经系统的灵敏度，却拉近了我和江青之间的感情。

我们的筷子，继续在美味佳肴上移动着。

江青她喜欢清淡的菜，尤其是小碗的粥。一种混合着各种材料熬成的粥，粥上面漂浮着一层异国情调的海鲜和用干蘑菇刻制成的花朵，还有一颗甜果核桃。

江青特别注重饮食的营养搭配。

实话实说，我不太喜欢辛辣的东西。尤其是那种油上面漂浮一层厚厚的辣椒酱。细心的服务员于是在我旁边额外摆放了一只盛放醋和辣椒酱的小碟子。

湖南的辣椒很有名，湖南也是毛主席的故乡。

我问道：

“主席还是那么爱吃辣椒吗？”

江青回答道：

“现在吃的少多了。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1

江青在谈及她是如何逃离上海时中断了话题，当时的上海正因日军的入侵而浓云密布。

香港有过一个不合逻辑的报道，称江青曾加入了中央电影公司，是国民党宣传部的一个机构。她随着这个公司到过重庆和其它内地城市，一路上拍摄国防电影，两年后她便在延安露面。

相比较来说，共产党电影史学家程季华的看法更可靠，据他所写，1938年江青一直随中央电影公司在武汉工作，第二年她去重庆拍摄影片《中华儿女》。在这部影片里她扮演女主角。

程季华，电影史学家。湖北沙市人。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后在移动演剧队、抗敌演剧五队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后任中国歌舞剧艺社监事会监事长、新加坡中华艺术专科学校教师。

建国后，历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处业务秘书兼演员科科长、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电影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国影协第二至四届理事、第四届书记处常务书记和电影史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中国电影年鉴》主编，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

江青说，1937年7月在卢沟桥事件后她离开了上海，国难当头，使得表面上的联合阵线出现裂痕，并且也产生了另一范围的“中日抗争”。她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公开信》的文章，公开了她个人的困境，之后便气愤地离开了上海。

当她经过长途旅行来到西安时，战事变得更糟了。

8月13日日军轰炸了上海，毁坏了被人们忆作“30年代的上海”这个旧中国唯一的社会和文化繁荣的奇迹。

江青永远忘记不了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形，那是一个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的会面。

一九三七年初夏季节，蓝苹告别了上海，途经西安踏上了奔赴延安的旅程。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她见到了周恩来。

“你还叫蓝苹吗？”

周恩来微笑着问她。

蓝苹似乎早已考虑了，她很坦率地说：

“当演员的蓝苹已经死了。作为长期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新的生活，我决定改名，叫江青。”

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说：

“江青，这个名字很好嘛。好，祝贺你开始新的生活。不过，我还是想看你演的戏呢。毛主席也很喜欢看戏，只不过在延安看不到你这大明星的演出啊！”

江青脸一红，低着头“咯咯”地笑了。

在前往延安的路上，江青说不上是激动，还是兴奋，总想放开喉咙唱歌、唱戏，那股劲，就像逃出牢笼的小鸟一样。她随同着一辆运输汽车，由于道路泥泞，山坡很多，她和一些干部、战士不得不经常走路，甚至推着汽车走。

烈日下，她急匆匆地走着、走着，感到一阵晕眩，脸色刷白。她支撑不住了，连忙靠在路旁的一颗树旁。刹时天昏地暗，身子倾斜，她歪倒了。

马上她被战士们七手八脚地扶起来，抬上汽车。江青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无力地望着这些淳朴、善良的战友们，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这支队伍的温暖。

江青一行来到洛川，驻扎在附近一个村庄里。恰巧，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这里开会。

江青正在收拾行李，领队的负责人跑进来喊道：

“大家赶快到东院的大槐树下集合，党中央领导同志要看望大家，毛主席也要来！”

“真的？”

江青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没想到，初到陕甘宁边区，就能见到自己最尊敬然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伟大领袖。她觉得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动着，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刚吃完午饭，毛泽东等人果然来了。

准确地说，是周恩来、贺龙等人把他动员来的。开会中，周恩来打趣地对毛泽东说：

“从敌占区来了一批热血青年，大多是知识分子。还有从上海来的几个电影女演员，蛮漂亮呢，你要不要看看他们？”

“不去不去，没得功夫。”

毛泽东连连摆手：

“要去你们去，我不去。”

贺龙说：

“听说还有电影明星蓝苹，她可是个美人儿，把个上海掀红了半块天。你们不去，我是要去看看的。”

“主席啊，你去看看吧。”

周恩来说：

“蓝苹不但是电影演员，而且还是我们的老地下党员。这个人敢怒敢骂，很有股辣子风格。你亲自出场，表示对爱国青年的欢迎嘛。”

张闻天也说：“毛主席应该去！爱国青年们一踏上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就是想见见毛主席和我们党中央的领导人，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基本要求嘛。”

在大家的劝掇下，毛泽东到了这批奔赴延安的青年们的驻地。

“同志们，大家辛苦了。”

毛泽东在政治局委员们面前显得多少有点腼腆和不好意思，但一到群众中，特别是在这些充满激情和美好追求的年轻人中间，他那与众不同的大家风范和领袖气质一下子把大家凝聚到自己身旁了。

“为了抗日救国，你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告别温暖的家庭和亲人，来到条件最艰苦的抗日前线，我代表中共中央，用一杯清水来敬大家，欢迎你们的到来！”

人群里立刻发出欢乐的笑声。

毛泽东在与这些青年们一一握手的时候，被一张清秀、健康而又漂亮的面孔吸引住了。

她，弯弯的眉毛下闪烁着一双亮晶晶的丹凤眼，那双眼睛深蕴着激动、渴盼和某种追求。眼睛好似会说话的窗口，就在那瞬间里和这位伟人产生了共鸣。

她的鼻子恰到好处地微翘了一下，显示出一种热情而又不乏高傲的神态。

她的嘴唇稍微厚一些，但晶莹透亮的牙齿却更显示出她的精明和利落。

她稍微甩了一下额前的短发，拉了拉非常合身的灰军装，便握住了毛泽东的手。

她的手有些湿润，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更体现出她那苗条的身姿和聪明中蕴含淳朴、文雅的风度。

同样，毛泽东魁梧、高大的身架在江青眼里显然就是座顶天立地的巨峰，与她在上海见惯的那些奶油小生、谦谦君子、忸怩作态、装腔作势的男人们形成了天壤之别的对比。

本来谈笑风生的这位党领袖，在这位嘴唇紧抿的女人身上，感受到了她某种倔强不屈的性格。

“你叫什么名字？”

“原名蓝苹，现在改为江青了。”

毛泽东几乎脱口而出：

“你就是写了《我的公开信》的那个蓝苹？哈哈，文若其人。看来你不仅能文可演戏，而且以笔作枪，很能自卫了。我读过你的文章，很有特性。”

“我没有什么可值得一说的，我从参加共产党的那天起，就是准备奋斗的。”

“看过《共产党宣言》吗？”

“读过几遍，但有些观点还是吃不透。”

“你说，《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毛泽东松开江青的手，双手叉腰，把头稍微倾斜地问道。

“不要害怕，大胆地阐明你的观点嘛。”

恰巧，江青在路途中刚看完一本介绍《共产党宣言》的书，对里面的观点记忆犹新，就鼓足勇气说：

“我认为《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或曰精髓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从十九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就责备马克思，说他维护了工人阶级的统治和专政，而他们的追求是根本消灭阶级差别。

这一点，《宣言》里讲得非常清楚：‘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二月之前写的《哲学的贫困》这本书里，也十分清晰地讲明了这个观点。”

毛泽东暗自吃惊，对她更加刮目相看了。他点点头：

“江青同志，你来到陕北，可要准备吃苦呀！”

“想想红军战士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什么样的苦也不在话下！”

江青回答得非常干脆，她朝随行的人环视了一下，倡议道：

“为了报答党中央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唱个歌怎么样？”

但是，环顾四周，没有多少人响应她、支持她，相反还有人抛来一种嘲弄的眼光，认为她这是在出风头。也有个别人低着头，跟着她唱了起来。

就这样，毛泽东和江青认识了。

毛泽东那爽朗、幽默、谈吐风趣的神态和驾驭一切的博大胸怀，在江青的心目中留下了再也抹不掉的印象。

她到了延安以后，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请教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但是，她没有收到毛泽东的回信。

她那火一般的热情逐渐变得冷静了下来。

江青沉默了。

从那以后，江青完全改变了装束。

她的灰军装总是洗得干干净净，齐肩短发飘逸而闪闪发亮。她活泼，开朗，勤奋读书。

见了领导人，热情中多少有点羞怯和腼腆，因而显得更迷人。

那天，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她刚出房间的门那一瞬间就看见了他。他没带警卫员，也没有任何人跟随就径直到了她的院子里。

她很欢喜，而又被自己的激动弄得有点惶惑，有一刹那，当她迎上去和毛泽东相互凝望的时候，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脸上泛出红晕，嘴唇滚烫，等待他走到她面前来。

他向她走过去，伸出手：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呵！最近又读什么书啊？”

“我……”

江青终于绽出笑容，显示出掩盖不住的惊喜：

“我在学习《中国革命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主席的论述非常精确。读着读着，我就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哦，我这可是山沟沟里的学问，比不上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洋派头啊！”

“你比他们强多了，他们根本无法和你相提并论。你是太阳，而他们不过是萤火虫……”

江青的这个比喻，引得毛泽东哈哈大笑。

“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是专门给你送票来了。”

“票？”

江青的眼睛像闪电一样炯炯发光。

“今晚有文艺演出？”

“不，不是你们文艺战士演，而是我们几个政治家演。”

毛泽东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今天下午的形势报告会，是我毛泽东唱主角，欢迎你去听报告。我怕发票轮不上你，专门给你送来一张。你可要准时到会啊！”

那时，中央机关召开报告会，除了有关负责人外，其余各单位的领导和代表都要凭票进入。除了保密的因素，也有级别的限制。

显然，毛泽东让江青参加会议，既表示了对她的信任，对她来说，也是一种殊荣。

她得到了心理上的最大的满足……

同样，江青所写的《我的公开信》，能给毛泽东主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足以能够证明她在上海的所作所为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30年代后期的西安是陕西南部一个贫穷破烂的市镇，满是过去上千年来历史遗迹，它曾经是11个王朝的首都。

当时西安的人口下降到只有大约50万人，而且其中有5千人是国民党的特务人，这些人主要通过其地下组织控制着西安城。

西安古称“长安”“京兆”，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居中国四大古都之首。

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城，著名的古都型旅游胜地。

西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区域之一。

西安，在《史记》中被誉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西安确定为“世界历史名城”，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从古到今曾用名中，以“长安”最为长久和著名。

长安，意为“长治久安”，是中华文明史及东方文明史上最负盛名的都城。

西安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之一，据《广博物志》、《述异志》、《山海经》等记载，传说中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等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据考古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是蓝田猿人的聚居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经形成了原始聚落“华胥古国”、“半坡”、“姜寨”、“灰堆坡”等。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发现，将中国城市历史

推进到了 6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同时确定了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座城市。

“秦州自古帝王都”，公元前 12 世纪，周文王在这里建立丰京、镐京两京，从此，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 1200 多年，先后有 21 个王朝和政权建都于此，是 13 朝古都，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代周、秦、汉、隋、唐均建都西安。

汉唐时期，西安是中国对外交流的中心，是世界上最早超过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史上最大的都城，在其发展的极盛阶段，一直充当着世界中心的地位，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使节与朝拜者的到来，“西罗马，东长安”是其在世界历史地位中的写照。

1936 年的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此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从 1937 年到 1946 年，该办事处(70 年代后期被作为革命历史纪念馆修复)一直是左翼人士在进入延安之前的最后一站，从这里往北经过三百公里山路便是延安。江青是成千上万名年轻的寻求庇护者们中的一员。同他们一样，她也是通过这条路到达延安的，并且也同他们一样，这次旅行成为她生命的转折点。

江青回忆说：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后，当时张学良拘禁了蒋介石，局势多少有些改进。但是我们(红军)仍然受到很多限制。”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陆军一级上将，曾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对其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汉族，籍贯辽宁海城，祖籍河北大城。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另外他风流倜傥，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

江青接着说道：

“蒋介石纠集了一支号称30万的军队来包围和攻打我们的根据地。

我也在西安事变之后，才得知我们的部队已经到达陕北，于是我便要求去那里。

但是直到1937年夏天(确切说是8月下旬)我才到达延安。

那时去延安是非常困难的。

我是坐一辆部队运粮的卡车上路的。

当时暴雨冲毁了路面，我不得不中途停下等了很长时间。那时我的钱花完了，我完全不知所措。

有人给我找来一匹马，但我不知怎么骑它。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了马背。那匹马只是低头吃草，一动不动。我害怕承认我不懂骑马，于是我又下马去折了一枝柳条，又上马，并用柳条鞭策着马。于是马疯跑起来。我感到自己似乎要摔成碎片，并且随时都会被摔下来。终于

马跑累了，速度慢了下来。

我到洛川时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正在开会。我感到非常害怕和不安，深恐会在他们面前晕过去。

但是组织上还是决定我去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们见面。他们大家都出来问候我。

我鼓励自己不能在他们面前垮下去，此外，我必须笔直地站立着。于是就这样我同他们大家都握了手。他们当时正在开的会议很重要。”

撇开这个话题，江青转而继续谈论起了马的事情。

马匹在当时的延安是很珍贵的，因而也主要是为领导同志所用。最后，因为她同毛的婚姻也配给了她一匹马，于是她必须克服自己对马的恐惧。为了强迫自己骑马，她逐渐地把速度增加到了每十分钟五千米。

江青说：

“到现在我都可以骑一匹温顺的老马。我喜欢骑马。”

她又重新开始谈论她去延安的路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她说，从洛川到延安那最后一段 50 公里艰难的跋涉中，她和其他同志坐在一辆卡车上面。后来她才知道，当时她的卡车恰好返回延安。

延安，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现辖宝塔区、吴起县、志丹县、安塞县、子长县、延川县、延长县、甘泉县、富县、洛川县、黄陵县、黄龙县、宜川县共一区十二县。

总面积约 3.7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227 万，平均海拔 1000 米左右，年均无霜期 170 天，年均气温 9.2℃，年均降水量 500 多毫米。

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是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

1937 年，中共中央进驻，同年设延安市，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1949 年，改称县，1972 年，再设市至今。

延安的老城墙留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难忘的。在南门上写着“安澜”两个大字。

她颇有点怀旧地说道。

“一看到这两个字，便一扫旅途的劳顿。”

江青没有提及，在她 1937 年 8 月到达延安的 7 个月之前，党中央才从保安迁到了东南四十多公里外的延安。

于是延安便成为长达十多年的陕甘宁边区的政府。

该地区南接洛川，北临长城，黄河在此拐弯，形成东口和西口。

江青来到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地方——这里洋溢着共产主义的信念。

而这信念，在长征结束近两年后，沉淀着那最惨痛又最具建设性的经历，这一切构成了共产党人独有的品性和特质。

长征的幸存者经历了在人类耐力方面令人无法置信的考验，他们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代奠基者。

延安是个古城，有着厚厚的城墙，三千年来一直是抵挡北方外族入侵的堡垒，直到 19 世纪中期的穆斯林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为止，它都一直很繁荣。

1928~1933 年遍布西北的大饥荒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这里没有都市的痕迹。

所谓的延安“城”，实际上是钻凿于山坡中的自然的村落。

数世纪以来人们双手造就的这些建筑——窑洞，由于其裹藏于厚实的黄土坡中，其独特的隔绝状况使其有冬暖夏凉的特点。

那些窑洞远比印第安人的居所精致得多。

它们都有拱形的门，窗户是木条构成格状的，上面糊着纸。窑洞的内部呈长方形。

上好的窑洞一般都装有结实的木漆门，内部也都要比普遍老百姓的多些文明的色彩。

曲曲折折的小径顺着山势联接着一排排的窑洞。

红军刚到延安时，那里的人口只有大约 3 万人。而在其后的 10 年中，它的人口达到了 10 万人的顶峰。

掌管着延安革命社会的那些军方人士对新来的人总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对女性。

要想成功地为他们所接受，通常要依靠一个有威望的革命者的引荐，并且这个人要设法讲清其历史背景，然后才能赢得共产党当局的信任。

江青到延安后很快前去拜见了当时共产党组织委员会的负责人李富春(也是妇女运动的先驱蔡畅的丈夫)。

李富春,字任之,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青少年时代,他目睹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状况,立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斗的志向。

1919年10月,为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远赴法国勤工俭学。

到法国后,李富春同志做过钳工和火车司机。

他深入研究法国社会问题,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士兵作调查,写下了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厮杀的战争本质。他还发表了《法国哈佛尔施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的调查报告。在深入考察法国社会和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逐步从信仰工学主义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他和李维汉等同志一起,将他参与发起建立的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确定“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

他积极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的运动等多次政治斗争,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2年6月,李富春在巴黎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并参与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1924年改名为《赤光》)。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江青向李富春讲述了自己的政治历史，描述了她在上海时所遭受的政治上不公正的待遇。

她讲了她如何一直在设法同党组织联系上。但一直没能如愿。她讲了自己曾在青岛就已加入了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的那些领导们歧视她的理由和原因她从来不清楚。

在李富春面前的这一番陈述和控诉令她很是激愤，李富春对她很是同情。

于是不假思索地安慰她道：

“从现在起一切都会好的。”

“一切都好”是依据一个人到达延安的时间而对其政治立场所做的一个判定。

先前就同党有过关系的人可以优先获准进入党校和其他主要的教育单位。

大战爆发后大批的学生和城市知识分子涌入延安，因而进入这些学校和部门便有了很强的竞争性。

江青立即看准了最高学府党校。

录取权取决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他们只收那些历史上清白的人。

江青回忆说自己当时站在那些著名的领导人面前时心情十分地紧张，他们把过去的她评论为是一个女演员和政治积极分子，他们考虑到了每一个细节，而不管它是否同他们当时的政治情形有直接的关联。

毛泽东的老对手张国焘是少有的几个当代领导人中记述到江青被延安政府接纳情形的一个。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

1932年前在中央机关工作。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第一把手，曾大搞肃反运动杀害了许继慎等一批红军根据地早期高级将领。但从未当上中共和红军第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

他有8万多人，毛泽东统领仅不足一万人马，便想争夺中央领导权，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中央红军在延安建立并巩固了根据地之后，南下期间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张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和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会师之后张即被边缘化，被剥夺了军权并遭到批判。

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 after，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说是代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遇上蒋鼎文后到了西安，投奔中国国民党。

4月11日周恩来来到武汉汉口与张多次协商未果之下，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张的党籍(于4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

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

1949年转居香港。

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曾经写作《我的回忆》。

张国焘叛党背叛中国共产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

张国焘说：

“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

王明说：

“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

他告诉张国焘：

“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

“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

“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

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

“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便匆匆离去。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但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

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

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

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

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

交待完张国焘，让我们再重新回到江青的身边来。

当时张国焘是陕北边区政府的主席，也就是唯一被外界承认的当地政府。他的回忆录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江青到达延安的时间。

他写道：

1937年夏末，录取权由公共关系部掌握。尽管名义上是在边区政府书记处的领导之下，但它实际上是直接受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并且是作为其政治安全局来行使自己的职能的。

但在实际情况中，公共关系部是由两个人的意志支配的，他们是毛泽东和张闻天。

被公共关系部接受的一些人，他们尽管被怀疑为是准共产党人，但却依然被看作朋友，他们中有“民主人士”梁漱溟，军事家何致礼，以及成为毛的最后一位妻子的女人江青。作为一位“演员”她的到来并未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

4

几年后，江青回忆说，当她和李富春谈起他们在边区的日子时，李富春笑了起来，他想起了当时他是如何吓唬江青的。

那时江青正在参加党校的面试。

最后江青还是通过了面试，但那只是她跃过的第一道障碍。她同样也想进入鲁迅艺术学校(后来的学院)，但这是在她进入党校的同时还是之后的事就不清楚了。

光有过去在表演艺术方面的经历是不够的。政治资格才是最重要的。

当她在鲁艺的官员们面前陈述她的情况的时候，当时的组织部负责人、中央委员之一的陈云会见了她。

知道了他（陈云）亲自负责录取工作时，江青竭力地想使他对自己渴望学习马列主义的热诚产生深刻的印象；她告诉陈云她是带着行装来的，她是如此渴望进入鲁艺。

她的表白使陈云确信她是愿意服从组织的决定的，于是直接录取了她。

陈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戏迷。

在他录取江青进入鲁艺后不久，他特意去观看了她的表演。演出结束后，他对江青说：

“为革命演戏，做一个无产阶级的好演员，光演技好还不够，首先要思想好，政治过硬。”

总的来说，江青在延安生活已开始步上了正轨。

秋天，她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军训，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在军队面前亮相。

这是一件值得记录的事。

军训的同时，她也接受了她在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这方面的最初正规训练。

而后者，当时主要是由王明在党校倡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教。

尽管王明比江青大不了几岁，但他在上海那些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们当中，却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最高的传道者，而毛泽东，则只不过是其远在延安的一个思想认识上的对手而已。

她继续从事着表演艺术方面的工作，但她却避而不谈其演出的剧名和角色。

她强调说她在文艺方面并没有多大的特长：

“在上海，我呆了四年。两年我是在文化圈子的上层工作，另两年则是在基层。当我到延安后我的职业变了。最初我并不想去鲁艺，但我不得不服从组织的安排，去那里工作。”

江青接着补充道：

“我喜欢在群众中工作。同艺术这样的工作比较起来，在群众中工作更重要。群众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础。”

很显然她的感情是很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心理则产生于对过去的回忆。

她不想重蹈覆辙，想当初在上海刚踏入演艺事业，便遭到了上级张肯的百般刁难与打击报复。

是陈云的一席话打消了她的顾虑。重新燃起了她对演艺事业的热情。

5

张颖——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许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海外却享有极高的声誉。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驻外负责宣传工作的责任人。

在我的这次访华期间，她作为江青的主要助手，对我的采访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谈论到延安时，许多问题江青都是向她咨询并通过她确认的。

张颖虽比江青年轻八岁，却有着与她同样辉煌的经历。

她思路敏捷，洞察力极强。正式场合却简言慎行，极少说话。一旦走出会客室，她便恢复了女人的天性，变得活泼和健谈起来。

无论是在宾馆或是在别墅与江青会谈，大多数时间她都在场。有时，她还会陪同我出去走走，去参观纪念碑或是去广州市内下下馆子。

我知道，她其实是负有双重使命的。一方面，她要负责我的安全，另一方面，她同时还要负责监视我。监督我与其他中国人是否有过接触。

所有一切她都会向江青汇报。

会谈中，她不仅是做做口头翻译，许多重要文件都是通过她整理后才交到我手上的。

对于当年江青到达延安的时间，外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好几个版本。

她却十分肯定，江青是1937年8月从上海经由西安来到延安的。

私下里，我问她：

“你怎么这么肯定？”

她回答我说：

“江青到了延安之后，不久我也去了那里。是同年11月。不是别人所说的1938年或1939年。”

语气十分坚定。

她跟我讲了许多当年在延安的故事。说着说着，有时候会突然大笑起来。她到延安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只有十五岁。

她是广东人。普通话也说得非常好。

“你为什么去延安？”

“为了打日本！这是去延安的所有进步青年的共同心愿。可是，到了西北后，我第一次讲话，大家都嘲笑我的方言是奇怪的声音。为这

我没少吃苦头。为了克服自己的粤语口音，我每天都要比别人早起，一大早就跑到山里去，用普通话大声朗读戏剧脚本。”

“你和江青一样，都是演员？”

“不能跟江青比，我算不上是真正的演员。”

说这话时，她显得有些羞涩。

“我永远都演不好戏。因为我没有这个天分。”

张颖没有演戏的天分，在其他方面却有着他人所不能及的优点。前面我已经说过，她是一个警惕性很高，而又性格内敛的人。

有一天晚上，江青停止了讲话，伸手拿过几分钟之前助手送进来的一只长方形的盒子。

盒子里装着两把精致的裁纸（开信封用的）刀。一把是象牙做的，另一把是竹子做的。

锦盒外面都有两个骨头别子，插入布扣中，可以将盒盖扣紧。每次在锦盒中放好象牙摆件后，应随手把骨头别子插好，这样即使是盒子偶然翻倒，也不会损伤象牙件活。

有时候买象牙件活时，没有锦盒。用软纸缠绕多层，便可以安全携带了。

江青开玩笑地说：

“这两把都不适合你。”

她手里拿着两把裁纸刀把玩着，一时间拿不定主意，该送我哪把好？

“两把都很漂亮。不过，看起来象牙的要更珍贵一些……”

江青喃喃地言道。

说着，俯身将那把竹子的裁纸刀递给了张颖。

“这个给你。”

张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脸上写满了惊喜和意外。

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一把普通的竹子做的裁纸刀。它是文革期间，长沙马王堆考古挖掘出的千年古董。具有艺术和历史双重价值，属无价之宝。

两天后，张颖私下里找到我，非要将她手中的裁纸刀送给我。我拒绝了。但她的坚持让我有些困惑，于是我提出用我手中的象牙的与她交换。

她依然不肯答应：

“我知道你喜欢竹子。”

天呀，她是怎么知道的？这着实让我吃惊非小。

原来，她观察到每天清晨当我走出宾馆外出散步的时候，总喜欢观赏竹林和刚刚出土的竹笋。并且还拍了不少的照片。

最后，我让步了。

收下了她的一片“心意”。

注：回美国后，找专家鉴定，张颖送给我的这把竹子的裁纸刀并非是出自马王堆的文物，而是赝品。张颖此举，平白无故让我心里多出了两个疑问：是江青原本送给她的就是赝品？还是张颖跟我玩了一手狸猫换太子呢？我可不敢胡乱猜疑，妄自菲薄。以免又多生出一桩冤案来。

谈到江青的延安时代，很自然地外国记者想知道她是怎么遇见毛的，又是怎么进入毛的私生活的？

对此，她没有回答。

但是在那张众人熟知的面孔上，显然闪现着浪漫思绪的光彩。

还在上海时她就听到过关于红军神奇领袖毛泽东和他的著名搭档朱德的许多传言。

朱德（1886年—1976），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

1909年初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

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

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

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琪瑞的护法战争。

1921年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2年8月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在柏林结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德国格丁根市一所大学里留学。

1925年年内返回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

1925年7月到苏联学习军事。

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

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革命军事干部。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后，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击败，他率领余部转至湖南南部，发动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8年4月率部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即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他和毛泽东指挥部队多次战胜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1月和毛泽东率部向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进军，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先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协同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根据地。

朱德生前虽受毛泽东赞赏、受全国人民爱戴，但死后却未能福荫子孙。

1983年“严打”期间，朱老总最小的孙子因“触犯”法律，（实情是他在谈恋爱期间，因一时控制不了自己强行亲吻了一下恋爱对象，结果被对方告发。最后以“流氓罪”论处。）在邓小平的指挥下在天津被处以极刑。一时间，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

其中最著名的是：

邓小平找康克清谈话了，做她的思想工作。

康克清很气愤对邓小平说：

“这是在朱老总头上动刀子，难道当年朱老总批评你多了？你现在想公报私仇。”

邓回答说：

“你自己看着办吧，什么动刀子不刀子的，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再说了，他能算王子吗？今天我是给你面子，你好自为之吧。”

康克清强忍着眼泪，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就在朱老总的小孙子被执行死刑的次日，康克清外出参加重要活动。

行车途中，她内心极不平静地对司机刘国和说：

“刘师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孙子昨天给枪毙了。”

“我也听说了，但没敢问您。”

稍后，刘国和又谨慎地问：

“听专车司机们说，您在判决书上签过字？”

康克清略显激动地说：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能不签字吗？”

说完大哭起来。

其实，为康克清心里明镜似的，邓小平之所以唱这么一曲，完全是因为文革开始之前朱德所投下的最后一票，也是最关键的一票！

此后，康克清曾在饭桌上气愤的对着孙子们发火：

“你们出了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是在折腾你爷爷！你爷爷死了，你们如果不争气，做了违法的事，我也没有办法，我保护不了你们，我还要我登报声明，与你们断绝关系！”

相关连接：

当时朱德的孙子是按照当时的刑法第160条流氓罪被判处死刑的，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当时还有几个老红军的孩子一块儿被开除军籍并被枪毙的。

上海当时被枪毙的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工作的原上海宣传部部长的儿子陈晓蒙。也是同样罪名。

按照那个标准，当年保守估计被枪毙起码1000万人以上，可是那条法律早在新刑法中已经被取消了。

一千万，听起来挺吓人。

一千万，等于或大于某些小国的总人口。

可比起因“计划生育”惨死在母腹之中的三个亿的婴儿，这被邓小平搞“严打”枪毙掉的一千万人口，又算得了什么呢？

话说当年，零星的新闻报道及穿梭于红区与白区的旅人所描述的毛的形象，既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也是一个用现代军事意识武装起来的人民的保护神。

对毛的外貌她只略知一二，对毛的个性，她则是一无所知。

同许多其他新来者一样，江青也深深地为领导同志中间个性与地位的差别所吸引，并且她也逐渐地意识到了毛的高踞奥林匹斯山之巅的清冷的光辉，一些人私下里把毛比作了宙斯神。

但在她到延安的最初几个月里，她的生活主要是受那些掌管着延安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机构的领导人的左右的。

然而在她到延安后不久，毛泽东还是知道了她叫蓝苹，是位女演员。

对此她又是如何说的呢？

毛找到她，给了她一张他将在马列主义学院举办的讲座的入场券。

她吓了一跳，谢绝了。

然后又很快地克服了自己的羞赧，接受了这张票，并且前去聆听他的讲座。

他们约会往来的方式对领导层来说是不显眼的，你很难把他们的交往同群众场面区分开来。

她不想让事情公开，传统的观念与革命的条规都不允许她公开她与毛恋爱与婚姻的细节。

每当谈起思想意识上的纯洁以及在公众面前频繁亮相时，江青会说，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去表现那些体现着“资产阶级

谬误”的个人的情感、罗曼蒂克的幻象和颇具诱惑力的性，都将是对非个人的和不讲性别的“无产阶级”理想的歪曲。

尽管有些自相矛盾，但还是发现她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情感、不同寻常的想象力以及显而易见的女性气质的人。

然而她所讲的又不足以让人相信她曾经历过因浪漫的爱情与革命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困惑。

那么，江青与毛二人有没有感到他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表面上看来他们二人历史背景上的差别要远比他们相似的东西更令人注意。

难道是那种种的差异有什么奇异的吸引力不成？

韶山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夏热期长，严寒期短。韶山一年四季都适合旅游，最佳季节是3月—10月。春天，可以欣赏韶山的青山绿树，还有满山的红杜鹃！夏天，滴水洞是避暑纳凉的好地方；秋天，韶山的丰收景色让你陶醉！年平均气温16.7℃，较四周县市略低，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9.5℃（1963年9月1日）。一月份平均气温为4.4℃，持续5天或5天以上的严寒期78%的年份出现在该月。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28.9℃。韶山年平均降水1358毫米，最多年份达到1719.9毫米。雨季在4月15日前后开始，7月10日前后结束，春夏多雨，秋冬干燥。韶山日照偏多，年日照达1717小时，年平均日照百分率为39%，分布趋势与气温变化基本一致，即1月—3月日照较少；4月开始，春暖花开，艳阳普照，7月太阳最强，从头顶直泻而下，青山绿树被晒得油光闪亮。9月后，

有一段秋雨绵绵天气，但更有秋高气爽的赏菊踏月登高季节。冬天因为山的屏障，显得暖和，一当瑞雪初降，玉树琼花，煞是好看。

只可惜此次访华行程太紧，实在抽不出时间到毛主席故乡——韶山，走上一圈。

据我所知：

两千五百多年前湖南曾是楚国的辖地。从宋朝以来湖南曾因绿林土匪的出没而闻名。

从19世纪以来湖南更是孕育了无数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革命者。

5

江青，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她来自沿海的省份山东，这里曾是古代的鲁国，孔文化的诞生地。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汉族，东周时期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

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区又被称为儒家文化圈。

孔子姓孔（祖父字孔，以其为氏），名丘，字仲尼，在家中排行第二。

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古文献整理家，儒家学派编撰人，被后人推崇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出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相传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撰《春秋》。

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中国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作成《论语》。

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汤恩比博士说，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

19世纪山东爆发过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并且产生过一支叫作“红灯照”的妇女部队。

红灯照，一作红灯罩，是义和团运动中的女性组织之一。一般说法是她们全身穿著红色装束，手提红灯笼，故称作红灯照。

红灯照义和团的组织，是以坛为基层单位，分属于八卦八个团(总坛)，各团有老师为首领，而坛有大师兄、二师兄、...等为其领导。

义和团中妇女组织亦类似男性组织，但其独立于男性各团之外，而有自己的坛口，然而经常附属于某个总坛而与之配合，例如黄莲圣母所领导的天津红灯照及张德成的坎字团就是这种关系。

团员一般彼此以姐、师妹称呼，其首领称作大师姐、二师姐...等，在天津的红灯照，则称其首领为黄莲圣母、二仙姑。

妇女组织的发展以天津城最发达，并以其为中心在四周地区发展。

义和团在天津独有一种专收妇女的拳会，叫红灯照。入会妇女统统穿了红衣红裤，右手提红灯，左手持红折扇，年长的头梳高髻，年轻的绾成双丫髻。

红灯照的大师姐林黑儿被称做“黄连圣母”，传说功法也了不得。

入了红灯照的妇女，跟着这位大师姐在静室习拳，用不了几天，就能得道术成。

一旦术成，持了红折扇徐徐扇动，自身就能升高登天，在空中自由飞翔。这时右手的红灯投掷到哪，哪就是一片烈焰火海，其威力宛如现在的轰炸机了。

林黑儿，南运河下游十里一船户之女，是义和团青年妇女组织红灯照首领，1900年春，林黑儿之父被洋人无故逮捕入狱，增加了她对侵略者的仇恨。

5月，在静海独流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的支持下，准备在杨柳青设立红灯照坛口，因遭地主石元士反对，未遂。6月初，在天津城沿侯家后运河边设立红灯照坛口，自称“黄莲圣母”。

曾参加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并带领红灯照救治在反侵略战斗中负伤的义和团团民。

天津陷落时被八国联军所俘，不知所终。

义和团中妇女的出身类似于男性，多来自于社会的中下阶层。例如天津红灯照的领袖黄莲圣母林黑儿，即本出自船家，而且曾为妓女，她在天津地区就多召集下层的女子加入红灯照。

又如在义和团中地位不低的女性翠云娘，早年是与父亲卖艺江湖为生的。下层的妇女们较感受到生活的困苦及外人和教民的压迫，且较易相信迷信的法术信仰，因此加入者较多。

义和团为一具民间信仰色彩的武术团体，因此红灯照亦有种种的武术和法术训练，平时在她们师父的领导之下，会练习如挥刀、煽扇子等的功夫，训练常十分严格而辛苦。

据说红灯照女性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练习之后，可步行水上而不湿，并可腾空而飞，又手中扇子一挥，则敌人大炮会不响，或者船舰房屋会自然起火等等。这些法术虽多半为迷信和宣传的幌子，但也因此吸引了更多女性的加入。

在义和团运动中，妇女的主要参与包括医疗救护、情报的搜集、实际作战、以及在宣传和团员心理上的支持等。

在医疗方面，红灯照的黄莲圣母自称能医治各种病伤，因此向她求医之人甚多，而且据一些参与义和团运动的老年人的口述，她们真的医治好了不少受伤之人，并且称赞黄莲圣母的医术。

在实际作战上。一方面红灯照经常四处出动，凭借她们的“法术”焚烧西人房屋教堂及船只等，她们因被认为不怕“秽物”，不怕枪炮，因此常与义和团男性组织联合作战，由天津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常和黄莲圣母联系，商讨作战计划，可看出二者在战场上的紧密关系，红灯照成员们虽为女性，但在史料中记述许多人在战场上作战英勇，视死如归。

此外，在东北也有红灯照组织对抗俄军的记载。

在宣传和心理上。如黄莲圣母到铁铺买螺丝钉，却自称盗自洋人大炮，又宣称能用香灰治枪伤，又用各种神迹的宣传，使人们相信红灯照都具有神力，一方面使人们敬服，一方面能提振团众的信心及士气。而另外有所谓“踩城”的制度，每隔七到十日出户绕村子跑，边耍刀边喊口号；又有“出风”，即在公共场合练功夫。

借著这些方式，达到对大众宣传的效果。

当时下层百姓受到外人及教民欺侮而生活困苦，正需要如圣母或红灯照仙姑们这种一方面“法力高强”能对抗外人保护大家，另一方面又具有温柔女性形象的“神”来作为心灵上的慰藉，这和中国传统女姓神祇如观音、妈祖等广受到大众欢迎的情形颇为类似，而义和团也正利用这种群众心理，刻意地以宗教宣传等手法塑造出了红灯照及圣母们“女神”的形象。

红灯照女子虽努力于爱国反帝的运动，但毕竟其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所倚仗的也是迷信的法术，同义和团运动中很多民间组织一样，在其后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天津城破，黄莲圣母及城内的红

灯照女性，或被抓被杀，或自缢而死，不少女子被抓时态度多十分从容，亦有不少人求自杀殉死以保名节，其他地区的红灯照组织也随者义和团和清军的失败而瓦解（在义和团运动中，清军的无耻绞杀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在红灯照中，可看到不少女性因加入而提高了自身地位，获取了权力。

如天津红灯照首领黄莲圣母，清朝官员裕禄之尊，竟曾经朝拜之，她和其妹三仙姑行走时，皆有大批男子随侍保护，人民敬之为神。而对于红灯照女子，“人民皆焚香跪接，不敢仰视，称为仙姑，拳匪遇之，亦跪伏道旁”。

虽然她们的地位及权力异常地超出一般妇女，甚至更高于义和团中的男性，她们被尊敬甚至崇拜，并非是因为她们女人的身分，而是她们被视为“神”，她们是靠著宗教上的力量，被认为受到神明的附身，具有神性，因此能够得到甚高的地位，因此并不表示妇女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

就整体上来看，义和团对于一般的女性是甚为鄙视的，他们认为妇女是污秽的，他们的法术常会因妇女的污物而被破，因此在他们的活动地区，经常禁止妇女出屋。

一种说法是因为男性义和团员因会受外国人和教民妇女“秽物”的影响，而被破解法术，故要靠同为女性的红灯照来“以毒攻毒”对抗敌人。

这些想法都仍延续中国传统对女性的歧视。也可见少数女性的受到重视尊敬仍只是一个表象，一般妇女仍然地位甚低而不受重视。

但另一方面，红灯照妇女的活动实际上打破了传统妇女在生活上的一些限制，参加义和团妇女组织的女子，得以借著修习法术、保卫国家等“正当”的理由，在生活上突破传统的家庭和礼教对于女子的种种束缚，如女子不得任意出户，女子不得参与公领域事务等等。

而在妇女身体解放的主张上，义和团中有妇女不梳头，不缠足的说法，似乎是主张解放传统对于妇女身体的束缚。但这种说法却经常是配合著义和团仇外爱国的想法及行动而起，如义和团歌谣唱道“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似乎并未认真看待妇女身体解放的问题，而更着重于杀洋人的目的。

而不缠足不梳头的最大的目的，实是认为缠足、梳头会造成秽物，会破解义和团的法术，因此才加以禁止。此外不缠足的主张也应是有益于行动和作战上的方便。

20 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列强争相要控制山东半岛，从而激起了民主主义情绪的高涨，并唤醒了江青的政治意识。

毛在满清王朝的末期诞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受的是儒家典籍的教育。

他对家庭为他规定的儒家文化的反叛，开始于他对如下这些古典小说的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

共和初年诞生于一个贫穷的文化家庭的江青，只是对最基本的儒家价值观知道个大概，诸如严格的自律及三纲五常的区分。

她要比毛年轻20岁。她只是粗略地浏览过那几部历史小说，这些传统对男孩子和男人们更具吸引力。

她的兴趣在现代剧上，那些戏剧为她展示了外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但她仍然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尤其对《红楼梦》和《金瓶梅》这两部书。书中描绘了置身于财富、贵族身份以及权力中的生活。

《红楼梦》，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章回体长篇小说，成书于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其原名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前80回曹雪芹著，后40回高鹗续（一说是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这本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宫廷、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族的腐朽，对封建的科举、婚姻、奴婢、等级制度及社会统治思想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

毛泽东一生喜好《红楼梦》，曾明确指示党内高管，人人都要读《红楼梦》。读一遍不行，至少要读二遍以上。

《金瓶梅》亦是中国古代另一部奇书。它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为引子，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富商3种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体现当时民间生活的面貌。描绘了一个上至朝廷内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官僚恶霸乃至市井间的地痞、流氓、宦官、帮闲所构成的鬼蜮世界。

西门庆原是个破落财主、生药铺老板。他善于夤缘钻营，巴结权贵，在县里包揽讼事，交通官吏，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

他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聚敛财富，荒淫好色，无恶不作。

他抢夺寡妇财产，诱骗结义兄弟的妻子，霸占民间少女，谋杀姘妇的丈夫。

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享乐欲望，他干尽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由于有官府做靠山，特别是攀结上了当朝宰相蔡京并拜其为义父，这就使他不仅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左右逢源，步步高升。

《金瓶梅》像日记一样，它的故事是逐年逐月展开的。《金瓶梅》开篇说“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表明《金瓶梅》写的是北宋末年政和年间的故事，恰好《金瓶梅》前六回写的潘金莲和西门庆偷情的故事是从《水浒传》中抄袭来的，读者早已知道《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政和年间，于是更加深信不疑地认为《金瓶梅》写的真是北宋末年政和年间的故事。

明代的皇帝，广事罗致妇女，以为后宫淫乐，史籍记载颇为详尽，正德皇帝则是其中最为出名的。可以说明中叶以来，君荒臣纵，纲纪

日坏，明武宗正是这样一个倡导者，明武宗朱厚照1506年继位，至1521年驾崩，在位16年。

《明实录·武宗外纪》记载，武宗即位后，“又别构院御，筑宫殿数层，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名曰豹房”，以供淫乐。

原书作者笔名“兰陵笑笑生”，全国名称兰陵的地方仅两处，一处是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县。

《金瓶梅》是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巨著，它假托宋朝旧事，实际上展现的是晚明政治和社会的各种面相，是一个社会断层的深入剖解。

一、全书描写了西门庆的一生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并以西门庆为中心，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一方面反映官场社会，展开了一个时代的广阔图景，彻底暴露出人间的肮脏与丑恶。

西门庆一方面凭借经济实力来交通权贵，行贿钻营，提高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地位来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扩大非法经营，从而成为集财、权、势于一身的地方一霸。作品还通过西门庆的社会活动，反映了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官府权贵与豪绅富商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现实，从客观上表明了这个社会的无可救药。

二、《金瓶梅》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西门庆及其妻妾的家庭活动，写出了这个罪恶之家的林总，反映了正常人性惨遭扭曲和异化的过程。

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代表的诸多女性，尽管出身、性格、遭遇不尽相同，但都被超常的情欲、物欲所支配。

她们以扭曲的人性去对抗道德沦丧的夫权社会，又在人性的扭曲中走向堕落和毁灭。作品在原始欲望的文本表象下面，同时具备了对人性本质的拷问，善与恶的分界在这本书中有了另一种解释。

毛泽东认为《金瓶梅》描写了真正的明朝历史。

江青19岁入党，毛泽东28岁入党，这一差别常常令人误解，因为共产党在毛泽东他们倾心建立起之前在中国并不存在，并且江青的党员身份也曾因一度脱党而并非连续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四处云游的青年，他曾不很认真地考虑过自己的职业，诸如制皂工人、教师、律师和商人。

也只是在他的后几十年的生命中，他才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做一个革命领导人上来。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江青把自己献身于一个职业上几乎达十年之久，当她23岁遇到毛泽东后，她才把自己的精力分散于她的专业与党的工作二者上。

也许可以这么说，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反差正好体现了时代的一个主要的辩证法，即农村与城市的对立统一。

直到1949年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毛从未曾连续地在一个大城市中生活过。

而江青从15岁起，就居住在优美的省会济南，然后是现代港口城市青岛和上海，并且偶尔还到北京去旅游。

其实她的整个成年生活的上海，则是她的文化品味上的试金石。

毛在上海的经历则比较动荡不定和琐屑：

1921年他出席了共产党成立的秘密大会。

1922年冬天又很快地返回，第二年成为党的组织部的负责人，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职于国民党。

他也曾做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洗衣店的送衣工——这在由外国人控制的上海是人所皆知的卑下的工作。

他的都市生活经历的贫乏同时也体现在他的著作中。

他没有一篇文章是论述上海的政治史或它的先进的社会及经济结构的。

故此，王明曾讥讽他：

“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6

如同其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在婚姻生活中毛也是一个革命者。

毛的第一次婚姻是同一位没有文化的农家姑娘，是按传统的方式由其父母包办的，当然毛从未与该女子完过婚。

这无疑是毛打响的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枪。

他的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杨开慧。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乡。杨昌济之女，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与毛泽东生有三个孩子，分别是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

在毛泽东率领中共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后，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她拒绝退党或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于1930年11月14日被杀害。

1957年毛泽东为纪念杨开慧特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

她不满3岁时，父亲杨昌济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远涉重洋去留学，杨开慧在母亲向振熙的抚养下度过了童年。其父杨昌济是闻名三湘的学者、教授，他思想先进，开慧虽为女儿身，但父亲也为她取了名、字、号。7岁时破例入长沙第四十初级小学，书香门第出身的杨开慧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气。

1913年杨昌济从国外归来，任教于长沙湖南省立一师，全家从乡下迁来长沙，住在大鹅塘。

杨开慧跟随母亲陪伴从国外留学回湘的父亲到长沙居住，正是在这段时间，杨开慧第一次见到她生命中至关重要、后来与她生死相依的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是杨开慧父亲杨昌济先生的学生，而且是杨昌济最赞赏的学生，杨昌济当时就已经意识到毛泽东将来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就大业的栋梁之才，对他欣赏和教授得格外用心，

而按当时的师生之礼，毛泽东常去杨昌济家，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后来成为他妻子，成为他三个儿子的母亲的杨开慧，那时，她还是一个13岁的少女。能看见自己爱的人从少女长成亭亭玉立的美人，然后在她生命的春天，用心去追寻、然后获得那份少女纯情，不是每一个男人一生中都能得到的幸福，而毛泽东就是一个有这份幸福的男人。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杨昌济以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吸引着向上有为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经常去杨家向老师请教各种救国救民的大道理。

从迁居长沙到 1920 年 1 月杨昌济病逝，杨开慧没有再进入学校。

在家里由父亲指导自学。当毛泽东等来家向父亲请教时，她总是搬一条小凳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论治学、做人之道，研讨朝代兴衰，探寻救国救民真理。

毛泽东和杨开慧日渐熟悉，毛泽东像兄长一样照顾比自己小 8 岁的师妹。

1918 年夏，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举家北迁。1918 年秋，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前去看望老师杨昌济并在杨家小住。

毛泽东 9 月间来到北京，并经恩师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每月工资 8 块大洋。

毛泽东虽是暂住杨家，小师妹和他接触的机会却多了，他的言谈、举止，特别是他那忧国忧民、雄心救国的宏图壮志，使杨开慧深感他是个不平凡的男子，有着非凡的才干和令人着迷的魅力。

她已经暗暗地喜欢他，愿意和他接触，听他讲话，几天不见就有点心烦意乱，甚至坐卧不安了。正是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清晨起来坚持洗冷水澡锻炼身体，而且寒冬腊月都是这样坚持着，这也

使得杨开慧从内心深处对他产生了一种敬佩，正是这时毛泽东和杨开慧开始相爱。

17岁的杨开慧，不仅树立了自己的人生观，而且有了自己的爱情观。

她认为：对爱，不能一厢情愿刻意去追求，那样很容易而且最终会失去真挚的、神圣的、高尚纯洁的爱情。

她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态度：

“不完全则宁无。”

杨开慧的父母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有意识地给他们更多的接触机会。

两情相悦，两性相吸，爱情之神同时打开了两个年轻人的心扉，两颗还没有品尝过真正爱恋之果的心，开始惴惴不安起来，而且是越来越移近了，贴紧了。在故宫、北海、香山，常看到他们的游踪，秋天的红叶、冬天的白雪，在这一对年轻人的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回忆。

他们的爱情像红叶那样艳丽，像白雪那样纯洁……他们越走越近，互相之间连称谓也渐渐由“开慧”、“泽东”改成“霞”、“润”了。

1919年12月8日，毛泽东率驱张（敬尧）代表团第二次到了北京，当然住在开慧家里。

一年多来，鱼雁传书，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毛泽东正是在北京遇见了他人生的挚爱，而爱盈于他的胸怀和脑海，流溢在北京的湖畔、高墙和青砖胡同间，这一次在北京，他爱的是一别经年、已

经出落成花季少女，而意志和内心情感都另有新天地的恩师的女儿杨开慧。

而杨开慧在北京重逢毛泽东那年是 18 岁，在少女灿烂如花的岁月里，她遇到了一位有大情大爱、胸怀天下、中国历史上后来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如此绚丽的爱情，将因为汇入了中国历史的巨澜、命中注定将会是惊天动地，而这一切在 11 年后当杨开慧因为挚爱毛泽东而舍身抛子走上刑场时，最终成为沉重的现实。

不久，杨昌济染病，杨开慧日夜侍于病榻之侧，并为父亲读书读报。

每期《新青年》是必读之书，从这里，杨开慧汲取了许多新思想新道德。

1920 年初，杨昌济不幸在京病逝，临终前，他给老友章士钊写信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

信中说：

“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北京和长沙的教育界都为杨昌济开了追悼会，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守灵，帮助料理后事，父亲病逝后杨开慧随母亲、哥哥回湖南。

这一年冬天，在长沙市望麓园附近的船山书院内，杨开慧和毛泽东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仅花了 6 元大洋请至亲好友吃了一顿饭。

婚后的毛泽东和杨开慧聚少离多，这对革命伴侣为了执着的信念经常天南海北。开慧的性格自有她刚毅、坚强的一面，但在情感世界里，她又是那样多愁善感。

这便注定了杨开慧作为一个女人所应承受的情感磨难，而这又是和毛泽东身份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的。而毛泽东的内心又埋藏了多少对开慧的依依不舍！

1927年夏，八七会议后秘密潜回湖南的毛泽东日夜进行暴动的准备，杨开慧则照料着丈夫的生活。

8月底，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

杨开慧给丈夫带上草鞋，并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但谁也没有想到，此次话别，竟成夫妻之间的永诀！

因关山远隔，音信不通，三年间杨开慧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屡“剿”“朱毛”却总不成功的消息，既受鼓舞又生牵挂。

同时，开慧的处境却是那样地险恶。

敌人到处在搜捕她，她仍无畏地奔走于板仓方圆数十里的地方，顽强地坚持地下工作。

杨开慧自小显示出一种女性的温柔，内向而又沉静的心理特征，童年的杨开慧身体羸弱，性情内向，并不爱动，因此与一般的孩子将大量时间投放在玩耍上不同，童年幼齿的杨开慧，已经有时间去思考人生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很长一段时期内，杨开慧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在杨开慧后来被人发现的自传体回忆录《从六岁

到二十八岁》一文中，杨开慧涉及到最多的内心世界之一就是她短暂一生中始终感觉到死亡的影子，而她已经千百遍的思考过人生和死亡的意义了。

在杨开慧生命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内心始终有自己将死亡的念头，而帮助它对抗这个始终萦绕着她幼小心灵的黑色阴影的、是她对

母亲和家人爱：“我总舍不得我的母亲去受那样的痛苦——看见我死的痛苦——不是有这一个人有力的牵伴，那我简直没法生活下来的可能了！”这是后来她自传回忆录中的一段话，是在认识毛泽东之前的想法。杨开慧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她敏锐的内心世界从一开始就在替自己规划未来人生最重大的抉择：生与死的意义。

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被军阀何键抓捕。面对爱人，她是那样地温柔，但面对敌人，她又是那样的刚强，这就是杨开慧。

出身书香门弟、“举止温婉”的杨开慧几乎每天都被提去过堂，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还被压杠子，被打昏后又用凉水泼醒……她带着儿子岸英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极其黑暗的日子。

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

“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

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开慧勇敢而坚决地拒绝了這個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

同年11月14日，开慧在长沙被杀害，年仅29岁。

牺牲前她只说了一句话：

“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杨开慧牺牲的当晚，尸体被远方舅舅偷运回家。7岁的岸青和仅3岁的弟弟毛岸龙抱着妈妈的尸体大哭不止。

过了十几天，毛岸英被营救出狱后，才准备掩埋开慧的遗体，三兄弟与妈妈难舍难分，痛哭不已，毛岸龙还非要和妈妈“睡”在一起。

在场的人无不痛哭失声。

毛岸英是第一个止住眼泪的，他擦了一把眼泪对两个弟弟说：

“我们要懂事，要为妈妈报仇！”

那时毛岸英8岁。

不久，正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妻子牺牲的消息，痛彻心肝。

他在给杨家的信中说：

“杨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时至27年后，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更是寄托了毛泽东对亡妻的绵绵哀思之情。

杨开慧的牺牲，是中国革命历程中最壮烈的一幕之一，因为杨开慧是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牺牲和痛苦，这其中有她骨肉相连的、命运未卜的三个儿子，毅然决然走向刑场的，几十年过去后，我们仍被烈士的刚毅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震撼。

作为一位男人以及如此一位不受条规和贞洁观限制的人，毛总是无拘无束地谈论他的伴侣。纵使在两次再婚之后（他的第二位妻子是贺子珍），在一首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他仍然表达了自己对杨开慧的敬爱之情。

贺子珍（1909—1984），女，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省永新县黄竹岭人，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妇委书记；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生于1909年9月28日，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

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其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寨躲避国民党追捕。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被袁文才派到毛身边工作。

当贺子珍等人在指挥永新暴动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

塘边村遇险后，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迅速升华。

毛泽东温存地对贺子珍说：

“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就这样，“湖南佬”和“江西妹”他们俩终于结合在一起了。

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红色土匪”袁文才做了几个好菜，大家热闹一下，就算喝了喜酒。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将进入云南省境。

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

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

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伤员隐蔽。

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

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

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

“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

说完，又昏迷过去。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将进入云南省境。

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

毛泽东撤离了瓦窑堡来到保安后没几天，贺子珍就分娩了。

她生了个女孩。

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里，有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等32位女性。

她们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摸爬滚打、风餐露宿。她们有男儿一样钢铁般的意志，也有共产党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共同走过漫长的长征路的女战友们知道贺子珍快要生产了，都来看望。

她们刚走到窑洞门口，就问笑咪咪的毛泽东：

“生了没有？”

“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

毛泽东一副高兴的表情回答说。

战友们走进窑洞，看到贺子珍身边放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

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

“真是个小娇。”

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

1947年娇娇从苏联回国，毛泽东给她取了个学名：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

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她生气时也常把负责警卫的同志找去诉说不平，为她评理。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

又说：

“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内中有一段曾志与毛泽东的对话，可印证史沫特莱和斯诺所叙述的故事。

当曾志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

毛说：

“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1937年，贺子珍同毛泽东怄气，伤病体弱的她到西安养病，又辗转随共产国际的代表从新疆去了苏联，没有理会毛泽东的召唤和中央的指示……到莫斯科后，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儿，隐名埋姓开始了学习生活，从小在苏联长大的李敏到了12岁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母女俩和杨开慧所生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真情相处，享受着异国的一份亲情欢乐。

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1938年，贺子珍在莫斯科生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俄文名字廖瓦，在十个月时染上肺炎夭折。

当贺子珍悲痛欲绝地告诉岸英岸青哥俩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贺子珍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外婆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哥俩第一次向贺子珍喊出“妈妈”，这样的亲情悲情，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贺子珍正沉浸在相继失去了五个儿女的哀痛中，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消息传来。

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

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丈夫，还有比这更大的打击吗？

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此饮恨终生！

得知婚变的情况非常偶然：

1939年的一天晚上，八部的学员们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

“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

全场包括贺子珍在内，都没有料到，大家久久沉默着，贺也不作声。

她非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眼泪和悲诉。

一段时间后，她才向其他红军中的女同志略略说了一些她的家庭生活——贺子珍就是这样默默咽下了苦水，去忍辱负重，保持自己苦涩的尊严。

后来，到苏联来的周恩来同志给她带来了一箱书、一封信。1940年初冬，毛泽东送女儿娇娇（李敏）去苏联看望母亲，同去苏联的孩子还有朱德的女儿朱敏以及罗亦农和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王继飞。

1948年深秋，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

困苏十年贺子珍带着岸青、娇娇回归故国。

7

“江青同志”。

一个新的名字和一个新的形象。

她像成千上万名皈依者一样，在共产主义大家庭中为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从而完全隔绝了自己同李云鹤和蓝苹及其在上海的一切故交的联系。

难道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江青这个名字是毛给起的？

其实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从字面上讲，是“江河青翠”之意。

她解释说，第一个字“江”与她的姓“李”没有关系。

但是，“江”反映了她爱悠长和宽广的长江，她在上海看到过长江的入海口。

“青”表示她爱青山碧海，而且在中国画中都被表现作青色，这是自然的色彩。

中国人认为，青蕴含于蓝色之中。

青即是一种特别的蓝，如江青所引用的古诗所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如此，江青说人们应该能读明白她的名的含义。

她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很是有意思。

江青的“青”字可以让人联想到她的旧名蓝苹的“蓝”。而江青的“江”，意味着河水；很能使人联想起“阴”。

在传统的中国思想中，阴便是女人。

在神话与历史中，女人要为河流泛滥和洪水灾害而受到惩罚。直到现在中国老百姓中仍有这么一种说法，即“女人是祸水”。

她名字中这种明显的“阴”性正好与毛的名字的明显的“阳”性相匹配。

在革命的宣传画中，毛被象征为太阳，是宇宙的基本能量，“阳”便是男性之意。

在这些图画中，太阳的象征意义总是积极的，是统领一切的，无论是文字的注释还是人们口头所咏唱的，都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还在他们结婚的最初的时日里，他们就经常拿他们二人径庭相对的经历背景开玩笑，江青脸上现出女孩的羞涩模样回忆道。

主席经常向她指出，在孩提时她学的是“要相信圣贤和读孔子的书”。而后来她便学的是“资产阶级那套东西”，包括对戏剧的沉迷。而以后她要开始学习的是马列主义，这是她学习进程的第三阶段。

事实上她很小的时候就对孔夫子的东西不感兴趣。

当她逐渐长大时她便学习从思想上支持共产党。

即使是现在，她也仍未完全在理论或实践上掌握马列主义。

江青与毛结合在一起的时代，两性关系在苏区极度不均衡。

参加长征的人们中，只有三十位妇女，而且她们大多都是红军将领们的妻子。

几乎所有已婚的士兵都不得不在出发前丢弃他们的妻儿。

而由于漫漫路途及不利的战局，几乎很少有家庭能够重新团圆在一起。

在红军于西北安定下来的地区，男女比例是 18 比 1。

一些人在没有与被丢弃的和失踪的妻子离婚的情况下，就与当地的女子同居或再婚。

但是绝大多数人由于太年轻和贫穷而不能结婚，指挥官们要求他们不得把金钱和精力浪费在娼妓身上。

他们的全部力量都要放在：

为着他们的首要职责，即打击敌人。

在红色根据地，结婚与离婚都是按苏维埃共和国的法规来进行的。

这些法规最初是在 1931 年起草的，1934 年修订过一次，1939 年又再次修订，而江青和毛便是在这一年结的婚。

法规的条款是反传统的，主张男女平等，用西方的一夫一妻（多情）制取代了中国的一妻多妾制（在旧中国通常主要是有钱人这样），自由选择婚姻伴侣取代了父母包办和媒妁之言的婚姻。

简单的结婚程序依据的是苏俄模式，是由王明加以改进引入到中国的。

但是是一些革命史籍的记载并非只是机械地申明某些社会真实。婚姻可以只是男女双方简单的口头协议，然后由党发布结婚通告公布认可。

妇女部也负责一些结婚与离婚的事情。

长征的幸存者们的精神核心。

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如同法家的革新一样，为解放区的每一个人树立了行为准则。

在过去他们也许曾为讨父母的欢心而结婚，但现在在延安这一进步的生活圈子里，父母的权威和儒家的圣贤们都被摒弃一旁，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结婚。

只要这个婚姻与党的利益一致，并且当然不能是同剥削阶级联姻。

作为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轻蔑矫情的浪漫、令人不齿的私通及形形色色的对个人情感的沉迷。

他们的一切为了革命利益的清教徒般的高尚思想，更是得到了西北地区的文化背景方面的加强。

当离婚的情况发生时(很少有)，被休掉的妻子便遭人唾弃。

这样的标准对他们的领导人来说，也是适用的。

此外，追随红军而涌入延安的大批的城市学生、艺术家、知识分子，他们的独立不羁的社会行为也打破了那些顽固的农民准则。

他们不论男女，都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

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席卷了年轻一代的文化阶层，并激起了中国艺术界狂放不羁的波希米亚风气。

他们蔑视一切婚姻的成规，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他们男女双方共同起草或解除他们的婚约，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是婚姻行为方面的先锋派。

抑或，文化界“上层”的一对男女，他们可以经由某种现代成规便能够同居一起。

关于电影明星们动荡易变的私生活方面的流言蜚语，也从沿海的大城市传到了内地的延安，并且将会传得更远。

电影明星们的绯闻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边。

表面上他已同他的妻子贺子珍这位为他养育了几个孩子的“老长征”关系破裂，并且已同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开始交往。

江青所面临的因而不只是打消革命领导人们对她作为蓝苹时的政治背景方面的怀疑，同时还要打消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们对大都市女子名声在外的自由同居、自由恋爱的生活方式的恐惧和轻蔑。

江青同毛的感情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议，但这些争议往往都同一些历史记载混淆于一起。

认识江青或是毛的人没有人敢于在报刊上公开讨论那些谣言。

抑或这里没有什么可要解释的？

譬如：什么人炮制了这样的故事，即中央委员会曾反对他们的婚姻、并做出决议——如果毛的同僚们同意他同这位颇为活跃的女演员结婚，则她必须安于家庭生活而在二十年内不得参政，甚至是终生不得参政？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在时间上距她结婚后有二十余年，似乎又证实了这种谣言。

离开上海后很久，江青气愤地忆道，她都不能不去想她在上海时那些交恶的人，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又都出现在了延安。

为了能在延安得到“公正”的对待，江青向政治局的那些高级领导人解释了她在上海受“迫害”的政治背景，以便他们能清楚地了解她的过去。

然而，在她成为主席的妻子后，她发现自己仍然不能从事她想做的工作，她担心人们对自己个人历史的误解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由于没有一个人保护(很显然甚至毛也没有保护她)，于是她又一次专门去找了党组织，她想要那些外表上似乎讲求公正的人们对她在上海的不幸有个深刻的印象。

“我们清楚你的历史，”

他们答道。

他们的话令人确信，但光是这些并不够。

江青引用了戏剧导演及当时上海地下党员负责人张庚的话，她问道：“他为什么说我是托派，并且让其他人也都相信这件事？”

“张庚不是那个意思，”

他们含含糊糊地答道。

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江青认为，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周扬的手下，他们声称张庚及其他人“并不了解她”。

其实张庚对她知道得很清楚。直到她在延安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才逐渐意识到原来张庚及其同党实际上是“敌特”(即国民党特务，然而何以特务在红军大本营中不曾暴露过)。

她从不曾忘怀是他们把她的上海生活搞得一团糟。

甚至在她成为主席妻子之后，她有權力去消灭他们，然而她控制住了自己。

在延安时张庚被批准担任鲁艺戏剧系的负责人。

对这一安排，江青或许可以加以阻挠，因为这不符合她自身的利益。解放后，张庚又是戏剧研究院的指定导演。

党组织对她不断的抚慰并不能驱散她心中的疑团，她认为一些现任的领导人反对她，并且要冷落她，不让大家知道她，承认她的地位，并且把她接纳到他们的圈子中。

基于这一想法，她又一次找到党组织的首脑人物们，向他们提供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及她如何成为其牺牲品的更进一步的细节情况。

以她作为主席夫人的身份，她想要他们明白，她是不会报复那些曾经亏待过她并且目前还在继续与她作难的人的。

他们应当明白她是愿意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的。

只要他们承认他们的过错，她就会原谅他们。然而没有人坦白。

多年后，她怀疑周扬应当为她与上海党组织失去联系和关于她的令人不快的谣言的四下传播，以及在延安时她同大家的隔绝状况负主要责任，因为从 30 年代中期以来，周扬一直是一手控制着党的文化事务工作的。但在时机成熟之前，她一直保持沉默。

多年来她一直疑心周扬、田汉、阳翰笙、张庚及其他一些左翼戏剧联盟的成员是切断她与上海党组织联系、散步谣言以及隔离她与延安群众联系的罪魁祸首。

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她才抓住机会最终来到周扬面前，直截了当地质问他：

“你知道当时我在上海以及我在寻找什么吗？”

他低下了头；

“我知道，”

他谨慎地答道。

“我努力在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江青用低沉的、郑重其事的语气说道。

1 2

江青知道国际上流传的关于她同毛结婚时的情形的流言蜚语，也知道那些出现在伦敦《中国季刊杂志》上的种种臆测。

周总理很关心她的事，不论是周还是其妻邓颖超，都知道江青不想谈论围绕着她同毛的婚姻而引发的争论。

因而，对此她有些事情要说。

在共产党抵达延安时，毛主席和他的妻子贺子珍已分居一年有余。

而江青本人则是1937年夏末从上海经西安到的延安。

这时，贺已经离开了西北，并已在苏联疗养。

尽管她从未见过贺，但她从毛的家庭成员那里，以及偶尔从毛本人那里（他很少提起贺子珍）所得到的情况，已足以对贺子珍有个“认识”。

江青认为，贺子珍是一个极固执的女人，她“从不曾理解毛主席的政治世界”。

这一点同她的家庭背景不无联系——她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从小她就习惯了富绰的生活。

每当红军在长征路上攻下一个城镇时，她都会宣布自己不想走了。因为她习惯于居住在城市里。她小的时候被宠坏了，她从没有克服掉自己对体力劳动的蔑视心理。她拒绝替主席剪报及其它简单的她份内的工作。

这些性情上的问题同她不幸的命运又纠缠在一起，江青继续说，长征期间她几次负伤，这些经历毁掉了她身心的平衡。

1935年晚期红军到达西北时，她的健康状况使她无法适应当时的政治局势，无法照顾她的孩子们，也无法与其他人正常相处。

很自然地，主席觉得她的行为无法忍受。

当党中央到达中央苏区时，贺抛下主席，发誓永不在延安定居。

她自作主张去了西安。

周恩来和邓颖超非常关心她同主席的关系，试图劝说她回延安，但她拒绝了。

没有人能说服和左右她。

她总是拿两个孩子出气，发狠地打他们。甚至在他们成年后他们都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大约是在1939年贺及两个孩子（女儿当时还很小）被送到了莫斯科。

在那里她得到的治疗是很粗略的，那些试图控制她的专家们使她的情形更糟。

出于对与世隔绝情形的绝望，她又开始打起了孩子。

最后她放弃了对孩子们进行抚养的努力。

孩子们被送进了孤儿院，而她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四十年代后期（此时斯大林对她已不再抱有幻想）她被送回了上海。

年迈的她原来住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里。

她定期接受电疗。

“对贺的处境有什么解释吗？”

我问。

“那是对于严酷生活的忧郁反映……”

江青平静地说。

无疑，毛同贺这位忠诚的妻子、多子女的母亲、长征老战士关系的破裂，其间的故事要远比江青的陈述的总和还要多。

难道她从贺子珍的悲惨命运中悟出了些什么吗？

贺子珍的命运，江青的命运，以及其他毛所倾心过的女子，都不可避免地同革命、同他的个性及其个人权力联系在一起。

当时的一些观察家们对此曾留下一些记录。同许多对政治罗曼史感兴趣的外国记者一样，尼姆·威尔斯（N y m W a l e s）有幸接触“延安的神秘世界”。

她称毛是：

“中国的亚瑟王，延安圆桌会议的首席。他的男人们便是他的骑士，他的女人们则是真正的夫人，高贵、骄傲，并有意识地为中国的这偏僻一隅树立着行为标准。”

尽管尼姆·威尔斯从不曾见过毛的最后一位妻子，但江青符合尼姆·威尔斯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直觉理解，这种直觉能够捕捉到毛泽东欣赏女性的什么方面。

她写道：

“毛是那种特别喜欢女人，而且是不寻常的女人的男人。他喜欢一个富有女人味的女人能为他营造出一种家庭气氛，他喜欢漂亮、聪颖、不但忠于他本人同时也忠于他的思想的女人。他不怕具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也不反对口红与烫发。”

在1968年再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埃德加·斯诺曾提到过吴莉莉这个人。

她是位女演员，曾令毛迷醉过，有人怀疑她是后来的江青的前奏。

30年代后期吴莉莉作为阿格尼斯·史沫特莱的译员来到延安。

后者是一位记者，并且是中共领导人的朋友。

吴莉莉是位招人眼的女子，风姿绰约，并很有天份，也很有自己的见解。

在当时都留运动短发、不抹脂粉的延安，她一如既往地留着披肩烫发，涂浓艳的口红（她从上海带来的）。

1937年5月毛随便拜访史沫特莱，恰逢还有吴莉莉、斯诺夫人（即尼姆·威尔斯）也都在座用晚餐。

同许多在延安的年轻的、政治狂热分子一样，吴莉莉也非常崇拜毛。当大家都酒酣兴浓时，她大胆地要毛握住了她的手。

就是这次的握手，成了毛天大的绯闻。

贺子珍听说了这件绯闻——而传言是否比斯诺夫人看到的更多？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她正式指控吴莉莉使她丈夫移情别恋。

毛否认了这一指控。

据斯诺的说法，离婚是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别法庭裁定的，其结果便是吴和贺都被流放延安，而后者我们知道，去了俄国。

难道被放逐的吴莉莉真的是江青的先锋官不成？

尽管江青没有专门指明她与毛交往的时间，但毛的对手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却从侧面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1938年早春，杨从上海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在那里她被安排和贺子珍一个房间。

一脸病容的贺向她介绍说她是毛泽东的妻子。

杨子烈问她为什么不在延安和她的丈夫及同志在一起。

贺说她想去莫斯科看病，不想回延安。

“泽东对我不好”，

她解释说。

“我们总是吵架。他摔板凳我就摔椅子！我知道我们完了。”

结婚的同志不应当这样，杨这么认为，并提出到延安要去见毛，劝他给她写信。贺谢绝了。

后来另一位叫刘春嫻的同志告诉杨子烈：

“蓝苹很漂亮，她能演戏。她一到延安老毛就迷上她了。他使劲为她的演出鼓掌。”

几天后杨子烈到了延安，她向毛讲了贺子珍的情况，并曾建议带她回来，但贺拒绝了。

“这全是你的错！”

她气愤地对毛说。

“你应当马上给她去信。”

毛只是笑而不语。

几天后她再见到毛时，毛告诉她：

“我已写了封信给贺子珍，但她是不会回来的。”

这封信写没写，杨无法确定。

所能明确的只是贺子珍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她不得不去莫斯科。

人们都还记得贺子珍是多么的固执——她很是有一股江西人牛一样的犟脾气。

显然，蓝苹一到延安，毛泽东就看上了她。这只是外间的传说。

与江青呆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她对我已少了许多顾忌。有时候也能与我拉拉闺房佳话。

她刚到延安后不久，即被毛泽东看上眼。不是她人长得漂亮，（比她漂亮的大有人在。）更不是因为她能浪（演员出身，会演戏的也不是只她一人。）而是因为她的矜持和好学。

每次毛作报告，她总是早早地就去了。她喜欢坐在第一排，离主席最近的地方。而且总是认真地作笔记。

她很少主动提问题。

说实话，她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主席上课所讲的那些大道理，她也就能听懂个大概。

倒是她那双求知欲极强的大眼睛，盯得主席久了。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了主席的心里。

是主席主动提出要与她结婚的。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她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而且，党内许多老资格的人，都明确表示反对。

江青记得很清楚，“新婚”之夜过后，这种反对的声音也就消失得无声无息了。

“为什么？”

我傻冒似地问道。

“我晒红了”

“晒红……？”

我想起来了。江青的母亲当年嫁到李家做填房，也是晒过红的。旧社会的女子对这个都看得很重。尤其是农村的女子，把名声看得比生命都重。

江青从小受母亲封建思想的熏陶，自然懂得要爱惜自己的身子。

“我不信……？！”

我眼里的疑问号明显地比惊叹号大。

“不信？有诗为证。”

江青随口朗诵出一首诗来：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首毛泽东1961年公开写给李进（江青的笔名。）同志的诗，其实最早是当年在延安窑洞新婚之后的翌日里写给江青的。

原因是当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小插曲。

翌日清晨，江青大大方方想当然地抱着染“红”了的床单，晾晒在院子里。引来一群小战士围观。

当值的警卫员汪东兴看不过眼，上来就将床单扯掉了。嘴里还嘟嘟朗朗地骂江青“不要脸！”

江青不乐意了，跑到主席跟前哭起鼻子来。

主席叫人将汪东兴叫进屋来，“批评”了他几句。主席对汪东兴历来十分偏爱，有时可以说甚至胜过自己的亲生儿子。汪东兴挨了骂，撅着嘴出去了。临出门时，向江青撂下一句儿狠话：

“总有一天，看我怎么收拾你！”

见江青仍在低声抽泣，主席提起毛笔，一挥而就，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顺手递给了江青。

江青一开始没看懂。读着读着，终于破涕而笑了。

“……仙人洞，……在险峰？”

我嘴里反复咀嚼着这两句诗，一脸茫然的样子。

惹得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江青也笑了。笑红了脸。

张颖笑得最厉害。直笑弯了腰，笑出了两行眼泪。

1 3

总的来说，江青很少谈自己的亲属和家人，但对毛的家人她却谈得很多。

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导致的。

中国人认为，女子一旦嫁人，便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而成为夫家的人。

其结果便是她自己的家庭就此永远退隐于后，丈夫的家庭成为她的生活中心。

毛的家庭生活模式，同大多数漂游四方的革命者一样是反传统的，即丈夫和妻子同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此外，丈夫的父母亲传统上应是一家之主，但毛在很早以前便已背弃父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年纪大了，上了岁数之后，毛却越发思念起父亲来了。

毛自己作为一个父亲时，他尽自己可能地把他的几位妻子所生养孩子聚笼在自己身边。

对这一点，江青是有切身感受的。

毛的家庭悲剧在他那一代革命奠基者中是很典型的。

长征的幸存者到达西北时，由于内战而牺牲的人数已猛增到数百万。

在革命队伍中复仇的情绪是很强烈的。

然而，尽管有许多的个人苦难，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却是革命的战略家，而没有陷入个人的感伤。单靠讨还血债的激情是不能造就历史的。

最终，他们把个人的复仇情绪导向了意识形态上的认识。

与此矛盾的是，革命的戏剧家们却更多的是关心大众的情感而不是政治意识。

一次在观看京剧《红灯记》时，江青开始谈论起毛泽东的家人。

从这出戏江青联想到了那些令人心痛的故事：

毛的孩子、妻子和其他牺牲的亲人们。

该剧有一幕是李奶奶讲述李家的悲壮的家史，这期间江青讲到了毛的六位“为革命牺牲”的亲人，她不由得落下了眼泪。

按江青所叙述的顺序，他们是“毛的妻子杨开慧、他的二弟毛泽覃，他牺牲于苏区；他的大弟毛泽民，他牺牲在新疆；他的儿子毛岸英，他牺牲在朝鲜；他的侄子毛楚雄，他牺牲于部队撤退之时；还有他的堂妹毛泽建；此外。他的另一个儿子的神经系统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毁。她气愤地补充说，国民党仍在恶毒地散布谣言，说他的神经失常是“我们造成的”。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江青又谈到了杨开慧——毛的第二位妻子，实际上的第一位妻子。

他们的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都生于他们婚姻的早年。

后来毛离开她去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为什么毛不把她一同带上以保护她？

这一点不论是江青还是毛都不曾解释过。

杨开慧理解他的抱负的严肃性，她全力支持他，后来她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作为要挟毛的革命活动的人质。

由于她拒绝声明反对她的丈夫和共产党，1930年她在长沙被湖南军阀何健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毛的堂妹。

至于毛的前妻贺子珍，江青从不清楚她到底生了几个孩子，毛从不谈这个问题（另外一些报道说在长征前贺生过一个或两个孩子，他们被送给农民暂时或永久性抚养）。有个儿子他们叫他“毛毛”，主席

特别喜欢他，但40年代后期在陕北的战争中间孩子丢失了（显然是在从延安撤退期间）。

江青同毛刚结婚时，她曾照顾过毛的另一个孩子（显然是贺子珍的孩子）。

这个小男孩最后被送往了莫斯科，后来又回到上海（可能是在1944年，江青在此没有讲明时间，）被安置在一个牧师家里。

这个牧师有两个妻子，非常狠毒。

他们打孩子很凶，以致使他的平衡感永远损坏了。

江青仍能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的小小的身躯如何大幅度地左摇右摆，甚至几年后他仍是这么左摇右晃，经常突然地跌倒在地。

江青逐渐爱上了这个孩子，一直到50年代初期，她都在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

后来她患了癌症进行放疗，很自然这种强化治疗使她难于照顾他了。

“其他人”（没有指名）决定她不再能抚养他了。

“他们”不顾她的请求，硬是把孩子从她身边带走了，并且不告诉她孩子被安置在哪里，（如果监护权是江青的，那么甚至在解放后，要否决这一监护权又怎么可能是在身为父亲的国家领导人的毛的决定权之外呢？）

这个孩子的失去很是让江青痛心，因为他非常聪明可爱，在他3岁时他就能把《国际歌》从头唱到尾。

她一直不知道那些人把孩子弄到了哪里？

毛也不知道。

主席从不对她多谈贺子珍，江青说。

她对贺子珍的了解多数是从毛岸英那里知道的。

在毛同贺离婚时，岸英已是十好几岁了，他陪同贺子珍及她的小女儿一同去了苏联。

在他回来时（大约是1944年）江青和他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她实际上只比他年长几岁。

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微小的年龄差别与她同贺子珍的女儿之间的差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后者，她显然在年龄上足以担当得起母亲。

从岸英那里她对毛的这一代亲人有了近一步的了解。

贺子珍的女儿还是一个婴儿时就临时托管在一个农民家。

在苏联，当贺子珍被送到收容所后，她便被送到了一家国立幼儿园全托，在那里她受到了典型的苏俄式教育。

后来，当母亲被送往上海一家精神病院时，她被送到了江青身边。江青为她起名李敏，并把她同自己的女儿李讷一同带大，两个孩子在年龄上很接近。

一些国外的报导称她有过两个女儿或许还有一个儿子。

江青不容质疑地答道，她只生过一个孩子，而主席便是孩子的父亲。

在几次谈话中她都曾提到她的女儿李讷，李讷是学历史的，并且喜欢文学，曾被送到农村锻炼过，这对她有好处，江青眼中洋溢着光彩说。

她把李敏、李讷一同抚养大的事实也反映在她为她们起的名字上。

她把自己的姓“李”给了她们，然后又给她们起了在古汉语意义上相对的名字。

她们的名字源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古语。

这种名字上的对比在现实生活中并未完全体现出。

她自己的孩子李讷在学校总是得五分，但是却因为死读书而变得有点“笨”。

但李讷实际上并不“讷于言”，因而很多时候她都需要端正思想认识。

至于李敏，她也并非是“敏于行”，对此江青未作进一步解释。

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牺牲之后（1943年被国民党追随者杀害于新疆），江青将他的儿子毛远新接到了自己家里。

毛远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时期重要政治人物。

湖南省湘潭市人，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和中共地下党员朱丹华之子，即毛泽东的侄儿。

毛远新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一度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

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1921年初，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投身革命，这个农民出身的种田人，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专家和理财能手，1931年，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军阀盛世才伪装进步，要求中共派干部入疆。

1938年2月，毛泽民由延安赴苏联治病途经迪化，奉党中央之命留在新疆，化名周彬，出任盛世才的财政厅代厅长，开展整顿新疆财经和金融的艰难工作，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在中央派往新疆的干部中，有一位端庄秀丽的浙江姑娘叫朱旦华，她原名姚秀霞，是上海务本女中的学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她辗转千里到了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

不久，朱旦华入党。

翌年5月，朱旦华入疆，任迪化市女子中学教导主任。

在中共新疆负责人邓发的介绍下，毛泽民和朱旦华由相识到相爱，1940年5月，他们在迪化结婚。

翌年2月，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婴出世了，毛泽民抱着儿子，喜不自禁，他给儿子取名叫“远新”。

因为按毛氏族谱中‘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牒序，孩子应是“远”字辈；“新”字，则表示对遥远边疆的纪念，要孩子永远记往他的第二故乡——新疆。

1942年8月，盛世才背信弃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干部全部下狱。

朱旦华抱着一岁多的儿子，被关在女牢。

1943年9月27日深夜，忠贞不屈的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三位新疆党的领导人，在受尽酷刑之后，被残忍的敌人秘密杀害。

小远新跟着母亲坐了四年牢，成了一个小难友。

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看守所长解下腰间的皮带，捉住小远新一只小手威胁道：

“你说！八路军、共产党都是土匪，你爸爸是土匪，说呀！”

小远新大声喊道：

“共产党不是土匪，我爸爸不是土匪。”

“你不说，我就打你！”

所长恶狠狠地举起皮带向孩子的手心打下来。

“共产党就不是土匪！”

小远新痛得直咬牙，拼命往回抽手。

“就是土匪！”

所长紧紧抓住孩子的手，一边用力抽打，一边奸笑道：

“只要你说了，我就不打你了。”

“我爸爸就不是土匪嘛！”

钻心的疼痛，小远新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狱中的阿姨冲过来：

“你们真是禽兽不如！欺负一个三岁的孩子！”

愤怒的阿姨硬把小远新抢了回来。

在阿姨的怀抱里，小远新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1946年秋，在中共中央和张治中将军共同营救下，新疆监狱中的百余名干部历经艰险，回到延安。

获悉丈夫英勇牺牲的朱旦华，强忍悲痛，带着小远新去见大伯毛泽东。

毛泽东为爱弟血洒天山而痛苦不堪。

朱旦华告诉毛泽东，毛泽民牺牲前，曾说过“我将不愧是毛泽东的弟弟”，闻此言，毛泽东感伤不已，又好言安慰弟媳。

毛泽东抱起侄儿亲着，小远新指着毛泽东下巴那颗痣问妈妈：

“伯父长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逗得毛泽东大笑起来。

中央安排朱旦华参加妇女工作委员会，在蔡畅、康克清的领导下工作。

朱旦华一头扑进工作里，只好把小远新送到延安“洛杉矶托儿所”，母子俩很少见面。

国民党胡宗南的炮声逼着托儿所跟着撤离延安的部队转移，这些睡在骡马背上摇篮里的孩子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每天还要拿着小石板跟老师学写字。

托儿所整整颠波了一年，才东渡黄河，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见到分别一年多的儿子，朱旦华喜极而泣，她把远新送进解放区的育英小学读书。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育英小学从石家庄搬进了北京城。

1949年夏天，南昌解放，由蔡畅出面说合，随军南下的朱旦华和当年的新疆坐牢难友方志纯重组家庭，朱旦华时任江西省妇联主任。

开国大典之前，康克清把远新从北京育英学校接出来，送到南昌母亲的身边

1951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正好朱旦华要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便带着远新去北京。

康克清见了母子俩说：

“旦华呀，你来开会，又带着个孩子，不方便啊，把远新送到他伯伯那儿去吧。”

远新高兴得直跳，他有两年多没有见到伯伯啦。朱旦华开完会，到中南海去接儿子回南昌。

“我不回南昌！”

儿子噘着嘴，一脸的不高兴：

“我愿在北京念书，还回育英学校去。”

“不行！”

朱旦华态度坚决：

“伯伯工作这么忙，你不能在这儿给伯伯添麻烦！”

毛泽东笑眯眯地看着这娘儿俩对阵，又快乐地抚摸一下远新的脑袋说：

“远新，还是回到妈妈的身边好，我这里是温室，你成了温室的花朵可不好哟！”

远新一拧脖子，反驳道：

“我留在北京是去育英学校上学，也不是留在伯伯这儿当什么花朵！”

毛泽东笑出声来，使劲儿把侄儿搂在怀里。

江青连忙把朱旦华拉到一边，小声说：

“自从岸英在朝鲜前线牺牲，主席很长时间没有笑脸了，这些日子，小豆豆（指毛远新）来了，主席才高兴起来，我看，别让这孩子回南昌了，留下来，主席情绪会好的。”

于是，朱旦华同意把远新留下来，又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指指李讷说：

“让姐姐带弟弟喽！都在育英学校读书嘛。”

朱旦华又再三叮嘱远新要听话，别淘气，这才告别毛泽东回南昌去了。

自从毛远新留在毛泽东的身边，给毛泽东带来了许多心灵慰藉和精神欢悦，他十分喜欢这个聪明机灵又乖巧听话的侄儿。

毛远新又回到原来的班级里，平日在学校住宿，周六跟着李讷回中南海。

毛泽东每月给学校15元，作为毛远新全部的膳宿和学杂费。

每年夏天，毛泽东又派人送毛远新去南昌看望母亲和继父。

从10岁起，毛远新就完全由毛泽东当成亲儿子抚养，他一直是在伯伯身边长大的。

1960年夏天，毛远新在北京第一〇一中学毕业。

当时的中国青年都对哈军工抱有崇拜感，皆以进入神秘的哈军工为首选升学目标。

毛远新当然愿意去哈军工，他回到中南海，对毛泽东说：

“伯伯，军工招生组来我们学院招生了，我想报名，听说我们学校已决定保送我去呢。”

“唔，保送？”

毛泽东抬起头来，打量着这个刚刚入党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稚气未退的方脸盘上激情洋溢。

毛泽东点燃半截香烟，吸了一口，缓缓说道：

“升大学嘛，怎么能靠保送？不是自己考上的，不能算真本事！我的意见，你要走进考场，考个状元郎嘛！”

毛泽东的态度让毛远新一夜没睡好，他知道伯伯从来不溺爱子女，当年岸英大哥从苏联回到延安，伯伯送大哥下乡当农民，朝鲜战争一开始，又把大哥送上前线……毛远新决心凭本事报考中国最好的大学。

高考发榜后，他轻松地拿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录取通知书。

在清华，他跟吴邦国是同学。

大学放寒假了，那天毛远新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让他到广州见伯伯。

在广州，毛远新碰到中学时代的好友，叶剑英元帅的二儿子叶选宁，两个年轻人亲热得形影不离，没完没了地聊着各自学校的事儿。

叶选宁突然问：

“你为什么不转学来我们军工读书呢？我们学院的条件比你们清华好，起码能吃饱饭。”

这可触动毛远新的心思了，正值国家经济困难，到处有人饿死的非常时期，作为学校排球队运动员的毛远新总感到饥肠辘辘，两眼冒金花。在哈军工能填饱肚子，这可太有吸引力了。

他忙去问毛泽东：

“伯伯，我能不能转学去军工？”

毛泽东并不反对侄儿转学，只是随便问了一句：

“人家会同意你转学吗？”

叶选宁帮忙拨通了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家里的电话，正在养病的陈赓乐呵呵地说：

“欢迎清华的高才生啊！”

1961年2月新学期开始时，毛远新转入哈军工，在导弹工程系一个班里插班上课。

初来乍到，毛远新埋头学习，保持低调。

他待人谦和有礼，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他的身上看不到一般高干子弟或多或少存在的优越感和骄娇二气。

第二个学期开始后，系里任命他为学员班班长，他推辞不掉，只好担任事事都要吃苦在先的骨干工作，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

一次学员队扫卫生，恰好负责扫厕所的那个班有事没来，毛远新领着全班完成分担的任务后，又一个人去打扫厕所，用抹布擦洗便池，直到把厕所收拾得一干二净才回宿舍。

毛远新踏实做事，从不张扬，全队学员都佩服他。

尽管社会工作多，可毛远新的学习成绩特别好，在班里，他的每门功课从没有出过前三名，这一点让不少高干子弟啧啧称奇。

毛远新生活简朴，除了那不到十元钱的津贴费，他从没有向谁要过钱。

平时省吃俭用，衣服破了自己补，头发长了自己理，在他的带动下，不少高干子弟也严格要求自己，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

高干子弟们常说，

“远新是最穷的干部子弟。”

他来哈军工之后，不久也进了院排球队，上场打球，人们常会发现他的背心上总是带着窟窿眼。

毛远新多才多艺，吹一手令人叫绝的小号。同班女同学，叶剑英养女傅凝（即后来的名记者戴晴）曾写过一文：《远去的号角》，记述毛远新当时的青春魅力。

对表现较差的高干子弟，毛远新像个大哥哥，经常找他们个别谈心，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他在学员中的威信是靠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起来的。

1963年春天，哈军工发生了一件惊动中央的大案。

一个父亲是上将、某大军区司令员的高干子弟主动联络台湾特务机关，要投奔“自由世界”，为蒋帮“反攻大陆”效力。

案件很快被破获，毛远新大吃一惊，这个高干子弟叫陈东平，是与毛远新睡上下床的同班同学。

陈东平案东窗事发之后，毛远新多次自责，平时，他对这位学习成绩不及格，天天大谈女人的纨绔子弟陈东平没少规劝和批评，但没想到老红军的儿子当了反革命。

毛远新认为自己这个班长没当好，他感到痛苦和气恼，为什么在高干子弟中出现这种害群之马？

他配合院系领导，以陈东平为反面典型，深入检查高干子弟中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使哈军工教育干部子弟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陈东平案件一直上报到毛泽东那里，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4年初，毛泽东在和毛远新谈话时，批评道：

“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旁边？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又说：

“这么多反革命你就没有感觉？陈东平在你旁边就不知道。”

毛远新说：

“陈东平是在家里休学听广播变坏了。”

毛泽东哼了一声：

“听敌人广播就那样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的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他陈东平？”

1964年7月，毛远新结束工厂实习后回到北京，毛泽东让他跟着去北戴河。

北戴河海滨凉风习习，毛泽东刚刚从海里上岸，穿上睡衣，心情很好。

听毛远新说哈军工组织上千人横渡松花江，毛泽东眼睛一亮，放下手中的书，笑道：

“好！年轻人应当到江河湖海中游泳噢，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游水才有味道，你放假了，要天天下海游泳。”

毛泽东突然问侄儿：

“你会骑马吗？”

“不会。我小时候从延安出发，坐过骡子驮的大筐，可从来没骑过马。”

“哼，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你假期找汪东兴安排一下，要学会骑马。”

警卫班长告诉毛远新，毛主席想考察黄河，准备从下游走到上游，听说路途险要，没法坐车，只能骑马，所以最近他经常练习骑马，还叫秘书和工作人员也去学。

毛远新这才明白。他在警卫团的帮助下，找了一匹老实的军马，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去练习骑马，没过多少时候他就可以扬鞭策马，在野地里飞奔了。

毛泽东每天工作很忙，好多天没和毛远新谈话了，有一天晚上有空，他让值班的卫士把毛远新叫过来。

“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啊？”

毛泽东点燃半支香烟，慢悠悠地问道。

毛远新知道伯父今天的心绪很好，就说：

“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上的。”

“我看你还有进步，”

毛泽东吐出一串烟圈儿，

“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没有？革命接班人的五条看了没有？”

那天晚上，毛泽东谈兴甚浓，看来，他是有意识想给侄子讲解革命接班人的问题讲到接班人的第二条时，毛泽东说：

“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呢？”

毛远新坐不住了，连忙争辩道：

“我还有点希望吧？”

毛泽东把烟蒂按死说：

“有希望，好，超出我的标准就更好。”

毛泽东又点上香烟，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

“你这个班长是怎样当的？人家提意见能接受吗？提错了能受得了吗？冤枉你能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能团结人？你要特别学会与你意见不合的人在一起工作。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颂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毛泽东谈锋甚健，讲解完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后，话题一下转到学院的工作上。

“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说要学习马列主义吗？”

你们是怎么个学法？

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重要的要到实际中去学。”

毛远新提出反对意见：

“工科和文科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

“不对，”

毛泽东神态严肃，毋庸置疑地说：

“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我已和罗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都去，一个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学院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你毕业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

对这个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侄子，毛泽东的要求可谓严矣，在1964年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多事之秋，他像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给学生上课那样，亲自教导，耳提面命，用心良苦。

对于身边钟爱有加的后代，毛泽东的内心寄托着何等样的期望啊。

毛泽东这篇教子长谈改变了中国教育的走向，中国高等院校迅速贯彻“阶级斗争是主课”的最高指示，大学生开始分批下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1965年夏，毛远新得了胆囊炎，痛得流汗。学院送他到北京住院治疗。病愈后，又陪同系领导作了一段时间的教改调研，这才向伯伯辞行。

毛泽东说：

“你要下农村搞四清了，名字太显眼，要改一下。”

思忖片刻，毛泽东说：

“解放战争时，我的化名叫李得胜，现在你的两个姐姐叫李敏、李讷，我看哪，你就叫‘李实’吧。”

9月初，带着伯父的殷殷嘱托，李实来到黑龙江省巴彦县临城公社，任工作队的副队长，和大家睡在一铺土炕上。

晚到了半个月，他积极工作，到农民家里访贫问苦，抓紧了解情况。

不久，在清理大队账目时发现了800元的亏空，在60年代的农村，那可是个大数目。

大队会计姓谷，他怎么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差出这些钱来。

大队上上下下都说，谷会计这个“四不清”干部是“板上钉钉子”没跑啦。

谷会计吓坏了，一病不起。

工作队把谷会计帐目不清的问题交给了李实。

李实白天认真调查，晚上在小油灯下打算盘，一笔一笔的核实，终于把这800元的去向弄清楚了，圆上了账。

那天，李实和同学们去看谷会计，躺在炕上的谷会计听到狗叫声，立时面无血色，体似筛糠，以为工作队要抓他送监了。

李实进门，坐到炕沿上，笑道：

“老谷啊，账已经圆上了，你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是来给你吃颗定心丸儿的！”

谷会计感动得嚎啕大哭。

半年来，农民群众只知道工作队的老李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谁也不知道老李的真实身份。

1966年初，毛远新提前毕业，学院把他分配到研制导弹的国防研究所。

回到北京，毛远新征求伯伯的意见。

毛泽东不以为然，淡然道：

“你这个大学生呀，我还不承认呢，你没当过工人，没当过农民，也没当过兵，没有什么实际经验，怎么算个真正的大学生？”

毛远新不服气：

“我在军工当了这么多年的兵，怎么不是当兵呢？”

“我说的是连队，”

毛泽东说：

“连队当兵跟军队院校的学生兵怎么可以比？”

毛泽东又说：

“你去的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刚毕业就去那里，对你并不好。”

毛远新自小就非常听伯父的话，他马上打长途电话，请系里通过正常组织渠道联系一下，看看能否同意他下连队当兵。

当然，这一切自然是一路绿灯，不久，毛远新接到去空军当兵的通知。

拿到通知书后，毛远新到空军司令部报到，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热情接待毛远新，连声说：

“欢迎，欢迎！欢迎军工的高才生来到空军！”

胖司令吴法宪一定要请毛远新吃一顿饭，以表敬意。

他说将会安排毛远新到空军的第二高炮指挥部当参谋。

毛远新轻松愉快地回到中南海，向伯伯报告，自己要到空军当参谋了。

毛泽东眉头紧蹙，摆手道：

“不对。你不应该留在城里当官，我是要你下基层连队当兵！”

见侄子没吭声，好像有点保留意见，毛泽东又缓和地说：

“你知道这句老话吗？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当那个放屁都没声的参谋干么子？”

一句话把毛远新说乐了，他又到空司，要求吴法宪收回成命，改派野战部队。空司把毛远新和他的同学廖晖（廖承志之子），谢飘（谢觉哉之子），胡鲁克（胡奇才之子）分到空军高炮某独立师。

之前，提前毕业的粟戎生（粟裕大将之子）已经先期到达这个部队的三营。3月初，他们调防到云南，在大山里布防，准备迎击敌机。

毛远新和粟戎生住在一个帐篷里，下大雨的时候，鞋子都会漂起来，最困难是大山上没水吃，下山挑水，走一趟就要40分钟。

毛远新和战友们栉风沐雨，忍受着蚊叮虫咬，专业精湛的毛远新很快挑起技术指挥的重担，很好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8月中旬，空司来了电话，急调毛远新回北京。

在深山里呆了半年的毛远新被北京天翻地覆的“文革”吓了一跳，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隔世之感，他看到红卫兵在破四旧，破坏西单的教堂，惊讶地问叶选宁：

“这不是在破坏文物吗？”

8月18日那天，毛远新跟着身穿军装的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此，毛远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身不由己地卷入可怕的历史旋涡里。

文革开始不久，毛远新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他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被视为“可靠接班人”。

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1975年9月，毛泽东病重，毛远新到中央担任“联络员”，负责与政治局的沟通。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随着“四人帮”的被捕，因为和江青走得太近，毛远新也同时被捕，当时的名义是“隔离保护”。

而这一“保护”就是整整十年的时间，直到1986年，法庭才对他进行审判，处以17年有期徒刑。

1979年大规模宣传的“张志新事迹”是毛远新被许多人诟病的“污点”。

其实，以张志新在文革时的言论，在任何一个省都是很严重的事件，都违反了当时的“法律”（公安六条）。任何省出了这种事都会重判，辽宁也不例外。

处决张志新是辽宁省委集体决定，若把此事推在毛远新一人身上也并不公平。

1989年3月17日，毛远新于服刑之中“保外就医”来到南昌。

毛远新保外就医，是1989年3月朱旦华亲笔给上一年3月刚刚当选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写信提出的。

杨尚昆很快作出批示：

“同意。在南昌保外就医”。

这样，毛远新在与世隔离10多年后来到了江西省公安厅招待所。

朱旦华知道消息的当天就去看儿子，她一刻也不能等。

在见到毛远新的一刹那，朱旦华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可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嘴角仍在拼命地挤出一丝笑容，喊着“远新——”毛远新靠在床边艰难地站起来，右手用力地撑着寸步不能离的手杖。

他的目光闪出了笑意：

“妈妈，您来了。”

毛远新说出的几个字是那么的轻，又是那么的重。

他的腿已经残废了，当年英气逼人的青年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变成了一个瘦得脱了形的老头，虽然这时他还不到50岁。

他拄着拐杖，站起来都晃晃悠悠地，看了让人揪心哪！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毛远新走过大起大落、酸甜苦辣的人生悲剧之路。

1993年10月，他17年刑满后，仍以“李实”的名字，被安排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

很长时间只有所长和书记两个人知道李实是谁。

那两年，毛远新负责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他拖着两条病腿，蹬着一辆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加班加点，成为全所下班最晚的人，终于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

毛远新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在全所有口皆碑，加上质朴谦和地待人处事，很快就融入这个集体之中。

他几乎年年被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大照片总挂在大门口。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李实是个做过“大官”和坐过“大牢”的人。

1977年1月，女儿李莉在毛远新刚被关押3个月时呱呱坠地，此时妻子全秀凤也在隔离审查中。

女儿10个月时高烧不退，因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

“是我连累了女儿……”

自责常使毛远新痛彻骨髓，不能自持。

考虑到聋哑人将来的生活自立，毛远新引导女儿课余时间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她素描、水粉、透视学。初中毕业后，李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

毛远新又引导女儿工余时间学习电脑，聪颖的女儿不辜负父亲的苦心，后来又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

今年女儿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

1996年毛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

毛远新的工资也逐渐增加了。

2001年2月，高级工程师毛远新退休，每月领取千余元的养老金。

他的烈属待遇终于恢复，每年春节，街道居委会都会把“光荣之家”的条幅贴到他家的门上。

过着平静平民生活的毛远新，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近年来受腿疾困扰，不得不四处求医问药。

每年，他都要到南昌陪伴年迈的老母亲两个月。

2003年9月，新疆各界纪念毛泽民等烈士牺牲60周年，毛远新夫妇应邀参加纪念活动。

站在父亲庄严肃穆的墓碑前，天山吹来的风轻拂着毛远新花白的双鬓，蒙蒙细雨冲淡了他苦涩的泪水，他在心里向父亲倾诉：

爸爸，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春天，还是冰刀霜箭的寒冬，儿子都经受住了历练……

话说回来，想当年当毛远新到了主席家后，很自然地他们欢迎他的加入，并很快融洽起来。

尽管他应当称江青“伯母”，但他却喜欢叫她“母亲”。

江青自己的女儿李讷从孩提时起就埋头于历史，成为一个与世无争的知识分子。

当60年代社教运动开展起来时，江青把她送到了农村，因为农村人多，只在那里她才能拓宽自己对人类客观世界的认识。

于是李讷加入了成千上万的城市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行列，来到了农村。

从农村返回北京时，她结婚了，并且生了一个孩子。

“这使我当上了外祖母！”

江青自豪地说。

她的继女李敏，她补充说，是学自然科学的，结了婚，有两个孩子。

1939年开始，国民党部队在胡宗南（他因抗日的上海保卫战而出名）的统帅下对共产党边区进行了封锁。

胡宗南（1896～1962） 别名琴斋，字寿山，曾化名秦东昌，汉族，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

陆军一级上将，黄埔系一期生，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其一生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抗日战争，

直到1947年指挥进攻占领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转战西北，官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与名震一时的“西北王”。

1935年8月底包座战斗后，红军一部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北上入甘；另一部红军则在张国焘率领下，脱离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领导，从阿坝挥师南下，重过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去。

这样，胡宗南率重兵扼守的松潘城就失去了防堵红军的战略意义。

1935年9月底，胡宗南得到军委会允许，率第一师离松潘回甘。但这时甘南碧口一带胡师原驻防地已为第三军王均部进驻。胡遂率第二师经弓木贡岭、南坪、邓桥、宕昌、西固、礼县，于10月上旬，开抵天水甘谷一带驻扎。当时正是农历中秋前后。

这一举动使得共产党边区同外界的贸易和通讯联系中断了五年之久。

其结果便是造成了边区的通货膨胀及物资的匮乏：粮价飞涨，棉花、布匹这些主要依赖进口的东西一下没有了。

占边区财政收入百分之九十还要多的盐的出口一下子也不可能了。

此外还有差不多90万人的红军部队的武器的进口也成了问题。

几个世纪以来，盘踞这些地方的地主与军阀总是把增加农民的税收作为最后的一着棋来使用，他们做，必然会使农民对共产党失去信任。

共产党的领导人们清醒自己不能重蹈历史覆辙，他们提出一种激进的边区精神。

毛是一个善于利用逆境的天才，他把“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变成了积极的口号。

士兵们都被发动起来务农，在延安的城墙上，用黑漆刷着大字标语：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发展经济、保障军需！

靠自给自足，我们将建设一个繁荣的边区！

一手拿锄一手扛枪，我们自给自足保卫党中央！

甚至就现在来说，在共产党到达延安的35年之后，这里仍是落后的地方，江青承认。

但错误是“我们的”，她容忍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的失误”。

这几年他们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国际义务上。

此外西北的自然环境也一直是无法战胜的挑战；高山深谷，梯田，在这里要提高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开发新土地和改善耕作条件一直是人们所期望的。

实际上，在那些一直对公共利益不感兴趣的领导人中，“某些分子”要部分地为这种落后局面负责。

但是在毛生活在西北的那段时间，他提出了最具热情的耕作规划。

1939年冬天他命令年轻的军官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去南泥湾农垦，那是在延安东南30多公里远的一片荒山野岭。

王震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农民家庭。在上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洪流中，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在工人运动中迅速成长起来。

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投身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参加了湘赣苏区的创建工作，先后任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师党委书记，红八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军长，中共湘赣省委委员，省军区代理司令员。

1934年7月起，王震先后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在任弼时同志领导下，为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与军团长肖克同志一起率部西征。同年10月与红二军团会师。此后，王震同志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中央军委分会委员、代理军区司令员。

1935年11月，为摆脱国民党重兵“围剿”，红二、红六军团主动转移，继续长征，于1936年7月初在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其后，红二、红六军团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王震同志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一道坚决反对和抵制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行径，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

1936年10月，共同北上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胜利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大会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震同志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军政委员会委员、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副旅长，随一二〇师东渡黄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1937年10月起任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他指挥部队对日寇英勇作战，配合忻口战役有力打击敌军，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其后，按照党中央部署挥师向晋察冀边区挺进，创建了以恒山为依托的雁北抗日根据地。

1939年8月，王震奉命回师陕北，同年10月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巩固陕甘宁根据地做出了特殊贡献。

1941年初，他率部进驻南泥湾，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参加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军事、政治斗争。

毛泽东命令他们要生产出解决因境所需的全部的粮食和布匹。

于是他们找来庙里的钟、锅、神像等熔化掉打成犁头。

羊毛是从他们养的羊群那里得来。

他们自己挖窑居住，形成村庄和学校。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互助合作，蔚然成风，首先体现在农业上，然后是手工业和小作坊上。

虽然是士兵们树立起的劳动模式，但最终当地的男女老少全都参加了这一劳动竞赛。

那时，虽然是在荒山野岭之中，文娱活动依然起着其特有的作用。士兵们自娱自乐，当地的百姓们也不由得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通过文娱活动来表现他们生活的根本变化。

然而，作为一个懂历史的革命领导者，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大规模的军垦计划看似革命，但实际上不过是两千多年来中国边疆地区军事殖民活动的一个翻版。于是领导人们，包括毛在内，他们定期地从延安到南泥湾参观，偶尔他们也把自己的印象写成诗句。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抗战之时，号称陕甘宁边区南大门。

当年八路军三五九旅驻防于此，一手枪杆，一手锄头，保卫了党中央及边区南线安全，且屯田垦荒，把一个野草丛生荆棘遍野的荒凉之地，屯垦成“平川稻谷香，肥鸭满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

时值抗战相持阶段，蒋介石反动派大规模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我抗日根据地，又遭逢连年自然灾害及10余万非生产人员的到来，一时间，不要说衣食住行，就连纸张等最基本东西都没有，延安困难到了极点。

面对困难，毛主席说：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还说，像国民党那样跟群众要粮要钱，不尽力去帮助群众增加生产，完全是错误的。

毛主席挥笔题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8个大字，一场大生产运动由此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毛主席时住杨家岭，亲自开垦了山坡下一块菜地，种上辣椒、西红柿、土豆等，用这些菜招待前来谈工作的同志们，还曾招待过华侨领袖陈嘉庚。

同志们劝主席那么忙就不要种地了，可主席一笑：

“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应当和同志们一样参加生产劳动。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什么难关不能渡过呢？”

1940年秋，朱德视察南泥湾，发现南泥湾适宜部队垦荒屯田，便将戍守绥德的王震三五九旅调往南泥湾。

三五九旅指战员高歌着“一把老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红旗招展浩浩荡荡地进驻南泥湾。

那时南泥湾，没有房子，战士们就自己动手搭窝棚、挖窑洞；粮食不够，战士们就以野菜野果充饥；没有衣物，战士们就自己做木纺车，纺粗毛线织毛衣；没有工具，战士们就自造木锄木犁或寻找废铁自己铸造；没有纸张，战士们就在桦树皮上写字。

冬天陕北很冷，尤其夜晚更冻得人难以入睡，战士们索性聚集一起，燃起篝火歌舞。

就这样，指战员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精神，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拓荒3载，拓出万顷良田。特别是垦出一片水田，种上陕北少有的水稻。

“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文钱。”

生产实现自给，进而达到“耕一余一”。

历史上，何曾有军队自食其力，不吃皇粮军饷？

只有延安八路军！

1943年9月，毛主席来到南泥湾，对指战员风趣地说：

“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

朱德曾作《游南泥湾》诗：

去年初到此，

遍地是荒草。

夜无宿营地，

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

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

水田栽新稻。

屯田初告成，

战士粗温饱。

熏风拂面来，

有似江南好。

“陕北好江南”由此传播开来。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这首深情歌唱南泥湾的歌，优美动听，穿越时空，传唱至今。

当然，对南泥湾的印象并非都是田园诗般的。

江青也去了那里，但不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去视察，而是作为一个领导的妻子去劳动。

她是1939年2月到那里的，当时南泥湾农垦刚开始不久。她在那里呆了六个月。

她告诉说，她这次南泥湾之行，大多数领导同志知道，但一般群众就很少知道的（也许毛和他的同志想要考验她，希望以此来改变他们对她这位城市姑娘的耐力的怀疑和轻视）。

当主席为她和别的一行人送行时，他告诉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生产所有的粮食和布匹，否则他们会饿死在荒野中。

在这种决心一战的使命下他们出发了。

他们自己建起营地。

由于以前从未从事过体力劳动，江青的手上打起了泡。

她继续说道，当时有不少参加这种劳动及其一些生产竞赛的女同志都受到特别照顾。

比如，在月经期间，她们可以休息一两天不干重体力活，只是做些洗洗涮涮的轻活。

她一直没有接受这种照顾。当时年轻，自己也没在意。不想却坐下了女同志的毛病，日后虽贵为“第一夫人”，却仍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多少年之后，党内的一些反毛派甚至于极赋想像力地将江青同志的妇科病归咎于“生活作风”问题。

当时一些女同志喜欢做一些轻松点的、传统上女人做的活，因为她们讨厌被迫像男人们那样做重体力的工作。

在那些日子里，她们认为干男人的工作是“二等阶级”的事。

由于那几年她一直闹结核病（西北地区及中国其他一些地区的地方病），她没有做纺织工作，这种工作对她的身体来说是太紧张了。

她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编织毛衣上（这是当时三五九旅所有的士兵们，无论男女都要从事的工作）。

尽管她一开始没有经验，但她最后还是织出了十件毛衣，并都上交了。

毛衣在当时是很需要的，山区的气候总是很冷，那六个月里她一直穿着厚棉袄。

当她和她的同伴们下山回到延安时，重新感到了夏天的气候。她回忆道，当她们重又换上单衣时是那么地快活。

回忆南泥湾的经历，她承认其他人要远比她干得好，她补充说事实上她在那里的成绩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一提的。

回到了杨家岭，回到了那间窑洞，回到了首长们身边，她又和毛居住在紧邻着延安的那块平缓的山坡上。

她又开始从事起了她所喜欢的文化工作。并始终高举着主席交给她的这面文化的旗帜。

第七章 大众文化

1

延安时期的江青，究竟给人们留下了怎样的印像呢？

文革之前，如果没有上级的首肯，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于私底下对领导人的妻子妄自菲薄。

更何况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妻子了。

延安时期的江青，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没有人知道和关心她这个名字，直到文化大革命她掌握了权力，才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的政治明星。

她不仅是红卫兵——狂热的革命小将们心中的偶像，同样也成为了国外媒体和新闻记者们关注的焦点。

延安时期的共产党尚未掌握政权，只有极少数的外国记者或外交官去过那个地方。他们更关心的是采访中共高层领导人，没有人肯将目光和时间浪费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女人身上，尽管她是一个年轻的二十几岁的漂亮的女人。

江青的存在没有引起任何一个外国观察家的兴趣（重视）。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写的报告中曾经提到，毛从不让他的妻子在外人跟前露面。

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

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

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

埃德加·斯诺1928年离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来到中国，在上海任《密勒支评论报》助理主编，以后又任《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

他踏遍中国大地进行采访报道，“9·18”事变后曾访问东北、上海战线，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

在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后来他对萧乾讲，“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来北平之前，他就接受鲁迅先生的建议，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想通过小说来向西方揭示中国的现实。

到燕大后，他又请在新闻系读书的萧乾和英文系学生杨缤（刚）一起进行编译。

他在编者序言中认为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既不是钻象牙之塔，也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同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同人民为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分不开的。

1936年此书出版。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

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

“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

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

9月末，斯诺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报道中，斯诺称赞这场战争是“伟大的表演”，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军事技能，是许多人所没有料想到的。

接着，斯诺沿着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线，横越中国国土，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并再一次去延安，撰写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

在汉口，他为中国工业所遭到的破坏而痛心：

“最令人气馁的是中国在各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把工业企业和有技术的工人加以改组和撤退，而在放弃南京、汉口两座战略城市之前，又没有作出巨大的努力使两个城市不致变成敌人的战争基地。日本利用了掠得的资源和工厂，把侵略更深一步向内地推进。”

他惊异地发现：

尽管日本人取得了所有重大战役的胜利，但从来没有赢得一项政治决定，从来没有能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

任何甘心承认失败的人，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人们不承认他的权威。

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了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脑，人民就唾弃他，他的影响也就消失了。如果蒋介石投降，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他称赞新四军：

最大资产，也许就是他的革命传统，那就是有组织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

他夸奖八路军：

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

所有这些结论，都显示了斯诺作为一个进步新闻记者敏锐的洞察力。都被收入他在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

斯诺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

1935年6月，斯诺又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不久即搬回东城盔甲厂13号居住。

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

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

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

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

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

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北平沦陷后，斯诺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死城，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

在延安，他曾将亲眼见到的一二·九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听。

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之后即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还热情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

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闻学会、历史学会开会之机，在临湖轩放映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展示照片，

让国统区青年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

10月《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

1938年2月，中译本又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为了取得更详尽的第一手人物资料，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于1937年4月冲破国民党宪兵、特务的阻挠，经西安、云阳到延安访问，采访了大量的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写出了《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中共杂记》等书。

1939年，斯诺再赴延安访问。

斯诺1928年初到上海时曾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文名字：施乐，并一直使用。

后来，胡愈之先生等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因不知他还有过这样一个汉文名字，而译作“斯诺”二字，并一直沿用下来。

2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西行漫记》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个大事”，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为了掩护，中文版书名为《西行漫记》。

1938年3月第一版印了2000册，很快售空。

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第四版。

仅几个月就轰动海内外，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

不少进步青年读了这本书，向往延安的自由民主。

23岁的华君武就是其中一个。

那时他在上海的银行里做小职员，也听到过诬蔑共产党的谣言，后来看了《西行漫记》才恍然大悟。

他说：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

1938年夏天，他瞒着母亲，只身投奔延安。

胡愈之（新中国建立之初担任《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说，斯诺几十年前写的这本书，始终是很多国家的畅销书，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通俗读物。

此书翻译成近20种文字，在全球有亿万读者。

3

埃德加·斯诺在延安的那段日子里，仅仅只见过贺子珍和江青一面。准确地说，只是点头之交，擦肩而过。

同样准确地说，斯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见到贺子珍和江青的。

在他的《西行漫记》传记中，曾对此有过简单的描述。

在 1968 年《西行漫记》的修订本中，他透露了一些从未对外人言及过的细节。

那是江青与毛新婚数月后的一天，

斯诺曾简短地采访过江青。

地点就在延安的窑洞里。

在一个美国人的眼里，江青留给他的印像是身材苗条、活泼好动。

斯诺说：

“她不仅打的一手好桥牌，而且厨艺了得。”

苏联人罗曼·卡门是一个曾三次获得斯大林奖的电影摄影师，1938 年斯大林派遣他到中国拍摄一些反映中国革命和抗战题材的影片。经过数月的艰难跋涉，好不容易才穿过国统区，于 1939 年 5 月中旬抵达延安。

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收集素材，尤其对鲁迅艺术学校学员们的日常生活和革命活动很感兴趣。

鲁迅艺术学校（简称：鲁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40 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

旧址位于延安城东北 5 公里桥儿沟，一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妆舞会。

现保存有天主教堂一座和石窑洞数十孔。

属 1961 年国务院颁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鲁迅艺术学院恢复成立以来，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十年办学实践和不懈努力，学院较快实现了由专科向本科、本科向研究生办学层次的提升。

继承“鲁艺”光荣传统和办学经验，立足[陕北](#)，注重地域文化与世界艺术潮流的融合，为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培养优秀艺术人才。

作为综合型大学的[艺术学院](#)，面对新的教育形势和发展机遇，鲁艺学院树立了明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和人才培养方向。

学院下设音乐系、美术系，现有音乐学、[舞蹈](#)、美术学、艺术设计 4 个四年制本科专业，6 个教研室。2006 年，陕北民间音乐、音乐课程教学论、美术课程教学论等 3 个硕士生研究方向获准招生。

全院现有教职工 46 人，其中专任教师 40 人，管理人员 6 人，在校学生 754 人。

各类图书 2270 册、音像资料 534 盒，艺术设计实验室一个，电脑 93 台，画室 23 间，琴房 60 间，钢琴 60 架。

正在修建的星海音乐楼总面积 9800 平方米，设施先进，功能齐全，将极大改善学院办学条件。

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40 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

1938 年 2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

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中共中央](#)委托[沙可夫](#)、[李伯钊](#)、[左明](#)等人负责筹建鲁迅艺术学院。此时，宁、沪等地大批文艺工作者陆续来到[延安](#)，为鲁艺的创办创造了条件。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

“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艺发表演讲时说：

“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毛泽东还为鲁艺题写了校训：

“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鲁艺的教育方针是：

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

1939年夏，中共中央为加强[华北](#)敌后文化工作及文艺干部的培养，派沙可夫等人率领鲁艺部分干部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联合[陕北公学](#)等校创办[华北联合大学](#)。

11月，根据中央的决定，留在延安的鲁艺部分师生恢复鲁艺。1940年11月，[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办了鲁艺华中分院。

后由于日伪残酷“[扫荡](#)”，鲁艺华中分院分编成江淮鲁工团和[黄河](#)鲁工团，深入根据地开展抗战文艺工作。

1943年4月，鲁艺并入延安大学，组建[延安大学](#)文艺学院。1945年抗战胜利后，鲁艺迁往东北。

在此期间，先后由[赵毅敏](#)、沙可夫、[吴玉章](#)、周扬等人担任正、副院长。

在延安七年半的时间里，鲁艺开办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培养学生685人。[穆青](#)、[贺敬之](#)、[冯牧](#)、[李焕之](#)、[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李波](#)、[时乐蒙](#)、[于蓝](#)等[文学家](#)、艺术家均为鲁艺学员。

鲁艺还创作了诸如《[白毛女](#)》、《[南泥湾](#)》、《[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极富影响力的作品，活跃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并对[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艺初期设[戏剧](#)、[音乐](#)、[美术](#)3个系，后增设文学系。

各系除设置专业课外，以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为共同必修课。各专业的学制最初规定为6个月。

1940~1941年期间，学校加强专业化学习，各系一律延长为3年（实习除外），并且注意提高教学质量。

为了紧密联系实际，鲁艺设有文艺工作团、实验剧团、歌舞团、美术工作团以及其他科研组织。

鲁艺当时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有志于文艺事业的革命青年。

曾在鲁艺任教的著名文学艺术家有[茅盾](#)、[洗星海](#)、[艾青](#)、[何其芳](#)、[陈荒煤](#)、[齐燕铭](#)、[张庚](#)、[吕驥](#)、[周立波](#)、[王朝闻](#)、[严文井](#)等。

各系研究室和附属剧团也集中了一批著名文艺工作者，如[王大化](#)、[袁文殊](#)、[华君武](#)、[孙犁](#)、[鲁藜](#)、[严辰](#)等。

抗日战争时期，鲁艺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文艺方针，把学习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成为学习、研究、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贯彻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的一个重要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党的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

在1938年4月至1945年11月七年半的时间里，鲁艺共开办了文学系四届，戏剧、音乐、美术系各五届，培养学生685人，其中文学系197人，戏剧系179人，音乐系192人，美术系147人。

[穆青](#)、[贺敬之](#)、[冯牧](#)、[李焕之](#)、[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李波](#)、[时乐蒙](#)、[于蓝](#)、[秦兆阳](#)、[黄钢](#)、[康濯](#)等文学家、艺术家、记者均为鲁艺学员。

鲁艺还创作了诸如[歌剧](#)《[白毛女](#)》、[歌曲](#)《[南泥湾](#)》《[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在抗日战争时期极富影响力的作品，活跃了[敌后抗日根](#)

[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对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鲁艺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

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

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

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

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

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跑过来了。

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

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

“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她同意了。

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

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

“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

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可惜的是卡门没有用他手中的摄影机将这个故事记录下来。

卡门与江青第一次见面是在 1939 年 5 月 25 日。他之所以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那天他正好与毛在讨论一些问题。

他是在半路上遇到江青的。他那艺术家的眼球一下子就被江青给俘虏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卡门在各种背景下为江青拍了许许多多的照片。江青尤其喜欢在马背上拍的那一张。

在旧时的中国，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骑马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在中国穷困的西北山区，马匹十分稀少。只有老资格的革命干部才能享受这个特殊待遇。

江青将这张马背上的相片送了一张给我。

同时，她还回忆道：

“1939 年，卡门为我照了许多相。我只选中了这一张。当时我还让新华社为我洗了一张彩色的，并将它送给了邓大姐（周恩来之妻）。

卡门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过此事。说江青有时候喜欢穿戏装拍照，头发梳成辫子。这使她看上去更像个斯拉夫人，而不是中国人。

他这样写道：

“我们正在赶路，去见毛主席。我们骑马穿过延安城，不远处便是一所新建的‘女子政治大学’。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女青年，其中少数是已婚妇女。学校建在一座小山上。位置就在鲁艺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后面。

一路上必须两次淌过溪流。”

他接着写道：

“当我们第二次过河不久，一位女骑手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上来。快要追上我们时，她勒紧缰绳一下子停住了。用一种略带夸张的姿势迎接我们。

她就是毛泽东的妻子。

像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人一样，早在几年前她就来到了延安——这个特殊的地方，并在政治大学学习。

之前她是上海演艺界一名崭露头角的青年女演员。现在，她已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她为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工作。是毛泽东的私人秘书。

她的工作职责是安排主席的活动日程、记录演讲内容、抄写文稿并负责照料主席的日常起居生活。

江青的坐骑仍在不停地腾跃，嘶咬着马嚼子。显然是跑了不少的路。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派她出了一趟远差，刚回来又派她前来迎接我。

江青的两条辫子用丝带绑着盘在脑后。身穿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官的厚呢大衣，光脚穿着一双木板拖鞋。

‘我去告诉主席，说你们来了！’

说着猛地掉转马头，朝我挥了挥手，旋即便消失在了一阵尘土之后。”

另一位名叫彼得·伏拉迪米罗夫（Peter Vladimirov）的苏联记者，从1942年到1945年一直呆在延安。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直到三十多年之后中苏关系恶化，他那本隐藏了多年的日记才得见天日。

伏拉迪米罗夫在日记中写道：

“……她是一个身材瘦小，但有着柔软身段与机灵的黑眼睛的女孩。当她站在身躯伟岸的丈夫身边的时候，娇小的身材反而更衬托出了毛的伟大。”

在1942年的日记中，他说：

“江青是一个有着极端性格的女人，爱憎分明。她毫不掩饰自己，她的事业就是她的一切。她是那么的年轻，充满活力……”

在1943年2月的日记中，他是这样写的：

江青不仅是毛主席的私人秘书，而且还负责毛主席所有的联络工作。她最亲密和最信任的朋友是康生。

康生（1898年—1975年12月16日），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溶、张溶，乳名张旺，笔名鲁赤水，中国山东胶南县人；曾担

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康生 1898 年生于今山东青岛黄岛区（原胶南市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与黄岛区合并为新黄岛区）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

1924 年，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并改名张溶，康生自称于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找不到确切的入党介绍人，此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曹轶欧；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1926 年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同年冬至 1928 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8 年下半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参与上海中央特科领导工作，1930 年 9 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被指定参加临时中央的工作，主管工会、交通等，这一时期他拥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1933 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 7 月去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在列宁学院学习。

1934 年 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 年从苏联回国，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延安[整风运动](#)中，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领导整风学习。

1933 年 10 月，[王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明[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步骤，强烈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把物件扩展到愿意抗日的除了[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党派团体，提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具体纲领，推进中华民族反日运动，组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这个纲领后来经过[宋庆龄](#)等 1779 人联合签名公开发表，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王明和康生当年一起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但他们日后的际遇却大不相同。

不过，在伏拉迪米罗夫的日记里却没有记载多少有关康生的事迹。

他认为康生之所以能成为江青的好友，仅仅只是因为康生尊重她与主席的婚姻。

在伏拉迪米罗夫的日记中，他把毛主席刻画成一个蔑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却不知毛泽东是倡导“洋为中用”的第一人。

他说毛主席只读古代的百科辞典、古典哲学论著及古典文学著作。

他说江青也很喜欢读书。尤其爱读外国文学作品。

他说：

“江青机敏灵巧而又不显山露水地帮助丈夫解决各种最不同寻常的问题。而这一切丝毫也不会影响到他俩的夫妻生活。”

他说江青对什么问题都喜欢盘根究底，对任何事情都感觉兴趣。

4

1944年，当《纽约时报》通讯记者迪尔曼·杜丁(Tillmsn Dudin)见到江青时，他像其他人一样注意到江青在那些年长的女人中，尤其是在像蔡畅（李富春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以及邓颖超（周恩来夫人）这样一些最杰出中国女性中间，竟然毫不逊色。并且在形像上似乎更胜一筹，更具亲和力。

康、邓两位大姐前文已有交待，此处不再赘述。

蔡畅 1915年毕业于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在家乡、长沙等地执教，1919年与其兄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参加新民学会。

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和李富春结婚。同年底由法国转入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

1925年回国，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江西省委妇女部长、湖北省委妇女部长、江苏省委妇委书记、江西省委组织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934年参加长征，是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

1935年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部长。

在杜丁的眼里：

“江青，她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美质……，是一个来到现实生活中的中国画美人。”

她的穿着和普通的中国妇女别无二致，只是在剪裁和选料上独具匠心。

她的头发剪成了苏联式短发。这是当时中国西北革命领袖人物夫人们之间最为时髦的发式。（30年之后，成了绝大多数中国妇女竞相仿效的发式。）这种发式很适合江青，使她看起来更为美丽。

那些日子里，江青吸烟。估计是陪毛泽东熬夜被主席熏出来“嗜好”。

江青还是一个美国舞曲音乐迷。

一个与她跳过舞的美国人发现她的英语“马马虎虎”，基本说的过去。

杜丁在他的报道中说，江青与主席新婚不久便患上了肺结核病，时好时坏地一直拖延到1944年尚未痊愈。

虚弱的病休并没有阻止她在鲁艺继续讲课。

江青在鲁迅艺术学院讲授的课程是戏剧艺术。此外，她还自编自导了一些宣传抗日的传统剧目。

另一个名叫哈里森·傅尔曼（Harrison Forman）的美国人，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也是一位新闻记者。

1944年，他同时结识了毛主席和江青。

他对江青那段历史的评价，比较客观和中肯。1972年，江青在一次会议中的报告便是很好的佐证。

他这样写道：

毛泽东在他居住的小院门口迎接了我。院内是一字排开的六间普通窑洞。这里住着毛泽东一家及其贴身护卫。

毛泽东年轻美丽的妻子与他住在一起。她从前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电影演员，是一个极其聪慧的女人。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放弃了她的电影事业，转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从事戏剧艺术教育。

毛泽东对戏剧的爱好使他俩走到了一起，并于1939年春不事铺张地结为伉俪。

他夫妻二人的穿着都很平常。

妻子一身像睡衣裤一样宽松的劳动布衣服裹在她那纤细的腰身上，使她的身段愈显苗条。

丈夫穿着一件粗糙的、带补丁的土布上衣，短得遮不住小脚的裤子。

我被带到了“客厅”。

这是一间用砖块铺地，白灰刷墙，摆有几件结实但很粗糙家具的窑洞。

时间已是晚上。

窑洞内仅有的一束光线来自一支被固定在一支倒置的茶杯上的蜡烛。

桌上摆放着专为招待我的点心：清茶、糕点、香烟和一些本地生产的糖果。

我们谈话期间，有几个小孩跑了进来，停了片刻，各自抓起一块糖果，又跑出去了。

毛泽东似乎并没在意孩子们的如此“失礼”举动。

5

大卫·巴雷特(David D. Barrett)和约翰·谢纬思(John S. Service)二人都是美国观察小组(Dixie Mission)成员。

1944年2月19日，罗斯福致函蒋介石，向其提出了向抗日根据地派遣美军观察组的要求。

但蒋介石并没有答应罗斯福的请求。

同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奉罗斯福总统之命访问重庆。

华莱士在谈判桌旁与蒋苦斗三天，终于以美国驻重庆的B-29远程轰炸机队需要根据地情报为借口，迫使蒋答应美方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要求。

美国人给这个观察组起了个绰号，叫作“迪克西使团”（“迪克西”意指美国内战时期叛乱的南方诸州，在这里则暗指陕北解放区）。

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成为了这支观察组的第一任组长。

“迪克西使团”在其存在时期内，进行了有价值的工作。

其职责和成员随时间改变而改变，尤其是在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指挥官后。

作为职责之一，使团收集天气信息，帮助援救坠落的美国飞机，并尽其所能地在前线的突破点上收集关于日本的军事政治得失的情报。

使团成员还不时在中共军队的护送下，行进于日军封锁线后方，撰写关于军事和社会形势及医疗条件的报告。

巴雷特和谢纬思只在延安呆了二年（1944年～1945年）。他俩都认为江青是一位极富魅力的夫人。

巴雷特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一次军情发布会上特意向他介绍：

“巴雷特上校，这是江青同志。”

巴雷特惊讶地发现，在他的想像中病体怏怏的癆病患者看上去却十分健康，和蔼可亲。

“她举止端庄，体态轻盈。像其他大多数中国女演员一样，她说得一口标准的‘国语’（普通话）。

在我的记忆中，她比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夫人更为出众，更年轻漂亮，风姿绰约。”

不过，在一般老百姓的心中，邓颖超与康克清的妇女领袖形象和地位要比江青更好。

江青偶尔也会参加一下周末舞会，却极少在一些重大场合露脸。如欢迎美国观察小组以及后来去延安的访问者的正式宴会上，都看不到江青的身影。

一次，那是1944年8月的一个晚上。

谢纬思与毛泽东、江青及一名翻译共进晚餐。

毛泽东始终掌握着会谈的主动权，餐桌上江青则极少讲话。

谢纬思回忆道：

“她相当年轻（在延安，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是中年人。）并且相当具有吸引力。”

在延安的逗留期间，谢纬思并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江青破坏贺子珍的家庭生活的流言蜚语。而后人却对些大做文章，实在的令人不可思议。

其他地方姑且不论，在当时延安的中国人当中，婚姻关系不过被视作是个人的私事而已。

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1945年访问毛泽东的时候，那一年毛泽东已年满52岁。

佩恩回忆道：

“毛的夫人进来了，穿着黑色松紧裤和毛衣。‘您好！’她打招呼道，带着浓厚的北京腔调。我突然注意到，她那张脸比那位更著名的蒋介石的夫人的脸，拥有更多的美丽和更丰富的表情。同时，伴随

着她那款款移来的脚步，一股高原地区野花的清香也随之飘进了屋内。”

6

进屋时，江青的手中握着一把刚从西北黄土高原的坡地上采集的野花。

这就是江青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那段日子，在江青自己的记忆中留给她的只有平等意识。她是毛主席的妻子，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没有因毛的伟大，而自觉自卑；同样，也没有因自己是毛的女人而比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妻子更优越。

江青自己整理的影集，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切。

在其后的岁月里，她的美丽和智慧，在十亿中国人的心目中整整保留了三十年。

在三十年代中期赴延安的外国人士的眼中，毛泽东已经确立了他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的领袖地位。关于这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8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亦有译为《西行漫记》的）便是最好的佐证。

在中共无数杰出的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学识和魅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便将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

1947年国民党将红军赶出了根据地，狂轰烂炸将延安城夷为了平地。

延安保卫战，于1947年3月13日开始。

战争是由国民党为了攻占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指挥中枢的目的，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4个旅25万多人的兵力而起。

中国共产党根据敌我态势决定：先诱敌深入，适时放弃延安，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创造战机，逐步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1947年3月，蒋介石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其重点进攻方向之一就是陕甘宁边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

当时，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有23万人，主要是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嫡系将领胡宗南指挥的部队，装备精良，盛气凌人。

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则不到3万人，而且装备极差，补给困难。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以整编第1军、第29军所属6个整编师15个旅共约14万人，分别从洛川、宜川出动，指向延安。

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身份部署延安保卫战，掩护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转移。

西北野战军教导旅、警备第3旅、第1纵队等部在延安以南的临真镇、金盆湾、牛武、茶坊等地构筑纵深阵地，依托有利地形，进行抵抗。

国民党军以近百架飞机、大量火炮掩护进攻，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西北野战军在极端困难情况下英勇作战，节节抗击。

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担负起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的任务。

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已兵临延安城下，直到傍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才离开延安。

延安保卫战进行了七天七夜，

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

毛泽东临走时对彭德怀说：

“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来的。”。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把他的西北军政大员胡宗南召至南京，具体部署进攻延安，想以攻占延安来实现其“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的心愿。

蒋介石把在西北的34个旅25万兵力组成南、西、北3个集团，以其“西北行辕”的马鸿逵、马步芳和“晋陕绥边区总部”的邓宝珊军在西线和北线钳制配合，以第一战区胡宗南主力从南线突破，夺取延安。

其意图是，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在延安及其附近围歼西北解放军，或逼解放军东渡黄河，由胡宗南部与黄河以东的国民党军夹击而歼灭之。

解放战争进行了8个月后，国民党军战线延长，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1947年3月起，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企图在战略上实施两翼突破，尔后钳击华北。

在陕北战场，国民党军集中34个旅25万余人，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20个旅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以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部12个旅由银川、同心、镇原一线向东；以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属第22军2个旅由榆林向南，企图围攻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消灭陕甘宁解放区部队于黄河以西，或逼过黄河，尔后会同华北国民党军将其歼灭于黄河以东地区。

此时，人民解放军在陕北战场仅有4个野战旅及3个地方旅2万余人，且装备很差。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充分利用陕北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基础，诱敌深入，歼其有生力量。

必要时放弃延安，采用“蘑菇战术”，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

据此，以教导旅及警备第3旅第7团共5000余人的兵力，于延安以南临真镇、金盆湾及牛武、茶坊地区，在延安军分区独立团和民兵游击队的配合下，实施运动防御，阻击敌军的进攻；以新编第4旅及驻陕甘宁边区的晋绥军区第1纵队（辖2个旅）为预备队，配置在鄜县（今富县）西南地区待机。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集团整编第1、第29军共15个旅14万余人分两路北进。

其第一梯队12个旅8万余人，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以密集队形实施多路攻击，企图三天占领延安。

教导旅和警备第7团等依托既设阵地组织防御，交替掩护，节节抗击，给敌以杀伤。

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各部队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

16日，胡宗南部进至甘泉县麻子街至金盆湾一线，随即改变战术，谨慎推进。彭德怀、习仲勋即令第1纵队、新编第4旅加入战斗。

西北野战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实行积极防御，适时组织反击，并利用夜暗灵活出击，袭扰、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

18日，胡宗南集团进至延安以南10公里的二十里铺、杨家畔一线；马步芳、马鸿逵集团进占盐池、庆阳等地；第22军向横山发起攻击。

此时延安各机关、学校已安全转移，群众已疏散完毕。

当晚，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等撤离延安。

西北野战部队经六昼夜激战，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完成了预定任务，也于19日上午主动撤出延安。

此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等率精悍的指挥机构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2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部署进攻延安，决定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为主力，并率马鸿逵、马步芳、邓宝珊等部共34个旅25万余人，100余架飞机，由南、西、北三面对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

面对严峻的形势，1947年3月初，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击破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问题。

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外线配合内线作战，保卫延安的计划。

同时决定，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

3月6日，毛泽东一面向各解放区通报陕北军情，一面急调外线部队靠近陕甘宁边区，电令王震率两个旅由晋绥西渡黄河，同时调守卫边区南线的新四旅、三五八旅从淳化、合水一线回延安。3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新市场举行万人大会，动员保卫边区、保卫延安。

3月10日，保卫延安的部队集结完毕，彭德怀亲临前线部署。当时，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主力只有6个旅，兵力不足3万，与敌相比，众寡悬殊。面对危急形势，为掩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群众转移，中央决定将兵力部署于延安以南地区，用运动防御战阻击敌人。

1947年3月1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撤离后仅7小时，国民党军飞机即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南线集团组成左右两个兵团，分别由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由宜川、洛川等地向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飞机对延安及附近地区再次实施轮番轰炸。

胡宗南坐镇洛川，要求“三天占领延安”，彻底解决西北问题。

从1947年3月13日起，西北各野战集团军和地方武装在延安以南地区，依托既设阵地，对来犯之敌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抵抗，为掩护中央机关和群众转移赢得了时间。

1947年3月12日凌晨，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撤离延安。

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止播音，由预设在瓦窑堡的备用电台接替，继续广播。

1947年3月16日，为统一指挥边区部队，中央军委决定将陕甘宁边区所有野战集团军编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下辖主力6个旅共2.6万余人，陕甘宁边区警一旅、警三旅、新编第十一旅和骑兵第六师共1.6万余人编为地方部队，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

同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签署保卫延安作战命令，要求西北野战兵团“在防御作战中达到疲劳与消耗敌人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撤离延安前在驻地会见了刚刚率部从晋绥赶来的王震，并嘱咐彭德怀，一定要让部队把房子、院子都打扫干净。入暮时分，毛泽东、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

国民党为了攻占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指挥中枢的目的，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4个旅25万多人的兵力。

中国共产党根据敌我态势决定：

先诱敌深入，适时放弃延安，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创造战机，逐步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南线部队开始从宜川、洛川分两路向延安发动天上地下的进攻。我西北野战军则组织运动防御，迟滞、消耗国民党军，掩护指挥中枢转移。

到1947年3月18日，中共各机关已转移完毕，西北野战军主动在1947年3月19日撤出延安。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却遭到西北野战军的不断袭扰、周旋，国民党军疲于奔命，磨得敌人缺粮断灶。

趁此机会，西北野战军再集中优势兵力，伺机各个歼灭。

由于延安保卫战战术运用得当，国民党军损伤惨重，连中共指挥中枢的毫毛都未能碰到。

1972年8月初的4天里，与江青会面之前，我去参观了延安。像我之前的千百万中国人和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一样，亲临其境地切身感受了它是如何唤起人们对过去岁月的回忆的。

这里依然故我——一片荒凉的土地和一些质朴的房屋。陈列室就是这普通房屋中的一间。

训练有素的红卫兵作为讲解员充满激情地向我们解说着延安——革命圣地，在过去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一些奇迹。

老实说，在来中国之前我曾花了不少时间去阅读中国的抗战以及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的中共高级指战员的有关材料。可是，当我目睹了眼前的一切，心灵深处仍然受到了一种巨大的震撼！

除了毛泽东的牢不可破的高大形象之外，在我心中还留下了朱德、周恩来和罗瑞卿等卓越的战略家的名字。

朱德和周恩来早已为人们所熟悉，而罗瑞卿对我们美国人来说却是个陌生的名字。

罗瑞卿（1906—1978），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1906年5月31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舞凤乡清泉坝，1924年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考入在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参加过军校讨伐夏斗寅的战斗，7月15日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部队的教导团，8月2日，张发奎在九江将教导团缴械，他离队回武汉寻找中共党的组织。

1928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被派往闽西，组建和训练游击队，任闽西红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率部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开辟闽西苏区。

6月，随部队编入红四军，任支队党代表。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会后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与政委罗荣桓积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加强政治工作建设，使部队获得很大进步，1930年6月，任二纵队（后改为十一师）政委。

1931年5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头部负重伤，并发大叶性肺炎，后痊愈。

1932年3月任第四军政委，率部参加漳州战役，进驻海边的石码。

6月任第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与参谋长徐彦刚率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中的登仙桥伏击战。

1933年8月，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中曾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到达陕北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西安事变后曾赴西安协助周恩来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2月回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

1938年在毛泽东指导下写成《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一书，向全国介绍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

1939年7月率抗大总校和延安其他学校数千名教学员工到华北敌后办学，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三十个县，行程三千里，通过同蒲、正太两条铁路封锁线，人称小长征。

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参与了百团大战的指挥和多次反“扫荡”，在此期间，他总结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撰写了《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等多篇著作，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贡献。

1943年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8

我略带惊奇地发现,刘少奇和林彪的图片及资料都从展室中消失了。

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而林彪则是主席钦定的接班人。在上个世纪的中国,这两个人的名字都是最响亮的名字。

一次饭后散步的时候，我问江青：

“林为什么要背叛主席？”

江青沉思了片刻：

“说林彪反党，我信。共产党本来就是由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纠合而成的政党。今天好人杀坏人，明天坏人杀好人。这就是阶级斗争。说林彪反毛，我不信。主席也不信！”

此乃后话，详情暂且不表。

我第一次到延安时，在展览室里没有见到刘少奇和林彪的画像。

形象最深的是毛主席跨坐在那匹著名的白马上的照片。

主席身旁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孩子。剪齐的短发，整洁的军装，让我深刻地领会到了中国的一句形容词：“英姿飒爽”。

离开那座白色墙壁的博物馆，在耀眼的阳光下我们驱车沿着尘土飞扬的乡村道路前往昔日毛泽东曾经居住过的那一排窑洞。

亲眼目睹经过重新修缮对外开放为人们瞻仰的圣地，不难想象当年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要比这更朴素和艰难得多。

在这段艰难岁月里，也是毛泽东位居红军和共产党领袖的第二个十年里，毛放下了手头许多的军事事务，而潜心致力于理论研究。

尤其是对时局的研究。

通过红卫兵小将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毛泽东选集》中收录的 150 篇著作，有 112 篇是在转战西北的 13 年中写成的，其中的 92 篇就是在延安破旧的窑洞里撰写的。

参观杨家岭毛主席故居时，讲解员特意向我们介绍了山脚下的一块被称之为“胜利菜园”的菜地。

毛泽东在连续写作几个小时之后，总喜欢在菜地里耕作，亲手种植一些蔬菜和烟草。且乐此不疲。劳动不仅能放松紧张的情绪，经常与土壤接触还能使主席的身体得到锻炼。

今天，这块地依然有人耕种。

我品尝了一口在阳光下长熟了的西红柿，味道甘美极了。

一间挨着一间一字排开的窑洞建筑风格完全相同。洞内通常都有二间房间。一间是睡房和浴室，另一间是办公和吃饭的地方。有时还得再劈开三分之一的地方用来接待客人或召开中央会议。

主席写作的房间内，一张光秃秃的木桌十分抢眼。桌面上摆放着笔墨和手稿，一只用旧了（不是原物）的茶杯。

一有时间，主席就伏案疾书。每每通宵达旦，废寝忘食。

几乎所有的讲解员都在传颂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而极少有人提到他的夫人。

除了专心致志思考革命问题之外，主席又是如何打发剩余的时光的呢？

他的孩子们是在小院中乱跑，还是根本就不在主席身边呢？

这些简单的问题，是任何一个来革命圣地延安参观访问的中国人都不可能问及的。只有我这个美国人才会胡思乱想，向讲解员提出这样的问题。所得到的回答，不是微笑着‘笑而不语’，便是简单的一句话：“我们不知道。”

显然，这些年轻人根本就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伟人，是人民的领袖。没有人会想他还是一位丈夫，是孩子们的父亲，也是一个普通家庭中的一名成员。

至于江青同志，不论是在私底下或是公开场合，从未被公开议论过。

在我与江青后来的交谈中，她对延安岁月的回忆始终是断断续续的，那些痛苦和幸福的往事同时深深地埋藏在她的心底。

在江青的眼里，毛泽东那段时期情绪很不好。没人的时候经常发作、焦虑、自言自语，常常绞尽脑汁苦思冥想。

主席写作时，为了一个问题经常陷入长时间的沉思之中，而不得结果。这时，他便放下笔，走到老百姓中间去。他总能在群众中找到灵感，找到答案。

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对手依然是王明。头痛的原因是他是自己的同志，不是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王明是自己的同志，而他对革命事业的破坏作用却远比敌人要大得多，也猛烈得多。

三十年代后期，王明与毛泽东的路线斗争仍在继续。

二人都力图以各自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只不过革命大家庭的家长——斯大林确实是更偏爱王明一点儿。

江青在上海期间，王明虽然本人并不在上海，但仍然很在影响力。他一直努力地在他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遥控着上海的地下党。

江青当时刚参加革命，正在为成了共产党的一员而努力奋斗。她还是一张白纸，既不知道毛泽东，也不认识王明。她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扬和张庚。

周扬想必大家并不陌生，而张庚当时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

张庚（1911年—2003年），原名姚禹玄，学者，戏剧理论家。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达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参与组织《白毛女》等新歌剧的创作。

江青别无选择，只能跟随周、张追随王明路线。

王明路线后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路线。同时也埋下了江青与周、张二人的心结。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后来进了城在北京的日子里，江青与他二人的关系一直很疏远。

江青直到到了延安，并通过与毛泽东的婚姻而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之后，她才知道王明。

王明与毛泽东二人都曾引导过中国的革命道路。

不同的路线是：

王明路线是要效仿俄国革命的成功之路，面向城市、依靠与敌对党和资产阶级的妥协，感化对方。博取对方的同情，从而从资产阶级手中分一杯羹，只要做到人人有饭吃，也就算是革命大功告成了。

毛泽东要走的是自己的路。

首先发动农民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然后再以农村包围城市，推翻整个剥削阶级，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斯大林关注吗？

斯大林他能看到吗？

为了使斯大林能了解中国的国情，毛泽东这才决定邀请斯大林正式派摄影师卡门来延安拍摄一部独家全方位报道中国农村革命影片。并通过这一举动以期达到引起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现实状况的关注。

难道不是吗？

毛泽东他那年轻貌美的妻子体态轻盈地纵马驰骋在滚滚红尘中的场景，难道只是一幅简单的动人心弦的电影画面吗？

为了说明王明与主席二人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江青从正反两方面作了一系列的论述。

王明其人其事前文已有交待，此处便不再赘述了。

谁对谁错？

历史早已给出了公正的结论。

据江青所言，土地改革与统一战线政策在当时的中共高层是最有争议的问题。

土地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

比如土地税收制度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等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因此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可以说一直都在进行。

我们这里所讲的土地改革指的还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

土地改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土地改革是指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即把一部分人占有的土地转移给另一部分人所有。

广义的土地改革不仅包括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且包括土地租赁契约的改变。

土地改革是一种通常存在争议的社会安排或改造，其目的是使政府能够管理土地的占有和使用。

土地改革通常由政府或政府所支持的房地产商发起并重新分配，改革目标一般为耕地。

有时土改会变为一种更具有革命性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政府的强行拆除或接受，这也是反对土改的主要原因之一。

无论世界各地，纵观其历史，人民对与土地有关的不满一直是挑起[革命](#)和其他导致社会动荡的最常见因素。

对于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民来讲，土地所有者拥有着特权，即侵吞部分甚至大部分的[产品](#)然而并未对[生产](#)做出相应的贡献。

这是阶级之间的不平等。

因此，土地改革通常是指土地所有权由人数相对较少的富有者、大量土地的所有者（如[贵族](#)、[庄园](#)、[农场主](#)，或通称为土地主）向那些耕作者的转让。

但广义的土改并非完全是这样，政府对土地进行的征收以及农业集体化改造亦被纳入。在改革过程中，部分转让会给予地主相应的补偿，金额从象征性的小数目至土地实际价值均有。

而某些改革甚至不需要所有者同意，即[土地革命](#)。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两次最著名土改运动分别为[土地改革运动](#)与[耕者有其田](#)运动。

解放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仍维持封建[土地制度](#)，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五十的土地。

他们凭借占有的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

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

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受尽剥削，生活不得温饱。

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他们十分悲惨，新中国成立后，占全国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获得土地！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规定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

《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

《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在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的开展了土改运动。

近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和房屋等；还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约三百五十亿千克粮食的地租。

1950年，美术家朱宣咸创作的作品《争阅土地改革法》，就非常典型生动的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场景。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正确贯彻和执行了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和政策。

1952年冬，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

农民真正获得了解放。我国存在两千多年（建立于战国，公元前475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摧毁，地主阶级也被消灭。

1949年后，[中国](#)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宪法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这就形成了旧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土地无偿使用，二是无限期使用，三是不准转让。

由于没有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对待，致使土地无偿占用，乱占、多占的情况[屡禁不止](#)，造成土地资源极大浪费。

由于党和国家在解放区率先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1948年冬，[陈毅](#)写道：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骏马高车送粮食，随军转运逐西东，前线征立功。”

江青说，直到 1974 年 3 月去世，王明每隔三、五天就要给编辑们写一封信，申诉他的思想比毛泽东更加正确。

只是没有人答理他而已。

江青说：

“实话实说，王明不像个中国人。在我看来，虽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个美国人，但她比王明更象是个中国人。”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引? Strong, 1885—1970）美国人，1885 年 11 月 24 日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费伦德城出生。

早年就学于奥伯林学院。

1908 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她年青时就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从事儿童福利和社会工作，积极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1 年第一次到苏联，广泛介绍苏联的革命成就。

1925 年首次访问中国，报道并支持省港大罢工。

1927 年，她第二次访问中国，访问湖南、上海、武汉和西北地区，报道了湖南农民运动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真相。

1930 年协助苏联政府创办英文《莫斯科新闻》任主编和特约撰稿人。

抗日战争时期两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活动。

1946 年第五次来华时访问了延安，她和解放区的战士们一起吃小米饭、一样住窑洞，并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

当年8月，毛主席和斯特朗谈话，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历史性科学诊断。

接着土改的话题，江青曾在西北进行过简单的考察。她说主席曾在1943年10月1日写过一篇题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文章。

摘录如下：

（一）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

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

党委应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和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村，发现模范，推动他处。

同时，应在报纸上发表关于减租的社论和关于减租的模范经验的报道。

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

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

在减租斗争中应当成立农民团体，或改造农民团体。

政府应当站在执行减租法令和调节东佃利益的立场上。

现在根据地已经缩小，我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

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二）敌后各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机关人员、军队人员和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

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

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

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

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

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

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

各地应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和为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员训练班。

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

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套本领。

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

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

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

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

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

把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和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和个人业余生产，认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

不把合作社看作为群众服务的经济团体，而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

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而说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据地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

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部长、总务处长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

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价的原则下，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

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

今年全部根据地的一律彻底减租，将是明年大规模发展生产的一个刺激。

而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

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三）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

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

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

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现在许多人已经不读《毛选》了。只要静下心来，读一读后便不难发现毛泽东在文中详细阐述了他在1934年1月第一次提出的构想，特别是建立互助组（陕北称变工队）的建议，并号召要推广到愿意合作的地方群众中去。

他们将建成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互助形式。

这样组织的劳动力交换以及军队农忙时半日或全日支农的工作方式，同部队的防御一样，在战时是绝对心要的。并且必须保持下去。

变工队是中国农村旧有的比较流行的一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劳动互助组织。

一般是由若干户农民组成，通过人工或畜工互换的方式，集体地轮流为各家耕种，按等价互利原则进行评工计分。

生产季节结束或年度终了的时候，进行结算，一工抵一工，少出工的农户向多出工的农户补付工钱。

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变工队有了广泛的发展。

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北方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过一种合作化程度较高的变工形式，农户除换工互助外，还将耕畜、农具折价组社入社共同使用。

另外，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劳动农民以村或乡为单位，进行换工互助。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利用变工队等形式把广大的农民组织起来，对于调剂人力、畜力、发展农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起了促进作用。

这时的变工队已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为以后的农业合作化提供了经验。

为便于更进一步的了解 40 年代的那段历史,江青向我推荐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文章。

文章中表明了毛泽东当时赋予联合阵线以多么大的权限,前提是其独立性和主动权必须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

江青同时还强调了存在于联合阵线内部的两条路线之争。表现形式便是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路线斗争。

联合阵线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还包括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文化斗争。

时间在谈话之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夜深了。

年轻的服务员中有人犯困,情不自禁地打起了瞌睡。

江青依然显得精力十分充沛。

她从坐着的那张宽大的柳条椅中站起身,举步向另一间屋子走去。

隔壁会话间的一侧摆放着一张台球桌。

当时台球在中国并不普及,中国人更喜欢的是乒乓球。

接过侍卫递过来的球杆,江青对我说:

“坐的时间长了,要是不运动运动两腿就会肿胀。”

她绷直腰板,做了一个水平瞄准的动作。

接下来的时间里,屋子内只听见台球的撞击声,以及赢球后双方各自发出的欢笑声。

打球时,江青又提到了西北的经济问题。

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凸显,牲畜、种子还有劳动力问题,一抓就死,一放便乱,哪一件都不是让人省心的事。

从一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在延安的一个旧礼堂中草拟的无产阶级创作原则如果被真正贯彻执行了的话，那么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也就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

这一点在教育、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便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42 年 5 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括 5 月 2 日所作引言和 5 月 23 日所作结论两部分，1943 年 10 月 19 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1953 年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

讲话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剖析，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

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竞的《漳河水》，孙犁的《荷花淀》等作品。

一种叫做“秧歌”的在西北地区非常盛行的民间舞蹈，被他们改编成了“解放舞”，在解放区普及开来。

同时，当地的剧种也被注入了新鲜的政治内容。

首批创作出的剧目有：

《兄妹开荒》、《白毛女》等。

剧中虽充满了凄婉与伤感，但却给当代生活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树立起了一种光辉的形象。

20年之后，江青亲自动手将《白毛女》一剧，重新改编成“样板戏”，依然震撼人心。

由于延安的房屋和材料都十分稀缺，所以很多旧材料都被派上了新用场。

鲁艺的院舍利用的就是五座被废弃的旧天主教堂。

距离延安中心城约5公里。

教堂的主体被改造成一个礼堂。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很协调的活动场所，却是一个古老与摩登、土建筑与洋艺术相结合的建筑物。

看到这座建筑，人们的眼前即刻会浮现出这样一幅情景：

一个大提琴手在教堂内的一个角落里如醉如痴地拉动琴弦；一个小型弦乐队在教堂的另一角演奏着一曲听上去像是异国曲调的乐曲；还有一个角落里，一位民歌手正在演唱着一支由旧曲调改编并添上了新歌词的民歌。

最后，所有的乐曲汇集成一个音符：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那些曾一度被基督徒占据的寓所，现在变成了音乐系与戏剧系同学们的宿舍。

有的学生模仿波西米亚吉普赛人放荡不羁的样子，穿着小说中俄国农民的罗曼装束，以使自己有别于军人。

波西米亚人是指捷克共和国内波西米亚的居民：

波西米亚人是用来指称以前波西米亚王国的居民，这个王国目前位于捷克共和国境内。

这个名字是源自于居住在这里的凯尔特部落的拉丁名词 *Boii*。

今天，对于说捷克语的人来说，*Bohemian* 这个字常常是 *Czech* 这个字的同义字，只不过它使用的时机比较是在古老风格或和诗有关的脉络下，这种用法尤其会带有第二个涵义（请见下文）的影响。

这也是为何他们会说自己是捷克人而非波西米亚人的原因。

另外一个造成 Bohemian 这个字跳脱了日常用法的原因，是因为 Czech 这个字在 1919 年—1938 年以及 1945 年—1993 年受到官方的推广，这是为了形塑一个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是将波西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与斯洛伐克合并之后所创造出来的概念。

波西米亚人的第二个涵义是出现于 19 世纪初期的法国。这个名词被用来称呼希望过着非传统生活风格的一群艺术家与作家。

鲁艺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从当地群众中招募而来的。

经过两年的培训，学生们就被派往前线，向红军战士及当地的人民进行战地演出，以鼓舞士气。

鲁艺老资格教员中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及记者们，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教学的方式方法问题。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出席了一次由这些被迫离别城市的知识分子们主持的会议后，这才开始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一二再、再二三地告诫这些绝大部分从大城市上海来的知识分子们不要趾高气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

哈里森·福尔曼是一位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朋友，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

1944 年夏，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冲破重重阻碍，从国民党控制下的重庆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战地进行战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报道了模范抗日根

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绝、英勇抗日的八路军，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此书后来被译为《北行漫记》）。

这部作品被誉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不仅如此，福尔曼还把自己在1944年8月到10月采访晋绥边区拍摄的照片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漫影》画册。

延安的领袖及随员们的正式聚会是在梨园举行的周末舞会上。

美国记者称延安的舞会是“周末谷仓舞会”。

共产党人知道了这个称呼之后，特别喜爱在把自己与以前的皇帝，尤其是唐明皇神秘的宫廷戏院进行比较后，似乎是接受了这个称呼，并时常开玩笑地自己也这么叫了起来。

在解放区，一个女孩显示个人解放的最佳方式便是在舞会上选择自己的男舞伴。

毛泽东自然是所有的男舞伴中最“抢手”的一个。

除非毛没有去，否则立马就会有女孩转到主席的身边，彬彬有礼地请求：

“主席，请和我跳个舞吧！”

舞会的音乐，有时候用的是一个旧得不像样的留声机；放得也是一些东拼西凑来的唱片。

有时候是由“乐队”演奏。

所谓的乐队，只有几把二胡、几把外国小提琴、几只口琴、一架箏、一把演奏用钢锯和一架传教士留下的足踏风琴。

演奏的乐曲，各民族的都有。

法国的小步舞、维也纳的华尔兹和美国的流行舞曲。《铃儿响叮当》、《扬基之歌》只为最尊贵的外国客人演奏。

在舞曲的伴奏下，人们欢快地跳着狐步舞和华尔兹。年轻人最爱跳的还是“秧歌”舞。

在这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度，领袖们与群众都“沉醉”在乐曲中。

西文社会中那种跳舞时要身体接触的方式当时并不被禁止。

福尔曼回忆道：

在大多数场合，你都可以看到有着一头浓密黑发、衣着随便、为人民所尊敬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正在欢快地与一名漂亮可爱的女生（延安大学）跳着一步舞。

同时，你也许还会看到一位普通的司机正在与体态丰满的朱德夫人飞旋。

而看上去像父亲一样的抗日勇士——我们的朱总司令，此时可能也正在与一位比他体瘦一轮、年轻三分之一的可爱女孩一起踏着畅快的舞步。

其他身上无不带着战斗疤痕的将军们，如林彪、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他们中的每一位日本人都情愿牺牲一个精锐的整编师来换取的抗战英雄，此时也极其难得地离开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在舞池中像跳吉特巴舞似地与大学生们一起飞来掠去。

与人民一起共舞的毛泽东，此时已从一个年轻的革命活动家上升到一个老练的军事战略家与政治理论家的阶段。

毛泽东的身躯也不再像长征时的那样皮包着骨头，但他却依然保留着一头浓密的黑发。

1941年12月24日版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萧三写的一篇文章。

标题是：

“我们英明伟大的领袖、我们的导师和救星。”

毛泽东是引导中国革命成功的独一无二的精神领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要延安的10年之中，毛泽东拥有了一批训练有素的追随者之后，开始思考一些理论问题。

此阶段他写作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将马列主义的普通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也就是在本质上寻求一个“民族形式”，即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种寻求与探索自然也会延伸到文化界。

1942年5月，在鲁艺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毛泽东写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场讨论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直至文革之后到毛泽东逝世。

在我们的谈话中，江青偶尔也会流露出对延安时期往事的怀念。

在她看来，70年代初延安的形势仍不能令人满意，尽管此时已比她和主席住在那儿时要好得多了。

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在延安一直在努力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而此时却有人撰文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一种令人反感的“等级体系”。

捉刀者便是王实味。

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

“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

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

“（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当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

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

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

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1942年被开除党籍。

1943年被逮捕关押。

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

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王震将军亲自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

时年四十一岁。

根据熟悉他的许多人的回忆，现实生活中的王实味并不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物。

王实味的性格狂傲、孤僻、偏执、吝啬，似乎缺乏中国人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

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以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情趣。

他对别人参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

他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取一种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姿态，一旦意见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因此，王实味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儿子、丈夫、父亲和情人。

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向往革命的冲动，这或许与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有关。

王实味出生于河南潢川一个破落乡绅家庭，因为家庭贫困，曾经从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两度辍学，从十八岁开始就不得不自食其力。

为了谋生，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先后从事过邮政局实习生、中小学教师和政府机关低级科员的工作，也曾经在上海亭子间里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个人生计长期没有任何保障，饱尝世态炎凉、社会不公和战争离乱之苦。

王实味早年发表的几篇小说，既记录了一个充满纯真理想的青年踏入复杂的现实社会以后的种种主观感受，也揭示了他由不满现实到投身革命的思想根源。

王实味曾经两度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入党是 1926 在北大读书期间。

但是王实味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十分淡薄，而“小资”情调却十分浓厚。

不久就因为追求党内女同志，与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学生支部领导人发生龃龉，被指为“入党动机卑鄙”，最终被北大党组织开除。

这件事显然造成王实味对组织的某种不满。

目前尚无史料显示在 1930 年前后，作为一个无党派文学青年，王实味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人士之间的主观价值取向，但他显然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陈源、徐志摩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受到他们的器重。

他的小说作品多经由陈源、徐志摩之手发表于《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和《新月》等刊物。

因此，他 1937 年再度入党，奔赴延安，其历史背景和思想动机值得进一步探讨。

他并不是一个性格坚强、有坚定信仰的人。

尽管在延安整风初期，王实味因发表杂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经提出“退党”要求，但当他觉察到局势不可扭转的时候，又自动跑到中央组织部要求组织上宽大处理，最终，他与组织的决裂，实乃在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的褊狭和无情，而非他个人具有某种决绝殉道的精神。

王实味的思想形态十分驳杂，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性和一贯性。

虽然他第一次脱党后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有过一些接触，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他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接纳至多限于一般个人道德伦理的范畴，而与国家政治方面的内容无涉。

他在延安发表的论文和杂文也谈不上深刻的理论性。

他的《文艺民族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因立场偏激而独树一帜，然而他的那些文艺观点能否站得住脚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他在《野百合花》等杂文中所表达的理想诉求，归结起来无非是“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

而且，他对这些理想诉求的理解也是十分质朴和大众化的，它们主要建筑在对具体事实表象观察的基础上，而非建筑在对制度框架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

这似乎是从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一类激进知识分子的共性思想特征。

而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概念，只有被放置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理论建构中，才能得到合乎其本意的理解和诠释，否则，关于“自由”的理解，就会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关于“民主”的理解，就会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

因此，如果真要从思想属性上进行分类，我倒宁愿将王实味归类于原教旨马列主义者的行列。

毕竟，他在上海时就曾经为托派翻译过一些苏共中央政治文献，而在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担任特别研究员的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所翻译的马列主义文献达到两百万字以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最高当局将他定性为“托派分子”似乎也勉强可以成立（至于“托派”概念是否可以与“国民党探子、特务”和“反革命”之间划等号，是否应该被从精神和肉体上彻底消灭，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赘）。

王实味的可爱与可敬之处，在于当他觉察到边区的特权现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时，没有像绝大多数人那样保持缄默，而是诚实、率性地将自己的不满公开地表达出来。

他提出那些尖锐的批评，主观上完全出于响应上级号召的动机，他所揭露的问题也都有客观的事实依据，结果却被定性为“别有用心”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监禁和杀害；

他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批评边区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官僚主义现象，结果却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自由化”的罪名。

我们看到，正是在批判王实味、丁玲等人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极端民主化”主张的同时，一种新的革命伦理被悄然建构起来。

这种革命伦理与我们所熟知的那些长期以来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道理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某种莫名其妙的张力。

“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斩断了世俗伦常的亲情和友情，“党性”与“人性”似乎变得水火不相兼容，来自上级的批判斗争不论对错与否，都被视为对革命者革命意志的一种考验。

结果，革命队伍中固然涌现出一批像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人那样的理想人格典范，但同时等级制度、特权思想、集权主义、个人崇拜等消极因素也不断发展蔓延。

时过境迁，中国共产党已经由当初的“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政党蜕变成“让少数人首先富裕起来”的致富工具。那么，今天的共产党，为被过去的共产党“打倒”的人“鸣冤”平反，其实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江青从一个文件夹中抽出了一份材料。

封面上空空的，没有任何标题。

显然，这是一份内部交流的材料。

她翻着书页说：

“这些文章第一次出版是 1941 年，1958 年‘反右运动’期间又重印过。”

江青接着大声说：

“纯粹是诽谤！”

1942 年，那时还是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撰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

“.....每天太阳都有一些黑点。”

1942 年 3 月，王实味出版了一本名为《野百合花》的系列短文。

书中作者坚持认为：

这种以鳞球茎上长出来的，尝上去味道很苦的野花（山丹丹）是延安最美丽的野花。

作者以花作隐喻，不直接地抨击了延安领导者们。

同时，丁玲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严厉批评了延安共产党政府统治下的妇女状况。

江青挥了挥手中的材料：

“读读这些文章吧。然后，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主席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从他们身上抓住这种苗头了。”

江青接着说道：

“毛主席在座谈会上及其他地方驳斥的种种苗头，从各个地方都点燃了导火索。中央委员们及青年团员们贴出大字报，轮番向党、军队和人民进行攻击诽谤。”

不觉之中江青的语调高了起来：

“从肩负责任的同志阶层范围内，如此对毛主席及其周围的人进行指责，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关于生活方式，江青说她自己一直是很艰苦朴素的：

“第一次到上海时，我住的是一座古雅的洋房。到了延安，总是住土窑洞。我和主席吃的穿的都和劳动人民完全一样。”

在过去的岁月中，鲁迅艺术学院的教职员工中绝大多数人的确都像江青一样，过着艰苦朴素的日子。

那些职业戏剧家、作家和音乐家们正是从以往的经历中建立起了他们不可动摇的个人信念。尽管他们有时会对经常变化的形势的判断反应较慢。

戏剧家马可回忆说，文学家们经常聚在一起，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争论希腊与罗马的古典作品。他们赞叹欧洲 19 世纪的文学艺术。一些表演外国戏的女演员，不觉之中竟然沉浸到了安娜·卡列尼娜的角色之中。以至于她们除了为其眼睫毛投身到地面上影子的长度而焦灼外，别的什么事也顾不上了。

在江青的记忆中最美好的一面仍然是学院进步的一面。

1940 年初，她在鲁艺戏剧系执教。

当时的院领导们都在为话剧忙活。话剧是一种灵活机动的剧种，便于顶替那些歌颂达官显贵、才子佳人的旧戏。

当时鲁艺编排的新戏，反映的都是当代题材。最为成功的有：《火烧飞机场》、《桑干河上》和《兄妹开荒》等。

在这些新剧目彩排期间，主席第一次去了鲁迅艺术学院。

江青回忆说：

“主席非常喜欢这些剧目。并开始询问起学院中的其他活动情况。主席开始关心现代文学艺术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之前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主席请教员们进行广泛的讨论。此后不久，这些议题就被提交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讨论了。”

关于这件事，马可有着更详细的回忆：

1942年5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突然降临鲁迅艺术学院，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主席骤然到达的消息像迷雾中透出的光线一样迅速传开。人们像久旱逢甘露一样，纷纷从窑洞中涌出，带着纸和笔奔向大会堂。

鲁迅艺术学院作为大会堂的那座旧礼堂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只好坐在门外的地上。

座谈会由周扬主持。

毛主席站在人们面前，总结了最近关于艺术问题讨论的结果。他提出了他所看到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家们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

主席形象地比喻说：

“鲁迅艺术学院是‘小鲁艺’，而解放区及广泛的生活斗争应该被视作‘大鲁艺’。‘小鲁艺’的成员们不应该将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应该使自己走出去，在‘大鲁艺’的范围内宣传他们的新文化。”

主席的讲话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这场论战持续了好几天，其间的气氛由早春甘霖变成了暴风骤雨。

在文学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民族形式”问题上，主席支持周扬的观点。即：为人民所熟悉的文化形式应该毫无疑问地救助与支持新思想，也就是说救助支持共产主义者的宣传与对领袖至高无上的崇敬。

与此同时，主席还支持了周扬对丁玲、萧军和王实味的抨击。尽管这些人都是当年从大城市走出，勇敢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

而周扬，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作为毛泽东在文化事务方面的掌权者，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的稳固地位。

在一次交谈中，江青提到了她也参加了 1942 年 5 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她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呢？

她是作为主席的秘书参加的。

这是她卸去讲授与执导戏剧工作之后的新岗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仅仅讨论的是文学与艺术中的问题，更多的争论是其他领域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争论的焦点依然是主席与王明之间的路线斗争。

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宣称他们信奉的是源于苏联革命理论的正宗马克思主义；而追随毛泽东的人则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不言而喻，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占了上风。并一再为后来的革命实践所证明：

“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

江青继续讲述她曾学习过的党校及马列主义学院的情况。

她说：

“当时，党校以及马列主义学院中都没有毛主席的著作。教材只有一些由王明主编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撰写的东西。主席能够突破他们‘意识形态封锁’的唯一途经就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到处讲解人民群众特别感兴趣的思想见解。只有在与人民群众的切身联系中，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话题又回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江青说：

“那次会议的与会者中，很多人都是他们所在领域的专家和权威。主席等到轮到他时才发言。他以对那些负责戏剧编导排演的名人进行‘有说服力的评论’为开头，讲话中他所表达的大意要旨明显地不同于其他人。他的论断不仅仅只是关于文艺本身，而且还深入到了哲学与政治理论上去探究文学艺术问题。讨论的宗旨与结论，主席总结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中，主席提出了一些极为严肃

的问题：一位作家应该写光明面还是阴暗面？一部既定著作的目的是什么、其结果如何？我们所制定的政治与艺术标准应该为谁服务？”

江青接着强调说：

“要经常读读这篇文章。”

第二天上午，这篇全部是汉字的文章便被补充到了我的资料库中。

回想起他与主席共同生活期间所遇上各种问题及挑战，江青巧妙地陈述道：

“我敬仰毛主席。”

接着又反问我：

“你不想你的学生也敬仰你吗？”

语气中我能明显地感受到她那发自内心的对主席的由衷的敬爱之情。

我为她的真率而惊讶，回答说：

“不，我喜欢他们与我争论。我也不是什么伟人，再说这个世上，不是阿猫阿狗随便什么人都能受人崇拜的。”

江青微笑了一下：

“文化大革命期间，主席总是在与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作斗争。什么事情做过头了，同样存在着极大的危险。那些在过去的‘斗争’中一直找机会想击败他的人，不过是变换了一付‘阿谀谄媚’的嘴脸而已。”

江青后来才真正地认识到，为什么主席内心里如此反感甚至可以说是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却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群众对他的敬仰。

用列宁的话来说：

“文学艺术是革命这架机器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却是不可缺少的齿轮。”

而毛泽东则更强调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如果作家是“工程师”，那么鲁迅艺术学院就是形成那些罕有矛盾的文化工厂。

学院的教员们被敦促着，去将微妙深奥的艺术形式改造成朴实无华的简单的艺术形式。

在 40 年代初，这种说法绝不是什么陈词滥调。

新的延安戏剧及改造后取材于工农兵真实生活的地方戏开始兴起。

一个简单的故事情节，（一个机警的农民如何帮助红军战士挫败日本侵略者的滑稽情节）就能编排出一出好戏。从而极大地激发出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尽管这些知识工程师们惯于创造的是具有复杂人格与矛盾心理的人物形象。

艺术家和作家与观众和读者常年以来由于天资与受教育的不同程度所形成的隔阂，就这样轻易地被毛泽东的‘大众文化’所打破。

文艺专家奉献给人民群众的作品要具有积极向上的文学精神。对那些思想保守、不肯依从、难以驾驭的知识分子，要通过思想改造使其脱胎换骨，心向人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为反面教员，并且最具有“争议”性的一批作家中，丁玲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

湖南临澧人。《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是丁玲代表作品之一，曾获斯大林文艺奖金。

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

后入岳云中学就读。

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

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

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

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

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1927年开始发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

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1928年，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

1931年，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一些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

1933年被捕，被软禁在南京，1936年脱离禁锢，离开南京到陕北。

她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作家，具有时代的鲜明印记。《莎菲女士的日记》描写“五四”退潮后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是细腻大胆、感情饱满的人物心理刻画典型。

其主角追求而无出路，伤感、自恋、颓唐的“时代病”体现在其身上，包括病态的反抗，都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批判性。

《韦护》通过其独特观察，捕捉出过渡性历史人物的特殊矛盾。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则刻画了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知识分子。

《水》是“普罗”文学重大突破，着重于表现农民觉醒、反抗的群像，放弃了对个别典型的刻画。

《母亲》则体现了封建大家庭的崩溃没落以及第一代新女性的坎坷路程。

在苏区，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

创作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

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

1948年，丁玲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荣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

《四人帮》被打倒后，许多人怂恿丁玲写文章骂骂江青。

丁玲却说：

“骂江青？”

我为什么要骂江青？

你知道是谁将我从秦城监狱中捞出来的吗？

是江青。

你知道主席为什么“恨”我吗？

那完全源于对江青的爱。

主席与江青的婚姻，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而且绝大多数是领导人。我是少数派。主席知道的。

问题是我没有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这件事让我后悔和内疚了一辈子。

我对不起主席。我也不如江青。

主席是江青生命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男人。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那么长的日子。

江青敢爱敢恨。而我却只会躲在小说里，拐着弯骂人。我真是不如她呀……”

这些话，丁玲只对老伴陈明一个人说过。

第八章 进城赶考

1

“我也是一名战士！”

江青昂首对我言道。

言语中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在北京采访期间，江青曾对我提到过，解放战争中作为一名政治工作者她一直战斗在西北军总司令部。在整个转战陕北的部队中，她是唯一的女性。至今她身上还保留着一股军人的气质。

当我们在广州再次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引起了江青对往事更多的回忆。

每次的政治局会议，江青都记有详细的日记。从延安到北京，这一路上，她始终带着她的文件箱。

文件箱里装着有关每次战役的手绘的地图和表格，投入的兵力以及作战（部署）方案。

最后的几天里，江青一直在忙着整理笔记。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五年（1937~1972），那段封存已久的记忆，依然使江青神采飞扬激动不已。

她虽然没有直接上前线作过战，但毛泽东部署的每一次战役，背后都离不开她的身影。

“这些事情，‘我们’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外国人说过。”

江青腴腆地言道。

我知道，她这里所说的‘我们’指的是中共领导人。

始料不及的是，我们的这次谈话，后来成了江青“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口实。

也难怪，抗日战争共产党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共合作打败了侵略者。解放战争共产党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这八百万匪军，难道就不是中国人了么？

这大概也许就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愿意对外过度宣传这场胜利的缘故吧。

2

战争，通常都是男人们的“专利”。但是，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从来都不乏女人们的身影。

两个女人在一起喋喋不休地谈论了七个小时的战争，江青突然站起来，止住了话头。

江青笑着将话题转移到了墙壁上悬挂着的的条幅（显然，是毛泽东的手迹。）和室内的摆设及花卉上。

为了从昨天晚上严肃紧张的气氛中解脱出来，江青将我领到了对面一间会客室。

房间很大。

天花板高得出奇。

我们在一张超大尺寸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面前的茶几却是又长又矮。

茶几上青瓷杯里已泡好了菊花茶。

空气中荡漾着一股淡淡的茶香。

茶几上的果盘里，摆放着几样难得一见的异国水果和一种我叫不出名来的蔬菜。

江青津津乐道地跟我谈起了这些花果。

我不得不承认她的审美观和专业知识的绝不逊色于任何一位植物学家。

江青用手熟练地掰开看似十分坚硬的外壳，里面是又脆又白的果肉。

我笨手笨脚地抓起了筷子。

味道虽有些古怪，却十分可口。

尝鼎一脔之后，江青做了个手势，示意我跟随她去另一屋子。

房间里二张大桌子上摊开了六幅地图。这些地图全都是手工刺绣的，做工极其精致。是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这是毛泽东进北京之前转战陕北的行军作战示意图，早已不是什么军事秘密。这也是江青与汪东兴共同回忆并亲手绘制的地图。

解放战争期间，汪东兴一直是毛的贴身警卫员，负责毛的安全保卫工作。

当然，为了制作这几幅地图，江青还从军事部门调阅了一些相关机密档案。

桌子的另一边，与我们一起观看地图的是一位军事专家张清华同志。

他说话吞吞吐吐的，欲言又止。

在一个外国人面前“泄露”国家机密，显然，他还没有作好完全的思想准备。

江青接着介绍说，转战陕北期间，张清华一直是某军事部门的负责人。现在，他是国家测绘总局的主任。

他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堪称解放军的“活地图”。为毛主席指挥打赢这场战争，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

“关于这场战争，至今仍有人不服气。说毛泽东只是运气好而已。”活地图张接着说道：

“江青同志手绘的这几张地图虽未公开发表，却是历史的见证。”要说毛泽东的运气好，有时还真是“好”得匪夷所思。

建军之初才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蒋介石领着数十万军队来围剿，被毛泽东牵着鼻子在山沟沟里打转转。

一转就转了四回。

回回都转得蒋介石鼻青脸肿，无功而返。

有人不服气，从莫斯科请回了王明。

王明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自己被扫地出门。

三十万红军拖家带口，好容易走到了湘江边。

王明前思后想、左想右想、胡思乱想了一个星期，在河边整整想了七天也没想出个“好主意”来。

等到敌人在对岸边架起了机枪，修好了工事。才想好了要过河。

结果将三十万红军中的二十七万人扔在了河里。

毛泽东运气“好”，红军走到遵义走不动了。

不得不坐下来开了个会。

会议通过让毛泽东领着大家再“碰碰运气”。

于是，毛泽东带领着区区不足三万人的残兵败将，四渡赤水河、飞夺卢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居然运气好得不得了，生生地将红军带出了绝地。

红军到了陕北之后，毛泽东的运气更是好得不得了。

张学良捉了蒋介石。将国民党扼杀红军于摇篮之中的那只手拔了出来，与共产党握在了一起。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八路军赢得了宝贵的八年时间，迅速地壮大起来。

等到蒋介石回过神来，让胡宗南占领延安城的时候，国军在山下走着，共军在山上藏着，最近距离不足二十米。

共军队伍中人无声、马不鸣。

说句不该说的话，此时只要有人忍不住放声响屁，他必将成为改写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人。

你说，这能说不是毛泽东的运气“好”么？

可是，毛泽东本人从来不认为他个人有什么本事，更不相信世上有“运气”这种东西。

只有江青知道主席不仅仅只是运气好，而是主席身边有许多能征善战的爱将。如：彭德怀、刘伯承、陈毅和林彪等人。

进屋时，江青的手中握着一把刚从西北黄土高原的坡地上采集的野花。

这就是江青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那段日子，在江青自己的记忆中留给她的只有平等意识。她是毛的妻子，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没有因毛的伟大，而自觉自卑；同样，也没有因自己是毛的女人而比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妻子更优越。

江青自己整理的影集，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切。

在其后的岁月里，她的美丽和智慧，在十亿中国人的心目中整整保留了三十年。

在三十年代中期赴延安的外国人士的眼中，毛泽东已经确立了他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的领袖地位。关于这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1938 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亦有译为《西行漫记》的）便是最好的佐证。

在中共无数杰出的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学识和魅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便将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

自然，江青亲历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共党史宣）。无论是她的资历还是她本身的素质都不足以说明她对这场战争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她只是默默地站在这场战争的一方的最高指挥员身后，抄写笔记、端茶倒水、传达信息……，尽了一个年青妻子应尽的本分。

在江青的记忆里，那段日子是最艰苦的，但同时也是最幸福的。

我甚至注意到，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江青不再用“我”，而是用“我们”来表述。不觉之中她已经将自己完全融入到了毛泽东的事业之中。

关于这点，读者可以从埃德加·斯诺 1930 年为毛泽东写的自传《西行漫记》中找到答案。

在这本书里，毛泽东告诉了斯诺红军是怎样从弱到强，在蒋介石的围剿中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有趣的是毛泽东使用的第一称谓同样不是“我”，而是“我们”。

毛泽东口中的“我们”说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整个“红军”。这场战争不是毛泽东他个人的胜利，而是“人民”的胜利！

为什么我们要将 1940 年的这场与我们的敌人和旧习俗所进行的斗争称之为“解放战争”呢？”

江青开口道。

始于 1947 年 3 月 13 日至 1949 年 6 月 12 日，毛泽东转战西北这几年的日子，也可说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但它却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尤其是最初的两年。一直被胡宗南追着屁股打，几次险些丧命。

在江青的指导与主持下，这些斗争传奇与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被整理出来，以文艺的形式登上了舞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黄河协奏曲》、《沙家浜》和《红灯记》等八个革命样板戏。

经过长征，红军撤退到了西北，并就地建立起了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

在其后的十二年中（1935年至1947年），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成了抗日斗争的堡垒，而国民党反动派却躲到了峨嵋山上。保存实力，苟延残喘。

共产党一直这么说，江青她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听完江青的介绍，我竟然对峨嵋山产生了一种神往之情。

如果，我想说的是“如果”历史可以假设，我一定会穿过时间隧道陪同江青一起登峨嵋山的。当然，是上山摘桃子，而不是下山去偷别人的桃子。

江青似乎对峨嵋山情有独钟，有说不完的话。

说着说着，江青突然在我面前大声地朗诵起唐朝诗人李白的《庐山谣》来。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晚年的作品。

此诗浓墨重彩地描写庐山的景色，不仅写出了庐山的秀丽雄奇，更主要表现了诗人狂放不羁的性格以及政治理想破灭后想要寄情山水的心境，流露了诗人一方面想摆脱世俗的羁绊，进入飘渺虚幻的仙境，一方面又留恋现实，热爱人间的美好风物的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

全诗风格豪放飘逸，境界雄奇瑰玮，笔势错综变化，诗韵亦随着诗人情感的变化几次转换，跌宕多姿，极富抑扬顿挫之美，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作品原文：

我本楚狂人，
凤歌笑孔丘。
手持绿玉杖，
朝别黄鹤楼。
五岳寻仙不辞远，
一生好入名山游。
庐山秀出南斗傍，
屏风九叠云锦张。
影落明湖青黛光，
金阙前开二峰长，
银河倒挂三石梁。
香炉瀑布遥相望，
迴崖沓嶂凌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
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
好为庐山谣，
兴因庐山发。

闲窥石镜清我心，
谢公行处苍苔没。
早服还丹无世情，
琴心三叠道初成。
遥见仙人彩云里，
手把芙蓉朝玉京。
先期汗漫九垓上，
愿接卢敖游太清。

这首诗作于公元760年（肃宗上元元年），即诗人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回来的次年。

李白遇赦后从江夏（今湖北武昌）往浔阳（今江西九江）游庐山时作了这首诗，那时李白已经历尽磨难，始终不愿向折磨他的现实低头，求仙学道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此诗为写景名篇。诗人以大手笔描绘了庐山雄奇壮丽的风光，可谓描写庐山的千古绝唱。

同时，此诗也表现了诗人的豪迈气概，抒发了诗人寄情山水、纵情遨游、狂放不羁的情怀，表达了诗人想在名山胜景中得到寄托，在神仙境界中逍遥的愿望，流露了诗人因政治失意而避世求仙的愤世之情。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起句即用典，开宗明义表达胸襟：我本来就象楚狂接舆，高唱凤歌嘲笑孔丘。

孔子曾去楚国，游说楚王。接舆在他车旁唱道：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

嘲笑孔子迷于做官。李白以楚狂自比，表示了对政治前途的失望，暗示出要象楚狂那样游诸名山去过隐居生活。

“凤歌”一典，用语精警，内容深刻，饱含身世之感。

接着诗人写他离开武昌到庐山：

“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诗人以充满神话传说的色彩表述他的行程：拿着仙人所用的嵌有绿玉的手杖，于晨曦中离开黄鹤楼。

为什么到庐山来呢？

是因为“好入名山游。”后两句诗，既可说是李白一生游踪的形象写照，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寻仙访道的隐逸之心。

以上是第一段，可谓序曲。

然后转入第二段，诗人以浓墨重彩，正面描绘庐山和长江的雄奇风光。

先写山景鸟瞰：

“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

古人认为天上星宿指配地上州域，庐山一带正是南斗的分野。

屏风九叠，指庐山五老峰东北的九叠云屏。

三句意谓：

庐山秀丽挺拔，高耸入云；树木青翠，山花烂漫，九叠云屏像锦绣云霞般展开；湖光山影，相互映照，烘托得分外明媚绮丽。

以上是粗绘，写出庐山的雄奇瑰丽；下面，则是细描：

“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金阙、三石梁、香炉、瀑布，都是庐山绝景。

这四句是从仰视的角度来描写：金阙岩前矗立着两座高峰，三石梁瀑布有如银河倒挂，飞泻而下，和香炉峰瀑布遥遥相对，那里峻崖环绕，峰峦重叠，上凌苍天。

接着，笔姿忽又宕起，总摄全景：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旭日初升，满天红霞与苍翠山色相辉映；山势峻高，连鸟也飞不到；站在峰顶东望吴天，真是寥廓无际。

诗人用笔错综变化，迂回别致，层层写来，把山的瑰玮和秀丽，写得淋漓尽致，引人入胜。

然后，诗人登高远眺，以如椽大笔，彩绘长江雄伟气势：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朗诵完李白的诗，江青累了。

江青提议休息一下。

走时对我说：

“我会安排人将这首诗的复印件交给你的。”

我感觉得到江青的态度是认真的。她殷切地希望我回美国后一定要认真地研读一下这首诗。

江青的认真，让我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那句最著名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江青还向我认真地推荐了毛泽东所著的《论持久战》。

你说，中国有那么多人。中共有那么多有头有脑的领导人。为什么只有毛泽东能看出来对日斗争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历程，而且必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的呢？

林彪说过：

“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的一个伟人。”

这话，我很以为然。

我们又回到了那间有地图的屋子里。

地图上用红、蓝两种颜色清晰地标示出了 1945 年 8 月至 1946 年日寇投降之后红区与国统区的面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给中国的对日持久战划上了句号。朱德统率的八路军和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不用江青介绍，我也知道他们都得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随着日寇的战败投降，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面对面地推向了国民党。

这时，共产党已经有了一支一百二、三十万人军队和根据地的一亿三千万的人口。

而国民党军队有四百三十万，国统区有三个亿的人口。而且占据着绝大多数的大、中城市和全国的交通要道。尤其是美国人还挺乐意提供飞机和军舰，颠簸颠簸地为蒋介石运送兵力。

那时候的飞机和军舰可是个稀罕玩艺儿。

一开始，蒋介石还挺开明。打算将美国人送他的洋玩意儿“匀出”一点儿给八路军。

共产党可没领他的情，而是诙谐地给他取了个外号：“运输大队长”。

国军的败家子作风在中国现代史上也算是一绝。

话说内战中期，国军的装甲部队几经战斗仗打得虽不甚像样不过人员、装备的损失不小。

为了补充装备，当时的装甲兵参谋长蒋纬国中校便向美国人求援。

大美帝国财大气粗又刚刚打完二次大战，手里的会喷火的钢铁剩余物资在太平洋诸岛上扔得到处都是，有人愿意要这些东西便随手甩来毫不在意。

古有明训：

“千金散去还复来。”

这些东西来得太容易了国军便也不如何放在心上，除了部分 M5 轻型坦克补充了战车 1、3 团以外，剩下几百辆的坦克、装甲车卸船后就扔到了上海龙华码头晒了一年多太阳。

49年5月，解放军兵临上海，国军才想起来还有这些东西。

无奈时候已晚，除了部分M4、M10来得及撤到台湾以外，剩下的数以百计的各色坦克、装甲车便留给了陈毅，后来成为解放军组建水陆战车师的本钱。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作为一个强者，他对自己的对手和敌人经常有一些幽默的评述。

比如，毛泽东对反动势力的政治代表蒋介石，虽然也批判，但也经常表扬。

毛泽东多次将蒋介石称作解放军的“运输大队长”。

这样的称呼完全是一种幽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毛泽东的强者风范。

可是，中国的某些右派文人却坚持认为：毛泽东是真心实意地感谢蒋介石。

并且著书立说，以为佐证。

虽然他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都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面，根本就没有“运输大队长”这个头衔。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确说过感谢蒋委员长的话，感谢蒋某人送来了武器弹药，是人民军队的运输大队长。

蒋某人真的是运输大队长么？

他可是拿着枪来屠杀人民和人民军队的呀！

为什么要感谢他？

因为毛泽东和他的军队正是依靠夺取蒋介石带送来的武装战胜蒋介石的。

毛泽东说感谢蒋委员长，正是一个强者才能说的话。是一个胜者才能说的话。

如果毛泽东被蒋介石打得一败涂地，毛泽东还能说出这种话么？

江青接着给我背诵了一系列的数字也进一步地证实了这一不争的事实。

这些数字包括战场规模、军队数量及人员和物质的损益（此消彼长）。

看到我手忙脚乱地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录着这些数据，江青笑着对我说：

“别急，我会叫人将这些资料整理好给你的。”

我情不自禁地用刚学会的几句中文答谢道：

“将来，这都是一些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是的，我想也是的。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资料，不容篡改的历史资料！”

江青大声地肯定了我的想法。

只可惜当时对江青的“激动”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尤其是她为什么要用“篡改”这个动词？

更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就连我给江青写的这本传记，也是被人改得乌七八糟，面目全非。并且是在四十年之后才与中国的读者见面。

后来，我又学了一句中文：“改天换地。”

毛泽东创立的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中国共产党都被人改成了为少数人首先富裕起来的致富工具，甚至还有人想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改成资本主义的宪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改改本人区区的一本书，又算得了什么呢？

江青当时提供给我的资料都是中文版的，不得不临时找人翻译成英文。

当我将这些英文资料整理出书，四十年之后香港某大学的某某教授才组织了一班学生，将早已被人改得面目全非的我的小说再翻译成中文。

这也就难怪我的中国读者们对我给江青写的传记《江青同志》为什么会被改成《红都女皇》而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是啊，没有“改”，就没有“变”。

没有改变，就没有进步。

被篡改了的历史，终究有一天会被人再重新改正过来的。就象有人说：“永不翻案！”。可该翻案的时候，总是会被人再翻过来的。

难道不是吗？

采访期间，江青还曾对我提到过 1940 年的时候，美国人基本上采取的是中立的态度。还是在支持蒋介石或是选择红军之间摇摆不定。

于是，他们派了一个三人团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之后，结果美国人的屁股坐在了蒋介石的一边。

不过，山姆大叔历来都是要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的。1945年10月10日，美国人出面调停，好歹让国共双方坐下来签定了一份《双十协议》。

《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受降等12个问题。

这12个问题中仅少数几条达成协议，在军队、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

《双十协定》公布不久，即被蒋介石公开撕毁。

尽管如此，但《双十协定》的签订是有其意义的，教育了广大人民，特别是中间势力，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当局陷入被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威胁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因素开始减少，抗战中出于共同目标而隐藏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开始浮现。

在东北、华北及中原部分地区，国共两党的军队竞相展开城市管辖权与战略物资的接收。

同时，苏联把在东北地区缴获的原日军轻兵器及部分战略物资，转移给由林彪率领的东北解放军；国民党则从美国方面取得了军事援助，由美国海空军负责运送国民革命军前往华北、东北地区，两党在部分地区对政权的控制展开了零星的冲突。

1945年8月，出于已取得战略主动权，蒋介石接受了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提议，三次电邀毛泽东前往重庆商讨国内和平问题。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飞至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展开和谈。

会议召开前，两党公开表示在谈判期间实行停火，但实际上为取得更多的谈判筹码，两党军队对战略要地的占领与反占领，在谈判期间从未中断。

谈判期间，共产党坚持抗日根据地拥有独立主权，但同意交出分布在海南、湖北、浙江、河南一带共13个根据地，由国民党接收，并为两党间意识形态的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构想，淡化两党的意识形态对立。

国民党则坚持，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即为共产党所占有的延安革命根据地保持不变外，其他地区一律收回，并要求将人民解放军纳入由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统一指挥。

共产党拒绝把军队交给只有国民党控制的政府，只表示会对军队减员，并要求在建立真正民主的政府后才交出军队。

毛泽东签完协定之后，即刻便飞回了延安。

蒋介石这才回过神来，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硬着头皮撕毁协定，极不情愿地承担起发动内战的全部责任。

回到延安之后，毛泽东可没闲着。

他指挥八路军争分夺秒地收复失地，扩大武装。并逐渐将触角向小城市和中等规模的乡镇伸去。

同时，诱惑国民党的小股部队钻进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然后一口一口地将他们分散“吃”掉。最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

毛泽东十分懂得“有利、有节”，命令部队：所有战斗，都必须在根据地内进行。

毛泽东采用的依然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术。专找敌人中的“软柿子”下手。

不仅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更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消灭他们——瓦解他们的斗志。

江青接着补充说：

“八路军抓了俘虏从来不杀，只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后，让他们自由选择：‘是走？或留？’。”

那些选择重回国军的人，结果成了共军的“义务宣传员”。

这就是共产党的高明之处。

江青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一直坚持转战陕北，不肯过黄河。他同时在指挥着两支军队。一支是我们自己的；另一支是敌人的。

他总是能将敌人“领”进包围圈，然后再一举歼灭。

我亲眼目睹了他指挥的每一场战斗。可以说，主席不是在打仗，是在进行他的“艺术”创作。

你如果懂得当时的形势，那么你的体会就更深了。

当时，我们的敌人伸出了两只拳头打我们。

一只是在中国东部，在山东。即我们称之为胶东半岛的地方。

另一只就是在中国的西北了。陕西的北部地区。我们称之为陕北。

敌人集中了二十多万的兵力，对外宣称三十万。而我们只有二万人，能与之对抗的兵力不足敌人的十分之一。

我们不占地盘，不跟敌人“拚”实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哪怕是“丢”了延安，主席也不在乎。

主席在乎的是，如何大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主席就在陕北，淡定地指挥着全国的战斗。

中国有句成语：‘运筹帷幄’。

你知道吗？”

这个我懂。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听说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当年“如果”，我说的是如果过了黄河，那么，中国的历史恐怕就得改写了。

你说，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在后来的谈话中，江青补充说，撤出延安后，真正打击敌人的拳头在胶东半岛。就在她的家乡——山东诸城。

她估计敌我的兵力对比是 9：1。

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说：

“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但是我们的腿比敌人的长。更何况战斗是在我们的地盘上打。在解放区，敌人就是‘瞎子’。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能不败么？”

随着战争的进行，人心越来越向着我们。

在大多数地区，通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分到了穷民的手里。

你说，在中国是地主多？还是农民多？

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就是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就是赢得了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

如同美国搞“选举”，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6

尽管国民党有飞机大炮，但江青还是侥幸地活了下来。

江青的表情开始变得和缓了起来。

她想起来了当年带着女儿李娜紧急避难时躲进地下防空洞时的情景。她俩也加入了洞内其他唱歌人的行列，大家都在唱歌，这样也就不觉得害怕了。

夜幕降临。

飞机仍在轰炸。

她们居住的窑洞附近，已是一片火海。照亮了半边天空。

爆炸声渐渐地消失了。

大家仍在大声地唱着革命军歌。

空袭持续了好几天，并最终迫使毛泽东作出撤离延安的决定。

许多人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个决定。

首先，大部分领导同志和军队都不愿意离开这片他们热爱和付出过许多的土地。他们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建设好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坚持认为，只要撤退到黄河岸边就可以了。

1946年10月11日，部队和中央直属机关已经撤退到了内蒙古的省会卡尔干（今呼和浩特），仍有人抗议毛泽东的决定，在延安磨蹭了好几天。

转移途中，江青无意中听到了一些思想不通的同志们在发牢骚。牢骚都是冲着毛泽东来的。

她将自己的忧虑告诉了毛。

不知是谁在她的身后拍了拍她的后背：

“你是一个胆小鬼！如果你想做懦夫，为什么不加入他们之中呢？！”

江青留在了毛身边。她也是唯一的一名在延安坚持到底的女同志。

她从未有过害怕之感。

她只是觉得在这最困难的时期，自己应该留在毛身边照顾他。

同样，转战陕北途中毛也花了大量的时间照看他们的女儿李纳。

那年，李纳六岁。

当然，毛只能在白天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和她玩一会儿。晚上，孩子们都有专人照看。

在延安的最后几天里，江青经常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

他们每天都在转移，居无定所。

李纳习惯不了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她常哭鼻子，吵闹着要回家。

顺便说一句，据江青回忆，撤离延安之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提出想跟他们一起走。但她年事已高（52岁），毛劝她暂时离开中国。

不过，他们并没有与她失去联系。解放后，她又回来了。

部队是3月18日撤离的。当时号称有25,000人。包括八个旅，组成第一野战军。总指挥是彭德怀。

江青再一次地强调：

部队撤退时井然有序，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战略举措，而不是溃败逃跑。

天气寒冷刺骨。

当天下午部队开拔时，地面上的积雪已超过一英尺。脚踩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直打滑。

大约在傍晚六点左右，所有人员全都踏上了征途，将一座空城留在了身后。

毛是乘坐着吉普车离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

那天晚上，当他们到达延安城北边数公里远的刘桥堡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发现了吉普车，并开始用机枪扫射。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只是吉普车的车顶被打穿了。

吃一堑长一智，有了这次的教训，士兵们学乖了。他们用树枝将吉普车假装了起来。

空袭时留下的弹壳显示，敌人使用了三种子弹——全都是美国制造。

穿甲弹类型、炸药类型和燃烧弹类型。

不久，子弹四面八方从空而降。

江青从未有过打仗的经验，但她并不觉得害怕。

她承认，不害怕并不代表不怕死。她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各自找掩体躲了起来。

空袭过后，她和毛都没有找到他们的女儿李纳。

江青第一次有了一种恐慌的感觉。

极度的恐慌。

一想到他们的女儿就像毛其他的几个孩子一样，要么丢失，要么被炸死？

江青真的害怕了。

这种害怕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还好，有惊无险。

空袭时，李纳躲在了当地一户农民的家里。她就在那儿愉快地玩耍，根本就不知道刚才躲过的空袭有多么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李纳随后便被送到了周恩来领导的西北总部。交给了邓颖超大姐照看。

她俩还真投缘，没几个月就好得谁也离不开谁了。

江青笑着说：

“李纳至今仍叫大姐：‘邓妈妈’”。

从离开延安城的第二个夜晚开始，部队都是白天休息，夜间移动。

见缝插针，能走多远是多远。

第三天，他们到达了高桥镇。在延安城的东北方向，距离不过几英里。

在那里，他们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准备在江华坪打一仗。同时，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会班子成员进行了一些调整。

撤离延安时，中央直属机关称为“第三纵队”，下设四个支队。

江青就在总部机关做协理员工作，一直到全国解放。

现在，毛泽东又将中央直属机关分为了两个部分：

一为“工委”（工作委员会），也称“前委”（前线委员会）；二是“区委”。

组织工作由西北局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具体负责。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属前委。

想都没想，江青接着飞快地补充了一句：

“还有刘少奇同志。叶剑英同志负责区委的工作。”

毛泽东领着队伍朝西穿过长城到了五台山上。

一路上为躲避敌人，部队只能在夜晚移动。

事实上，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转移。常常是疲于奔命，每走几个小时才休息十分钟。

另一路纵队，此时也已经渡过了淮河。

部队在黑暗中行军每每一走就是连着几个小时，一些十来岁刚参军的孩子们一个个精疲力竭、东倒西歪地艰难地行走在队伍里。

江青很幸运地分配到了一匹马。

江青记得有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跟在她的身后，双手紧紧地攥着马尾巴，生怕掉队。

尽管江青已经很累，可不敢睡觉。她怕睡着了会从马背上摔下来。

为了保持清醒，她强迫自己唱革命歌曲。

凌晨三点钟之前，是根本不能睡觉的。这加剧了她的慢性胃病（小时候她就已经坐下了这个病根子。）行走在高海拔的山脉中，常常引发胃酸，并导致肠胃紊乱。

1947年3月31日，部队到达丘家坪。淮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

江青无意中发现一名战士的军帽上仍旧戴着国民党的帽徽。她很生气。

从未有过的愤怒，使她不择言辞地怒斥这名战士。并命令他脱下军帽，摘除帽徽。

有人看不过眼，认为江青小题大做，故作姿态。

但也有人支持江青，认为共产党员就应该戴红星军帽。李维汉便是其中一人。

他是毛泽东的老校友。

只要看到有人仍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他就大叫：

“快把国民党的帽徽摘下来！”

“是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打仗！”

江青跟在李维汉的身后大声附和。

所有依然戴着国民党帽徽的士兵，无人表示异议。全都老老实实地摘下了帽徽。

因为江青。

她不仅是毛主席的夫人，她还是中央工作团的政治指导员。

部队在继续行进。

终于穿过山脉，到达了平原地区。

部队虽然每小时只能休息十分钟，但这并不是最大的困难。更让人受不了的是如何抵御严寒的问题。

江青虽然穿了一件羊皮大衣，可仍然感到冷风直往骨头里钻。

有人贡献出了一小瓶白酒。大家伙轮流喝了一口，顿时温暖了许多。

部队每天白天睡觉，夜晚转移。

周而复始，已成陋习。

中共大部分的老一代领导人甚至在解放以后依然习惯于晚上工作，白天睡觉。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江青同志。

四月初，部队仍在向西移动。

4月5日，到达江杨岔。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支起帐篷，就地扎营。部队已经好多天没有休整过了。

当然，部队停下来不仅仅只是为了睡觉。更重要的是为了收集“三珍”。

盐、毛皮和草药，都是稀缺物质。

转战陕北期间，为了迷惑敌人，部分领导同志使用的都是假名字。

毛泽东给自己取了个化名是：“李得胜。”（决心取胜。）周恩来为自己取的名字是：“胡必胜。”（一定取胜。）

在江杨岔休整期间，为了保密起见中央工作团也更换了名字。对外宣称：“第九支队。”

部队分为四个纵队。

江青依然隶属于中央教导队。

他们的下一站是王家湾。

部队在这里休整了整整二个月，直到六月七日才拔营起寨。

这是一个座落在京平县山脚下的一个十分偏僻的小村庄。全村人口不过十来户人家。

追剿他们的敌人离此地最近的距离不超过六里地。

中央工作团分住在两间窑洞。

江青和主席住一间，周恩来、陆定一和任弼时这三位没带家眷的“王老五”，同住另一间。

江青他们住的是里间。

每当他们四人开会时，江青就不得不走出窑洞，呆在外面的驴棚里。

由于无所事事，江青每每只得用捉虱子和跳蚤来打发时间。

那段时间，江青的体重一直在下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颈上还长出了一个肿块。

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主席才叫江青回屋。

毛泽东一边聆听江青“诉苦”，一边心痛地抚摸着江青的后颈：

“这一定是臭虫们干的坏事！每天睡在一堆臭虫里，难免不会遭到它们的围攻。这儿，就是‘臭虫总司令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让我们来打一个歼灭战，粉碎‘敌人’的围剿！”

毛亲自动手，为江青认真地捉起虱子来。

回忆此事，江青脸上泛起了红晕，挂满了笑容。

部队隐藏在王家湾这些日子里，江青并不知道中央工作团里发生了多么激烈的斗争。

她只能透过紧张的气氛，有所感觉而已。

敌人离他们越来越近。

从哪个方向？

多少兵力？

不得而知。

继续呆在王家湾，则有可能会遭到敌人的围歼？

如果撤退，则有可能会遭到敌人追击而不得不东渡黄河。这样，将如何保卫陕西？

陆定一坚决主张东渡黄河，并得到了任弼时的响应。

但是，主席拒绝撤退。认为只有留在西北地区打游击，才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两种意见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久议不决。弄得毛泽东精疲力竭、心浮气躁。

散会后，江青成了毛的临时“出气筒”。

一开始，江青还觉得挺委屈的。可后来当她知道毛并不是真的冲她发火时，便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受气包”。

一做，便做了好几年。

总的来说，在王家湾的日子是平和的。

毛泽东常和她一起走出去，走到人民群众之中。主席很快地便和村里的老人们交上了朋友。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聊天。一聊就聊到了深夜。

说到此时，江青从一个棕色的大文件袋里找出了一张照片（我们见过的第一张照片）。

从江青的动作上可以看出她十分珍视这张照片。因为这能使她回想起以前的生活。

照片有些模糊。

江青剪的是短发，几乎就是个平头。像个男孩。

毛泽东和她与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另外家里还有一个女人（女服务员？）。

窑洞外面有一张粗糙的木制桌子。

那些日子，他们的生活与普通人完全一样。

在王家湾他们（用江青的话来说，应该是“我们”。）组织发动了好几场战役。

陕西省内打的这几仗的组织者虽说是毛泽东，但江青始终站在主席的身后，用她那双女人的小手默默地支撑着主席那高大的身躯。所以用“我们”这个词，对她而言并不过分。

其中著名的战役有“羊马河战役”。

1947年3月青化砭战役后，西北野战部队主力转移到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休整，以部分兵力与敌周旋。

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急于寻找陕甘宁解放区部队决战，集中整编第1、第29军共11个旅的兵力，由安塞、延安、临真等地分三路进至延川、清涧地区。

4月3日又折向子长（旧称安定），连连扑空，兵疲粮罄。

遂改以整编第76师守备延川、清涧，整编第15师第135旅守备瓦窑堡，主力于5日南返蟠龙、青化砭休整补充。

6日，整编第29军第12旅途经永坪时遭西北野战部队的攻击，损失600余人。

后发现西北野战部队主力位于蟠龙西北地区，即以8个旅的兵力，于12日由蟠龙、青化砭地区向西北方向进攻，并以整编第76师第

72 团接第 135 旅防务，第 135 旅沿瓦窑堡至青化砭大路南下策应，企图围歼西北野战部队于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

西北野战部队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指挥下，以第 1 纵队（2 个旅）伪装主力，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诱其向蟠龙西北地区进攻；集中第 2 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 4 旅共 4 个旅的兵力在子长县城西南羊马河地区设伏，求歼孤军南下的第 135 旅。

13 日，整编第 1、第 29 军主力被阻于蟠龙西北李家岔、云山寺一线。14 日晨，第 135 旅沿子长、蟠龙公路两侧高地南下，10 时进至羊马河西北高地时，西北野战部队突然对其发起攻击，迅速分割包围，首先于东山歼灭其 1 个团，继而围歼位于西山的旅部及另 1 个团。

激战至 16 时，将第 135 旅 4700 余人全部歼灭。俘代旅长麦宗禹。

1947 年 4 月 18 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战局的转折点》的社论，指出解放军此次羊马河战役与青化砭战役一样“足称为模范的战例”。

“第一三五旅的被歼，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

“西北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上升，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社论认为，

“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

并预计：

“从四月开始的两三十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成为攻势”。

羊马河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位于王家湾和延安的东南方向等距离的地方。

战后，毛泽东在王家湾总结道：

“此役，彻底扭转了整个西北战局的形势。(1947年4月15日)”

并断言：

蒋家王朝看起来很强大，却是外强中干，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毛泽东的论点，接下来在蟠龙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证实。

毛泽东在羊马河以南的蟠龙设下埋伏，活捉国民党第167师师长及手下6,700名官兵。

此役一举摧毁了敌人的补给站。缴获一万二千袋面粉和四万套军服。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派周恩来亲临蟠龙，召开庆功大会。

说到此处，江青补充道她当时是“政治指导员”，主要负责宣传工作。

此时，国共两党关系已成水火不容之势。

国民党有美国人的援助，而我们呢？

我们只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看我一头雾水的样子，江青接着解释说：

“我们之所以能打败敌人，不是共产党有多厉害，而是蒋介石的士兵犯了太多的战术错误。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共产党，向我们提供武器。他们只是红军的军需官。国民党士兵的下场都很悲惨，他们就

是炮灰。而红军战士个个都有理想，为共产主义而战。所以他们能以一当十，战无不胜！”

这大概就是林彪所说的“精神原子弹”吧。可共产党明明就得了天下，你能说这是荒诞无稽的谬论吗？

8

当部队第一次来到王家湾时，在当地老百姓中引起了很大一阵子恐慌。

国民党的部队刚刚过去，他们席卷了小镇和村庄。

共产党的部队行军途中秋毫无犯，从不扰民。所以他们很快地便赢得了民心。

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的是：国民党抓人，共产党放人（包括政治犯和监狱里的其他犯人）；国民党抢粮，共产党放粮（或帮助农民收割庄稼）。

相比之下，人们自然要感谢共产党。他们不但踊跃参军，而且再三恳求部队不要离开。

“我们不能白吃老百姓的白面馒头。”

这是战士们常说的一句话。

言下之意是老百姓如此对待我们，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部队即将开拔时，许多当地人找到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来了。要求参军。

尽管他们明明知道如此抛家弃子，很可能有去无回。可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这么做了。义无反顾地跟着红军走了。

6月7日傍晚，部队到达陕北与内蒙交界处的一个名叫“小河”的小镇。

雨下过不停。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间窑洞。

战士们请毛泽东和江青进去躲雨。被毛坚决拒绝了。直到所有的战士都安顿了下来，毛才肯进屋。

一觉还没睡醒，侦察员报告敌人已从东面“摸”了上来。

部队只得赶紧离开小河朝田家湾出发。

江青回忆说，接下来发生的戏剧性的一幕，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恐怕无人相信。

大雨磅礴。

一道道闪电划破夜空。

部队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移动，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

更糟糕的是向导迷路了。

他们不得不又退回到原先出发的地方。

这里已被敌人占领。他们甚至可以听得见敌人的说话声。部队顿时安静了下来，相互间只能通过打手势来交流。

毫不夸张地说，此刻只要有人咳嗽一声，或者是马匹打个喷嚏，他们这二百来人（中央工作团和警卫连）就得交待完了。

人不语，马不鸣。

有如神助。

在这最危险的时刻，江青为了不增加毛泽东和警卫员的负担（免得他们分心来照顾自己），故意落在了领导人的后面。

她突然发现自己队伍中唯一的一名“骑兵”。

一名战士赶了上来，拉住了马的缰绳：

“同志，风暴太大，不能骑马。危险——！马容易受惊，会把你摔得满嘴泥的……！”

从战士焦虑的声音中，江青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赶紧下马。

牵着马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

天黑，路滑。

根本看不清道路。

战士们默默地手牵着手，一个跟着一个组成了一条“人链”。就这样从敌人眼皮子底下穿了过去。

黎明前，“人链”移动到了一座山峰前。

走在队伍前面的毛泽东停了下来，等候江青。

部队就地休息。

江青“连滚带滑”地朝主席奔去。

滑到毛泽东身边时，江青第一时间所做的事就是忙不迭地脱下自己的雨衣。

这是整个部队中唯一的一件雨衣。

雨衣早就湿透了。

起初毛泽东不肯，经不过江青“软磨硬泡”地再三恳求，最后主席才将又湿又重的雨衣披在肩上。

江青的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雨在继续地下，一点儿也没有要停的样子。

部队继续出发。

江青和其他同志们一样，拖着又饥又渴又疲倦的身子高一脚低一脚地继续赶路。

跟在毛泽东身边的先锋营的一名警卫员注意到了江青走路东倒西歪的姿态，赶紧地靠了上来。

警卫员拔开随身携带的暖水瓶塞子，倒了一杯“水”，默默地递给江青。

江青接过杯子，喝了一口。顿时一股“暖流”流向心田。

杯子里的不是水，是酒。

江青舍不得多喝一口，转身将杯子又递给了其他的同志们。

天亮的时候，部队停了下来。

大伙儿想找几间房子或窑洞，作为临时指挥所。

结果一无所获。

当地人口稀少，而且找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江青看起来有些郁闷不乐。

周恩来走了过来：

“夫人，怕不怕？”

连他自己也没搞清楚，是想问：“怕不怕挨饿？”还是“怕不怕吃苦？”

江青想都没想，反问道：

“我怕什么？”

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这不，有两百名战士陪着我。我不是孤单一人的。”

（这时，会客室里旁边坐着的一位女同志插话道：“她打从娘肚子出世就没有吃过这样的苦，你说她‘怕不怕’？”。）

6月9日，部队转移到了田家湾。

侦察员报告，敌人已经被甩开了。

于是，部队驻扎了下来。休整了一个星期。

时间没有白白浪费。

他们访贫问苦，深入了解当地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为将来的“土改”做准备。

江青也没闲着。

她什么事都做。有一次还帮助一位卧病在床多日的女人，梳理她那又脏又乱又长的头发。

田家湾有七户地主，控制着绝大多数的土地。

通过与当地的一些佃农交心谈心，江青了解到了这些地主是怎样盘剥农民的。

比如说，有一位佃农他租到了九十亩地，但他仍然无法耕种。因为他没有犁或其他农具。

虽然土地的租金很便宜，但农具的使用费很贵。一年忙下来，粮食都进了地主的粮仓。佃农们的生活依然艰苦。

1947年夏天，毛泽东仍然牢牢地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敌人就像“瞎子”一样，跟在共军的身后。

毛泽东很辛苦。

他要负责指挥两支部队。

一支是自己的，另一支是敌人的。

总得来说，他得让自己的人“跑”。然后，再让敌人来“追”。

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毛泽东就这样牵着敌人的鼻子在陕北兜圈子。

有意思的事是，共军每每住窑洞或直接进村子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而“胆小如鼠”的国军却只能露宿在山上。

这里是根据地，老百姓早就被赤化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追的共军舒舒服服地呆在家里烤火；而强大的国军却只能猫在寒风刺骨的山顶冻得打哆嗦。

寒冷的天气不仅冻僵了国军士兵的关节，更主要的削弱了敌人的士气。

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擅长的“山地游击战”，看起来有很大的风险，实际上却更安全。

毛泽东走的这步险棋，自己人都不敢想，敌人就更想不到了。

毛泽东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鱼”，老百姓是“水”。

鱼儿离不开水。

由此可见，毛泽东并不是盲目地在走险棋。

几个月过去了。

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变得更融洽了。

不但如此，老百姓还主动地担当起了共军的“守护神”。

他们只要看到队伍中有几匹马或几个带手电筒的同志，便知道毛主席在队伍中。

可他们从不向敌人透露这些。哪怕是面对刺刀和死亡的威胁。

（说到这儿，江青低声地对我说道：“他们帮助我们保守秘密。”）

江青接着说，按照主席的战略部署，中央工作团继续向西转移；主力则向东而去。意在迷惑敌人，保护党中央。

中央警卫团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向南挺进到了安塞。江青跟着这支队伍最早到了附近的何家圪。

小分队里的另一位同志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插曲：

有一天，他掉队了。

突然间与几名国民党士兵撞了个正着。

情急之下，他大喊了一声：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这一嗓子将敌人弄糊涂了。他们本能地以为灌木丛中一定埋伏着很多人，枪口正对着自己。于是，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一个人抓了七个俘虏。

一时间成了根据地的美谈。

在那些日子里，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是共产党的朋友。尤其是一些地方上的“有头有脸”的有钱人。

他们即不抗日，也不反蒋。

每当有飞机在头顶盘旋的时候，这些人还鼓动老百姓向敌机叩头作揖。

当食物短缺时，他们便囤积粮食。把粮食藏匿在山洞里，即便发霉变质也不拿出来分给大家食用。

江青指出，《红色娘子军》中描写的南霸天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

海南岛椰林寨恶霸地主南霸天的丫头吴琼花，含着几代人的冤仇，不堪忍受压迫与欺凌，一次又一次地反抗逃跑，但都逃不出虎口，一次次地被抓回，狠遭毒打。

几次反抗后，南霸天命人将她活活打死，昏死在地的琼花在电闪雷鸣中惊醒过来，遇到化装成华侨富商的红军干部洪常青和通信员小庞。

琼花在他们的帮助下，决心走上革命道路。

她来到娘子军营地，要求参加娘子军队伍。

洪常青认出琼花，连长批准琼花入伍，并发给她一支枪，娘子军战士们决心打下椰林寨、活捉南霸天。

南霸天的公馆宾客满堂，正为南霸天做寿。

化装成华侨巨富的洪常青到来，南霸天见他气度不凡，接到寿礼后对他更是深信不疑。

夜深，琼花带领一名女战士化装成丫头，潜入南府，准备里应外合捉住南霸天。

但琼花见到仇人分外愤怒，贸然行动致使南霸天漏网。

连长严肃批评了琼花并收回她的枪，让她深刻反省，琼花对自己的错误悔恨不已。

部队又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但洪常青为掩护主力不幸被俘，面对凶残的敌人，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琼花继任党代表，带领娘子军配合主力解放了椰林寨，击毙了南霸天。

这个故事不仅被搬上了银幕，还被搬上了舞台。是江青主抓的八个“样板戏”之一。

宁夏的经济平衡，依赖于西北地区大量的穆斯林人口。

江青注意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

她被告知，这里三分之二的人民的收入都花在了衣服上。她还被告知，到目前为止，该地区的人们还没有见识过什么是真正的衣服。

当地的妇女总是用十分羡慕的眼光打量她身着的朴素的军装。她们眼里闪烁的亮光，明白无误地告诉你，她们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是真正的布。

他们的衣服大多是用粗糙的羊毛线缝制的羊皮衣。白天是衣服，晚上当被子。而且很不卫生。

和她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天之后，江青发现自己身上和她们一样也爬满了虱子。

即便是汉族而不是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十分奇特的风俗习惯。

江青仍记得当地妇女喜欢在耳前保留一缕长发，其余的则全部挽在脑后。

未婚的女子梳辫子，结婚后则马上要将头发盘起来。

只有极少数的妇女敢剪发——表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

甘肃东部的妇女比西部本地的女人更懂得如何打扮自己，小河的女人也不例外。

在这点上，江青认识的两个女孩给她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她们是俩姐妹，姐姐叫桂花，妹妹叫兰花。

父亲是个地主。

她们的父亲没有按照汉族人的习惯将女儿嫁到夫家，而是为她们“娶”了上门女婿。

为家里添加了两个壮劳动力。

当红军在小河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将岳父的土地分给他俩的时候，无论如何做工作，他俩都不肯接受。

道理讲了一箩筐，也改变不了他们的观点。

即便土地分在他们名下，可土地真正的主人依然是他们的老岳父。

土地改革的经验告诉江青，必须尊重当地的文化意识，尤其是婚姻习俗。

例如，后来她得知广东省南部沿海地区与小河的情况恰恰相反。这里的男人大多下了南洋或移居海外，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人。于是，当地纳妾之风盛行。

这里的地主一般都是妻妾成群。这些娶回来的媳妇不是让她们在家享福，而是要下地干活的。

记得当年在梅县搞土改的时候，有一个觉醒了的小妾站出来，公开辱骂她的“丈夫”。

这个故事最后被编成了戏剧，被广泛传颂。

地主打倒了。

女人解放了。

江青笑了：

“听说当地政府分了一块很大的地给她，作为奖赏。”

战争，代价是昂贵且痛苦的。

尤其是对于连续两年没有过一天正常日子的人们来说。

共产党要想在陕甘宁边区恢复大部分被敌人占领的县城，除了战争，他们没得选择。

他们所到之处，旨在重建与当地人的融洽关系。只有这样，部队才有可能发展壮大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6 年 7 月至 1947 年 6 月，红军成功地消灭了 97.5 万国民党正规军及 120 万非正规军。

（江青急忙补充说，这里所说的“消灭”，并不是说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指得是被击溃和打垮的敌军人数。）

国民党士兵一旦投降便意味着他们可以成为“自己人”。关键在于如何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改变他们的意识形态。

红军战士对待已经投降了的敌人，主要是通过与他们面对面地交谈，打消对方的顾虑，建立起对红军的信心。进而通过“忆苦思甜”的方式，唤醒他们对国民党的仇恨，从而推动他们加入红军。

这种方式每奏奇效。

一旦埋藏在心底深处久远的痛苦经历复苏过来，感情方面会完全不设防。嚎啕大哭之后，他们会主动要求加入红军。

然而，真正要改变一个人的立场是很不容易的。

几个月过去之后，尤其是当初的那股子“仇恨”的怒火消退之后，伴随而来的是一种恐惧感。

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党是如何惩罚、甚至是处死开小差者的。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江青及她的同事们（政治工作者）便“对症下药”，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

这些“反正”过来的战士中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在他们自己的家乡或居住过的城镇工作。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经就是分给他们土地。

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根据各自不同的穷困程度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他们。

一旦他们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这些反正战士，不仅感激共产党，而且作战十分英勇。

就这样，共产党用地主的土地，成就了自己的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这些脱离了国民党的反正战士，并不是红军兵员的唯一来源。另一部分新兵是来自农村的青年。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但适龄青年仍然踊跃报名参军。

经过一个星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这些新兵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在短期内成为勇敢的战士。

而所谓的“政治教材”，有时就是一顶装饰着红星的军帽。

刚参军入伍的战士，极少有人能分配到一套完整的军服。

然而，正是军帽上的这颗“红星”，使这些思想纯朴的农村青年，认定了自己是属于共产党阵营的人。

江青愉快地回忆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了自己的各式各样的军服。”

当话题转移到西北的军事史上时，江青的表情开始变得严肃起来了。

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的较量，胜负每每取决于来自敌人内部的“参与者”。

参与者分两种：

一是共党所言的“叛徒”。敌人的叛徒，便是人民的朋友。二是共党的间谍，即所谓的“潜伏”者。

江青提到了两个人的名字。

一个叫“王朝普”，另一个叫“颜长凌”（音译）。

后者江青认识。是一个爱夸夸其谈的人。

江青解释说，当他们从小河向田家湾转移时，敌人明明占领了山顶，可颜长凌提供的情报却说敌人在山脚下，让部队绕过去。

跟随部队转战陕北时期，江青不仅要“政治工作”（组织上分配给她的工作）。而且她还要为主席做鞋。尽管做群众工作占去了她大部分的时间，她仍然默默地尽着中国式的贤妻良母的义务。

这些事鲜为报道。江青就更不能王婆卖瓜自吹自擂了。在她看来，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毛主席。

10

春天老是下雨，几乎每天都下。而到了夏天，天气却又异常干燥。田地就像刚被烘干机烤焦了似的，看不见一粒粮食。

军队和老百姓一样本来很难买到吃的食物，再加上敌人人为的破坏，使得自然条件变得更为恶化。

国军所到之处，家禽被杀了，农作物被毁了，只有粮食被老百姓藏起来了。

处处是：“鸡犬之声不闻。”

1947年8月1日，红军离开小河向西北方向转移。部队行军的速度很慢，平均不到每小时三公里。

十天之后，他们到达了绥德。

过去，这儿是商贸中心，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现在，随着人口的急剧减少，一切都颓废了。

部队刚刚到达，还没来得及埋锅造饭，敌人就突然从三个方向包围了过来。

部队不得不马上撤离。

8月17日，到达桥兴镇。这是途经白龙庙，黄河西岸边的一个小镇。

短暂的几个小时的休整时间，给江青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她买到了几个青苹果，想缓解一下主席紧张的压力。

敌人仍在从三个方向对他们紧追不舍。

一支从南面的吴范；一支从西面的榆林，另一支则从榆林的西南恒山方向压了过来。

毛泽东召开了紧急作战会议。

一位年轻的军官端了一碗米饭走了过来，说他想到黄河东岸去吃这碗饭。

显然他主张过黄河，撤到陕西去。

“你是个胆小鬼！”

江青一时间忘了自己的“身份”，出言相讥道。（照理，江青是没资格出席这样的会议的，更别说在会上骂人了。）

敌人已经离此地不到五里路远了。

显然，他们还没有找到红军具体所在的位置。

抓住时机，毛泽东果敢地下令：

收缩兵力，朝白龙庙方向突围！

部队成功地突围了出去。

黄河到了。

可对岸才是他们的目的地。

春天的黄河，湍流不息，暗流密布。

如何过河？

情急之下，他们不得不拆除了附近的一座寺庙，搭建了一座临时的“浮桥”。

当最后一人到达对岸后，主席下令拆除了浮桥。

黄河，将敌人“挡”在了对岸。

解放战争，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毛泽东指挥的于 1947 年 8 月第三周开始的沙家店战役，成了西北战场的转折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防御转为进攻，并以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敲开了新年的大门。

8 月 18 日部队经过杨家园子向梁家岔转移。

翌日夜晚到达目的地。

梁家岔是一个很小的村庄。

根本无法隐藏这支几百人的队伍。

双方主力正在向离此地七里之遥的沙家店集结。

毛泽东就在梁家岔通过无线电指挥打响了这一战役。

战至当日黄昏，未使该敌通过青阳川，保障了野战军主力全歼敌整编第 36 师的战斗。

此时，由于葭县之敌整编第 90 师已尾随其主力西进，我即迅速撤出战斗。

现在他们开始向东转移，在一个叫楚关桥的地方呆了几天。

部队没有吃的，只能靠豆角充饥。

然而，战士们精神仍然很饱满。

在这儿，毛泽东写下了《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文，为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指出，随着全国性的战略反攻时机的到来，应该将战场推到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去。

10 月 18 日，部队转战到了谭家坪。

江青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带着她参观了一家造纸厂。

这家造纸厂与当地人民群众的关系非常好。并在当地百姓的保护下得以保存下来。

同样，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对外一律称主席为：“他”。

三天之后，部队转移到了南后地，然后再转移到了沈春范。部队行进在街道上时，老百姓全都出来了。

夹道相迎。

当看到毛主席时，他们高兴地哭了起来。

有人说：

“只要主席活着，我们死了也不怕！”

11 月 1 日，他们驻扎在附近的卢家坪。

接连不断的胜利使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受此影响，江青也感到了历史潮流正朝着自己这边移动。

江青决定暂时离开主力部队，去完成一项个人使命。

她很兴奋，也有些害怕。

她渡过黄河东岸，前往古城双塔。

她是去接回自己的女儿——李纳。

撤离延安后不久，李纳便被邓颖超大姐保护了起来。邓大姐有了更重要的任务要离开大后方委员会，不能再替主席和江青照顾孩子了。

算算，最后一次见到孩子已经整整过去八个月了。

孩子有了明显的变化。

母子俩久别重逢，喜极而泣。

离开双城时，江青带着李纳爬上了城墙。

站在最高处，朝延安城作最后一瞥。

江青突然有了一种怀旧感，深深地怀念起和毛泽东一起在延安生活的那段日子。她第一次感觉到“命运”这种说有就有，说无亦无叫人捉摸不透，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

当江青领着李纳重新归队之前，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正式发表宣言将“八路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有时也被称为“双十宣言”。

在《宣言》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红军的基本精神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指导思想。

可以说，《双十宣言》是引导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纲领性文件。

江青刻意向我推荐了这篇论文。（文章刊登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之中。）

史料记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 1947 年 10 月 10 日公布的政治宣言。亦称《双十宣言》。

毛泽东起草，朱德、彭德怀署名。刊於当日《人民日报》，後收入《毛泽东选集》。

1947 年月 7 月，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

为了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加倍努力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并提出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等八项基本政策。

《宣言》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

提到这段历史，江青给我留下了一种很深的“超然”的感觉。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她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说她是中央工作团“三人小组”的编外人员，并非言过其实。

11月11日，部队继续开拔。

十天后，到达吴陇铺。

欢迎的群众再一次见到自己的部队时，几乎人人泪流满面欣喜若狂。

部队没有久留。

22日，转移到了杨家沟。

比预计的时间更长。这一呆，整整呆了四个月。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从25日到12月28日，中共中央在此地举行了一次特别的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宣读了《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

这篇《讲话》是毛口述的，江青作的笔录。

“都是主席的原话。”

江青紧跟着补充了一句。

各解放区土改运动蓬勃发展，革命进入新高潮。

为了使党的路线政策深入贯彻，毛主席在杨家沟还写了一系列光辉文献，都在四卷内。

回到桌前，江青指着桌上的地图：

“这张地图涵盖了整个华北各战场的战况。1947年7月，蒋介石的部队就开始走下坡路，并即将被淘汰出局。”

1948年的春天，战场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了共产党的手里。12月，开始了全面反攻。（江青刻意提到了刘伯承、陈毅、林彪和其他几位将军的名字。）经过新式整党整军运动之后，共军的主力部队已将战场推进到了国统区（蒋介石军队的实际控制区）。

华北地区，晋察冀（山西、察哈尔、河北省）、晋冀鲁豫（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山东渤海很快连成一片。

华北人民政府即将成立。

次年秋，又迁往阜平县史家寨乡家北村，称家北旧址。

旧址为窑洞建筑，窑洞分上下两层，共有窑洞35个。

在这简陋的小屋里，毛主席曾写下了《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两篇重要著作。

1948年3月，江青已明显地感觉到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坚持转战陕北的目的已经达到。

毛决定重新整合前、工、后委。

前委：中国共产党中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于前线设有领导对敌作战的前敌委员会，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曾设立类似的前线委员会，都简称“前委”。

工委：党工委（全称：中国共产党XXX工作委员会）是一级党组织的委员会的派出机构，是指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同级党和国家机关或某行业（系统）、某地区的领导而派出的领导机构。

后委：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曾分为前委、工委与后委。

后委在其存续的一年时间里，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3月21日，江青随主席离开了杨家沟前往河北平山西北坡。

傍晚时分到达吉成店。

3月23日，经川口渡黄河，到达山西省的寨则山。

3月26日，经双塔到达蔡家崖。

4月4日，到达苛岚县。

运气不错，他们在这儿捡到了几辆敌军遗弃的吉普车。

四个轮子毕竟快过两条腿。有了“新”的装备，行军速度快多了。

队伍继续朝神池进发。

朝北翻越长城，然后再折回头继续前进。

4月6日，到达代县。

1948年有晚春，大雪依旧覆盖着五台山脉。山口的风巨龙般怒吼着，向所能触及的一切渲泄它疯狂的力量，雪团像冰坨子一样兜头砸下来，把人砸得踉踉跄跄。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手牵着手，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艰难地向前一步一步地挪动着。

刚下的雪太深，他们不得不高抬腿并向后倾斜着身子，才能向前挪动一步。

好容易到了山顶。

江青一边回忆，一边演示着行进的动作：

“随着气压的下降，我们的一些同志，当然也包括我，开始觉得头晕和眩晕。甚至连主席都感到反胃。”

部队终于翻越过了海拔近一万英尺高的五台山。

如果那天不过山就要再拖到第二年化雪后才能过了。

就在这里，毛泽东写了《再克洛阳后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主要规定了我党、我军在解放城市时的政策。

洛阳是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期间的重要据点。

1948年3月14日，解放军首次攻克洛阳，以后为便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又主动撤出。

4月5日，解放军再度攻克洛阳。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前线指挥部起草电报，指导接收工作。

1948年4月11日过了五台山，向北不远便是内蒙古了。

江青说：

“上山气压太低，一过山呼吸就好了。雪很深，踩下去一步还得退一下。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他一直在我身旁照顾我。”

同一天，他们经五台山，过杨林街，浏览了五台庙。

山上的庙很多，根本走不完。早年在北京时，江青对此便有所耳闻。庙里的和尚，有些人还是当地的地主。

13日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敌人飞机跟上来了。

有内奸用电台指挥敌机轰炸。

每个炸弹有25磅，5~10个捆在一起。

18日到达花山，敌人盲目轰炸，对山上的白杨树也扔很多炸弹。而他们就躲在山脚下，安全得很。

在敌机的狂轰烂炸中，毛泽东淡定地写了好几篇文章。

江青回忆道：

“天气转暖，堆积在花山悬崖峭壁上雪堆融化成了壮观的瀑布。”

1948年4月18日，周总理到西柏坡打前站。

毛泽东5月27日到达西柏坡，即今天的平山县。

毛在西柏坡住了10个多月，写了大量光辉文献，直接组织指挥了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

亲自主持召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政治、经济、外交的基本政策。

这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渐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纲领。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明确指出，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各项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

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为此，全会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在政治方面，会议分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由于这些基本矛盾的存在，会议强调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

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作用。

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离开西柏坡经保定到达北京，并在西郊机场检阅了部队。

这是共军最高统帅在解放战争史上唯一的一次阅兵，也是半年后举行的开国大典阅兵式的一个预演。

此次阅兵，毛泽东还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参加。

此次阅兵，是党中央对解放军部队进驻北平前的一次检阅，也是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第一次在北京检阅自己的军队。

江青说：

“.....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了三大战役。”

听这话，一开始我有点儿懵。

心里直纳闷：

“这牛皮也吹得太大了点儿吧？”

再想想，也对。

并非言过其实。

毛主席指挥打仗。

江青指挥主席吃饭、睡觉。也包括给主席做鞋、梳头。（主席爱留长发，梳头是他唯一的“享受”。）

整个解放战争，从挨打到反攻，江青一直都呆在主席身边。可不是她俩在共同作战么？

不是有那么句话：“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么？

提及三大战役，江青想都不用想，各种数据了然于胸：

“着重讲一下三大战役。主力决战，只给数字。辽沈：歼敌 33 个师，47.2 万余人；淮海：歼敌 5 个兵团 56 个师，55.5 万人；平津：连消灭带起义，第 39 兵团，52 万人，共歼 158 个师，154 万余人（正规军）。这时敌军 290 万，我们 300 万军队。”

一气呵成。

天亮了。

三个小时又过去了。

从昨天的傍晚开始，江青已经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好几个小时，几乎没有中断，也看不出她有任何疲倦的迹象。

像是有 N 个 G 的笔记本电脑的内存一样，整个解放战争全都装在了江青的脑子里。

可以理解，毕竟那是她亲身经历过的岁月。

（第一部完）